

超越残疾与苦难

——论史铁生的反现代性书写

汪树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史铁生确立了超越精神立场,执着地探讨人性的有限性,关注人的生存困境、生存悖论,发掘人的超越可能,批判革命现代性的阶级论、身份论、理想主义和权力意志的合谋,对启蒙现代性的科学崇拜、理性崇拜、欲望化、主体论、进步论等核心因素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反现代性倾向。这种立足于超越精神的反现代性书写,对于拆解开现代性迷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史铁生;反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启蒙现代性;超越精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01-08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量级作家,其特殊的残疾遭遇倒逼着他向人性和文化的边界冲击,探索人性的终极可能,叩问灵魂的永恒处境,思索命运的幽深奥秘,从而铸就了其小说散文远远超越前辈的先锋性。可以说,他的《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作品必将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淀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散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本文主要探讨史铁生小说中呈现的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

要理解史铁生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必须从他对人的基本的生存困境的把握和体悟入手。应该是受双腿残疾的直接影响,史铁生无论是思考人生还是理解文学,均从生存困境着眼。对于他而言,人生存在着三种最基本的生存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

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1]193}与别人难以彻底沟通的孤独,欲望难以满足的痛苦,死亡的恐惧,这三种困境,无论人类文明如何发展进步,最终都是不可克服的。这才是永恒的生存困境。

相对而言,史铁生的小说对人孤独的生存困境展示得最为充分。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试图寻求别人的理解,寻求爱情,寻求心魂交流,但是往往不能得偿所愿,乃至心力交瘁。短篇小说《别人》中,主人公正经受着婚姻的变故,似乎和所有人都无法正常交流,最终发现别人是遥不可及的,“我也不知道别人都是要到哪儿去,总之等到天完全黑了的时候,等到午夜,大家就都不见了,都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我与别人、与所有的别人的距离,应以光年计算。把各自的阳光反射到对方的视网膜上,但中间隔着若干光年”^{[2]394}。面对着以光年计的距离,孤独便是无法逃避的宿命了。

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主要围绕的也是人的交流和阻隔、爱情和怨恨,最终依然落实到无法驱除的孤独困境。作家C(残疾人)和X,F医生和导演N,

收稿日期:2020-06-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的反现代性价值取向整体研究”(10YJC751084)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男,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生态文学研究。

画家 Z 和女教师 O 等等,无不渴望着心魂的交流,渴望着爱情,但终于还是被身体的残疾、政治的身份、个体性情的差异等阻隔,心魂异地睽隔,爱情梦断现实。

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延续的还是《务虚笔记》中爱情和孤独的主题,丁一和秦娥、吕萨试图越过爱情的常规界限,为的就是寻求心魂的真正交流。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丁一在“文革”之初去参加革命组织,很快就发现,根据出身所有人被划分为“我们”“你们”“他们”。政治身份的划定,构筑出人与人之间森然的界限,心魂的交流陷入障碍之中。后来,丁一更是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遥远距离,甚至连肉体也成为人与人之间阻隔的边界,“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3]130}。当然,像丁一这样的心魂,并不愿意困于孤独之中,他这个迷失于尘世中的亚当不断地与女人交往,就是想找到那个心魂相通的夏娃。“这永远的行旅只是出于孤单,这孤单的心魂只是期求着与他者的团聚。”^{[3]84}因此,要理解丁一和秦娥的立约,那是对赤诚袒露的渴望,“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儿,也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一旦像现在这样,我们一同走进月光,走进幽暗,那就是我们的舞台,夜就把我们带进了戏剧,带进了一切都是可能的时间,带进了无条件的坦诚与信任。在那样的时刻,没有遮掩没有羞耻也没有歧视,一切愿望都是正当,没有什么话是不可以说的”^{[3]236}。但是,最终丁一和秦娥、吕萨的越界爱情无法维持下去,丁一再次被病魔击中,中道殒命。这无疑是人性的终极悲剧。

史铁生在小说中还特别喜欢呈现人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困境。最令人深思的无疑是短篇小说《原罪·宿命》中《宿命》里的悲剧,主人公莫非年轻气盛,活泼健康,已经办理好了留学手续,正准备展开美丽的未来人生,不料却遭遇车祸,脊髓被撞断,被“种”在了床上。当他回顾事故的发生,他看到了各种偶然,也理解了命运的必然性。“如今当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听见那声闷响仍在轰鸣。它遍布我的时空,经久不衰,并将继续经久不衰震撼莫非的一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声闷响?不为什么。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以后所有的日子。”^{[4]247}从事故前的偶然性来看,只要任何一点改变,莫非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但在事后看来,一切又构成了一条无法解开的必然性铁链,紧紧地勒扣着他的脖子。

偶然性在人生中可以书写美丽的传奇,也可以勾勒致命的厄运,所谓的人生自主性在它的如椽巨笔中只是笑话般的存在。短篇小说《两个故事》中,那个曾经当过地下革命工作者的主人公打入敌后,还没有干什么工作,革命就获得了胜利,于是他被视为叛徒。为了自证清白,他必须找到当初命令他打入敌人内部和他单线联系的唯一上级刘国华,谁知他一找就几十年,最终找到刘国华时,却发现他已经中风不能说话。人生的偶然性、荒诞性让人不由得哑然失笑。而短篇小说《往事》中,吴夜为了追求冬雨,等了几十年,走了几万里路,最终只差一步就走到冬雨身边了,却一脚踏进空电梯里摔死了。这样的命运,也令人深感荒诞。至于微型小说《草帽》,更是写尽了人生的偶然性。小说叙述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在湖边,因为共同帮助老人去追被风吹落的草帽相识了,发现彼此是天作之合;当他们结为夫妻后,再次找到老人,向他道谢,老人却对他们说:现在令他们感到幸福的原因,最终也可能使他们感到痛苦,因此不接受他们的道谢。的确,一顶草帽让那对男女找到彼此的意中人,也肯定会埋下未来某些不幸的种子。命运之风,到底刮向哪一边,无人能够破识。

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生存悖论无处不在。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意味着人的孤独,但是若取消区别,又意味着雷同,意味着活力的丧失,意味着死亡的胜利。正如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所说:“我开始体会了上帝的英明,体会了他的高瞻远瞩,体会了人与人之间区别的重要:人,如果仅仅都是人,便无异于一片沙漠。……设若你无论走到哪儿,所闻所见都是一模一样——一样的人形,或一样的沙尘与沙丘,即便无衣无墙自由辽阔,必也形同监狱。……无边无际的雷同宣告着行走的无效,宣告着想象的枯竭与希望的湮灭,同时宣告着他者或别人的珍贵。”^{[3]185}因此,区别和雷同,就构成一种悖论;与之相应,无法交流的孤独和没有交流的雷同也构成一种悖论。又如,人们不愿意接受苦难,但是没有苦难,往往也很难体验幸福。史铁生在散文《好运设计》中就设想了一个处处被命运宠爱的幸运儿,结果发现这种好运设计行不通。直面苦难,让人难以承受生命之重;取消苦难,又会让人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两难悖论,跃然纸上。

正是循着生存悖论的幽径,史铁生发现了现实世界中善恶、美丑、真假都是相辅相成的。他在《中篇1或短篇4》中曾写:“无恶即无善,无丑即无美,

无假即无真,没有了妄想也就没有了正念……”^{[4]298} 如果要人勉力追求所谓取消所有差别、矛盾的理想社会或极乐世界,他追求到的往往会是一个死亡世界。就像特鲁尔和克拉鲍修斯给盒子输入了佛法,设计了一套使每个人不仅仅可能成佛,而且必将成佛的程序,结果几乎毁灭了盒子,“盒子里的亿万众生都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现,身上没有一丝生气,呆若亿万朽木枯石,在他们的大脑里也几乎观察不到电子的跳跃了”^{[4]297}。短篇小说《死国幻记》里,史铁生以对生命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没有困苦、一切都已经圆满结果也就死寂无声的死灵生活的死国。借助死国中死灵的牧师(MS)之口,我们知道:“因为死灵们都已圆满,没有困苦,没有罪恶,没有疑问。死灵们心心相通,无我无他。我们甚至可以在时间中任意来去,因为思想的速度远远快过时间,想象便到未来,回忆即是过去。”但是死灵们没有欲望,结果死灵们只有寂寞,“寂寞得就像是嵌进了岩石,就像是铸进了均匀的时间,寂寞得快要让整个死国都发疯了呀……所以,所以我们指望戏剧,我们模仿软弱,模仿孤独,模仿激情,模仿着相互敞开心扉的感动”^{[2]425}。正是在这个死国里,神被视为平庸的东西,死灵们呼唤魔鬼,重新赋予他们以残缺。

二

的确,史铁生否定了那种所谓的理想社会、极乐世界、天堂等终极性存在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肯定了人间残缺的必然性、必要性,肯定了生存悖论的常态性,肯定了孤独、痛苦、死亡等生存困境的必然性。不过,他真正要凸显的不是人生的阴暗景观,而是一种专注于过程和信心的超越之路。

因此,在史铁生看来,神绝对不是那种偶像般的客体存在,而是植根于残缺人性中的超越渴望。正如他在散文《智能设计》中所说:“诸多的‘神证论’中,最让我心悦诚服的一种是这样说的:残缺,证明了圆满在;丑恶,证明了善美在……人之诸多的残缺与丑恶,证明了神在。神之在,即圆满与善美之在。或者是,人看那圆满与善美跟自己殊有距离,故称之为神。或者这样说吧:神即有别于人之实际的、一种人之心魂的向往;人一旦自知残缺与丑恶,便是向那圆满与善美之神性的皈依,因而神必定是在的。”^{[5]55} 换言之,并不存在万能、纯善、超然的客体化的神,存在的必定是残缺人性、丑恶人性比照下的神,亦是引领人自我超越的终极性力量。史铁生曾说:“神,乃有限此岸向着无限彼岸的眺望,乃相

对价值向着绝对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渴盼与祈祷。这样,哪一个凡人还能说自己就是神呢?”^{[6]147} 的确,人与神之间的无限距离,是必须反复重申的;既不能因为人性的残缺和丑陋而否定神性的昭然之在,又不能因为神性的高远而否定人性的可超越性、可完善性,更不能人冒充神。人生之路,就是永无休止的朝圣之路。

至于信仰,史铁生认为看不见而信,才是信仰的根本。“信仰,恰是人面对无从更改的生命困境而持有的一种不屈不挠、互爱互助的精神!”^{[7]19} 那么天堂呢,天堂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空间中的完美之所,“所以我宁可还是相信,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仰望使我们洗去污浊。所谓另一维时空,其实是指精神的一维,这一维并不与人间隔绝,而是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重叠融会”^{[6]31}。面对这样的天堂,留给人的只是艰难跋涉的苦旅。“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6]59} 专注过程的生命哲学就这样确立起来了。

对于史铁生来说,生命的目的就在于过程之中,无论人生中存在着多少困境、悖论,都无法阻挡人活在精彩的过程之中,既然死亡也剥夺不了人生的精彩过程,人反而能够把死亡转变成为精彩过程的一部分。神在哪里?神就在于人不断地克服着宿命的残缺和丑陋,向着终极性的完善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因此,像《原罪·宿命》中的《原罪》里的主人公十叔,虽然从小瘫痪在床,但是他没有放弃信心,依靠给孩子编织神话,勇敢地活下去。《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最终领悟到无字白纸其实是师傅为他精心设置的一个美丽谎言,为的是维持他活下去的信心,为的是让他能够充分地活在琴弦紧绷、琴声欢唱的过程中。《毒药》中,小说主人公曾经渴望着有朝一日坐上鱼帝、鱼王的宝座,但最终发现这些世俗目标的荒诞性,于是带着两粒毒药离开岛屿,到陆地上去,过上了一份质朴而不失真趣的正常人生。至于《务虚笔记》中的那些主人公,《我的丁一之旅》中的丁一、秦娥、吕萨、秦汉等人,不都是在追寻着人生苦旅的真意吗?史铁生曾说:“距离,或者差别,是上帝开天辟地的根本方法——唯此才可能展开一条道路。分离,然后寻找,是上帝创世之首要意图——唯此才可能维系这一条道路。使其千姿百态,使其柳暗花明,使其顾盼屡屡、思念频频……这道路才可能传扬爱的消息。就好比一个明智的父亲,见子女在

家中养尊处优终日无所用心,恐其年华虚度,便要他们出门远行去寻一处宝藏。宝藏在哪儿?宝藏不是别的,正是寻宝的这路恒途。”^{[3]88}如此看来,人的生存困境,本来就是神设下的谜题,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去破解它。更关键的是转变,“要把一条困苦频仍的人生之真路,转变成一条爱愿常存的人生之善路;要把一条无尽无休、颇具荒诞的人生之实路,转变成雄关漫道、可歌可泣的人生之美路!”^{[5]80}这就是人生的超越之路。

执着地面对人生的基本困境,不断地超越着人性的残缺和丑陋,追寻着终极性的存在根源,就是史铁生所展示出来的超越精神。他的文学观也是立足于这种超越精神之上的。当大部分中国作家还在听命于意识形态的陈腐说教时,史铁生就曾振聋发聩地说:“文学的根,也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1]179}史铁生还把文学分为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他认为纯文学最关注的就是人的生存困境,“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没有这样一种纯文学层面,人就会变得狭隘乃至终于迷茫不见出路。这一层面的探索永无止境,就怕有人一时见不到它的社会效果而予以扼杀”^{[1]179}。可以说,史铁生毕生追求的就是纯文学的高标准。这种纯文学也就是史铁生所理解的先锋文学,“艺术从来都是先锋派。先锋,绝非是一种行文模式,而是对精神生活之种种可能性的不屈的不尽的询问”^{[5]85}。

当一部分中国作家想着与世界对话时,史铁生认为更为伟大的作家是与命运之神对话,“那些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作家,往往是在无人能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说出前无古人的话来。他们是在与命运之神对话。因此,我们甚至不必去想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件事,只想想我们跟命运之神有什么话要讲就是了。这样也不见得能立刻把我们弄到世界文学的前列去,不过我们不关心这一点,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新路。倘若有一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前列,我们还是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新路无尽无休尚且让我们关心不过来”^{[1]168}。史铁生就是与命运之神对话的优秀作家。

三

史铁生对现代性的反省,就是在超越精神立场

上进行的。首先,看看史铁生对革命现代性的反省。在《奶奶的星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等短篇小说中,史铁生对革命现代性的反省,承接的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中国社会中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立场。对革命现代性的阶级论是如何给像“奶奶”这样的普通人带来的历史伤害,革命现代性是如何彻底摧毁像詹牧师这样的普通人的主体性,以及像B的姑父这样的普通人是如何被革命现代性压弯了腰等等,史铁生都做出了及时有效的启蒙主义反思,并重申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必要性。

在《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小说中,史铁生以深邃的笔触去挖掘革命历史中的叛徒的生命困境,已远远超越了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立场,更是从超越精神立场上来审视革命现代性的。例如《务虚笔记》中,《葵林故事》中葵林里那个女人的故事,就是对革命现代性的有力质疑。她曾参加革命,是Z的叔叔的女朋友,但在关键时刻为了掩护Z的叔叔,自己却被敌人捕获,结果为了不殃及家人,她成了革命的叛徒,终生背负着最可怕的罪名。史铁生写道:“成为叛徒的道路与通向理想的道路一样,五光十色奇诡不羁,可以想象出无穷无尽罄竹难书的样式。但这些故事,结尾都是一样,千篇一律。诗情在那儿注定无所作为,那是一片沙漠,或一眼枯井,如此而已,不给想象力留出任何空间……”^{[8]308}在革命现代性者看来,像葵林里的女人这样的叛徒自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配得到众人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但是史铁生偏偏要去发掘叛徒身份下的人性逻辑,他看到的是人性的脆弱,是偶然性的机缘对命运的捉弄,是一个不屈的生命在叛徒身份的重压下逆势生长。当他远观着葵林里的女人最终和Z的叔叔在暴风雨之夜激情燃烧时,史铁生颠覆的是革命现代性的权力话语,确立的是超越精神立场上的人性价值。

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丁一的姑父继续演绎着葵林里的女人的叛徒故事,他为了从叛徒身份的重压下摆脱出来,居然试图求助于倒转时间的魔术。在史铁生的超越精神的审视下,像丁一的姑父这样的人,绝不像革命现代性者眼中的该死的叛徒,而是一个偶然被命运压倒的可怜之人,呈现出来的是人性的脆弱和高贵。丁一的姑父试图倒转时间,就像夸父追日一样,都是超越性的壮举。

当然,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铁生借助丁一的爱情试验,不但反思了人性的局限性,更直接反思了革命现代性的理想主义和权利勾兑的致命局限问

题。丁一受秦汉的奇思妙想的启发,才想着和秦娥、吕萨一起进行那个爱情试验。秦汉曾说:“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在赞美爱情,对吧?爱情,是人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这不会有人反对吧?既然如此,那么又是为什么,这一种最最美好的情感却要被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里?先是限制在异性之间,后又要限制在一对一的关系中,再又是提倡最少的人次。这哪儿像是对待美好事物?简直倒像是对待罪行了。”^{[3]307}于是,丁一把爱情的范围扩大视为理想,要秦娥、吕萨加入进来。但是麻烦的问题马上就来了,秦娥出于现实的考虑要退出三人的爱情圈子,丁一的理想无法维系,结果丁一郁郁而终。其实,最早看出丁一的爱情试验问题的是何依,她曾经对丁一说:“也许人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扩大,而是权力的扩大。”^{[3]391}而何依正是因为其父是受到革命机器整肃的“右派”,自己也曾被丁一出卖过,下放到边疆,受过苦难,因此她才从切身之痛出发,把丁一的爱情试验阐释为革命现代性的乌托邦试验。她注意到两者的内在联系,也注意到两者之间同样的致命逻辑。

史铁生也曾说:“理想的危险,即理想的推行!既是理想,既是美好和非常美好的理想,你不想它扩大吗?不想扩大的其实算不上理想。但推行却可以毁灭理想。所以,理想于其诞生一刻已然种下了危险。那扩大的欲望,会从劝诱至威逼,会从宣扬渐至强迫,譬如唯我独大的宣扬已然就是强权了。但这丁一,理想障目不见现实,使理想成为现实的热望拿住了他。他的失望化作怒火,指向了娥,指向了萨,甚至指向了秦汉、商周和所有的人——你们这些庸人,你们这些理想的叛徒!他就差说这句话了。”^{[5]87}的确,丁一的理想和权力纠缠在一起,在理想未得到实现时,他所向往的充满爱愿的生活正不可抑制地孵化着仇恨。最终,他自己郁郁而终,没有举起斧子,强迫他人跟从他的理想,已经是万幸。但是小说中丹青岛上的那个诗人却以暴力仇杀结束了所谓的美好理想。史铁生曾说:“善与美,切不可强力推行,否则直接变成丑与恶。”^{[5]89}联系到革命现代性以真理之名、以绝对的权力推行着所谓的终极理想时,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史铁生对革命现代性的反思和警惕。

四

科学崇拜,是启蒙现代性的核心支柱之一。对于现代性的信奉者而言,自然科学几乎成了另一种宗教,任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都可以靠其解决。史

铁生对这种科学崇拜,自然是持谨慎的态度的。虽然他也不否认科学技术的价值,以他自身的疾病为例,他早年双腿瘫痪,后来需要血液透析,若没有现代医疗技术,可能早就一命归西。因此,他对现代科学技术心存感激;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科学崇拜的反思。他对科学崇拜的反思,首要着眼点就是确立科学的边界,为信仰保留足够的地盘。他曾说:“活着,不是仅仅有了科学就够。……一个人,身患绝症,科学已无能给他任何期待,他满心的坚强与泰然可是牵系于什么呢?地球早晚要毁灭,太阳也终于要冷下去,科学尚不知那时人类何去何从,可大家依然满怀豪情地准备活下去,又是靠着什么?靠着信心,靠着对未来并无凭据的猜想和希望。……先哲有言:科学需要证明,信仰并不需要。事实上,我们的前途一向都隐藏在神秘中,但我们从不放弃,不因为科学注定的局限而沮丧。那也就是说,科学并非我们唯一的依赖,甚至不是根本的依赖。”^{[6]22}的确,就像史铁生在《原罪·宿命》中所讲述的十叔的故事,对于十叔而言,活下去依靠的就是信心;而阿夏阿冬的爸爸虽然信奉的是科学,把十叔的神话视为迷信,但是当他在孩子们的追问下,说将来太阳甚至宇宙都要毁灭,那时候人类的科学已经非常发达,又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可以生存的地方时,他所表达的也并不科学,而是和十叔一样靠的是信心。

为科学划界,守护信仰的正当性,是史铁生的清明理性。他曾说:“科学以其小有成就而轻蔑信仰,终至促生了现代性迷障。”^{[7]8}对于这种现代性迷障,史铁生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他还说:“科学之要在于‘识’,其全部心愿都在弄清楚这个世界,把握它,甚至改造它。信仰之要在于‘信’,即认为世界的神秘是人永难知尽的,一代代行走其间,必要有一份可以信赖的来引领。”^{[5]63}应该说,科学和信仰之间本来不必势同冰炭,科学不能因为信仰没有实际问题而轻蔑信仰,因为人最终还是要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信仰也不必因为科学太过实际而贬斥它,毕竟超越的灵魂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支撑。因此最好的是,就像史铁生所说的那样,科学和信仰划界而治,共同服务于人,科学不能越界向信仰领域殖民,信仰也不能越界向科学领域妄言。

相对于牛顿、伽利略这些启蒙时代的科学家崇拜的自然科学而言,史铁生更欣赏20世纪西方更富有人文精神的科学。例如,他在作品里屡次引用“测不准原理”等现代物理学的看法,并由之洞察到一些不同的信息。在短篇小说《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中,史铁生就曾说:“‘测不准原理’的意

思是：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人们说一辆汽车的位置和速度容易同时测出，是因为对于通常客体，这一原理所指的测不准性太小而观察不到。‘并协原理’的意思是：光和电子的形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嵌入观点’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是嵌入在我们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宇宙本是严格观察者参与着的宇宙。现代西方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和古代东方神秘主义的‘万象唯识’，好像是在说着同一件事：客体并不是由主体生成的，但客体也并不是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的。”^{[2]352}对于那种主客两分、高扬主体性和理性意识的现代性科学崇拜观念，史铁生不感兴趣；但是对于像“测不准原理”等现代物理学所显示的主客混融、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科学倾向，史铁生深感兴趣，引之为同道。

相对而言，启蒙现代性崇拜理性，放逐神秘，贬斥神秘主义。但是对于史铁生而言，神秘的存在是天理昭然的，神秘主义倾向对于人生而言也不无裨益。他曾说：“神秘的力量，毫无疑问还是存在的。神秘，存在于冥冥之中。这其实很好，恰为人间的梦想与完善铺筑起无限的前途。但是，这无限既由神秘所辖，便不容得凡人染指，原因简单：有限的凡人怎么可能通晓无限的神秘？”^{[6]32}其实，当现代性的理性崇拜者、科学崇拜者放逐神秘之时，也就是他们无限地夸大有限的凡人之日，其中的颓废和危险都值得警惕。史铁生还曾由气功谈到神秘问题：“气功，从一听说它我就相信，截断物欲的追逼，放弃人类的妄尊自大，回到与万物平等的地位，物我两忘，谛听自然神秘的脚步……我相信气功确有其科学不可比及的力量。比如在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地方创造奇迹，比如在沉思默想中看见生命更深处的奥秘。还有一些听上去更接近科学的功法，比如沟通宇宙信息，比如超越三维空间汲取更高级的能量，比如从更微观的世界中脱胎换骨，这些我都倾向于相信。甚至风水、符咒之类，大概也不是全无道理。世界之神秘，是人的智力永难穷尽的，没理由不相信奇迹的存在。”^{[6]27}

对神秘的肯定性态度，体现了史铁生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其实，在他的小说中，神秘主义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例如《原罪·宿命》中，莫

非在事后回想起整个过程都相当神秘，任何事情的微小改变都会导致车祸结局得以避免，但是恰恰又无可避免，这就存在着凡人无法参透的神秘在。至于《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小说中，每个主人公的命运都似乎有一种神秘力量在主宰着，令人欲罢不能。这种神秘主义倾向，体现了史铁生对现代性的理性化、标准化、模式化思维观念的质疑和颠覆。

五

现代文明始终和人的肉身化、欲望化相伴相生。对启蒙现代性的崇拜者而言，人的肉身化、欲望化本身就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现代人要充分地理性化，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就是要让肉身健康地活着，让肉身免除病痛的折磨，并尽可能地满足现代人的各种物质欲望。但是对于史铁生而言，超越精神要让人把肉身、欲望放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真正应该凸显的还是人的精神、信仰。因此，史铁生非常反感现代性的欲望化倾向，激烈地批判这种欲望化带来的危害。他曾说：“单说遏制人类的贪婪吧，乐观的理由就少，悲观的根据越来越多。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天上破着个大窟窿而且越来越大，但人类还在热火朝天地敲诈和掠夺。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真能遏制吗？令人怀疑。比如我，下了好大决心，也只抗拒了羊绒衫的诱惑——据说那东西破坏植被，但更多的诱惑只在理论上抗拒，人类也真是发明了很多好玩意儿，空调、汽车、飞机、化肥、农药、电脑……丰富得超过有用的商品、新奇得等于屠杀的美味、舒适得近似残废的生活……人能齐心协力放弃这样的舒适吗？还是让人怀疑。就算有99个人愿意放弃，但剩下一个人坚持，舒适的魔力就要扩散，就会有2、3、4、5、6……个人出来继承和发扬。”^{[6]29}现代人的欲望化对整个地球生态造成了非常恐怖的威胁，史铁生从超越精神立场出发，表达出了较为先进的生态立场。而且，史铁生在生态危机背后，看到的是现代人的信仰危机。这就是典型的超越精神立场上的生态批判。

启蒙现代性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现代人的主体性、理性力量的过度肯定，对人的有限性缺乏反思。史铁生对人的有限性有着非常敏锐的体认。他曾说：“人怎么可能是万物的尺度呢？人——这一有限存在，不过沧海之粟，不过是神之无限标尺中一个粗浅的刻度。孙悟空尚且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心，人的测量又岂能‘创造整个世界’？科学的伟大，也许恰在于科学的无能。人曾想象天上人间，人

曾向往月宫中的玉树琼楼,可待到‘阿波罗’终于登月,人才明白,沧海一粟依旧是沧海一粟,我们知道的比过去更多了,疑难却并不比过去更少,幸福也不比以往更近。这便是科学的功绩。科学曾令人张狂到自信胜天,唯踏上荒凉的月球表面,人的真正智慧才被激发;世界是无限的,而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之比意味着什么,则刚好证明了人的地位。”^{[5]78}

对于那种过度的狂妄自信,史铁生则尽可能地展示它的危害。“就连科学也已经看见,人的自命不凡已经把这个星球搞得多么乌烟瘴气,贪婪鼓舞着贪婪,纷争繁衍着纷争,说不定哪天冒出个狂人,一场细菌大战,人间戏剧忽然收场。也许人间真的是一场错误?也许,在某一种时空中真的存在着极乐?人是这样的渺小无知,人的智识之外,宇宙的神秘浩瀚无边,为什么肯定没有那样的地方?人不知其所在罢了,人却可能在来生去投靠它。这真是多么迷人的图景!于是正有很多这样的理想流行,天上人间,美妙超过以往的种种主义,种种法门汇成一句话:到那儿去吧,这儿已经无可留恋,这儿已是残山剩水,那儿才是你的梦中天堂。信与不信,常让我暗自踌躇。”^{[6]29}没有信仰引领下的谦卑,现代人最终只会踏上自我毁灭的悲惨之途。

启蒙现代性还有一个基石,就是对进步观、进化论的信奉。但是与之相对,史铁生总是尽可能地展示一种生命的轮回观。史铁生说:“宇宙这只花瓶是一只打不烂的魔瓶,它总能够自我修复,保持完整,热情此消彼长永不衰减。人间这出戏剧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一代代角色隐退,又一代代角色登台,仍然七情六欲,仍然悲欢离合,仍然是探索而至神秘,欲知而终于知不知。各种消息都在流传,万古不废。”^{[6]45}这就是从超越精神立场上对所谓的进化论的质疑。从超越性视角出发,所谓的进步只是现代人的鼠目寸光而已,所谓的进化只是现代人的自我安慰而已。史铁生的深邃目光看到的不是什么进步、进化,而是生命的轮回、意义的轮回。“所有的消息都在流传,各种各样的角色一个不少,唯时代的装束不同,尘世的姓名有变。每一个人都是—种消息的传达与继续,所有的消息连接起来,便是历史,便是宇宙不灭的热情。”^{[6]48}当然,意识到生命的轮回、意义的轮回,并不必然意味着悲观。史铁生在轮回中祈求着的乃是超越,乃是信心,乃是信仰。

启蒙现代性的进步观、进化论要求现代人向未来寻求立身之基,寻求意义的归宿。但是史铁生要破除的就是现代人对线性未来的迷信,要把现代人

的目光引向永恒。短篇小说《我之舞》中,那一对死去老人的鬼魂在古园里作如是观:“我们永远不会死;世界就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的,除了一个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就没有别的世界;一切存在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一切无都是相对于有说的,而一切有却不必相对于无,有就是有,不必相对于什么;绝对的虚无是绝对没有的,虚无是相对的,存在是绝对的;‘我’也是绝对的,无穷无尽无始无终;人有来生千秋不断,生生相连万古不竭。”^{[2]289}而在散文《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最终也落脚于永恒轮回中的不死之“我”;这个“我”脱离了启蒙现代性的个体化之路,返回到宇宙大生命整体中,获得了自己的归宿。

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就是典型地建立在轮回生命观之上的超越叙事。亚当夏娃永恒轮回,“就这样他们不得永生,故而轮轮回回,以自称为‘我’的心流生生相继,走在这漫长或无尽的旅途中”^{[3]3}。心识不死,轮回不断,“如同水在沙中嘶喊,或风自魂中吹拂,虚无缥缈间凝聚起一点欲望——心识不死。我知道,我即将进入新一轮身形”^{[3]3}。生命即轮回,“大凡存在,皆生生不息,不是生命又是什么?一切都在新陈代谢,滚滚如流,绵绵不绝。一切都是永恒的传扬,一切都是这永恒传扬之一节,之一点,之一环,之一缕,之一息尚存而已!”^{[3]14}这种生命观,和启蒙现代性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理性崇拜的、进化论式的生命观迥然不同。这种生命观也反对静态地、孤立地来理解个体生命,它更强调整体的、普遍联系的、生态化的理解方式,“灵魂就是这样蔓延着它的旅程,就是这样延续着它的脚步,丰盈着它的存在的。灵魂即那千古不尽的消息,有如江河,不断地诞生,不断地有所汇合,即兴地蔓延与必然地流传,编织成一张玄奥莫测的网……而在其一个网结上,我伫望于丁一。比如丁一是一个网结,我便是其牵牵连连不知何来何去的千丝万缕;比如丁一是这网的一部分,我则牵系于这网的全息”^{[3]165}。这种生命观,体现了史铁生对启蒙现代性的鲜明突破。

整体看来,史铁生确立了超越精神立场,执着地探讨人性的有限性,关注人的生存困境、生存悖论,发掘人的超越可能,批判革命现代性的阶级论、身份论、理想主义和权力意志的合谋,对启蒙现代性的科学崇拜、理性崇拜、欲望化、主体论、进步论等核心因素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反现代性倾向。这种立足于超越精神的反现代性书写,对于拆解开现代性迷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史铁生曾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比如文学、戏剧，何以会有不朽之作？就因为，那是出于人的根本处境，或生命中不可消灭的疑难。就像那群鸽子，根本的路途、困境与期盼是不变的，根本的喜悦、哀伤和思索也不变。怎么会是这样？就因为它们的由来与去向，根本都是一样的。人也如此。人的由来与去向，以及人的残缺与阻碍，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样的。人都不可能成神。人皆为有限之在，都是以其有限的地位，来面对着无限的。所以，只要勤劳勇敢地向那迷茫之域进发，人间智慧难免也要在某一处汇合。”^{[5]38}的确，像史铁生这样从超越精神高度反思现代性、再次明晰人的有限性和可能性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极其少见，也让我们见证了人间智慧的珍贵。

参考文献：

- [1] 史铁生. 病隙碎笔[C]//史铁生作品系列(纪念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2] 史铁生. 命若琴弦[C]//史铁生作品系列(纪念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3] 史铁生. 我的丁一之旅[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4] 史铁生. 原罪·宿命[C]//史铁生作品系列(纪念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5] 史铁生. 扶轮问路·妄想电影[C]//史铁生作品系列(纪念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6] 史铁生. 病隙碎笔[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7] 史铁生. 昼信基督夜信佛[J]. 收获,2012(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ranscending Disability and Suffering

——On Shi Tiesheng's Anti Modernity Writing

WANG Shud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Shi Tiesheng established the transcendental spiritual position, persistently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nature,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edicament and paradox of human beings, explore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ence of human beings, criticized the conspiracy of class theory, identity theory, idealism and power will of revolutionary modernity, it has deep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n the core factors of science worship, rational worship, desire, subjectism, and progress theory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thus presenting a distinct anti-modernity tendency. This kind of anti-modernity writing, which i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ranscendence,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reaking down the myth of modernity.

Key words: Shi Tiesheng; anti-modernity; revolutionary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transcendence spirit

诗歌批评:在多元解读中寻觅真相

——由黄理兵《唐诗的真相》谈起

谭邦和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黄理兵的唐诗解读,促使我们思考诗歌批评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困境:诗歌作品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真相”,解读者应不应该寻觅又能否找到这个“真相”。西方的多元解读理论似乎并不赞赏这种追求,主体论的文学观念支持多元解读;语言悖论现象的存在,表明语言并不能帮助诗人实现最真实、最准确、最完美的表达,中国古典诗论则早就认定“诗无达诂”。多元解读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促进了中国诗歌批评的繁荣,但随后可能已演化为某些批评者任性解读的理由,显然这是诗歌批评的歧途,应该得到纠正。黄理兵的解读实践提醒我们:诗歌批评者应在多元解读中努力寻觅真相。

关键词:诗歌批评;多元解读;唐诗;真相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09-06

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并奔走世界各地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学博士、教授黄理兵,突然向学界献出一部唐诗鉴赏集,而且书名叫《唐诗的真相》^[1],或许你心里在嘀咕,唐诗哪来什么真相?翻阅书稿,作者的文字如行云流水,谐趣迭出,读完有十分舒爽之感。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千年唐诗,遇到了一位新的解人。

我早就知道黄理兵在写唐诗鉴赏的文章,最初读过几篇,觉得很有味道,因而鼓励他写下去。开始我只是认为,他虽然主业是语言学,但文学修养也很好,可以玩一玩诗歌鉴赏;而当他结集成书后,命名《唐诗的真相》,我就有些惊讶了,因为这触动了我关于诗歌理论、诗歌鉴赏与批评的一些基本认知。这里就有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了,这个鉴赏集可能就不只是在无数唐诗鉴赏的著作里增加一本新书,而是有自己鲜明的理论追求了。

为什么说这个书名触动了一个理论问题呢?因

为在我的感觉里,探求“诗歌的真相”是与目前流行的批评理念不太相同的路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学术复苏,诗歌研究领域也风起云涌,欧美等国的诗歌批评理论和方法迅速涌入中国,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了包括唐诗鉴赏批评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思维的角度拓展到各种认知领域。当时,鉴赏与批评的方法有心理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等,学者们认识到了文学文本的多义性与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因而提倡多元解读,反对定于一论。在这种情况下,诗歌解读,见仁见智,似乎已经没有“真相”了。有些理论甚至主张剥夺创作者的解释权,例如意大利批评家弗·梅雷加利就认为,作为作者产品的文本与作为被接受的文本的作品,两者是不同的。文本是固定不变的,作品却是变动的。在他看来,文本属于作者,但作品则属于接受者。未经阅读的只是“文本”,经过阅读的才是“作品”。在接受美学那里,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了“作品”,而此时,“读者”也成了“作

收稿日期:2020-05-10

作者简介:谭邦和(1955—),男,湖北利川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和语文教育。

者”。^[2]这些理论,甚至可以到自然科学的理论库藏里找到支撑,例如,量子力学把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看作一个整体,它不允许把世界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的部分所组成。

二

主体论的文学观念为诗歌文本多元解读理论提供了学术基础,其阐释方向,大概包括诗歌创作的对象世界、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三种视角:

其一,诗歌所欲潜入的对象世界是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人的社会,这是一个结构层次和运转状态无比复杂的对象世界,人所组成的社会复杂无比,单个的人作为精神主体,其心灵之广袤与深邃,也几乎可以称为一个内宇宙。一首诗歌,要想在描述人的心灵和社会生活方面做到精确周延、单纯唯一,根本没有可能。

其二,诗歌文本的创造者——诗人自己也是人,作为精神主体的人的全部复杂性都必然反映于诗人自身,而且每个人都是一个不会与别人重复的独特存在,诗人的出身、经历、社会地位、知识结构等等,都会作用于他欲描述的对象世界,影响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评价,制约他的情感态度,决定他对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意象的提炼,直至诗歌技巧的运用。如果说量子理论认定物理学家尚不能成为真正客观的观察者,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要求诗人非常纯粹地“客观”反映生活,不同诗人对同一对象的描述和认识又怎能不出现差异?

其三,诗歌文本的读者、欣赏者、评论家也是人,也同样有着作为精神主体的人的全部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其各自的知识差异、性格差异、兴趣差异、社会背景差异、阅读目的差异,等等,自然也会导致对作品意义、内涵理解的差异,对同一作品做出不同的审美评价。鲁迅先生注意到不同读者对于《红楼梦》这同一部作品却有不同发现:“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如果把别有用心的排除在外,这种情况在诗歌欣赏领域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现代批评理论进一步抬高了读者的主体地位,认为读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作品,读者是创造者,作者则不过提供了一个意义尚未完全确定的文本。每个诗歌作品都是在读者的解读欣赏中才真正完成,而作品的“意义”也是在解读中才得以实现。

为诗歌鉴赏批评多元解读提供理论支持的还有语言悖论现象的存在。语言悖论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外文学理论。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启发我们认识到:极致的深刻思想和美好音像不可能找到完美的表达工具和具体的承载物。无独有偶,柏拉图的《斐德若篇》记载,苏格拉底与斐德若讨论修辞学时,突然讲起一段传闻:埃及有个古老的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学、几何、天文、地理,最重要的是他发明了文字。有一天图提来见埃及法老,献上他的发明,在讲到文字的时候,图提特别强调其非凡功能。出人意料的是,法老反复斟酌,别的都收下,唯独谢绝了文字,而理由竟然是他认为文字只是一些支离破碎、死气沉沉的记号,不可能传达生机勃勃的活的经验,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非真实界本身。他据此推论,文字看来可以教人获得许多知识,似乎变得无所不知,实际上却一无所知。^[4]这个故事讲的应该也是文字作为承载工具的局限,法老认为它不能胜任“真相”的完美传达。

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进一步研究了语言作为表达工具的内在矛盾,认为语言既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在更深的层次上,语言又是表达的障碍。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必然在这方面遭遇尴尬,因而考验诗人们的语言智慧。从某个角度来看,诗歌创作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但选择的对面是放弃。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诗歌创作,我们可能只好承认语言作为表达工具的局限,承认语言并不能帮助诗人实现最真实、最准确、最完美的表达。陶渊明的名作《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归隐田园的人生意趣,但他认为这种意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所谓妙不可言也。末尾两句,诗人明确地表示放弃了对这种妙趣的言说,“有真意”,但无语言,从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审美空白,召唤读者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审美思维去想象填充。马致远的散曲《双调·落梅风》描写了类似的境遇:

云笼月,风弄铁,两般儿助人凄切。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一声吹灭。

“欲将心事写”说明“有”，“一声吹灭”则是放弃表达。有心事，无语言。假设这是一位月夜思亲的女子，她显然意识到了千头万绪的“凄切”之情，但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难到什么程度了？难道只能吹灭银灯，放弃书写。

这时我们可能会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一段名言：“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5]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的领域，对这个领域的东西只能显示而不能用语描述。

语言并不甘心承认自己的无能，元曲似乎表现了这种挣扎。散曲中的套曲以曲牌联套和曲牌正格中加衬字的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表达空间，但不要以为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那样的套曲，可以穷形尽相地描写自己“铜豌豆”的性格，《窦娥冤》那样的唱词可以用无数罪名把天地鬼神骂得狗血淋头，似乎就体现了语言无边无际的表达能力。其实这恰恰说明语言并不能轻易完成表达的任务，只好极尽铺排，用了一大串的形容，才把“铜豌豆”说得比较有质感了；用了一大堆的罪名，才稍觉发泄了对于老天爷不为人间主持公道的愤怒。这种酣畅淋漓的赋体铺排，与那些以比兴手法交给读者自己去领会的方式，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认识语言在表达复杂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性。

四

中国古代诗歌的批评鉴赏理论，与西方现当代的各种流派相比，也许更早地认识到了诗歌美学的这种特性。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诗歌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优秀作品，而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精彩的理论命题。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就引述了当时早已流行的观点：“《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6]实际上说的就是语言并不能完成毫无歧义的表达，对文本的解读也就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不可更改的标准解释，《诗》《易》《春秋》这些经典文本都逃不出这个规律。“诗无达诂”起初是讨论先秦时代一部具体的诗歌总集，但这个命题的意义早已超越时代和具体文本，而具有了超越时代、也超越文体的理论意义。

“诗无达诂”可以有三个理解层次：其一，是指“诗三百篇”，即《诗经》，没有唯一准确的标准解读；其二，指所有的诗歌文本，所有的诗，都不可能有一致的标准解读；其三，诗还可以指所有的文学作品，“诗无达诂”因而已经成为诗学与文艺理论的重要原则。也因这个缘故，几千年前的诗歌文本与文学

经典，才可能常读常新，代代有解人，永无定论，被后人不断挖掘出新的意义。

对于诗歌批评与文学文本解读的这种现象，历代著名作家和批评家不断表达着相似的认知。苏轼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绝非一夫所能抑扬。”^[7]他认为，文章的高下绝非某人可以论定不移。宋代学人陈善亦云：“文章似无定论，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耳。”^[8]宋代文论家吴子良曰：“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9]他认为，文本解读甚至难于文本写作。明代布衣诗人谢榛看来体会也深，故主张：“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10]清代著名诗评家沈德潜则曰：“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11]可见中国古代的鉴赏批评理论向来反对穿凿拘泥，主张不求定解，鼓励各有会心，而这应该是在认识和把握了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文本的本质特征以后，所做出的明智的选择。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追求意境、意象，讲究意内言外，其实相当程度上就是在用非常聪明的办法克服言意之间的矛盾，突破语言作为表达工具的局限，进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美学追求。

五

古今中外的诗歌批评理论都注意到了诗歌文体的特殊性，诗歌结构的开放性，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诗歌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因而不约而同地提倡诗歌文本的多元解读。既然“诗无达诂”，自然应该鼓励多元解读。但是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时间，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处于一元的思维空间，文学研究方法也是比较单一直线，有时甚至是非常绝对的。随着80年代以后社会改革开放的步伐，文学批评多元解读理论的觉醒和接受美学的引进，极大地开拓了诗歌文本的解读空间，鼓舞了读者，也解放了批评家，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多元理论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无疑都是具有拓展意义和开放功能的进步观念。

但多元理论在实践中也会遇到问题，并非任何事物都有多个答案，更不是任何答案都能够成立或者应该容忍，多元理论应该是有理论边界的。多元理论具有开放的胸怀、宽容的品格，而其目标与追求，是在开放宽容的学术环境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和美好的事物，并不是随意接受一切哪怕是明显荒谬的东西。多元理论的边界在哪里？我想，这个边界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与人类达成共识的思维逻辑，其基本规则只能是尊重事实，服从逻辑。从这

个角度,来认识诗歌研究与诗歌文本解读,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思想空间和学术环境,鼓励读者和批评家以相关事实为前提,在符合逻辑的想象与形象思维中寻觅诗歌文本所隐含的意义真相。

六

其实任何事情都应该有自己的真相,诗歌也不例外。在排除简单机械、武断定论或恶意歪曲之类情形后,诗歌文本的解读者,诗歌研究的学人,也应该以探求真相为责任。诗歌鉴赏集的读者是希望研究者给他们提供真相的。

诗歌文本解读对真相的探讨,我认为有两个大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诗人及其身世、时代与创作过程,这个层面的真相必须尊重事实,依据文献,研究者的工作主要是史学的而不是诗学的;第二个层面是作品意义的探究和美感的阐释,与第一层面的史学必须保持某种逻辑的联系。

在第一个层面,真相应该是客观存在,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面对一个诗歌文本,首先必须认定作者是谁,这里容不下“多元”吧?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史料中可能出现某些作品作者失传或误为他人的现象,学者们在研究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推论,在证据不足或者证据不力的情况下,几种说法可能因相持不下而暂时只好并存。但在这里,“真相”最终只有一个,哪怕目前还不能确认和公认。唐诗鉴赏中这样的情况也不少,研究者碰到了也必须面对,只要有可能,就要把那些作者尚不能确认的问题加以解决。有一种批评理论认为,作品完全可以离开作者进行解读,其实绝对真空地理解作品是不可能的,即便作者不知是谁,一首诗的解读实际上也是被置于某个比较可信而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才能进行的,哪怕稍微宽泛一些。

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之一就叫作“知人论世”,而且这个传统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位置。《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就是这个传统的理论源头。按照这个理论,诗歌解读,首先应该了解作者,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以把握作者的生存境遇和创作心态,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诗歌的真意。黄理兵在这方面是下了很扎实的功夫的。例如他重解贺知章的名篇《回乡偶书》,通过相关事实的分析,得出结论:人生得意的贺知章荣归故里,离开京城的时候,皇帝设宴并亲率群臣饯行;到家乡后,亲朋故旧纷纷携儿带女前来看望,根本没有什么老年

归乡人不识的悲凉,过去那种望文生义的解读应该是错了。这就是“真相”。

第二个层面的“真相”就不太容易把握了,因为作为语言的艺术作品,诗歌文本的意义是丰富而复杂的。这方面,《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同是孟子,他又引领了中国诗歌批评的另一个传统,叫作“以意逆志”。对孟子这段话的一般解释是:“说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12]这里的“意”被释为读者所体会到的作品的意义,并据以推想作者通过语言所欲表达的内容。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云:“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13]

解构主义批评与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以意逆志”似乎有着某种精神相通,也主张通过体会作者的意图而找到诗歌文本的意义“真相”。日内瓦学派批评家乔治·布莱所坚持的“认同批评”认为,“阅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给人以接近他人思想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在他看来,批评必须在阅读的基础上产生,而阅读就是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批评则“必须将自己基本界定为意识接纳意识(对意识的理解)”^{[14]3},批评家是特殊的读者,“其典型特征就是习惯于认同与自己思想不同的思想”^{[14]1}。

希利斯·米勒《重申结构主义》一书在阐释布莱的批评理论时说:“批评家不仅不该退出作者的思维,他还要用自己的语言深化诗人的语言,也就是说更加准确地界定它,这样就可以延续那种语言,通过建立诗人也许从来没有明确说明的理想和含义来使它得到延续。”他还说,“当批评家尽力做到与作者一致时,文章就完成了”^{[14]13}。评论家竭力体会了自己的大脑被作者的意识所占据的那种状态,从而完成了对批评对象的认知,也就是完成了一次“我思”进入“他者”的过程。通读《唐诗的真相》,我们能够不断地体会到研究者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以意逆志”,以“我思”进入“他者”的沉潜揣摩与追逐。他真的找到了很多“真相”。

七

多元解读在实践过程中必然表现为个性解读。《唐诗的真相》作为一部新的唐诗解读著作,鲜明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思维品质与个人风格。我阅读的感受是:从学术方略上,作者有宏观的理论追求和比较

高远的学术立意,那就是在当前古诗特别是唐诗鉴赏比较泛滥的潮流中,凸显自己的学术品格,不是滥竽充数地再凑一种类似读物出来,而是以严肃、严谨的态度,广泛深入地搜集新旧文献史料,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展开想象,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起来,负责地对这许多前人解读过的作品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做出新的阐释。所以,他打出了“真相”的旗帜。在古典诗词走红的当代,人人都来充当导师,粗制滥造充斥于书市网络的乱象中,“真相”二字是有理论光辉和引领意义的。

黄理兵有很严肃的学术追求,也始终保持严谨的态度,但在具体写法上,他力求轻松幽默,风趣相随,引人入胜。在日常生活中,黄理兵是一位非常富有耐心的人,所以他的文字也善意满满,绝不耳提面命,总是循循善诱,因而写成了一本好读的书。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作为语言学家,他对诗作涉及语言学、语言学史乃至方言学方面的内容,往往有独到的发现和解析,这是一般专治文学的古诗鉴赏者往往忽略或者知识不足的地方。

黄理兵自己也经常写作旧体诗,因而对律诗绝句的平仄比较敏感,所以经常利用律绝的平仄规则来判断读音,以理解诗意。例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绝胜烟柳满皇都”中的“胜”,做动词表“战胜,超过”,做形容词表“佳,美好”,过去的解读者两种都有。而黄理兵认为,应该做动词解,因为这个绝句平起首句入韵,则此句平仄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黄理兵分析说:“韩愈生长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离洛阳很近,他的发音是比较标准的共同语。韩愈写诗,格律还是掌握得比较好的,因此,诗中这个‘胜’应该是平声,没有出律。在唐代,‘胜’有平仄两种读音,表示‘战胜,超过’的动词‘胜’是平仄都有。如王建《和元郎中从八月十二至十五夜玩月五首(之三)》里面是平声,《田侍郎归镇(之一)》里面是仄声。因此,把韩愈诗中的‘胜’理解成‘战胜,超过’,是没有问题的。把‘胜’理解成‘美好’义的形容词,是否也能说通呢?不,不能。就我们粗略检索的结果,‘美好’义的‘胜’,在唐诗中都是仄声。”“胜”还有一个义项是“胜任,能承担”,那能否理解成“能承担”呢?黄理兵审慎但又并非妥协地说:“不是绝对不可能,不过我在古代汉语语料库里面没有找到这样的‘胜’跟在‘绝’后面的用例。为了谨慎起见,我不能提出这种主张。”一个字的把握,有理有据有节,我想应该是能帮到读者的。

写到结尾,想起了明代诗文流派起伏更替中的

一种现象。明初宋濂、刘基、高启,雄深雅健,俨然开国气象。立朝既稳,文禁渐严,台阁体雍容娴雅,歌功颂德,无病呻吟,文坛生气渐无。于是茶陵派稍有振作之后,前七子举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以复古扫荡颓风。后七子继起,拟古更严,“文必西汉”。复古风盛,转为拟古,泥于古人而不能拔。虽归有光出,立唐宋派,效法八家,稍觉平易,而复古阴云遮蔽文坛近百年,直至公安三袁出来,才云雾一扫,打开了性灵的天空。但三袁文人习性,信心信口,不拘格套,而公安派末流作家底蕴不足,效法三袁,演为轻率,浅薄俚俗,如中道所言“百花开而棘刺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15],文坛又被不学和浅薄所害。乃有竟陵钟、谭出焉,编选《诗归》,“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继续张扬“性灵”,但补上一个“厚”字,以革公安派末流浅俗之弊。灵且厚,作为一种文艺观念,遂无偏颇。竟陵派诗论显然没有公安派的冲击力,但作为一种比较公允的观念与方法论,却有长久的理论价值。

回顾反思明代诗文流派的演变,是为了得到一个启示,也是一个教训,就是任何一种理论或方法都不能走极端,一走极端,就有流弊,必待纠正,而矫枉过正,又须矫枉。以最近四十多年的诗歌研究与古诗鉴赏来说,20世纪80年代大力提倡多元解读,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否则难以开辟出文学批评的新天地;但时代平稳发展以后,多元解读必须严守逻辑边界,因为多元理论渐渐成为一些人粗制滥造甚至哗众取宠、胡说八道的理由。就是这个缘故,让我看到了《唐诗的真相》的理论意义。“灵”好,加个“厚”字更好。乱象有时是必须的,但“真相”才是我们更加长远的追求。

2020年5月于武汉

参考文献:

- [1] 黄理兵. 唐诗的真相[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
- [2] 弗·梅雷加利. 论文学的接受[M]//冯汉津,译. 胡经之,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14.
-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9.
- [4] 柏拉图.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C].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68-169.
- [5]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郭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
- [6]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凌曙,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
- [7] 苏轼. 苏轼文集:第五十三卷[M]. 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6:1571.

[8]陈善. 扞虱新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

[9]吴子良. 荆溪林下偶谈[C]//王水照. 历代文话:第1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50.

[10]谢榛. 四溟诗话[C]//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下). 北京:中华书局,2006:1137.

[11]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

[12]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1.

[13]吴淇. 六朝选诗定论[M]. 汪俊,黄进德,点校. 扬州:广陵书社,2009:34.

[14]希利斯·米勒. 重申解构主义[M]. 郭英剑,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

[15]袁中道. 珂雪斋集(中)[M]. 钱伯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2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Poetry Criticism: Seeking Truth in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Talking about Huang Libing's *The Truth of Tang Poetry*

TAN Bang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Huang Libing's interpretation of Tang poetry makes us to think about a theoretical problem and practical dilemma of poetry criticism: whether the poetry works has its own "truth", and whether the interpreters should look for it and whether they can find it. The western theory of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seem to appreciate this pursuit. The ideas of literary subjectivity support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The existence of language paradox shows that language can not help poets achieve the most authentic, accurate and perfect expressio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heorie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poetry can not be well interpreted". Since 1980s,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liberated and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poetry criticism. However, it may have evolved into the reason for some critics to interpret willfully. Obviously, this is a wrong way of poetry criticism which should be corrected. The interpretation practice of Huang Libing just reminds us: Poetry critics should strive to find the truth in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poetry criticism;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Tang poetry; truth

跨文化语境下的主体转换与角色认同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冯 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作为一名身居海外的华文作家,严歌苓难免要面对思想差异、文化断裂、族裔冲突、生活重建等诸多现实问题,她一直在试图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并为小说寻找新的叙事方式。严歌苓以离散者、移植者、游牧者、寄居者的身份,在杂糅的多元文化空间里,与异质性的“他者”相处对话,为人类生活的多元化图景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严歌苓;跨文化语境;多元化;身份建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15-06

严歌苓赴美留学,离开祖国、踏入异国,面临的是被标识、被认知、被建构的跨文化语境。这里的“跨文化”并非指不同文化的自为存在,而主要是指不同文化缠绕时的重组过程。文化向来都是多元的,任何一个时代不存在绝对二元对峙的文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从根本上排斥另一种文化而独立存在。“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对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1]293}对于十几年来不停游走、频繁移居的严歌苓来说,更是如此。她积极地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逐渐以融通的视野来审视中西问题。

在跨国界的交往中,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回应、互相质疑、互相补充,以“融合”和“共异”的方式存在。正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的:今日文化的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于不同文化接触的边界处和疆界处,并于此探求差异,审视身份认同、生存归属和自我建构。总之,杂糅混合的文化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性。“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2]118},身份不是内部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所谈到的身份,指的是文化身份,不是生理的或职业的身份。身份是构成“人”作为人存在的基础,没有身份,这个人

也就从一定的文化心理层面缺失了存在性。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将身份分为两种:其一,身份是“一种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3]209},所标识的是共享同一历史祖先遗留下来的一种深厚的、集体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符码,人们在其中可获得固定源头和归属感。其二,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3]211},这是从后现代身份观来论述的。身份有自身的承继性和断裂性,既是存在,又变化着,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严歌苓常年异国游移,受民族、种族、阶级的影响,原有统一的“归属感”“共享性”身份一度被打破,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颠覆和消解。文化身份呈现出“离散者”“移植者”“游牧者”“寄居者”流动混杂的样貌。那么,在自我认同的追索和建构中,身份是如何建构并动态转换的呢?

一、离散者:身体苦痛与心理焦虑

1989年11月,严歌苓前往美国,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带着过往近30年的祖国成长经验、情感印记、传统感知孤身一人来到异国,不仅仅是地理疆界上的离散,还是文化心理

收稿日期:2020-05-10

作者简介:冯美(1989—),女,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传播研究。

上的离散,更是一种从母体向外的艰辛“流放”。“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愁别绪)。”^{[4]80}环境的突变、语言的隔阂、文化的差异、生存的压力,使她成了精神上真正的“离散者”。

弗洛姆曾说:“对身份感的需要源于人类生存状况,也是人类最强烈的追求源泉。”^{[5]51}与生俱来的共享的民族文化身份,在新的移居国的主流文化语境中变成了弱势性、边缘化的“他者”,这种“他者”身份刺激着严歌苓去探寻“我是谁”?身份的寻找能够给“我”带来稳定的安全感,使其认清位置、辨明方向,有效避免离散带来的失重与空虚。

严歌苓留学之初,利用读书打工的边角料时间,同时也是在接受国外小说技巧专业训练的过程中,创作了一系列以海外留学生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如:《浑雪》(又名《学校中的故事》)《栗色头发》《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方月饼》《失眠人的艳遇》,等等。谈起这些作品时,她曾表示:“在国外,大家有着相同的背景,他们会与他人聊起这种苦痛的经历,和不被人瞧得起的边缘的感觉。我这个人喜欢倾听,很少抱怨,这也是我得到很多故事和启迪的来源。当年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像井喷一样写出来,与这些有很大关系。”^[6]

小说家在文本建构中涉及自我的声音,通过这种声音对此在的环境进行记录和选择,进而形成带有自我指涉性的话语场。如果把严歌苓的这些短篇小说与她的散文随笔和访谈自述放在一起作为互文进行参读,显然会发现小说中很多故事情节、人物情感都来自她身在异域的切身体验,作品颇具“纪实的亲历性”“自叙的倾诉性”色彩。严歌苓创作的这些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叙述人“我”来架构组织故事,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外化。“我”既是一个亲历者,又是一个旁观者,同时也是一个叙述者:

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

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的挤,我嫌别人,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静,我总是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口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

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拗。^{[7]67}

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份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7]33}

严歌苓通过“我”重在讲述异地漂泊离散的感受,暗指严歌苓求学异国时艰难且坚韧的生存境遇,是一种亲历的真实经验的传达。这种让人意想不到又在情理之中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绪,既始于想象中的生活与现实生存图景的差距,又源于国内良好优越的自我认同感在异域直线下跌的失落,更在于繁重低廉的超负荷工作和孤身一人在外的心酸。“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使“我”常常感到焦虑与无奈。

在其随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中,这种生存的苦痛意味仍在延续。《无出路咖啡馆》在叙事上不仅继续倚重第一人称“我”作为视点人物和认知主体,而且整个故事原型还取材于严歌苓的亲身经历。“我”一个柔弱如风的中国女子,每天吃着低劣食品,翻着账单,挖空心思去向房东太太争取房租的宽限,尽管两手空空也要对贫穷守口如瓶。疲于奔命忙于应付的“我”,考虑最多的既不是自己相爱的外交官未婚夫,也不是惹人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尽管这些把“我”折腾得精疲力尽。爱情、婚姻、前途这些对于“我”来讲,都无法抵过“生存”和“钱”那般重要和紧迫,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真实而残酷。除此之外,因隔阂而生的困惑、因窘迫而生的辛劳、因身份失衡产生的逼仄境遇等诸多苦痛,都很自然地浸透在她的小说文本中,间接呈现了一位离散主体撕裂的、冷静的、成熟的精神演进过程。

“我”不顺心地活着、累呀累呀地活着、辛劳寂寞地活着,本以为来到了“自由的彼岸”,可是生活仍是新一轮的身体受难和精神折磨,“美国的生活离我曾设想的‘青灯一盏,红楼一卷’的清高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8]。一方是祖国根系话语深植的召唤与牵制,另一方是西方新奇话语播迁的吸引与影响,两方的冲撞对“离散者”(“我”)也带来了内在强大的心理焦虑与伤害。生活在海外的严歌苓曾一度患有精神忧郁症和重度失眠症,1996年严歌苓为近乎要了性命的失眠症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此外,她对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心理学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研究不仅能帮助她舒缓、协调来自异质空间的各种尴尬和矛盾,同时还能对过往潜意识的记忆创伤进行解析。例如,在她的小说《人寰》

里，“我”躺在美国的一家心理门诊接受治疗，在凌乱碎片化的絮语中反复回忆家族史、文革史，最终揭开了那场掺杂暧昧与伤痛的“性奇遇”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这让严歌苓从心理学的理性视角去寻觅个体的精神状态，并借助文学写作的形式对“离散者”心理的痛因与杂症进行解密与探寻。如：《女房东》里老柴对房东沃克太太，《青柠檬色的鸟》里糟老头佩德罗对楼上的年轻女子香豆，《阿曼达》里来美国陪读的42岁男人杨思斌对邻居14岁的混血儿阿曼达，都有着近乎畸形的爱慕心理和隐秘的偷窥心理。这些微妙阴郁的心理活动的表达，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小说“刻画人物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美学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自我实现。尽管在西方的异质文明中，“离散者”诸多心理的不适不惯缠绕不已，但是在异域不仅是逃避、谋生，更是一种自我人格的重新生长以及对现代认知的探索追寻，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是支撑其在漂泊中的内在精神动力，所以“生命移植”的痛很快便接踵而至了。

二、移植者：失语危机与沉默对抗

严歌苓三十岁时成为一名大龄留学生，如同她自己所说，留学“结束了我在国内的那点文学局面，推翻了我对创作的所有自我设计，将我置于一个新的竞争环境。这个生存环境中，我像普伊格那样去挣一份餐馆工的工钱，像乔伊斯那样，去谋一个小职位的职位，也险些像纳博科夫流亡初期那样零星授课”^[9]。与体力移民相比，像严歌苓这样由“留学”变成的新移民，在追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痛楚、精神磨难远远多于生存的艰辛。身份错位、身份失衡意味着根源的丧失、话语权的丧失。

被母语文化塑造的严歌苓要在短时间内顺利地“跨域”和“移植”，过渡到自由舒展的状态，显然是不易的；更何况要从中文写作的中心区域，亦即舒适区域，来到一个极具陌生又颇具挑战的地方。严歌苓曾多次谈道：“出国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对另一些作家，却是新生……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9]“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10]340}这些带有比喻意味的阐释被众多研究者大量引用。“再生”“新生”所带来的敏感、伤痛、快感极大地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其认知视角和精神气质随即发生着更新。

对于严歌苓来说，出国留学并不是简单地涉猎

新奇、游历美景，举目茫茫来到孤寂艰辛的环境，不仅切断了与祖国、家庭、朋友的实体纽带，而且原先在国内略有名气的军旅作家的“光环”也随之消失。课堂上，她必须用英文口述自己的文章，并先用英文创作而后翻译为中文，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意味着先天优势的失去、母语力量的消逝。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明确提出：一个民族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联结成的共同体。马丁·海德格尔也说过，语言是人的首要规定性，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尤其是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语言不仅仅是人际传播中的必要存在，更是一种文化表意和生活表征。语言标识和建构着身份，一旦陷入失语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身份的失落和消解。对于“移植者”来说，能否在异国生根取决于对该国语言文化的吸纳转换，取决于身份归属寻找和文化失语应对中的坚韧。

严歌苓对失语这种“存在之源”的苦痛有着切身体验，因此也把失语危机植入到小说创作中，如在《簪花女与卖酒郎》中，刚到美国的齐颂与墨西哥小伙卡罗斯互生好感、两情相悦，但因语言障碍，两人沟通总是不畅，齐颂每次只能以“是”或“不”来应对。齐颂的姨妈为了将他们分开，故意将对话译错，并将齐颂卖给了一个聋子，也彻底丧失了话语权。“聋子”暗示着无助的齐颂彻底失去了语言——这一维系与人沟通交流的工具。《栗色头发》中的“我”和齐颂一样，失语的尴尬使“我”和美国男子“栗色头发”之间真实的情感无法通过语言顺畅表达。“我”常常答非所问，把“栗色头发”折磨得疲惫。因语言不通，“我”总觉得自己好似一只失群的雁，被遗弃在这陌生的异国。在一定程度上，失语折射了严歌苓在异质语境中所遭遇的文化身份认同上的龃龉与尴尬。同时，这里的语言不通还暗指中西之间认知、情感、思想、行为等方面难以逾越的隔膜与对话鸿沟。

进入一种陌生的异域空间，意味着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感知世界。“移植者”在跨文化语境中常常会感知到明显的差异，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更多的是来自异域文化语境中的人、事、物给予自己的感知信息，以及自己感知到的强势文化信息与原生的弱势文化信息之间存在的差异。尤其是“移植者”在西方社会跻身生根的过程中，会遭受到来自第一世界的高傲优越感、拯救式的同情心和蔑视性的不均等，在这种文化殖民、文化霸权中，“我”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在《栗色头发》中，西方人常常以为“我”听不懂那些偏见品评的语言：“中国现在还有

红卫兵吗?”“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移植后的“我”,在东西方的撕裂拉扯中,即使失语危机常伴随左右,但对差异之下西方的排他性和优越性有着极强的感知。最终,“我”无法忍受西方人用惯常的优越姿态来对中国人进行“偏见品评”,毅然辞去了高报酬的人体模特工作,因为这个工作需要“麻痹些许的自我意识”。

严歌苓曾将自己受美国 FBI 调查,并被迫要求进行测谎实验的经历写入散文《FBI 监视下的婚姻》中,她写道:“它们(美国)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它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我已意识到在这里(美国)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4]56}这种感受在《无出路咖啡馆》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证,“我”之所以离开外交官安德烈,并非是因为联邦调查局轰炸式的无理干扰,而是“我”实在无法忍受在与安德烈的相处中始终被视为可怜、同情和施舍的对象;正是西方人骨子里先天携带的“拯救主义”,促使“我”携着幼小但却强烈的自尊心离开。

在《栗色头发》中“我”的辞职,《无出路咖啡馆》中“我”的分手,不单单是因为作家严歌苓心中的民族主义,更多是为了生命尊严和人格独立。这两个情节,意在揭示“我”在异族情感里所感受到的中西文化、种族、性别的不平等性。西方人乐于以基督徒“爱世人”“救世人”的名义,对弱势文化族群进行拯救,而被拯救的东方人深感其中的嘲讽,对强势文化予以沉默的拒绝和抗议。同时,这也是“移植者”在东西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与隔阂中,如何努力坚持人格独立性的一种体现。

如果说无所归依的“离散者”在面对东西文化碰撞时,流露出更多的是挣扎的苦痛,那么,已向前迈一步的“移植者”,已在撕裂的精神历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文化之间宿命般的隔膜鸿沟——身陷进退两难的语言困境、生存困境中无法自拔,移植后的身份也很难得到鲜明地确立,缺乏言说自我需求的话语权。但是,严歌苓凭借“移植者”先天的自尊和敏感,知识分子特有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试图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反拨、去抵抗。她在小说文本中,隐含地揭示出东西方小人物之间不对称、不对等的关系,挖掘其中隐含的种族优越感,消解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与诋毁。

三、游牧者:双重边缘与复眼旁观

1997年,严歌苓在马来西亚文艺营开幕式上称

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4]80}一边是东方文化的博爱宽厚,另一边是西方文化的个性自由,她试图在东西方文化接触的疆界处寻找更适合自我的、更富有民族新意的新身份。于是,她借错位归属的“游牧者”来界定自己,认为既游离于故国文化主流,又处在别族文化的边缘,但恰可利用这种双重边缘的“居间”优势,与他方和此地保持对话式的联系。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认为,这是属于移民的双重视角,是最真的眼睛,移民者在杂糅的“第三空间”中,穿越地域、种族、阶级之间的差异,揭示文化认同的“域限”。在实际创作中,严歌苓便立足于既非这个、又非那个的“第三空间”中,试图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复眼旁观”式的深窥。

其一,严歌苓对祖国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乡愁书写并非那般泛滥繁复,她重在表达跨文化语境中人与人相处时的不信任,和难以沟通的孤寂感。如《方月饼》,可以说是披着“乡愁”的外衣,“我”握着“变形”改良后的方月饼邀请室友玛雅一道赏月,向她谈起关于中秋那些思乡的浪漫情绪,譬如私奔的嫦娥、捣药的玉兔、伐桂的吴刚,可是这些都是我的一厢情愿,玛雅却并未听懂。她担心月饼的卡路里过高,果断离开,并留下一句话:“下月送报费,你分担一半。”在西方人玛雅的意识里,只有相处的明确界限和公道划分,无法理解东方中秋所指征的“圆”“聚”“合”的意象。这里,乡愁悲离的情调以诗意的古典意象含蓄呈现,月饼所指代的故乡记忆在此蒙上了一层柔美圣洁的面纱。可是,这里的月饼是变形的、是方的,意在表达对祖国文化、居住国文化之间差异的看法,还有基于文化差异所折射出的西方个体主义问题。

其二,严歌苓对在异乡受到的排挤和屈辱也并非那般强烈控诉。如《大陆妹》,讲述了一位大陆妹被美国远亲“唐家”暂时收容的生活,唐家多年前从台湾迁居到美国,但从原乡、根脉论,身体里流淌的仍是中国的血统。可在“唐家人”眼里,“大陆”却是落后的象征地,“故乡”被戏谑为 Mushroom(香菇),国音乡韵成了一种骇人可怕的声音。大陆妹在被刁难、被歧视的过程中也逐渐学会了适应,慢慢地也将吃饭说成吡饭,垃圾说成勒色,凑趣地笑,从众地生活。可偶然间大陆妹从华文报纸上看到最喜欢的老作家去世的消息时,对原乡那份浓浓的依恋感奔涌

而出,这是“唐家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像大陆妹这样的移民,在新的国度里,入乡随俗也好,奋力求存也罢,即使有嘲讽和排挤,也乐于拥抱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审美标准……可是,不论何种程度的适应与认同,自己身上所携带的文化印记仍深埋于心,并深沉地依恋,同时在异域所培养的独立自主的生存意识也在逐日增强。

其三,严歌苓小说中的留学者、移民者也常表现出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的征服意味。但是,她对漂泊人生和无根灵魂更多地给予精神层面的关切,用博爱的心,真诚平等地看待他们的尊严、价值和命运。在《海那边》中,王先生、泡、李迈克是同为异乡的中国人,也是永远无法回去的离散者。作为餐馆雇主的王先生,为了榨取泡身上的所有价值,想尽办法使唤欺压,丝毫不理会泡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正常需求。泡痴傻愚钝,只懂得机械卖命,但内心深处对异性的需求却十分强烈,是他“唯一没被痴傻污染掉的那部分灵魂”。尽管畸形,但也合理,毕竟这是生命欲望的涌动,是泡唯一自我的东西。李迈克试图用一张捡来的美女照片戏耍蒙骗泡,这个美女在“海那边”的大陆等着嫁给他。正是这张凝聚所有寄托的照片,给予了泡充足的心灵安慰和想象期望。但是,王先生不仅冰冷地揭穿了这个“可贵”的谎言,还将李迈克告发到移民局。最后,失去了“精神支撑”的泡,杀死了王先生。李迈克虽日夜想念着“海那边”的爱人和孩子,但也并不晓得“哪辈子回得去”。严歌苓把泡个体行为的隐形需求放大,对人性本色深层关注,人的扭曲和压抑被深刻地凸显出来。

另外,从“方月饼”“国音乡韵”“海那边”这些颇具祖国象征的符号意象中,可窥出严歌苓在跨语际环境中母语的滋养一直都在。这些1995年之前创作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她在美国学习西方小说技巧时的课外习作,她希冀找到“更具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找到能够全世界流通的写作方式和语言”^{[4]81},赋予文学表达一种独特的声调和语气——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饶芃子将其称之为一种“新的汉语体”^{[11]276}。这种语言不仅有汉语含蓄、凝练的古典意味,还颇带西方异国语言独特的情调意趣,最重要的是能与世界沟通。这种对中西两种语言精髓的汲取运用,与“游牧者”的身份经验也是分不开的。

总体而言,严歌苓没有将海外特有的乡愁、漂泊、受辱情绪渲染夸张,而是有节制地言说,将这些“望月思乡之苦”“寄人篱下之悲”“失根无根之痛”控制在一定范围限度内。在严歌苓的小说文本中,

既蕴含着对东方文化的强烈认同,又渗透着来自西方个体生命的价值判断。陈晓晖评价严歌苓时指出:“书写华人社会也好,书写异族社会也好,或是两个世界的融和贯通也好,都有一个比族裔性和社群性更好的观照点。”^{[12]105}这个观照的视点便来自处在“第三空间”中的“游牧者”,不仅表达了来到异国之后的内心困惑和复杂处境,还叙说了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和种族隔阂时是如何完成自我超越和文化沟通的。

四、寄居者:多重发现与融会贯通

2004年,严歌苓跟随丈夫劳伦斯在非洲尼日利亚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非洲生活结束后又居住于中国台湾、德国柏林等地。严歌苓自称自己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之所以称为“寄居者”,是因为她早已打破了固定存在的家园,在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流动迁移中获得内心自由的归属,并以此达到建构文化身份的目的。从迁移意愿和心态表征上看,严歌苓是乐于“旅居”“寄居”的,长久以来,这已经成了她“安居”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向来都是多元的,任何一个时代不存在绝对二元对峙的文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从根本上排斥另一种文化而独立存在。对于十几年来不停游走、频繁移居的严歌苓来说更是如此,她积极地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面对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文化,并逐渐站在人类文明这一更高的视角来审视思考中西文化问题。

非洲原始蛮荒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气息深深地吸引着严歌苓。在散文《非洲手记》中,她描述了阿布贾、拉各斯、卡诺这几座城市,其环境恶劣、治安混乱、交通不便。尽管当地人挣扎在温饱线上,但是他们吃苦耐劳、殷勤友好。严歌苓在为数不多的几篇非洲题材小说《苏安·梅》《集装箱村落》《热带的雨》中,以广博融通的视野,描述了非洲实际的生存现场和文化观念,还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有了更深的批判性思考,对少数族裔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同情。常年游走、具有融通思想的严歌苓,更能敏锐地抓到多元文化之间的同质点,如在非洲感知的苦难形态和历史悲情,在她随后的创作中,不着痕迹地将非洲苦难转化为中国化的文学想象——《第九个葡萄》《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地母式的苦难叙事范式,以此吸引、感染了众多中西方读者。

严歌苓在异域的创作除了关注“新景”之外,还从融通的视角,在文化碰撞交流的漩涡中来审视人类文化共同的“远景”。“我觉得文学到最最根本的

时候,它应该是全球的,应该是 globe 的,应该是 universal 的,所以写最根本的是写到人性上面。”^{[4]180} 尽管世界各地文化不同,但人性、人情、人道是相通的,不可否认,同大于异,同者日显,异者日微。中国—纽约—尼日利亚—德国,频繁地出入转换,错位归属的无奈,使严歌苓常常感叹自己身处漂泊之中,但也正是这种“寄居”带给作家更多的生活经历和营养。严歌苓正是以这种“寄居者”的身份,以自强、自为、自由的融通意识与各种异己话语进行沟通交流。事实上,随着现代性的进展,全球化的推动,人们也愈加感到身处在一个多元繁杂、众声喧哗的文化生存空间。

从中国大陆到北美、非洲,又到欧洲,严歌苓的游走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进行的。在“全球场”中,跨国界、跨文化现象日益成为一种常态,大规模的人类交流移居活动,使整个世界向着休戚相关的纵深整体发展。“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体验,人们已经开始习惯并依赖于这种生活了。”^{[13]5} 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认为,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时间的压缩、空间的跨越,还意味着人们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改变。严歌苓既是全球性潮流的顺应者与参与者,同时又是世界格局差异、多元文化冲突、价值分裂共享的承担者与表现者。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身份建构,与中国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历史前进方向有着一致性。在动态对话、多维建构的全球化进程中,严歌苓不再固守于封闭专属的文化空间,而是处于一种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间”,在小说创作中保存文化差异,并使之适应敞开的异质语境。具有多元文化身份的严歌苓,从

自己最熟悉的移民生活、边缘处境、真实体验入手,在小说中展示出全球场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与融通,由此在海外华文文坛开拓出一席之地,并为东方文化的世界传播注入力量。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2] D. 佛克马, E. 蚁布斯.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C]. 俞国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 斯图尔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4] 严歌苓. 波西米亚楼[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5] 艾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孙凯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6] 严歌苓,郭红. 我经历过无数个人生[J]. 黄河文学,2016(6).
- [7] 严歌苓. 海那边[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
- [8] 严歌苓. 苦闷中的反思[J]. 台港文学选刊,1995(1).
- [9] 严歌苓. 呆下来,活下去[J]. 北京文学,2002(11).
- [10] 严歌苓. 洞房·少年小渔[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 [11] 饶芃子. 世界文坛的奇葩[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 [12] 陈晓晖. 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 [13] 约翰·汤林森. 全球化与文化[M]. 郭剑英,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ubject Transformation and Role Identification in Cross – Cultural Contex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Yan Geling's Novels

FENG Mei

(College of Media,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s an overseas Chinese writer, Yan Geling faces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inevitably, such as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cultural breaks, ethnic conflicts, and life reconstruction. She has been trying to construct her own cultural identity and find new narrative methods for her novels. She interacts with heterogeneous “others” in a mixed and multicultural space, as a diaspora, transplanter, nomad, and sojourner, providing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diverse picture of human life.

Key words: Yan Geling; cross – cultural context; multi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集体记忆”视域下李安电影中的饮食文化探析

——以“家庭三部曲”为例

关 键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李安在“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充分展现了离散的海外华人心中根植的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集体记忆”;中国特有的饮食文化如食物制作、中式餐具、用餐礼仪、具有仪式感的饮食活动等,加强了在异国同一群体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引发我们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的思考——既要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要吸收异质的优秀文化,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李安;集体记忆;饮食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4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21-0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的概念纷纷出现,不可避免地会凸显出文化差异现象,不少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将目光聚集于此,李安导演的“家庭三部曲”就是其典型代表作。李安出生、成长于中国台湾,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1978年,李安赴美留学,在留学的过程中又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因此,李安导演对于海外华人尴尬的文化冲突处境感同身受,他的“家庭三部曲”便是基于自身对于文化冲击的感受和思考拍摄而成。

1991年12月7日在中国台湾上映的《推手》,是李安独立撰写剧本并执导拍摄的处女作,这是一部反映一家在纽约的台湾人生活中存在的文化差异的喜剧片。《推手》一上映,便一炮走红,在台湾获得了第28届金马奖和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奖,李安也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原创剧本奖。据李安自述,这部电影在上映当日票房平平,获得金马奖后,隔天票房便大涨,同时在有线电视台一天播演四次的情况下,台北票房也冲到了1800百万元。一炮走红的李安,在两年后又执导了《喜宴》上映。

在张靓蓓所著的《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中,李安道:“当年在纽约时,有观众问我《喜宴》

是个什么电影,我说‘《喜宴》是部李安的电影!’我的教养、背景都自然地反映在作品里。”^{[1]60} 确如李安所说,中国文化以及美国文化都对他有着深深的影响,他出生、成长于台湾,少年和青年时代在台湾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同时,他在文化身份上是“外省第二代”,祖籍为江西德安,他成长中的认同感与大陆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喜宴》在1993年入围柏林影展,台湾电影大出风头,该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这部关于传统伦理观念的通俗剧,是一部以好莱坞模式制作的中国电影,李安由这部影片逐渐摸索出自己影片的市场定位——从“台湾—亚洲”,他的电影走的是大众路线;而从“亚洲—欧美”,他的电影就走出了自己的艺术路线。

李安在这两部影片大获成功之后,他既欣喜又惶恐,惶恐的力量促使他继续尝试,《饮食男女》便是他开始转变的第一步,也是他第一次拍摄他人写的剧本,同时面临着从“大众”向“艺术”跨界的压力。《饮食男女》在欧美艺术院线立住了脚跟,但在台湾卖座并不理想,金马奖全军覆没,和这该影片性调比较忧郁有关。李安开始了自我反思。但这次尝试,对李安来说还是获益良多。

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中讲:“对于我们来说,近百年来何去何从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

收稿日期:2020-06-12

作者简介:关键(1995—),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

二、回溯“集体记忆”

(一) 仪式活动:在西方举行中式婚宴

是个纠结和迷惑。身为外省第二代,我不由自主地会注意到传承的问题(台湾电影则比较注重民族意识的觉醒),不只是文化传承,还包括生活习惯、伦理的传承。这些传承面对遽变的时代,已经变味了,就像《饮食男女》里的菜肴,徒具外貌,里面已经少了些什么滋味。”^{[1]61}因此,正如李安所说,他在《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的拍摄中会自然流露出自身的感怀。

一、“集体记忆”与饮食文化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又称群体记忆,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首次提出,释义为:“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确保集体记忆继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连续性。”^{[2]10}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维系族群关系、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的重要记忆体系。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人们所共享、传承的事或物,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历史的变迁而变成群体记忆中的标志性元素。

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作为文化符号的一个类别,在历史的变迁与沉淀中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具有辨识度的标识符号。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并以某物象征作为标志来标示自己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3]“文化认同正是建构身份认同的主要途径,饮食传统作为文化符号的一种,以具有象征性标志的文化符号来建构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建构一个民族共同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中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4]

在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比如食物制作、中式餐具、用餐礼仪、具有仪式感的饮食活动等中国特有的饮食文化符号,形成了一种维系族群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影片中多处影像都展现着中国人即便到了美国或者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在国内所形成的饮食文化的集体记忆一直根植于他们的意识中。对这种集体记忆的回溯,加强了在异国同一群体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与饮食相关的仪式性活动在唤起和重塑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婚宴是中国人自古沿袭的具有仪式感的饮食文化传统。婚宴时,请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同见证新人喜结连理,这不仅是祝福新人的仪式感,更是维系亲友感情的有效手段。“筵席代表了一种共乐的氛围、一种集体的精神、一种个人的品位以及在人群中的游戏……在饮食中聚会或在饮食中品味,都是一种情感性游戏,前者是彼此间的情感,后者是人与自然客观世界间的情感。游戏的过程就是与之产生沟通和相互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都是在自由活动中没有显现目的的。”^{[5]124}喜宴是筵席的形式之一,离散在海外的华人通过在中式婚宴中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从而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定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它代表了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感。

李安的电影《喜宴》中,男同性恋高伟同为了做一个孝子,满足父母抱孙子的愿望,和葳葳假结婚,他们仓促地领了结婚证,并告诉父母他们不打算举办婚礼。机缘巧合下,高伟同父亲的老部下陈老板,帮忙督促张罗给高伟同和葳葳举办婚礼,高伟同的父母这才喜笑颜开。整个喜宴充满中国元素,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式婚礼”。喜宴的流程包括一对新人向父母行跪拜礼、喝莲子汤“早生贵子”、吃宴席敬酒、闹洞房等。高伟同和葳葳虽然有着西化元素的婚纱和西装,但高伟同的父亲身着中山装,母亲身着旗袍,都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服饰,代表了老一代中国人虽身在异乡仍渴望保留中华元素于一身的愿望。

李安导演在《喜宴》中唯一露脸的镜头,是在高伟同婚宴上宾客起哄玩闹的场景,李安称之为“五千年来性压抑的结果”,这个镜头让人记忆特别深刻。中国人自古给人含蓄内敛的印象,而喜宴成为理所当然释放情感与压抑的场所,即含蓄内敛和激情的释放共同寓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电影中的婚宴,宴请的大多是华人宾客,在异乡同一族群的人聚集在一起,回溯作为中国人对于婚宴的集体记忆,由此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上高伟同的父母在国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内心深处也渴望通过在异乡举办婚宴来满足自我面子,以及对于集体记忆的追溯。这在异国举行的“中式婚礼”和营造出的“中国氛围”,使得高伟同的父母在异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

(二) 礼仪传承:崇礼文化沿袭至“餐桌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

称,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都强调“礼”的追求。儒家传统文化中讲究“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也印证着“礼”的不容忽视。^[6]“崇礼文化”渗透于中国“餐桌文化”中。《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这种礼仪的传承,根植于离散的华夏子孙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一种传承的内在伦理精神。在“家庭三部曲”中,餐桌崇礼文化体现在就餐的座位秩序、用餐时的话语权,等等。

在电影《推手》中,朱晓生的父亲来美国与晓生一家生活在一起。朱父是常年生活在北京的太极拳大师,不通英文,儿媳玛莎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的“餐桌礼仪”中,餐桌的主位往往是正对门口的位置,或者是宴请主人的位置。晓生一家围坐在一起吃饭时,朱父是坐在长方形桌子短边的主座位置,儿子晓生和孙子杰米依次坐在朱父左手边,而儿媳玛莎独自坐在晓生对面,表明在这个“中西混合”的家庭中,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餐桌文化中对父辈尊重的礼仪。朱父是家中“最高权力”的象征,儿子晓生和孙子杰米次之;儿媳玛莎独自居坐,隐喻着在中国式家庭中她是一个外来者。朱父到了美国依旧保持吃中餐的习惯,面前摆的餐具也是具有中国元素青花瓷碗筷;而晓生面前摆的既有中餐餐具,也有西餐餐具,他一边用刀叉吃西餐,一边用筷子吃父亲夹给他的中餐,他身上不仅有传统的中华文化教育,更有西方文化对他形成的冲击,他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中尽力维持平衡。

在《喜宴》中,“餐桌礼仪”的集体记忆也凸显得淋漓尽致。高伟同的父母去美国,他们一家人吃饭时座位安排是:高父坐在餐桌主位的位置上,高妈和葳葳依次坐在一边,高伟同和赛门坐在另一边。从餐桌上的日常交流,也可看出高父在家中的“父权地位”;早上吃饭时,高父不动筷,没人先动筷吃。赛门和高伟同吵架时,高父了然于心他们争吵的原因,高妈不通英文一头雾水,高父对高妈说:“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从这些言语措辞就可看出中国传统家庭地位的高低之分。在《喜宴》中,尤其是陈老板,作为高父的老部下,在餐厅里他和高父说话时一直是站立的;喜宴结束后,陈老板站在门口等高父出来,在高父主动伸手和他握手前,他是不敢伸手的,直至送走高父一家,陈老板都很恭敬礼貌。

(三)食物制作:中餐饮食符号根植于心

在电影《饮食男女》开头,导演运用多个特写镜头展示“炸鱼”“东坡肉”“煨鸡汤”“小笼包”的制作过程,极具表现力的近距离特写镜头和摇镜头凸显

了中华美食的“色香”,使各种菜式作为特定的艺术表达符号,极具审美价值。通过影片的展示,可以悉知朱父是名厨,每周的家庭聚餐朱父都会做一大桌具有中华美食符号的菜品,家庭成员围坐在桌前进行感情的交流和重要家庭事件的宣布。这美食成了维系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的有力工具,美食符号所建构的饮食文化的“集体记忆”根植于朱家每个人的心中。

在电影《推手》中,朱晓生的父亲来美国,和晓生一家生活在一起。导演李安通过长镜头和景深镜头展现朱父和美国儿媳虽处于同一空间下,但却因文化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彼此隔膜、陷入尴尬境地的场景。朱父虽身在美国,但依旧保持食中餐的习惯,会给晓生一家准备丰富的中餐。当他们一家围坐在一起吃饭时,透过镜头可以看出朱父面前摆着三盘带荤的家常菜,餐具也是青花瓷的中式餐具;而儿媳玛莎正在用刀叉食用蔬菜沙拉。朱父奇怪玛莎为何只吃青菜,并说道:“这地球上有一种东西,五谷杂粮,果木蔬菜,属于隐性;另一种东西是牛、羊、猪、鸡,是显性的,两种东西配合起来吃才能补先天之灵。”他的话语中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和中餐的习惯。

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一书中讲:“因为记忆通常会被遗忘、扭曲以及会受到被排挤的威胁,历史因此常常需要借助回忆来赢得其形态。”^[7]在《推手》中,朱父晚年赴美,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思想方面与西方世界是有强烈冲突的,他需要通过本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来增强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朱父和陈太太结缘于食物的制作:陈太太在会馆里教华人烹饪,因教室被占,不得不转移阵地到朱父教太极拳的教室里制作蟹黄小笼包,朱太太说“我们还有葱油饼和花卷”,让朱父深感亲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太太提到她教学员做“左公鸡”。“左公鸡”又称“左宗棠鸡”,这道菜源于1952年台湾海军总司令负责接待美国海军总司令设宴时所诞生的菜,掌厨大师彭长贵因自己是湖南人,希望菜名和湘菜有关,就给它起名为“左宗棠鸡”。可见,“左公鸡”也是具有与传统饮食文化相关的菜品。可以看出,这些华人聚集在一起,学习交流中华美食的制作方法,已经超出了食物制作的普通含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极具中华饮食符号特征的食物,建构起有关饮食文化的“集体记忆”,唤起在异国他乡群体之间的民族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总而言之,朱父与陈太太晚年的爱情,是通过一系列具有明显中式饮食文化元素建立起来的,从开

始的包蟹黄小笼包奠定基础,陈太太夸赞朱父包包子手艺棒,朱父答:“北方人嘛,都喜欢做些面食。”一句“北方人嘛”,就极大地增进了老一辈离散的北京人之间的情感;到后来的野餐增进感情,通过镜头可见,野餐时他们所备食物是烧烤和一些中式餐点。透过建构饮食文化的“集体记忆”,加强了离散于海外的老一辈北京人的身份认同与族群归属感。

三、记忆呈现:“集体记忆”背后的精神实质

(一)“集体记忆”的重塑,加强中华文化遗产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中汲取力量。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会有多少集体记忆。”^{[2]39-40}换言之,集体记忆对于族群来讲,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可以推动离散的族群实现族群文化的重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碰撞,势必导致原民族文化的变异、流失。西方发达国家依靠经济实力和政治强权,将自己的文化理念移植于发展中国家,而“集体记忆”的重塑,有利于离散在海外的华人传播本国文化符号,在增强集体归属感和文化身份认同感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二)“他者视角”强化“自我主体文化”建构

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在“镜像阶段”理论中认为:婴儿在镜像阶段的“二次同化”过程中,认同了“他者”的话语体系,才能使自身被主体化。由于自我本质上的内在缺失,它需要外在的“他者”不断地充实和确认自己。“他者”不仅是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它对人类自我的塑造,贯穿人类生活的始终。哈布瓦赫认为:“没有纯粹的记忆,记忆产生于集体。回忆不是个体活动的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才能完成,需要借助某些载体如时间、空间、事件等才能被感知,经由‘他者’唤醒个体记忆。”^[8]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所呈现的“饮食自我主体文化”同样也需要“他者视角”,来强化自我主体文化的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在欧美国家通常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面对文化强国的文化输出,离散在海外的华人内心渴求集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李安导演通过展示在美华人熟知的饮食文化符号,强化“自我主体文化”在“他者视角”下的存在与差异化,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实现了“自我主体文化”的建构,从而满足离散的海外华人对集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需求。

(三)建立跨文化交流的平台

李安电影成功的关键元素,不仅在于影片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描写,更在于他在跨地区、跨种族、跨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扮演好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他既能让国人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获得身份认同,又能得到西方观众的青睐。李安在不同文化的跨界传播中扮演的是一个“翻译者”的角色,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象征,因此,是不同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换、协商和斗争”^{[9]163}。可以看出,电影中所涉及的跨种族文化“集体记忆”建构的现象,并不是要一种文化“打败”另一种文化,彼此之间一决高下,而是要在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建立一个平等协商、交流沟通的平台。在李安的电影中,有很多元素都体现了影片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交流、平等互动的平台,以实现文化交融的效果。

在电影《推手》中,朱父与儿媳玛莎经过一系列的家庭碰撞与摩擦之后,双方都进行了妥协和让步,以实现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交融。先是玛莎生病后,朱父用极具中国元素的青花瓷杯泡了一杯茶给玛莎,这是朱父迈出和解的第一步。在影片中可见这个青花瓷杯是朱父不离手的物件,象征着朱父所代表的中方文化态度。身处美国,被现代文明裹挟的大环境下,朱父愿意为了家庭的和睦做出妥协,为文化交融做出让步,也为后续埋下了伏笔。随后朱父离家出走毫无音讯,玛莎在家招待朋友,这时导演给了玛莎和她朋友一个中景镜头,画面右侧是玛莎正在用长长的筷子熟练地炸着具有中餐符号的春卷,灶台上放置的也是烹饪中餐所需的调味料。画面左侧是玛莎朋友所坐的餐桌,餐桌上摆放的茶具是标准的工夫茶具和小茶杯,整个画面充斥着中式饮食元素。朋友问起玛莎要写作的小说题材时,玛莎说写的是中国移民携家来到美国的故事。可见在朱父离家出走后,玛莎也在反思自身,反思不同地域的文化碰撞后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来对待。在影片结尾部分,玛莎对于朱父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主动给朱父置办房间,亲手将太极剑挂于屋中显眼的地方,还和晓生讨论太极文化,学习太极动作。玛莎前后巨大的转变,体现了文化碰撞背后要实现的是文化的交流融合。朱父则从他们的小家搬出去独自生活,尊重西方家庭中的“自由”空间。

《喜宴》中亦是,在影片的结尾,导演用一个慢镜头拍摄高父离美回国过安检时双手高举的动作,暗喻“投降”,高父接受了赛门和伟同的感情,赛门

也以中国家庭中的一员接受了中方文化。文化碰撞不是为了消解碰撞双方中的其中一种文化,而是要建构一个文化间交流的平等平台。李安导演也正是想通过对于饮食文化“集体记忆”的建构,为中西方饮食文化搭建一个相互交融的平台。从影片中可以明显看出李安借观众熟悉的饮食元素,将中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和交融做出了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表达。

(四) 引导受众辩证看待中西文化差异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10]223}此文化特征也体现于中西饮食文化中。饮食文化的差异是影视作品中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因为中西烹饪习惯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饮食习惯的差异。从微观的层面看,中西方饮食文化具有差异;从宏观层面看,在文化大类上中西方同样具有差异。三部影片中涉及的“饮食文化”集体记忆背后,隐藏的是离散的海外华人回归家园的愿望。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碰撞或冲突。我们不能因此就以消极的目光来看待文化碰撞,而应该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文化混杂状态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李安导演通过对本土饮食文化“集体记忆”的重构,在强化本土饮食文化存在感与满足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同时,又能引导受众辩证看待中西文化差异,引导受众既要反对偏执于记忆中

的东方民族文化,又要反对偏执于西方文化思想。李安的电影也提醒我们:用开放的态度来接受西方文化之精髓,抓住时机发展民族文化,将文化融合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新契机。

参考文献:

- [1] 李靛蓓,李安. 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 [2]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 冯琼莹. 受众网络使用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D]. 上海:同济大学,2013.
- [4] 阿里夫·德里克. 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J]. 东方论坛,2001(4).
- [5] 陈苏华. 人类饮食文化学[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
- [6] 薛乔琿. 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社交的启示:以儒家文化为例[J]. 汉字文化,2019(12).
- [7]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M]. 金福寿,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8] 杨秀红,苏丽靖. 跨文化交际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2).
- [9] 向宇. 跨界的艺术:论李安电影[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10] 祝西莹,徐淑霞. 中西文化概论[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n Analysis of the Food Culture in Ang Lee's Mov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Taking the "Family Trilogy" as An Example

GUAN J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Family Trilogy", Pushing Hands, Wedding Banquet, and Diet Men and Women, Ang Lee fully demonstrat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ese food culture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dispersed overseas Chinese; China's unique food culture, such as food production, Chinese tableware, dining etiquette, and ritualistic eating activities, has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among the same group in a foreign country, it leads us to think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 we should not only adhere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our own nation, but also absorb the outstanding culture of different nature and realize the fusion of multi-culture.

Key words: Ang Lee; collective memory; food culture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选模型

王志强^{a,b}, 刘 硕^a, 王陶陶^a, 马婷婷^a

(青岛理工大学 a. 管理工程学院;

b. 智慧城市建设管理研究中心(新型智库), 山东 青岛 266520)

摘要:建筑物料综合性能对建筑的整体质量起到关键作用,而建筑物料供应商作为建筑供应链的源头,对其进行科学抉择能够保证建筑业的高水平发展。为了更好地考虑风险偏好对决策者行为决策的影响,引入累积前景理论对建筑物料供应商进行评价优选研究。在将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指标属性值进行极差化法标准化,并应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基础上,得到各评价指标前景价值与决策权重系数,最后得到供应商综合累积前景值并排序择优。

关键词:建筑物料供应商;累积前景理论;评价优选模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5

中图分类号:F224.3;F4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26-05

一、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高水平、高质量的平稳发展,质量、兼容性以及综合性能优良的建筑物料已成为建筑行业在社会经济大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作为建筑物料供应链的源头,如何对供应商进行科学抉择,关系到建筑行业的安全稳定运行。因此,建立符合实际发展的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选模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供应商的评价优选是供应链领域的研究重点,在国外最早研究供应商评价优选问题的是 Dickson^[1],其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得出交货时间、交货质量等23项供应商评价优选准则。自此以后,国内外学者对于供应商评价优选的研究逐步增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大型制造企业^[2]、电网物资^[3-4]、零售业^[5]等领域。供应商评价优选研究方法较为丰富,包括 AHP^[6]、模糊综合评价^[7]、TOPSIS^[8-9]、BP神经网络^[10]等方法。而有的学者采用管理科学的其他知识来解决供应商评价优选问题,如 Wang 等^[11]

将 DEA 和 Nash Bargaining 模型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解决供应商间竞争问题;刘微微等^[12]基于供应商动态变化速度考虑,提出动态综合评价模型,实现对阶段性时间内供应商动态变化速度的度量。

综上所述,前期文献中有关不同领域供应商评价优选的研究颇多,而对建筑行业供应商评价优选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此外,现有文献中鲜有基于决策者角度考虑,决策者作为具有有限理性自然人极易受到外部环境与风险偏好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借助累积前景理论,充分考虑外部环境与风险偏好对决策者的影响,构建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化模型,以期对相关方面提供参考。

二、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供应商评价优选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趋于成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评价准则中常见的产品质量、产品合格率以及产品价格等指标。然而,在细分下的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存在较大的差异。建筑业与传统制造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建筑物料

收稿日期:2020-05-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参与方个体视角下大型工程项目融资风险动态评价体系研究”(71471094);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一般项目“区域创新背景下山东地区被动式住宅政府激励机制研究”(2019RKB01459)

作者简介:王志强(1976—),男,江苏新沂人,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工业化、建筑信息化等。

需求量大、易受社会因素与天气影响、协同难度大等特点,对柔性供货机制^[13]提出了更高的要求。Laya Olfa^[14]与石晓波等^[15]均指出企业在对供应商评价优选时,不仅要考虑成本、质量、售后等因素,还要注重产品的环境效益等因素。

通过查阅有关建筑行业供应商评价指标选取的相关参考文献^[16-17],并依据行业规范文件^[18-19],再结合实地调研,综合考量评价准则可操作性、客观性

原则,本文构建的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在本文的指标体系中,根据指标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收益型指标、损失型指标与区间型指标。其中,收益型指标指参数越大越优的指标,损失型指标指参数越小越优的指标,区间型指标则指参数越接近某区间越优的指标。此外,为了使结果更具有客观性,本文涉及的指标均为可通过公式或数值计算得到的定量指标。

表1 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数据来源	
建筑物料 供应商评价 指标体系	企业经济绩效	抽检合格率	收益型	产品合格率公式计算	
		产品单位价格	损失型	总价与总质量之比	
		交货及时率	收益型	准时交货次数与年总交货次数之比	
		产品退换率	损失型	退换数量与总成交数量之比	
		成本费用利用率	收益型	利润总额与成本总额之比	
	企业服务水平	供货柔性	收益型	供货数量范围	
		解决问题及时性	收益型	规定时间内解决问题数量比	
		技术服务水平	收益型	产品问题满意解决次数比	
		售后服务响应时间	损失型	售后服务响应时长	
		企业财务水平	速动比率	收益型	流动资产占流动负债的比例
	资产负债率		收益型	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资金周转率		收益型	销售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例	
	企业合作潜力		合作时长	收益型	工作往来时间长短
			绿色环保材料利用率	收益型	合格产品中绿色环保材料含量占制造该产品耗用量的比例

三、累积前景理论

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通过观测和系统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发现,在不确定环境下人具有有限理性^[20]。为了更好地寻找人们的真实决策以及解释期望效应与预期效应存在的差距,Tversky 和 Kahneman 在通过大量行为实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21]。随着更深层次的研究,Tversky 和 Kahneman 又于 1992 年提出累积前景理论^[22]。与前景理论明显的区别在于,累积前景理论包含两大观点:一是参考点,决策者依据预先设定的参考点计算得失;二是风险偏好,决策者在面临收益与损失时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在面临收益时倾向于风险规避,在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追求。

在累积前景理论中,前景价值感知函数包含价值函数 $v(\Delta x)$ 与决策权重函数 $w(p)$,其具体表达形式见公式(1):

$$V = \sum_{i=1}^n w_i^+ v(\Delta x_i) + \sum_{i=1}^n w_i^- v(\Delta x_i) \quad (1)$$

式中, $\Delta x_i = x - x_0$,其中 x 为前景收益, x_0 为收益参考点; $v(\Delta x_i)$ 为决策者面临第 i 个决策时的实际收益与参考点偏差产生的主观价值感知; w_i^+ 为决策者面临收益时的决策权重, w_i^- 为决策者面临

损失时的决策权重。价值函数与决策权重函数对应的函数表达式见(2)和(3):

$$v(\Delta x) = \begin{cases} (\Delta x)^\alpha & \Delta x \geq 0 \\ -\lambda(-\Delta x)^\beta & \Delta x < 0 \end{cases} \quad (2)$$

$$w(p) = \begin{cases} \frac{p^q}{[p^q + (1-p)^q]^{1/q}} & \Delta x \geq 0 \\ \frac{p^\delta}{[p^\delta + (1-p)^\delta]^{1/\delta}} & \Delta x < 0 \end{cases} \quad (3)$$

式中, $\lambda(\lambda \geq 1)$ 为损失规避系数,表示决策者面临损失时敏感程度; $\alpha, \beta(0 \leq \alpha, \beta \leq 1)$ 表示风险偏好系数; p 表示决策事件发生的概率; q 表示决策者面临收益时风险偏好系数; δ 表示决策者面临损失时风险偏好系数。研究表明,前景价值函数中的相关参数并不是固定值,会随着情境不同而改变。在文中为了研究方便,特设定 $\alpha = \beta = 0.88, \lambda = 2.25, q = \delta = 0.61$ 。^[22]

四、基于累积前景理论评价优选模型

选取某建筑物料供应商的评价优选为研究对象,供应商集合为 $G = \{G_1, G_2, G_3, \dots, G_n\}$, 供应商的评价指标集合为 $C = \{C_1, C_2, C_3, \dots, C_m\}$, 评价指标权重集合为 $W = \{W_1, W_2, W_3, \dots, W_m\}$, 各供应商评价指标属性值为 $x_{ij}(1 \leq i \leq m, 1 \leq j \leq n)$, 由其组成的指标属性值矩阵为 $X = (x_{ij})_{m \times n}$ 。通过标准化处理

得到关于各供应商的指标评价规范化矩阵 R 。在此基础上,运用累积前景理论计算每个供应商的综合累积前景价值并排序优选。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建

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选模型具体的实施步骤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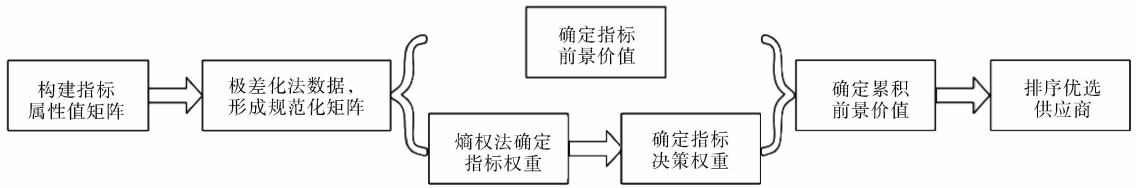


图 1 供应商评价优选模型实施步骤

步骤 1 构建评价指标属性值矩阵。假设需要评价的供应商数量为 n , 选取的评价指标数量为 m , 那么由各供应商评价指标组成的指标属性值矩阵为 X :

$$X =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n} \\ x_{21} & x_{22} & \cdots & x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m1} & x_{m2} & \cdots & x_{mn} \end{bmatrix}$$

步骤 2 数据极差化法处理。为了便于对各供应商进行客观地评价优选, 需要将所有指标属性值在统一标准下进行计算。张立军等^[23]曾表示极差化法在兼容度上的处理效果要比极大化法、极小化法、均值化法等方法更合理。因此, 本文运用极差化法对指标属性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所用公式见式(4), 之后建立规范化矩阵 R 。

$$r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quad (4)$$

式中, x_{min} 表示 x_i 指标的极小值; x_{max} 表示 x_i 指标的极大值; r_{ij} 表示 x_i 指标在极差化法后的标准值。

$$R = \begin{bmatrix} r_{11} & r_{12} & \cdots & r_{1n} \\ r_{21} & r_{22} & \cdots & r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r_{m1} & r_{m2} & \cdots & r_{mn} \end{bmatrix}$$

步骤 3 确定指标前景价值与决策权重。选取参考点是累积前景理论中关键内容, 参考点的选取决定了决策者的风险偏好, 收益高于参考点, 往往倾向于风险规避; 收益低于参考点, 往往倾向于风险追求。在本文中, 选取各指标属性值的期望值作为决策者行为决策参考点, 依据极差化法, 设置行为决策参考点为 θ , 各指标前景价值表达式见式(5)。

$$v(r_{ij}) = \begin{cases} (r_{ij} - \theta)^\alpha & r_{ij} \geq \theta \\ -\lambda(\theta - r_{ij})^\theta & \theta < r_{ij} \end{cases} \quad (5)$$

熵权法能够有效排除人为主观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能够客观赋权确定指标权重。本文借助熵权法

求得各指标客观权重 $W = \{W_1, W_2, W_3, \dots, W_m\}$, 再依据决策权重函数表达式求取各指标决策权重。

步骤 4 确定各供应商综合累积前景值, 并排序优选。各供应商综合累积前景表达式见式(6):

$$V(G_j) = \sum_{i=1}^n w_i^+(p_j) v(x_{ij}) + \sum_{i=1}^n w_i^-(p_j) v(x_{ij}) \quad (6)$$

根据式(6) 可以求得各供应商综合累积前景值 $V(G_j)$, ($j = 1, 2, 3, \dots, n$), 再对其排序, 值最大的供应商为最优选择。

五、实例分析

某建筑企业拟进行工程建设, 现需要购进一定数量槽钢, 拟在与该企业一定时间内有过工作往来的 6 个供应商范围内评价优选。通过调查研究, 得到 6 个槽钢供应商的指标属性值如表 2 所示。

依据步骤 1, 构建槽钢供应商指标属性值矩阵 X 。

依据步骤 2, 对步骤 1 所得矩阵 X 应用极差化法式(4) 标准化处理, 获得规范化矩阵 R 。

依据步骤 3, 在 Matlab2014b 环境下, 求取客观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W = \{0.0167, 0.0601, 0.0195, 0.2836, 0.1748, 0.0165, 0.0201, 0.0306, 0.0019, 0.0223, 0.0128, 0.0027, 0.1943, 0.1442\}$ 。由此可求得各指标对应的决策权重 $w(p) = \{0.0735, 0.1445, 0.0800, 0.3095, 0.2443, 0.0730, 0.0813, 0.1019, 0.0212, 0.0860, 0.0634, 0.0260, 0.2572, 0.2226\}$ 。此外, 依据式(5) 求得各指标前景价值 $v(r_{ij})$ 。

依据步骤 4, 得到各供应商综合累积前景值分别为 $V(G_1) = -0.2156, V(G_2) = -0.3283, V(G_3) = -0.4741, V(G_4) = -0.1992, V(G_5) = -0.4230, V(G_6) = -0.4620$ 。按照综合累积前景值大小值排序, 可得 $V(G_4) > V(G_1) > V(G_2) > V(G_5) > V(G_6) > V(G_3)$ 。根据综合累积前景值排序可知供应商 4 的值最高, 为最优选择。

表2 指标属性值

评价指标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供应商5	供应商6
抽检合格率	0.952	0.987	0.876	0.905	0.873	0.832
产品单位价格(万元/t)	0.353	0.384	0.458	0.376	0.340	0.335
交货及时率	0.985	0.983	0.882	0.977	0.838	0.969
产品退换货率	0.021	0.015	0.022	0.021	0.032	0.028
成本费用利用率	0.059	0.102	0.085	0.097	0.068	0.085
供货柔性	0.954	0.827	0.971	0.890	0.943	0.867
解决问题及时性	0.828	0.746	0.811	0.768	0.874	0.730
技术服务水平	1.000	0.986	0.852	0.967	0.964	0.812
售后服务响应时间(h)	14.891	15.266	15.567	15.769	15.675	15.563
速动比率	1.031	1.000	0.985	0.988	1.092	1.179
资产负债率	0.617	0.659	0.705	0.603	0.646	0.649
资金周转率	0.182	0.177	0.186	0.173	0.177	0.180
合作时长	3.000	2.500	1.750	3.000	2.750	2.000
绿色环保材料利用率	0.562	0.471	0.502	0.389	0.330	0.458

$$X = \begin{bmatrix} 0.952 & 0.987 & 0.876 & 0.905 & 0.873 & 0.832 \\ 0.353 & 0.384 & 0.458 & 0.376 & 0.340 & 0.335 \\ 0.985 & 0.983 & 0.882 & 0.977 & 0.838 & 0.969 \\ 0.021 & 0.015 & 0.022 & 0.021 & 0.032 & 0.028 \\ 0.059 & 0.102 & 0.085 & 0.097 & 0.068 & 0.085 \\ 0.954 & 0.827 & 0.971 & 0.890 & 0.943 & 0.867 \\ 0.828 & 0.746 & 0.811 & 0.768 & 0.874 & 0.730 \\ 1.000 & 0.986 & 0.852 & 0.967 & 0.964 & 0.812 \\ 14.891 & 15.266 & 15.567 & 15.769 & 15.675 & 15.563 \\ 1.031 & 1.000 & 0.985 & 0.988 & 1.092 & 1.179 \\ 0.617 & 0.659 & 0.705 & 0.603 & 0.646 & 0.649 \\ 0.182 & 0.177 & 0.186 & 0.173 & 0.177 & 0.180 \\ 3.000 & 2.500 & 1.750 & 3.000 & 2.750 & 2.000 \\ 0.562 & 0.471 & 0.502 & 0.389 & 0.330 & 0.458 \end{bmatrix}$$

$$R = \begin{bmatrix} 0.774 & 1.000 & 0.284 & 0.471 & 0.265 & 0.000 \\ 0.146 & 0.398 & 1.000 & 0.333 & 0.041 & 0.000 \\ 1.000 & 0.986 & 0.299 & 0.946 & 0.000 & 0.891 \\ 0.353 & 0.000 & 0.412 & 0.353 & 1.000 & 0.765 \\ 0.000 & 1.000 & 0.605 & 0.884 & 0.209 & 0.605 \\ 0.882 & 0.000 & 1.000 & 0.438 & 0.806 & 0.028 \\ 0.681 & 0.111 & 0.563 & 0.264 & 1.000 & 0.000 \\ 1.000 & 0.926 & 0.021 & 0.824 & 0.809 & 0.000 \\ 0.000 & 0.427 & 0.770 & 1.000 & 0.893 & 0.765 \\ 0.237 & 0.077 & 0.000 & 0.015 & 0.552 & 1.000 \\ 0.137 & 0.549 & 1.000 & 0.000 & 0.422 & 0.451 \\ 0.692 & 0.308 & 1.000 & 0.000 & 0.308 & 0.538 \\ 1.000 & 0.600 & 0.000 & 1.000 & 0.800 & 0.200 \\ 1.000 & 0.608 & 0.741 & 0.254 & 0.000 & 0.552 \end{bmatrix}$$

$$v(r_{ij}) = \begin{bmatrix} 0.3558 & 0.5767 & -0.4999 & 0.0111 & -0.5459 & -1.1471 \\ -0.4757 & 0.1095 & 0.7150 & 0.1994 & -0.7247 & -0.8188 \\ 0.3598 & 0.3456 & -0.9781 & 0.3046 & -1.6171 & 0.2469 \\ -0.3431 & -1.1599 & -0.1865 & -0.3431 & 0.5710 & 0.3405 \\ -1.3318 & 0.4943 & 0.0766 & 0.3850 & -0.8753 & 0.0766 \\ 0.3618 & -1.3658 & 0.4788 & -0.3710 & 0.2838 & -1.3061 \\ 0.2899 & -0.8368 & 0.1627 & -0.4781 & 0.6041 & -1.0838 \\ 0.4189 & 0.3446 & -1.4501 & 0.2405 & 0.2222 & -0.3981 \\ -1.5235 & -0.5819 & 0.1638 & 0.4050 & 0.2963 & 0.1582 \\ -0.2329 & -0.6314 & -0.8096 & -0.7754 & 0.2838 & 0.7187 \\ -0.7569 & 0.1570 & 0.6126 & -1.0640 & -0.0212 & 0.0375 \\ 0.2744 & -0.4338 & 0.5795 & -1.1405 & -0.4338 & 0.1035 \\ 0.4465 & 0.0000 & -1.4353 & 0.4465 & 0.2426 & -1.0046 \\ 0.5184 & 0.1107 & 0.2586 & -0.7155 & -1.2785 & 0.0403 \end{bmatrix}$$

六、结论

本文在构建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选模型时,不仅考虑传统评价指标,如价格、质量等,还将供货柔性、废弃物资源利用率考虑进来,高度契合当今社会

绿色发展的要求。本文将熵权理论与累积前景理论综合应用到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选过程中,依据熵权法取得指标权重,借助累积前景理论确定各供应商评价指标前景价值,将供应商的累积前景值排序优

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若决策者对各评价指标的风险偏好是确定的,那么可以进行调整参数 α 、 β 的取值来反映决策者风险偏好对评价优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DICKSON G W. An Analysis of Vendor Selection Systems and Decision[J]. Journal of Purchasing,1966,2(1):5-17.
[2] 王翔. 基于熵和前景理论的大型制造企业供应商评价研究[J]. 软科学,2015,29(7):131-135.
[3] MAGGIE C Y, TAM V M, RAO T. An Application of the AHP in Vendor Selec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J]. Omega,2001,29(2):171-182.
[4] 李存斌,冯霞,祁之强.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电网物资供应商评价优化模型[J]. 陕西电力,2014,42(11):29-33.
[5] 李玉龙,李雪欣. 转型期零售企业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价指标体系[J]. 统计与决策,2015(15):178-181.
[6] 吴良刚,文丽. 基于二维二元语义和模糊 AHP-TODIM 的低碳供应商选择方法[J]. 运筹与管理,2017,26(3):7-16.
[7] 曹吉鸣,高翔. 房地产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模糊综合评价[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6):843-847.
[8] 陈为公,闫红,刘艳,等. 基于改进 TOPSIS 法的装配式建筑部品供应商选择[J]. 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2019,36(2):12-19.
[9] 范露华. 基于熵权 TOPSIS 模型的建筑材料供应商评价与管理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3(12):240-248.
[10] 潘雨红,詹翌,马旭. 基于 DEMATEL-BP 的装配式住宅预制构件供应商选择的影响因素识别[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7,47(9):22-34.
[11] WANG M Q, LI Y J. Supplier Evaluation Based on Nash Bargaining Game Model[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14,41(1):4181-4185.

[12] 刘微微,石春生,赵圣斌. 具有速度特征的动态综合评价模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33(3):705-710.
[13] 赵善敏. 面向快速响应的 G 公司供应商柔性供货机制研究[J]. 企业技术开发,2015,34(13):122-123,126.
[14] LAYA O. A Fuzzy Multi-criteria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Green Suppliers Performance in Green Supply Chain with Linguistic Preferences[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3,74:170-179.
[15] 石晓波,任佳,刘晨晨.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建筑经济,2019,40(1):92-97.
[16] 徐兴,李仁旺,吴新丽,等. 面向供应链协同的供应商选择模型的研究[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1,39(5):550-554.
[17] 郑晓云,贾玲. 住宅产业化进程中建筑部品供应商的选择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13,27(10):93-97.
[18] 建设部住宅产业促进中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GB/T 50362—2005[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5[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0] SIMON H A.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5,69:99-120.
[21]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ict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1979,47:263-291.
[22] TVERSKY A, KAHNOMAN D. Advance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J]. Risk Uncertainty,1992(5):297-323.
[23] 张立军,袁能文. 线性综合评价模型中指标标准化方法的比较与选择[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25(8):10-1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Model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Supplier Based on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WANG Zhiqiang^{1,2}, LIU Shuo¹, WANG Taotao¹, MA Tingting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20, China;
2.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New Think Tank), Qingdao, Shandong 266520, China)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building material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and as the source of the building supply chain, building materials suppliers can ensure the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y making scientific choices. In order to better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risk preference on decision-maker's behavior, the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evaluate and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 suppliers. On the basis of standardizing the attribute value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supplier evaluation index by range method and determining the weight coefficient of evaluation index by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foreground value and decision weight coefficien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are obtained, and finally the comprehensive accumulated foreground value of suppliers is obtained and sorted to choose the best on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material supplier;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model

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研究

齐天锋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旅游研究所,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摘要:基于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研究和探索,通过分析国内外现有的文献,选取了评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9个指标,建立了一套包括旅游业经营情况、发展规模、市场效率三个方面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对中部六省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中部六省中河南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湖北省和湖南省位列二、三位,安徽省位列第四位,江西省和山西省位列第五位和第六位,这表明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对中部六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估的基础上,分析其差异形成的多方面影响因素,以寻求差异化中蕴含的发展机遇和合作可能,为中部六省区域旅游的整体竞争力提升和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一定的政策方向。

关键词: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6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31-07

一、文献综述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准显著提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逐日增加。旅游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对我国旅游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机遇。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旅游业培育为最具影响力的幸福产业,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赋予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使命。然而,由于各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目前来说,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好,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始终坚持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并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因此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始终处在领先地位;西部地区虽然没有地理位置的优势,没有交通运输的优势,没有舒适的气候,但由于西部地区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旅游资源以及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使得西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近些年有大步提升。而中部六省相比东西部来说处在相对尴尬的位

置,受到东西部两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双重夹击和压力。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中部六省各自的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然而,目前学界在这一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在界定旅游业构成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部六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测度了中部六省的旅游经济发展现状,比较了中部六省各自的发展优势和缺陷,为中部六省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政策方向。从实践意义上来说,通过科学地评价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影响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可以在差异中寻求发展机会,优化升级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改良旅游产业的结构,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旅游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如 Balaguer (2002)^[1]、Dimitrovski (2011) et al^[2]通过对西班牙、斐济等国家的分析,都证实了发展旅游业对区域经

收稿日期:2020-04-15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2017GGJS293)

作者简介:齐天锋(1978—),男,河南南阳人,硕士,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旅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学,旅游资源开发。

济具有促进的作用。二是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 Archer(1982)^[3] 为代表的通过乘数理论进行研究；第二阶段是用投入产出模型、一般均衡模型、旅游卫星账户 Ahlert(2008)^[4] 等评价区域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第三阶段是 Blake et al(2004)^[5] 利用概念模型与数量模型相统一的方式进行研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同旅游竞争力的紧密联系是国外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各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地区差异直接由各地区的旅游竞争力决定。理论研究方面,1980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建立了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旅游竞争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Michael Potter(1990)^[6]、克劳奇和里奇(1993)^[7] 分别提出了从旅游竞争力角度研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钻石模型。三是关于旅游发展水平研究方法上的探索。海外学者 Qu H L, Li L, Gilder Kei Tat Chu(2000)^[8] 运用因子分析法以香港的旅游竞争力为例做了研究。克劳奇和里奇(1993)^[7]、Baidal(2003)^[9] 针对旅游资源禀赋水平、旅游成本高低、旅游需求差异和消费水平等影响因素运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展开研究。四是关于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上的研究。如弗朗索瓦·韦拉(1989)^[10] 指出,国际旅游业发展不平衡的决定因素是旅游资源禀赋、旅游需求和比较成本;Hall(1999)^[11] 认为,旅游经济水平的差异是由基础设施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造成的;Priskin(2001)^[12] 认为,影响旅游经济水平的是旅游资源的等级和数量。

国内相关研究也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旅游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根据王雷、张帆、李春光(2011)^[13] 关于旅游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方面的研究,认为旅游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的贡献是复杂并且多面的,旅游经济理论显示,旅游业的发展能够使国民收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货币回笼、增加就业机会、给相关产业带来发展动力,并能够发展社会经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闫敏(1999)^[14] 通过对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认为旅游业的产业化和国民经济所处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必然联系,只有在进入工业化,尤其是经济进入相当于重化学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后,旅游业才可能进入产业化阶段。二是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文献将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总结为旅游地的资源、旅游地的基础设施、旅游地的交通区位、旅游地的产业结构、当地居民的收入

水平、家庭恩格尔系数、游客旅游信息获取方式等(汪德根(2001)^[15];王淑新等(2011)^[16])。左冰(2011)^[17]和余凤龙等人(2010)^[18]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制度和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产生的影响作用上。化文君(2011)^[19]研究认为可以将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消费人群的人数、旅行社个数、星级饭店个数、旅游者人均花费等5个方面。樊贵玲等(2009)^[20]认为影响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实力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公共设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环境等5个方面。曹芳东等(2011)^[21]认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国家优惠政策导致了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差异。三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方法上的探讨。国内方面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比较的研究文献较少,国内学者以旅游收入、旅游人次、旅游企业数或固定资产投资、营业收入等为指标,对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的方法通常有: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四是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上的研究。通过方叶林等(2013)^[22]的研究发现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会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呈上升趋势。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有资源因素、区位因素、交通条件、服务设施和经济因素等5个方面。陈刚强等(2009)^[23]通过研究认为:旅游经济区域差异性的降低会促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的降低。

综上所述,目前的关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并不完备,实证研究也一般在于全国范围,区域内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没有体现出来。本文是在界定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找出影响中国中部地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部六省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因子分析法能够在减少指标数量的同时尽量保留原指标的信息,因此对大量指标进行整体分析时,运用因子分析法可以提供较为方便且准确的操作。在运用因子分析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将因子得分再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类型。

二、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本文指标和原始数据均来自2011—2015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本文选择从旅游资本投入、旅游业经营情况、旅游经济效率3个方面来测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选择旅游企业固定资产(万元)、旅游业从业人员人数(人)作为投入类指标,选取旅

游企业营业收入(万元)、旅游企业税金(万元)、星级饭店个数(家)、旅行社个数(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作为旅游业经营情况的衡量指标,选取接待旅游者人数(人)、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作为旅游经济效率的衡量指标。分别编号为:A₁ 旅游企业营业收入、A₂ 旅游企业税金、A₃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A₄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A₅ 旅游业固定资产合计、A₆ 星级饭店个数、A₇ 旅行社个数、A₈ 旅游业从业人员人数、A₉ 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二)数据检验及因子提取

本文使用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对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数据统计,经过对 2010—2014 年指标的检测,得出各年份的 KMO

值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Sig 值,结果显示,2010—2014 年的 KMO 值均 >0.5, Sig = 0.000 < 0.05,说明所选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以 2013 年数据为例进行数据检验及因子提取。

1. 主因子提取

将数据输入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处理,通过表 1 可以知道,应该提取 3 个主成分,这 3 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 1,它们的累计方差达到 95.397%,也就是说用 3 个公共因子能够代表原来的 9 个变量。而且,因子之间相互没有任何相关关系,各自独立地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这 3 个因子可以较好地反映所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

表 1 主因子提取(2013 年)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A ₁	5.842	64.911	64.911	5.842	64.911	64.911	3.369	37.439	37.439
A ₂	1.699	18.873	83.784	1.699	18.873	83.784	3.293	36.590	74.029
A ₃	1.045	11.613	95.397	1.045	11.613	95.397	1.923	21.368	95.397
A ₄	.313	3.477	98.874						
A ₅	.101	1.126	100.000						
A ₆	3.302E-16	3.669E-15	100.000						
A ₇	2.377E-16	2.641E-15	100.000						
A ₈	2.345E-17	2.605E-16	100.000						
A ₉	-1.341E-16	-1.490E-15	100.000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2. 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及因子变量得分

将提取的因子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得出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 3 个主要因子的载荷矩阵(见表 2)。

表 2 旋转成分矩阵(2013 年)

成分	1	2	3
A ₁	0.805	0.696	-0.120
A ₂	0.848	0.226	0.273
A ₃	0.857	0.271	0.204
A ₄	0.793	0.214	0.204
A ₅	0.395	0.884	0.250
A ₆	0.462	0.846	0.119
A ₇	-0.241	0.807	0.295
A ₈	0.119	0.977	0.134
A ₉	0.329	0.247	0.979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根据表 1、表 2 的数据发现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5.842,总方差贡献率的解释程度达到 64.911%。其中第一个因子在指标 A₁、A₂、A₃、A₄ 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是从旅游企业营业收入、旅游企业税金、接待国际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角度考虑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这 4 个指标代表了旅游业

的经营情况,因此,本文将其归纳为经营因子。从数据可以说明,区域旅游企业经营情况越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相反,区域旅游企业经营情况越差,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低。

第二个因子的特征值是 1.699,总方差贡献率的解释程度达到 18.873%。第二个因子在旅游业固定资产合计(A₅)、星级饭店个数(A₆)、旅行社个数(A₇)和旅游业从业人员人数(A₈)有较大载荷,这 4 个指标反映着旅游企业的发展规模,因此,本文将其归纳为规模因子。

第三个因子特征值为 1.045,总方差贡献率的解释程度达到 11.613%。第三个因子在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A₉)有较大载荷,因此第三个因子可以归纳为效率因子。这表明旅游企业效率越高,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由此可见,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旅游企业的经营情况、旅游企业的发展规模、旅游业的经济效率。

表 3 是以 2013 年为例得出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是根据回归计算出的因子系数。

表3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2013年)

成分	1	2	3
A ₁	0.127	0.179	-0.189
A ₂	-0.056	0.281	0.026
A ₃	0.144	-0.136	0.436
A ₄	0.343	-0.239	0.265
A ₅	-0.105	0.338	0.002
A ₆	0.298	-0.063	-0.005
A ₇	-0.167	-0.001	0.519
A ₈	-0.283	0.510	-0.082
A ₉	0.405	-0.151	-0.162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F_n = X_1A_1 + X_2A_2 + \dots + X_nA_n \quad (\text{公式1})$$

注: X_1, X_2, \dots, X_n 为每个成分对应每个因子系数, A_1, A_2, \dots, A_n 为每个成分得分

根据公式1可以写出各主成分的数学表达式:

$$F_1 = 0.127A_1 - 0.056A_2 + 0.144A_3 + 0.343A_4 - 0.105A_5 + 0.298A_6 - 0.167A_7 - 0.283A_8 + 0.405A_9$$

$$F_2 = 0.179A_1 + 0.281A_2 - 0.136A_3 - 0.239A_4 + 0.338A_5 - 0.063A_6 - 0.001A_7 + 0.510A_8 - 0.151A_9$$

$$F_3 = -0.189A_1 + 0.026A_2 + 0.436A_3 + 0.265A_4 + 0.002A_5 - 0.005A_6 + 0.519A_7 - 0.082A_8 - 0.162A_9$$

然后以每个因子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线性加权平均求和:

$$F = 0.64911F_1 + 0.18873F_2 + 0.11613F_3 \quad (\text{公式2})$$

将公共因子 F_1, F_2, F_3 放入公式中,就得到了因子综合得分和按得分大小的排名,见表4。

表4 中部六省旅游综合因子得分及排名(2013年)

地区	F_1	F_2	F_3	综合得分 F	排名
河南省	-0.304	0.609	0.655	-0.15	2
山西省	-0.404	-0.271	-1.066	-0.369	6
湖北省	-0.299	1.017	-0.86	0.059	1
安徽省	-0.351	0.193	-0.992	-0.24	3
湖南省	-0.219	-0.13	-0.839	-0.253	4
江西省	-0.439	-0.22	-0.107	-0.31	5

由表4可以看出,在2013年,由于湖北省第二个因子的得分高于其他省份,因此因子综合得分最高,说明湖北省在旅游企业发展规模方面领先其他5个省份;河南省的第二个因子得分和第三个因子得分都比较高,但是第一个因子得分拉低了河南省的因子综合得分,因此可以看出河南省的旅游企业规模和旅游市场经济效率发展比较均衡,但旅游业经营水平没有跟上,导致河南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弱于湖北省;安徽省的旅游企业规模占有优势,但旅游业的经营水平和旅游市场经济效率较低,因此排名第三;湖南省、江西省和山西省在三个因子方面的得分都不高,而由于经济水平的影响,江西省和山

西省的旅游业经营水平低于其他省份,因此江西省和山西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中部六省中位列后两位。

(三) 聚类分析过程

1. 聚类分析树状图

为了科学地对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我们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归类。根据每个区域3个因子的得分,利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了中部六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树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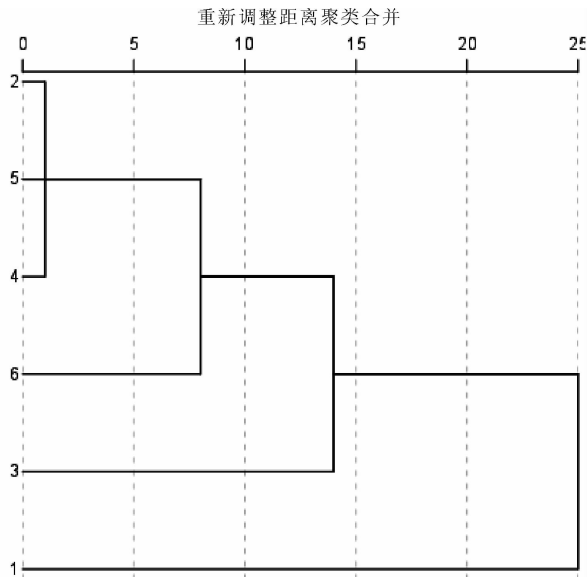


图1 地区差异树状图

2. 聚类分析结果

通过聚类分析,SPSS得出的结果是将中部六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河南省和湖北省,是中部区域中旅游经济水平发达的地区;第二类是湖南省,是中部区域中旅游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第三类是安徽省,是中部区域中旅游经济水平一般的地区;第四类是江西省和山西省,是中部地区中旅游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

三、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

(一) 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特点,我们按照上述研究方法,对中部区域2010年至2014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计算,各年份计算出的因子综合得分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对中部地区2010—2014年5个年份的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主成分因子进行综合得分计算,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综合得分依次是河南0.216、安徽0.123、湖北-0.025、湖南-0.103、江西-0.206、山西-0.354,结果显示河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2010年最高,湖北和湖南相当,江西和山西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弱。

表5 中部六省各年份因子综合得分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河南省	0.126	0.367	0.445	-0.150	0.057
山西省	-0.354	-0.246	-0.476	-0.369	-0.632
湖北省	-0.025	0.234	0.337	0.059	-0.287
安徽省	0.123	0.059	-0.109	-0.240	-0.219
湖南省	-0.103	0.245	0.326	-0.253	-0.078
江西省	-0.206	-0.107	-0.674	-0.310	-0.517

2011年我国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前列的是河南、湖南和湖北,三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安徽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有所下滑,山西和江西的旅游经济发展依旧最弱。

2012年我国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依次是河南0.445、湖北0.337、湖南0.326、安徽-0.109、山西-0.476、江西-0.674,河南、湖北、湖南在中部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依旧领先。

2013年我国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依次是湖北0.059、河南-0.150、安徽-0.240、湖南-0.253、江西-0.310、山西-0.369,结果显示湖北和河南依旧领先,湖南、安徽略有下降,江西、山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依旧最弱。

2014年我国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依次为河南0.057、湖南-0.078、安徽-0.219、湖北-0.287、江西-0.517、山西-0.632,结果显示河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湖北和湖南相当,江西和山西最弱。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2010—2014年之间,中部六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河南省,湖南省和湖北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平稳领先,安徽省则处于第四位,江西省和山西省两个省份则一直处在中部六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末位,其旅游潜力还有待发掘。

(二) 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1. 差异分析

根据表3、4、5中数据分析可以知道,由于地区旅游经营情况的不同、旅游企业规模大小的不同以及旅游企业效率的不同,中部六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2010—2014年表现出很大的区域差异性,各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值相差很大。总体来说,由于旅游经济规模较大,固定资产、旅游从业人员、旅行社数量和星级饭店数量占有一定优势,河南省和湖北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中部六省中居前列,湖南省和安徽省由于旅游业的经营情况不错也紧随其后,江西省和山西省则因为旅游经营水平不发达,旅游企业规模较小,旅游市场经济效率不高而

相对落后。

2. 对策建议

(1) 加强中部各省之间旅游资源的共享

中部地区环境优美,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且个别省份的旅游资源具有垄断地位,但中部各省之间并没有建立良好的资源共享链接,反而是纷争不断,互相倾轧,缺乏旅游资源共享的精神。为了更好地协调中部六省的旅游资源,应该加强各省之间旅游资源的共享,各省之间开展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倡导各省之间互为客源地、互为目的地,加快推进各省之间服务一体化。中部六省联合推出中部地区旅游惠民政策,改善旅游景区交通,提升服务设施,建设旅游咨询服务体系,实现各省旅游服务对接。建立中部各省之间的旅游投诉,完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实现中部地区旅游质监一体化,联合起来维护中部地区旅游的良好声誉和市场秩序。中部各省之间应该建立旅游合作的制度,定期对各项旅游事宜进行讨论,共同促进中部地区区域旅游经济健康发展。

(2) 中部各省联合开发国际旅游市场

近年来,国际旅游市场日益扩大,中国作为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通过以往数据呈现的特点是:1. 我国最有潜力的客源市场是经济发达国家;2. 我国最主要的客源市场是港澳台同胞;3. 我国最大的区域性外国人国际客源市场在亚洲;4. 在入境游客中中老年游客占大部分,青少年游客相对较少;5. 入境旅游中来观光旅游的占大部分,来进行会议、商务、探险等活动的比较少;6. 入境后流动的空间分布不平衡。当今,我国的国际旅游最主要的客源国是:日本、美国、俄罗斯,最有开发潜力的其他发达国家市场是:韩国、中东和西欧。外国旅游者只占入境旅游人数的1/9,港澳台同胞则占到了入境旅游人数的8/9,比重最大,因此我国的国际旅游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就全国范围来说,我国入境旅游者大多数流向了几个著名观光旅游景点,比如北京的长城、故宫、天坛、上海、广州的城市风光、西安的兵马俑、桂林、苏州、杭州的秀丽山水、丝绸之路,黄山、泰山、九寨沟。全国境内,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吸引到的入境旅游者人数要比其他地区高很多,而中部地区由于路程和交通以及各种经济方面的原因比起东部地区来说在开发旅游市场方面逊色许多。目前来说,湖北、湖南、山西和安徽做得比较好,湖南张家界的武陵源风景名胜、湖北的长江三峡、山西的平遥古城、壶口瀑布、安徽的黄山都是相当著名的入境旅游胜地,但是中部各省之间旅游地分散,没有通过相互合作来扩大国际旅

游市场,中部各省的相关部门和旅游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宣传活动,共同培育中部区域内部的旅游客源市场,建立各个省会的旅游集散中心,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优化旅游路线,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海外旅游者。中部地区还可以针对特定的海外旅游市场,如东南亚、欧美等国进行有创造性的旅游特色规划,开发更多的旅游线路和旅游商品来吸引更多的海外旅游者。

(3) 扩大江西省和山西省旅游企业的规模

旅游活动离不开吃、住、行、游、购、娱六个字,作为新兴产业,自然更离不开各大旅游企业,中部地区要发展扩大旅游企业的规模,离不开政府的扶持。首先要加大政府对相关旅游企业的投入,建立鼓励机制,只有政府进行了导入性的投入,利用市场手段以及利益杠杆有效吸引外来资金和社会支持,有效调动全社会发展和投资旅游产业的积极性,支持各大景区的基础建设,提升旅游管理部门的积极性,才能把扩大中部各省旅游企业规模落到实处。其次要推动中小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企业进行小额融资,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它们简化旅游贷款的审批手续,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对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要完善旅游企业配套的相关政策,优化旅游企业的发展环境,为旅游企业营造公平竞争、适于发展创新的政策环境,推行税收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降低旅游企业的经营成本,适当放宽旅行社经营的范围和领域,为旅行社创造更大的收益。有资本的省份还应该增加五星级饭店和5A级景区的数量,通过对饭店和景区品质的提升给旅游者带来更好的旅游观感,增加旅游者回头客的数量。

(4) 打造有特色的旅游商品

中部六省的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可谓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十分可惜的是各省的旅游资源没有能较好地转变为旅游商品,使得各省的旅游商品品种单一,而且大多相似乏味,完全浪费了本来很有优势的旅游资源,为此,打造有特色的相应省份的旅游商品变得刻不容缓。打造特色旅游商品的基本原则是要瞄准市场动向,以现实需求为首要需求,目光也要放一部分在潜在需求上,打造旅游商品是一种投入大收益小的行为,因此各省很容易出现趋同的画面,比如民宿在近几年很流行,于是一个省份开发民宿,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旅游商品开发的知识产权也得不到保护。要解决这些困难,首先地方政府要对区域内的旅游商品进行有效的引导,大力提高从事旅游商品开发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创新意识,通常来说,政府要带动这个产业需要培养自己的相

关团队。然后是要对景区进行顶层设计,规范景区内商业混乱的情况,让景区内的旅游商品达到互补的效果,好的商业氛围会帮助景区形成更好的口碑,对景区品质的提升十分有利。

四、结论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做了测度和比较研究,结合文献分析和定性分析选取了9个指标分析影响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其结论如下:中部六省旅游经济水平的发展受到旅游业经营情况、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市场效率的影响。河南省因为旅游业经营情况良好以及旅游企业规模大,大多数时候在中部六省居领先地位,但是仍然可以优化旅游线路提升旅游市场效率来提升河南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湖南省和湖北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中部六省中也占有优势地位,这两省的地理位置不错,近年来吸引到相当数量的东亚、东南亚游客,旅游资源也颇为丰富,但是优越的旅游资源还没有尽可能多地转化为旅游商品,要提升这两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就要更加深入地对这两省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湖南省的旅游业从业人数众多,但缺乏有效的管理,也缺乏非常有创造性的旅游从业者,因此引进更多人才对提升湖南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十分有益。安徽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处在中部区域的中游水平,要提升安徽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就要扩大安徽省的旅游企业规模,加大资金和人才的投入。江西省和山西省在中部六省中是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省份,要改善这两省旅游业基础薄弱的现状,需要加大这两省的旅游资源开发力度,提升景区开发建设,改进旅游业发展方式;打造旅游拳头品牌,加强营销推广,提升旅游知名度;加大政府引导投入,完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 [1] BALAGUER J, CANTAVELLA - JORDÁ M. Tourism as a Long - 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 The Spanish Case[J]. Applied Economics, 2002, 34(7) : 877 - 884.
- [2] DARKO D D, et al. Rural Tour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Region of Gruza, Serbia[J]. Landscape, Environment, European Identity, 2011, 11(4) : 4 - 6.
- [3] ARCHER B H. The Value of Multipliers and Their 25 Policy Implica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1982, 3(3) : 236 - 241.
- [4] AHLERT G.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n Increase in Inbound Tourism on the German Economy Using TSA Re-

- sult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8, 47(2): 225 - 234.
- [5] BLAKE A, DURBARRY R, EUGENIO - MARTIN J L, et al. Tourism in Scotland: The Moffat Model for Tourism Forecasting and Policy in Complex Situations [Z]. Discussion Paper, 2004.
- [6] MICHAEL Porter. 国家竞争优势[M]. 李明轩, 邱如美,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7] RITCHIE J R B, CROUCH G I.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J]. St. Carlos de Bariloche Argentina, 1993, 15(10): 23 - 71.
- [8] QU H L, LI L, GILDER KEI TAT CHU.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stination in Southeast Asi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6): 643 - 648.
- [9] BAIDAL J A I.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 Assessment of Their Evolution and Effects on the Spanish Tourist Model[J]. Tourism Management, 2003, 24(6): 655 - 663.
- [10] 弗朗索瓦·韦拉. 国际旅游经济与政策[M]. 罗结珍, 吴化麟, 译.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
- [11] HALL C, PAGE S. The Geography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Environment, Space and Place[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12] PRISKIN J. Assess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Nature-Based Tourism: The Case of the Central Coast Region of Western Australi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22): 637 - 648.
- [13] 王雷震, 张帆, 李春光. 旅游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定量测度方法及其应用[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6, 26(5): 54 - 62.
- [14] 闫敏. 旅游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J]. 旅游学刊, 1999, 14(5): 9 - 15.
- [15] 汪德根. 中国旅游经济的省际比较研究[J]. 经济地理, 2001, 21(1): 278 - 281.
- [16] 王淑新, 何元庆, 王学定. 中国旅游经济的区域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1(4): 89 - 96.
- [17] 左冰.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因素及其贡献度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1(10): 82 - 90.
- [18] 余凤龙, 陆林. 制度变迁下的中国区域旅游发展与差异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3): 124 - 127.
- [19] 化文君. 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 旅游纵览(行业版), 2011, 25(2): 171 - 172.
- [20] 樊贵玲, 张立明, 郭磊. 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实力影响因子量化分析[J]. 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37(1): 100 - 104.
- [21] 曹芳东, 吴江, 徐敏, 等.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根源探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11, 31(3): 25 - 31.
- [22] 方叶林, 黄震方, 陆玮婷, 等. 中国市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及机理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3, 29(6): 100 - 104.
- [23] 生延超, 钟志平. 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湖南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 24(8): 23 - 2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y in Central China

QI Tianfeng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Sanmenxia Polytechnic, Sanmenxia, Henan 472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on the level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selected 9 indicators to assess the level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e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y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of tourism operation status, development scale and market efficiency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 regional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6 provinces in Central China is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The study found that among the six central provinces, Henan Province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Hubei and Hunan ranked second and third, Anhui ranked fourth, Jiangxi and Shanxi ranked fifth and sixt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evel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ix central provi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ces, so as to seek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in the difference,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certain policy direction for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mprove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in the six central provinces.

Key words: central region;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measurement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

——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王素萍

(郑州东航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利用河南省郑州市2011—2017年各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与住房价格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基础教育支出的增加对于住房价格的增加具有推动作用,由于惯性上一期的住房价格越高,当期的住房价格也越高。郑州市政府应该通过增加新建区域的基础教育投入的方式,真正将城市成熟区域的住房需求引流到新建区域,进而通过提高新建区域的房地产供给来平抑城市房价。

关键词:政府基础教育支出;住房价格;郑州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7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38-04

近年来,房价不断攀升,城市居住成本的提高已成为老百姓城市生活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住房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究竟受什么因素影响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这充分表明对于住房价格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国,有一种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教育是社会公众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因此,子女教育问题在现代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得到了高度重视。其实,重视教育的理念在我国古代就已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古代对教育重视的体现。

有房住是一个家庭城市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教育又是现代城市家庭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因此,教育与住房必有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其实,房地产开发商的眼光更加敏锐,早就关注到了教育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比如学区房的价格为什么居高不下,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住房能够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现在,开发商在开发新项目的时候都会考虑项目周边的教育资源,如果项目附近没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开发商一般也会邀请名校入住该项目,以此提高项目的价值。因此,研究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极具现实意义,本文将

以郑州市各区为例研究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在国外,学者关于教育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质量这一视角。Black和Machin研究发现,一个地方教育质量越高,人们的购房意愿就越强,同时,教育质量与当地的房价呈正相关关系^[1]。Chin和Foong研究发现,教育质量与当地房价正相关的关系在华人地区更加明显^[2]。Thomas和Jeffrey研究发现,学生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住房价格就会增加0.67个百分点^[3]。

在国内,近年来,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关注教育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并且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与预期也是相符的,即一个区域的教育水平对住房价格具有正向影响。张周青、徐梦洁、庄舜尧通过文献综述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教育资源及其住房价格成正比^[4]。冯浩和陆铭利用上海市52个区域的学校与住房价格的月度面板数据和“实验性示范高中”命名的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不同区域基础教育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会影响住房价格^[5]。马军、罗红娟、章铁生利用马鞍山市的数据研究发现,基础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基础教育

收稿日期:2020-05-20

作者简介:王素萍(1970—),女,河南郑州人,郑州东航实业有限公司会计师。

资源越丰富,该地区的房价也越高^[6]。

一方面,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外关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质量,而国内关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资源,但用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来研究教育对住房价格影响的文献还很少见;另一方面,以郑州市各区域为例研究教育对住房价格影响的文献也没有见到。因此,本文以郑州市各区域为例,研究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可以为郑州市政府的教育和房地产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

1. 模型构建

为研究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本文把住房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基础教育支出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住房价格具有惯性,即本期的住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上一期的住房价格,因此在构建模型时把住房价格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来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本文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begin{aligned} \hat{f}_{it} = & \alpha + \rho \hat{f}_{i,t-1} + \beta_1 j_{y_{it}} + \beta_2 rk_{it} + \\ & \beta_3 my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t=2, \dots, 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i 表示区域, t 表示时间; \hat{f}_{it} 表示住房价格(单位:元),由于新房价格的制定一定程度会受政府管制,如区域最高限价,并且开发商也会通过购房绑定车位等政策进行变相涨价,因此新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反映出房地产市场的真正供需,而二手房价格不受这些因素干扰,能真正反映房地产市场住房的供需状况,因此,住房价格选用郑州市各区每年12月份的二手房价格来度量; $j_{y_{it}}$ 表示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单位:千元/人),用郑州市各区教育部门每年的人均事业性经费支出来度量; rk_{it} 表示区域规模(单位:人),用郑州市各区的人口数来度量; my_{it} 表示对外开放程度(单位:万美元),用郑州市各区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额来度量; μ_i 表示个体异质性的扰动项,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2. 数据分析

本文选取2011—2017年郑州市各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郑州市各区包括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共8个区(上街区和航空港区因数据缺失严重,被剔除),时间跨度为7年,共包含56个样本。住房价格数据来源于58同城网站,其他数据均来自《郑州统计年鉴》。为了了解数据的分布特征、核查数据,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

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数据不存在异常值,本文采集的数据是适合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的。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住房价格	9502.86	2828.65	5991.00	18769.00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	0.77	0.48	0.08	2.16
区域规模	575361.50	374671.10	112158.00	1453288.00
对外开放程度	26669.64	13654.71	8348.00	62709.00

表2给出了搜集的2011—2017年郑州市各区每年12月份的二手房价格数据。从表2可以看出,总体上,历年来金水区、经开区和郑东新区的住房价格相对较高,而惠济区和高新区的住房价格相对较低。从郑州市各区的发展现状可知,金水区、经开区和郑东新区是城市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郑州市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这里,而惠济区和高新区大部分是城中村改造的新建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因此,城市成熟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丰富、住房价格相比新建区域要高。

表2 2011—2017年郑州市各区每年12月份的二手房价格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中原区	6015	6409	7763	8153	8443	11642	12674
二七区	6098	6478	7872	8071	8426	11662	12620
管城区	6479	6890	8210	8351	8582	11857	13078
金水区	6789	7216	8407	8672	9073	12588	13731
惠济区	6199	6603	8042	8050	8775	11799	12624
经开区	7028	7013	8796	9052	9015	13473	12786
高新区	5991	6324	7304	7788	7724	11234	8574
郑东新区	12592	11453	12478	12566	12562	18769	15297

数据来源:58同城网站(单位:元)。

三、实证分析

1. 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于本文构建的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法可以将差分GMM和水平GMM结合起来,其估计效率将大大提高,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法进行估计。同时,一个区域的住房价格高时,该区域的土地出让也相对更容易,并推高该区域的地价,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财政有钱了,相应的政府基础教育支出也会提高,因此,住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即,政府基础教育支出与住房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关系。

虽然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解决不了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为解决政府基础教育支出与住房价格之间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在采用系统GMM法进行估计时,用政府基础教育支出的一期滞后项作为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模型采用系统GMM法估计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采用系统 GMM 法的估计结果

	系数	标准差	P 值
住房价格的滞后一期	1.15	0.15	0.00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	3102.90	715.38	0.00
区域规模	0.00	0.00	0.08
对外开放程度	-0.03	0.05	0.57

从表3可以看出,住房价格的滞后一期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2011—2017年这个研究区间内,上一期的住房价格对本期的住房价格影响为正,即一个区域本期的住房价格会受到上一期的住房价格的影响。这个实证结果与实际相符,一个区域的住房购买者一般分为三类:基于居住需求购买者、基于投资需求购买者和基于居住投资两方面需求的购买者,后两类住房的购买者一般要考虑投资收益,价格越高的住房一般增长潜力越强,因此,上一期的住房价格越高,则本期的住房价格也越高。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2011—2017年这个研究区间内,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影响为正,即政府基础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房价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区域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增加可以改善该区域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而现在的城市家庭又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在选择居住地、购买住房的时候会重点考虑所购住房周围的教育资源,更倾向于牺牲价格优势购买教育资源优质的住房,其结果就是,教育资源越好的区域住房价格越高。

区域规模的系数估计值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2011—2017年这个研究区间内,区域规模对住房价格影响为正,即该区域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房价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区域规模越大,越具有人口集聚效应,该区域周围的各种设施也更加完善,购房需求就会更强,也就有利于该区域住房价格的提升。

对外开放程度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

2. 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本文分别利用改变估计方法和改变控制变量的方式对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稳健性检验——改变估计方法。

前文估计公式(1)所示的计量模型中,系数估计值采用的是系统 GMM 法进行估计的,这里,我们采用差分 GMM 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将该表数据与表3数据对比分析可知,改变估计方法后,政府基础教育支出的系数估计值,无论是显著性还是符号,都未改变,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

的显著性与符号,也都未变化。这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4 模型采用差分 GMM 法的估计结果

	系数	标准差	P 值
住房价格的滞后一期	1.09	0.21	0.00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	3176.57	951.10	0.00
区域规模	0.01	0.01	0.05
对外开放程度	-0.05	0.06	0.43

第二,稳健性检验——改变控制变量。

不改变核心解释变量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改变模型的控制变量,总共可以得到3个计量模型,依然采用系统 GMM 法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模型3)。通过对比改变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可知,改变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政府基础教育支出的系数估计值,无论是显著性还是符号,都未改变。这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5 模型改变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住房价格的滞后一期	1.08***	1.27***	1.07***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	2903***	3339.14***	2534.22***
区域规模	0.01**		
对外开放程度		-0.0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郑州市各区2011—201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基础教育支出的增加对该区域住房价格的增加具有推动作用,同时,上一期的住房价格在惯性作用下对本期的住房价格也有促进作用,区域规模对住房价格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两条政策启示:

1. 在城市“稳房价”方面

近几年,各个城市围绕“稳房价”的政策目标,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在需求端,有限购、限贷、限售等政策;在供给端,不断加大房地产的供给,当然,受城市成熟区域的空间限制,增加的供给主要位于新建区域。尽管如此,人口流入型城市的房价上涨压力依然较大,在不少城市,尤其在城市的成熟区域,政府采取了直接干预价格信号的政策措施,但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变相涨价、品质缩水、寻租等多种弊端。

一般而言,房价上涨压力最大、采取限价政策后出现弊端最多的区域,是城市的成熟区域,因此,稳定城市成熟区域的房价是稳定一个城市房价的关

键,同时,稳住成熟区域的房价,也能降低新建区域的房价上涨预期,从而有利于整个城市的房价稳定。根据本文的研究,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会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城市成熟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丰富、住房价格相比新建区域要高,因此,城市成熟区域与新建区域的房价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基础教育资源、基础教育投入的差异导致的,微观上讲,很多人在城市成熟区域购房,不仅仅是为了居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子女教育,这是推动城市成熟区域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重要因素。因此,郑州市要想通过提高城市新建区域的房地产供给平抑城市房价,新建区域的基础教育投入一定要跟得上,这样才能真正将城市成熟区域的住房需求引流到新建区域,通过提高新建区域的房地产供给平抑城市房价的政策才能真正奏效。

2. 在城市增强人才吸引力方面

近几年来,众多城市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吸引人才,“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这些城市对于一般人才的吸引措施主要有:简化手续,降低落户门槛,减少落户限制,发放住房补贴、租房补贴、生活补贴、创业补贴等。本文研究得出,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会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优质、丰富的基础教育资源是其吸引外来人员居住的重要筹码,基础教育资源,是一个人选择居住地的重要考量因素。并且,各个城市要吸引的“人才”大多是受教育年限较长的群体,相比较而言,这些人会更重视其子女教

育,在选择城市就业、居住时,基础教育资源更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一个城市,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增加基础教育投入,新建、扩建中小学校,增加中小学的学位数量,提高本市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从而解决“人才”对于子女教育问题的后顾之忧,将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 [1] BLACK S E, MACHIN S. Housing Valuations of School Performance [J].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011(3): 485 - 519.
- [2] CHIN H, FOONG K. Influence of School Accessibility on Housing Values [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06, 13(2): 120 - 129.
- [3] THOMAS A D, JEFFREY E Z. The Impact of School Characteristics on House Prices: Chicago 1987 - 1991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2, 52(1): 1 - 25.
- [4] 张周青, 徐梦洁, 庄舜尧. 国内城市教育设施对周边住房价格影响的文献综述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8): 2 - 6.
- [5] 冯皓, 陆铭. 通过买房而择校: 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 [J]. 世界经济, 2010(12): 89 - 104.
- [6] 马军, 罗红娟, 章铁生. 基础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16 - 1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 on Basic Education upon Housing Prices

—— Taking Zhengzhou City of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Suping

(Zhengzhou Donghang Industrial Co.,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nel data in 2011—2017 from each district in Zhengzhou City of Henan Province is used to build a dynamic panel measurement model with which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on basic education and housing pric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government bas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has a driving effect on the increase in housing prices. Due to inertia, the higher the housing price in the previous period, the higher the housing price in the current period. The Zhe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basic education in new areas to truly divert housing demand from mature urban areas to new areas, and then stabilize urban housing prices by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real estate in new areas.

Key words: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 on basic education; housing price; Zhengzhou City

基于 RPA 的企业智能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问题研究

魏佳思

(福建江夏学院 会计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在对 RPA 及其在企业财务共享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分析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方式选择现状,指出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为:精准识别,将 RPA 科学应用于财务管理流程;加强研发,稳步解决 RPA 产品存在的不足问题;提前规划,有效打破 RPA 产品存在的定制化困境。最后,对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RPA;财务共享中心;财务管理流程;发展趋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8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42-05

当前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不断改进企业财务管理流程,但依然存在许多管理的不足与漏洞,然而随着大数据、云平台的发展及应用,也不断给财务共享管理的优化带来福音。2017年,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应用智能化技术先后推出财务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实现了首次将RPA技术应用于财会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万达集团财务共享中心总经理王德迅在“2019中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高峰论坛”上明确指出,万达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目前已有21个完全自主开发的RPA正在运行,极大程度上节约了财会运营成本,提升了财务共享中心运行效率。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业界普遍关注。近年来,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大型企业均不约而同基于RPA进行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为让大家进一步深入了解我国企业基于RPA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情况,本课题着重针对基于RPA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问题展开研究。

一、RPA 及其在企业财务共享领域中的应用场景分析

(一) RPA 的内涵

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的中文全称

收稿日期:2020-01-29

基金项目:2019年度福建江夏院校级科研人才培养项目“基于‘RPA+K均值聚类’的财务共享中心应收账款管理优化研究”(JXS2019011);2019年度福建江夏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优化研究”(J2019B022)

作者简介:魏佳思(1984—),女,福建建瓯人,硕士,福建江夏学院会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社会责任。

为“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是在人工智能概念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进程自动化技术。RPA可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准确模拟人类操作,高效率完成预期任务。它依据代码程序全天候自动化运行,无须做任何系统接口开发,可应用于任何虚拟机、服务器及电脑。RPA可代替人工操作,给相关企业节省大量人力资源成本。除此之外,基于RPA几乎零差错的特点,还可极大程度上避免人工操作风险。^[1]如今,RPA已经逐步应用于企业管理的诸多领域,其中在财务共享领域中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RPA可改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财务管理流程,提高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财务管理运营效率。

(二) RPA 在企业财务共享领域中的应用场景举隅

RPA在财务共享领域中的应用具有诸多优势,正因如此才致使很多企业在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过程中积极应用RPA。结合已有研究,RPA在企业财务共享领域中的应用的具体场景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财务自动化。财务共享中心应用 RPA 技术

后,可将大量烦琐、简单的财务工作交由 RPA 完成。对于一些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财务工作内容,可首先让 RPA 学习及分析相关财务工作内容特点,自动生成业务模板,并依据业务模板自动完成具体财务工作。^[1]

2. 账单处理自动化。对很多企业而言,每天的收付款业务交易量是非常大的。此时,如若采用人工操作的形式下载银行对账单进行对账,容易出现准确率不高且效率较低的情况。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应用 RPA 后,基于 RPA 开发的对账机器人可自动下载银行对账单,并对账单进行准确核对,大大提高账单处理效率。

3. 税务自动化。财务共享中心基于 RPA 开发的税务机器人能够对进项发票实施智能识别和处理,实现销项发票的一键开票,实现专票签收和在线认证,实现税务智能申报等一系列税务工作,可有效促进财务共享中心的税务自动化。

4. 报表统计自动化。基于 RPA 开发的报表机器人可以按照系统程序事先设置的财务报表编报形式,在规定时间点依据要求高效率完成财务报表的编制、计算、上报及汇总工作,可帮助财务共享中心工作人员大幅提升财务报表的信息报送成效。

5. 增值税发票查验自动化。财务共享中心可借助 RPA 机器人登录增值税查验平台,对企业增值税发票实施轮番查询,对增值税发票的真伪情况实施自动判断。如此一来,不仅可避免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同时也可提升财务共享中心的工作效率。

6. 月结自动化。财务共享中心可设置 RPA 月结工作程序,并在其中科学设定月结任务及规则。这样,机器人便会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月结任务。月结任务完成后会自动生成月结报表,并将其自动发送至对应岗位工作人员手中。^[2]

除上述几个应用场景外,RPA 在财务共享领域中的应用还有审单自动化及人力资源管理等诸多典型场景。

二、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方式选择

应用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 RPA 能够针对不同企业的财务业务内容及流程特点,以虚拟劳动力取代传统人工手动操作,帮助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工作人员高效率完成大量单一、枯燥、重复的基础财务管理业务^[2],进而达到优化企业财务共享中心财务管理流程,提升财务管理业务成效,减少财务合规风险的基本目的。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具有诸多优势,那么当前我国企业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究竟在选择哪些方式呢?

(一)部分企业尝试基于 RPA 自主进行财务共享中心建设

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是一个新理念,由于是新理念,因此刚推行时接受该理念的企业并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及 RPA 技术在财务共享领域的不断推广,部分企业开始接受 RPA,并尝试基于 RPA 进行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航空”)为例,该企业近年来持续出现利润率逐渐收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方航空决定应用 RPA 技术对企业财务共享中心进行改革。经过多方深入探索与研究,南方航空首先选择财务共享中心的“国内起降费核算”“银企系统资金支付”“成本系统月报”“餐食系统核算”等四大财务管理流程进行试点。经过开发、调试及稳定性测试,最终开发出适合上述流程的 RPA。具体实践研究结果证明:RPA 的应用极大程度上节省了南方航空的人力成本,具体情况见表 1。取得初步成果后,南方航空决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基于业已建立的“自动化卓越中心”,加大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与改革。除南方航空外,国内还有很多企业在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过程中选择了自主建设方式,在此不再一一枚举。自主建设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虽会让相关企业付出一定研发费用,但开发的 RPA 也往往更符合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需求。不过,由于基于 RPA 自主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会耗费大量研发资金,因此目前国内仅少数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型企业会选择此种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方式。

表 1 南方航空财务共享中心应用 RPA 后节约的人力比例一览表

流程名称	节约人力比例
国内起降费核算	50%
银企系统资金支付	75%
成本系统月报	75%
餐食系统核算	65%

(二)部分企业借助平台公司的 RPA 进行财务共享中心建设

众所周知,财务共享中心为当下流行的财务管理模式,愈来愈多的企业为优化财务管理模式相继构建财务共享中心。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快速建立与发展为 RPA 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实际场景,让 RPA 有了更大用武之地。目前,除部分企业尝试基于 RPA 自主建设财务共享中心外,更多的企业则借助平台公司开发的 RPA,在平台公司的帮助下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例如,招商轮船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即通过此种方式完成。招商轮船在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过程中,借助金蝶公司开发的“金蝶

小 K—RPA 机器人”高效率完成了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金蝶小 K—RPA 机器人”具体由 6 大部分组成:(1)核算总账机器人;(2)共享总账机器人;(3)共享出纳机器人;(4)共享应收机器人;(5)共享应付机器人;(6)共享报销机器人。上述 6 个 RPA 机器人功能不同且各司其职:按照事先预设的具体检查项目,自主登录招商轮船的财务共享系统,利用自带的查询分析器对预设的一系列检查项目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如若发现数据异常会立即导出并制作成 Excel 表格,所有检查结束后再将检查结果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财务共享中心的对应财务人员。^[3]财务人员收到 RPA 机器人发送的异常财务数据后,会逐一检查核对并解决问题。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帮助招商轮船完善了财务共享中心功能,降低了风险。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我国已有很多平台公司致力于 RPA 技术研发,并帮助很多企业基于 RPA 构建了财务共享中心。企业选择此种方式不仅可节省大量技术研发成本,同时也可加快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速度。因此,目前大部分企业均选择此种建设方式。

三、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目前国内企业选择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方式不同,但不可争辩的一个事实是,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确实给相关企业带来了诸多利好,如节省了人力资源成本,优化了财务管理流程,提升了财务管理效率等。需要注意的是,为更好地促进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与发展,对具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应予以正视。

(一)部分企业认为 RPA 是万能的,盲目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

目前,为引导更多企业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无论媒体抑或是开发 RPA 的平台公司等均对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优势进行大力宣传,以至于让很多不明所以的企业偏颇认为:RPA 是万能的,适用于财务管理的所有流程,只要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那么建设起来的财务共享中心功能一定会极其强大。而事实并非如此,业内人士均明晰,RPA 是依据预先设定的程序与现有用户系统进行交互并完成预期的任务,作为虚拟劳动力开发的机器人软件,它并不能适用于财务共享中心的所有财务管理流程。^[4]从现有的 RPA 技术实践审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 RPA 技术仅仅只能适用于一些高重复性、逻辑确定并且稳定性要求相对较低的财务管理流程,对于那些重复性较低、逻辑不确定且

稳定性要求相对较高的财务管理流程并不适用。如若企业在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时不明所以,盲目将 RPA 应用于财务共享中心的所有财务管理流程,不仅不会提升财务管理效率,甚至还可能让财务共享中心的财务管理系统崩溃,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二)国内 RPA 产品存在架构冗余性较高以及系统安全性不足等弊端

捷一科技创始人王新童曾说过:“目前,中国大部分从业者使用的是 AutoIt(免费)/Python-UIAutomation-for-Windows(开源)+Selenium+中间件(AI)这样的开源免费架构来打造自己的 RPA 产品。对比下来,国际知名的 RPA 厂商 UiPath、Blue Prism、Automation Anywhere 都是使用 .NET 自主研发的 RPA 架构。前者架构冗余性较高,系统安全性和健壮性不足。”财务共享中心是企业的核心部门,关乎企业财务安全。正因如此,很多企业在决定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之前,均会考虑到 RPA 的架构冗余性、安全性及健壮性问题。一旦决策者对 RPA 存在的上述问题产生疑虑,极可能会放弃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想法。也有一些企业财务共享中心负责人表示,为提升财务共享中心运行效能,他们也曾考虑过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但是后来考虑到 RPA 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可能还存在不足,所以后来放弃了 RPA。^[5]

(三)国内基于财务共享中心开发的 RPA 产品存在通用性不足问题

当前,国内构建财务共享中心的企业并不多,仅仅是少数大型集团企业。这些大型集团企业在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时,一般会采取如下两种方式:借助其他平台公司的力量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自主研发 RPA 产品用于本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6]无论采取何种建设方式,我们均不可否认这一点:开发的 RPA 产品几乎都是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制,缺乏通用性,特定 RPA 软件只能为特定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服务。正因如此,这也限制了 RPA 产品的经济效益。所以说,为了更好地推动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与发展,未来还应切实解决好 RPA 产品的通用性不足问题。

四、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发展对策与建议

在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并不奇怪。基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为引导和促进更多企业高效率、科学地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特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精准识别,将RPA科学应用于财务管理流程

以目前的RPA技术研发水平而言,RPA并不能适用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所有财务管理流程,这一点毋庸置疑。为了让RPA更好服务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建议企业在决定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之前,应对RPA进行全方位了解,了解RPA具体可用于财务共享中心的哪些财务管理流程。做完初步了解后,再聘请专家对本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具体财务流程进行梳理、评估,精准识别出适合基于RPA的具体财务管理流程。例如,南方航空在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时即采取了这样的做法。首先,通过对南方航空财务共享中心的财务管理流程进行梳理,初步识别出180个基本财务管理流程。在此基础上,再依据“重复性”“逻辑性”及“稳定性”等三大指标,精准识别出适用于RPA的13个财务管理流程:(1)国内起降费核算;(2)银企系统资金支付;(3)成本系统月报;(4)餐食系统核算等。做完这一切后,再有条不紊地将RPA科学应用于上述财务管理流程中。正是因为南方航空对适用于RPA的财务管理流程提前进行了精准识别,做足了前期准备,所以后期建设起来的财务共享中心才能发挥其理想作用。^[7]总体而言,在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前期,精准识别适用于RPA的财务管理流程极为重要。相关企业如若决定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切勿忽视前期的评估与精准识别工作。

(二)加强研发,稳步解决RPA产品存在的不足问题

目前,国内开发的RPA产品不同程度上存在架构冗余性较高、安全性及健壮性不足等问题,正因如此才导致很多企业对于RPA存在质疑,不敢轻易尝试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为解决此问题,建议国内相关科技企业加强RPA产品的研发,稳步解决RPA产品存在的架构冗余性较高、安全性及健壮性不足等问题。除此之外,欲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企业亦可与相关科技企业联合研发RPA产品,为科技企业提供RPA研发资金,推动科技企业的RPA研发进程^[7],尽快研发出更适用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RPA产品。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应予以大力支持。例如,由政府出资从国外聘请RPA技术专家,与国内RPA技术专家一起共同致力于RPA产品研发。另外,政府还可为开发RPA产品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一系列优惠举措,鼓励相关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强RPA产品研发。诚然,如若欲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企业预算资金

充足,也可在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过程中,与国外科技企业合作,将国外RPA产品应用于本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当中。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致力于研发RPA产品的企业也愈来愈多,相信在相关企业及研发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未来定然会逐步解决RPA产品架构冗余性较高、安全性及健壮性不足等问题。届时,必然会打消部分企业疑虑,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企业将会愈来愈多。

(三)提前规划,有效打破RPA产品存在的定制化困境

DCM董事合伙人曾振宇认为:“RPA的产品能力非常重要,我们不应陷入去做某一个企业的定制化服务当中,把已经做过的相通的RPA技术放到其他行业才是重点。”基于当前RPA产品存在的定制化困境,建议无论是科技企业开发服务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RPA产品,抑或是由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企业自主开发RPA产品,在正式开发之前,均应提前做好科学规划,让开发出的RPA产品不仅适合特定企业或特定行业的企业使用,还可适合其他企业或其他行业的企业使用。当开发出来的RPA产品突破定制化困境,具有较强通用性,才能更具经济效益,为开发RPA产品的相关企业带来更多利润。建议可首先开发出一个RPA模板,该RPA模板可基本适用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财务管理的相应流程。当有特定企业或特定行业的企业需要基于RPA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时,在该RPA模板的基础上进行简单修改即可适用。如若RPA模板无法做到万能,也可根据特定行业的财务共享中心特点,针对该行业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特点开发出适合的RPA模板。随着RPA技术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此点并不难。

五、基于RPA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基于RPA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在我国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未来发展过程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克服。经过今后的持续发展,未来基于RPA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预测会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一)RPA未来将会应用于更多财务管理流程

随着RPA技术研发进度的不断加快,未来出现的RPA技术必然可适用于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更多财务管理流程。虽然如此,一些重复性较低、逻辑不确定且稳定性要求相对较高的财务管理流程仍需人工手动操作。所以,无论在何时,企业在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过程中均不能忽视人的作用,偏颇认为

RPA 可以完全取代财务人员。只是在那时,由于 RPA 替代了财务共享中心的很多传统财务管理工作,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剩下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一些高精尖人才而已。

(二)更多企业将会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

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在当下中国仅是少数大型集团企业的鲜有行为,更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未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更莫谈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了。不过随着财务共享中心这一时下先进财务管理模式的不断推行,RPA 技术的不断成熟,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成本的降低及更多企业对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优势认识,未来相信会有更多企业加入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队伍中来。届时,不仅仅只有少数大型集团企业基于 RPA 建设财务共享中心,一些中小企业也会成为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队伍中的一员,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将会给更多企业带来利好。

(三) RPA 与 AI 的结合势必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随着 RPA 在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中应用的不断加深,企业对 RPA 的要求必然会越来越高,那时 RPA 与 AI 的结合势必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众所周知,RPA 是一种基于人类预定规则模仿人类行为的软件,被视为人工智能(AI)前序。未来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必然会充分结合 RPA 与 AI 的双重优势,不断优化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财务管理流程。所以,未来企业在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时,不应仅将目光局限于 RPA,还应将目光转向 AI,探

索如何实现 AI + RPA = IPA(Intelligent Process Automation),让 IPA 更加智能,使其学习、认知特征被充分激发出来,更好地为企业财务共享中心服务,为企业服务。

六、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是一种潮流,更是未来很多企业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重要路径。当前,基于 RPA 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尚处于初始研究阶段,随着实践探索力度的不断加强,未来基于 RPA 建设起来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功能必然会更加强大,必然会帮助企业更好地解决好自身的财务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 [1]程平,纪薇.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应收管理优化研究[J].会计之友,2018(15):153-157.
- [2]胡绍学.大数据时代我国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优化[J].财政监督,2018(1):94-99.
- [3]程平,张洪霜.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中心税务管理优化研究[J].会计之友,2018(14):145-148.
- [4]程平,王健俊.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应付账款流程优化研究[J].会计之友,2018(19):154-160.
- [5]程平,代佳.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总账管理优化研究:以 ABC 集团为例[J].会计之友,2018(16):141-146.
- [6]呼桂霞.基于财务共享中心的财务业务流程再造研究:以信地集团为例[J].财会通讯,2018(29):68-72.
- [7]程平,王文怡.基于 RPA 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费用报销优化研究[J].会计之友,2018(13):146-15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Intelligent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Based on RPA

WEI Jiasi

(School of Accounting,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discussion of RPA and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scenario in the field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shar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mode selection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Based on RPA, and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Based on RPA.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pplying RPA science to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cess;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eadil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RPA products; plan ahead, effectively breaking the customization dilemma of RPA products.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Based on RPA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RPA; Financial Sharing Center;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cess; development trend

平台垄断下的网络文学作家权益保护

苑言博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为传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活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新时代的典型经济特征,这也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可能性,借助于网络媒介,网络文学悄然兴起,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家伴随着这一新型文学形式而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文学作家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资本的注入使得平台与作家之间的力量日益失衡,平台借助其垄断地位日益侵损作家权益,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走向对立,极大地损害了网络文学的发展。这就亟须对平台力量进行限制,对网络文学作家力量进行补强,但平台经济的发展带来与传统经济不同的很多差异性,必须探究网络文学平台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及规制方式,而鉴于网络文学作家的多重身份,也有必要研究其他法律的介入可能性和规制方式。

关键词:网络文学;平台;作家权益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09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47-05

网络文学是指在网络上发表、具有特殊的网络文化内涵、供网民在线阅读的超文本文学样式。^[1]其既依赖于网络文学作家的努力创作,也依赖于网络文学平台的反馈与展示,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并称四大文化奇观的一种文化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愿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发挥互联网传播平台优势,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人民了解各国优秀文化,共同推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网络文化正在成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展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7年5月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加强网络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推动网络文学、网络剧、微电影等新兴文艺类型繁荣有序发展,培养优秀的网络文艺创作、生产、传播和评

论人才。网络文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在当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随着2020年4月27日“阅文集团”高层更换,从集团内部流出的“新合同”引发了大量网络文学作家的抗议,“新合同”中出现了大量“霸王条款”,事件持续发酵,到5月3日,湖南省作家协会发声,表达了对网络文学作家维护权益的支持,5月5日网络文学作家自发“五五断更节”,之后阅文集团表示将于5月6日启动“系列作家恳谈会”。此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若不对平台与作家之间的矛盾进行妥善处理,势必将危及网络文学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有必要追溯网络文学平台与作家之间的历史关系以明晰问题根源所在。

一、网络文学作家权益受损原因探究

网络文学平台与网络文学作家的关系伴随着网络文学自身的发展不断变化,以历史关系分段划分,大体可分为合作期、剥离期、平台垄断期。

(一)合作期

蔡智恒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1998年的发

收稿日期:2020-05-08

作者简介:苑言博(1994—),男,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竞争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表标志着网络文学迎来了自己的开端,网络文学网站作为这种文学展示的平台也开始出现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创建了华人第一家汉语原创文学网站《橄榄树》。1994年Internet正式接入中国大陆,水木清华等网上BBS出现,一些文学爱好者开始在其中交流和创作。1996年,网易开通了个人网页,以互联网作为媒介传播的文学作品第一次登上舞台。1997年7月,海归青年朱威廉创办个人主页《榕树下》。1998年8月,上海榕树下计算机有限公司成立,作为大陆首家独立域名的原创文学网站,真正标志着网络文学平台的诞生。这一时期的网络平台与网络作家之间基本没有利益关系,大家都是网络文学的爱好者,网络文学作家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很少,大多数是处于业余交流的状态,基本上是兼职,并不以此谋生,平台与作家之间互相合作也互相交流,网络文学开始逐渐萌芽。

(二)剥离期

资本的入驻开始逐渐改变这一局面,率先入场的是多来米中文网,他们以4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网易排名前二十的16家站点,开始进行商业探索。但初期对版权问题的处理,导致大量精品著作不能收录,渐渐流失了读者,最终走向衰败。之后是“博库”对网络文学付费模式的初次尝试,但因为全球互联网行业在2000年3月迎来寒冬,难以继续注资而失败。而后一批新的文学网站开始出现和竞争,其中“龙的天空”在当时成了影响力最大的网站。但因其理念的问题,最终放弃网络传播的竞争,慢慢淡出了网络文学站点的视野。继之而起的是“幻剑书盟”和起点中文网,借助于这些平台,一批网络写手迅速成长,网络文学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但“幻剑书盟”由于对原创作品的价值认识不够,推出VIP模式后禁止作家上榜、拖欠稿费等问题导致其逐渐衰败,起点中文网开始迅速发展,并成功推行了付费制度,成为网络文学站点的领头羊。2004年10月,盛大网络公司开始了漫长的收购经营活动,包括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潇湘书院在内的八家网站被整合。至此,纯以文学为特色、“诸强并存、内容为王”的文学网站时代宣告结束,网络文学开始产业化,网络文学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此后,资本注入后的网站平台因为掌控着渠道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再加上其规范化的公司经营团队,与普通网络文学作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出现了明显的不平等。

(三)平台垄断期

资本大战后的网络文学平台竞争日益惨烈,大

神作家被疯狂争抢,文学站点被不断整合,平台愈加规模化。2015年1月,腾讯COO任宇昕与副总裁程武宣布正式成立阅文集团,统一管理和运营原本属于盛大文学和腾讯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潇湘书院、红袖添香、榕树下、QQ阅读等网文品牌,一跃而成为网络文学领域绝对的垄断者,占据了当今网络文学80%以上的份额。^[2]这样,阅文集团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具有高度市场影响力和市场统合力的超级平台。

这种超级平台的出现使得作为个体的网络文学作家的话语权基本丧失,完全没有了与平台讨价还价的资格,但网络文学却又紧紧依赖着平台的渠道,而平台所独具的网络效应,使得平台型交易市场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先进入市场的平台向超级平台演进,进而提高新平台进入门槛,压缩原有中小平台生存空间。这就使得网络文学作家不得不接受拥有垄断地位的超级平台的各种不合理条件,合法权益被不断侵害,创作活力降低,继而引发了现今网络文学的困顿不前,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四)问题揭示

人民日报对当下的网络文学局面评定为“产品很多,精品很少”。总结其中的原因可以看出,导致网络文学作家同质化生产文学作品、引发精品日益减少的关键原因就是平台与作者之间的对立。从中折射出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是网络文学作家权益保障的缺失,核心就在于平台垄断力量与网络文学作家个人力量的失衡。而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需要对网络文学平台的力量进行限制和监管,这就为反垄断法的介入提供了可能。

二、网络文学作家权益反垄断保护的理论基础

网络文学领域的问题一直以来大多是由著作权法调整,过往也没有反垄断法介入的案例,是否可以进行反垄断法保护还需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一)反垄断法保护的价值基础

反垄断法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价值理念一直受到争议,但保护竞争依然是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传统理论对反垄断法的认识,即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在总体上是通过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这种特定方式来体现的。在美国,反垄断法的效率价值和消费者福利价值在20世纪70年代被统合成为主流,这最早源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其认为反垄断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法的核心目的则在于促进经济效率,而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则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关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消费者福利与竞争秩序地位的争论一

直存在。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反垄断法考虑了消费者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反垄断法是一种消费者政策,它将自动服务于消费者利益。即反垄断法通过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发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从而使得经济效率提高并惠及消费者,间接保护消费者利益。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尤其体现在最近爆发在美国的反垄断法大争论中,争论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将一直以来的奉行消费者福利标准作为反垄断法立法目的。^[3]

而在我国,保护竞争和消费者利益均是反垄断法所追求的多元价值目标的一部分,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反垄断法》之中(参见该法第1条)。

(二) 反垄断法保护的合理性

网络文学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事实上对其双边市场的各方都产生了损害性影响,平台利用其竞争优势持续获取数据,继而在运用大数据技术不断挖掘和计算的过程中放大了“赢者通吃”的效果,即数据不断向平台归集,随之使得平台数据抓取和挖掘能力持续强化,循环往复地强化消费端和其他端上用户的黏性,致使其多边市场参与者越来越依赖平台,转向已成为不可能或是成本过高,进而锁定用户。^[4]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网络文学作家端,平台借助于其强大的锁定效应直接强化了自己的谈判能力,新作家难以接受种种苛刻条件,用脚投票,使得网络文学行业缺乏新鲜血液,而以此为职业的作家在平台积累了大量读者,一旦选择更换平台,大量读者囿于平台的锁定效应不再继续跟随,作家将因此丧失大量读者,转移成本过于高昂,从而不得不接受平台的苛刻的合同条件,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在读者一端,长期以来的阅读习惯以及因充值而获得的种种利益(如平台推出的根据充值获得的弟子、长老等象征身份)都在平台内,且借助于平台,读者群体内部也形成了一种网络文学的亚文化,包括书评、观点讨论等,读者由此被平台锁定,读者不会轻易转移平台。当权益受到损害,网络文学作家的创作动力无疑会降低,加之平台依据大数据挖掘对读者心理的把握,持续推介仅为“爽点”而写作的作品,使得同质化问题泛滥,创新难以被真正驱动,读者一端也因此丧失了事实上的选择权,即其支付的对价因同质化问题难以购买到期待的优秀文学作品。

此外,平台通过其搭建的生态系统(Platform Ecosystem)对系统有着绝对权力(利),读者一端的用户不得不接受其接入平台的条件,个人数据被强制收集,用户对作品的合理使用权利被剥夺,用户原创内容(如书评、读书笔记)的版权被强取等,种种行

为都严重损害了作为读者一端的消费者权益^[5];平台所具有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也会导致进入壁垒,抬高进入成本且放大竞争难度。成长为超级平台的平台企业,其交叉网络外部性将转化为对多边市场力量的整体控制,超级平台便开始摆脱对多边市场上各要素的依赖,相反,多边市场上的各要素会不断强化对超级平台作为要素市场的依赖,其垄断地位得到不断巩固和强化。^[4]再加上我国近些年来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知名网络文学作品的版权被平台牢牢把控,新进入的平台难以获得这些文学作品资源,吸引受众困难,而网络文学作品十分依赖网站流量的支持,事实上拔高了行业进入门槛。由此,网络文学超级平台的出现已然严重违反了反垄断法所保护的各项价值,这就要求反垄断法因应时代对其进行规制。

三、网络文学作家权益反垄断保护的思路展开

(一) 深化网络文学平台认识,把握平台垄断新样态

市场份额是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关键要素,而且该要素容易界定及分析的特点也有助于各方主体认定,更加巩固了其作为关键要素的地位,但这很难适用于网络文学平台之上,平台经济所具有的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以及交叉网络外部性特点,使直接将单边市场分析工具应用于多边平台时,如果忽视各边需求间的正反馈效应,会导致市场界定的结果要么过于狭窄,要么过于宽泛。网络文学平台连接着供应端的网络文学作家群体以及消费端的广大消费者群体,单边市场分析工具难以对其进行覆盖,极易顾此失彼,很难界定出适当的相关市场。

在市场支配力的认定上也存在与传统认定不同的情况,双边市场下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会创造相应的进入壁垒,容易导致“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但鉴于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等特征,高市场份额并不意味着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也无法假设市场份额会一直维持在高位。这从网络文学平台的发展史可以略窥一二,如上文所述,网络文学平台的“霸主”地位几经更迭,如“龙的天空”市场地位的逐渐式微和起点中文网借助新型付费模式的兴起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故而平台经济的市场壁垒往往没有传统市场那么持久和稳固,这迫使所有平台必须继续创新以维持地位,从而使得后续在认定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也出现了很多争议,如掠夺性定价行为,对平台企业而言,为了使交叉网络外部性产生的收益最大化,最优策略就是“补贴”能够产生更多价值的

一边(甚至是免费),并不存在反竞争动机。但是此种问题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网络文学平台,付费模式维系着一般作家的生存,平台基于运营需要对消费者进行阅读优惠甚至推行免费模式,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难以认定,这是因为部分作家借助免费模式可以使其文学作品获得更高的知名度,继而提升其IP价值,但大量作家以付费模式下的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免费制度的推广无疑将严重打击其积极性。因此,网络文学作家权益的反垄断保护必须深化对平台的新样态的认识,转变传统认定和规制观念。

(二)加强政企合作,促进平台自我规制

我国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与他国不同,一直是由政府进行推动的,政府的推动是我国当下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国的经济,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网络文学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一种,是当下经济样态中的新生事物,它一方面是经营者,面向消费者推出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又具有管理者属性和功能,规范运营平台内部的各种作品。这种管理者属性无疑为其自我规制提供了条件,且平台自身作为经营者有着更深刻的行业认知,合理的自我规制能够更加具有行业针对性,起到事前预防反竞争行为的良好效果。但平台自身的逐利性又必然会使其在制定规则时出现偏向性,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加强政府和平台的合作,畅通政企交流机制,以外力促使行业内力运用更加合理。为预防以上二者行为失灵,再引入法律的可责性,使二者行为在法律的框架下良性运行。

(三)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补强网络文学作家谈判力量

近期的阅文集团新合同抗议事件中首次出现了非个人的作协团体的发声,这极大地促成了平台与作家的进一步沟通,为权益受损的网络文学作家群体提供了谈判机会和支持力量。此前对不平等合同的抗议活动形式主要是在各社交媒体进行个人揭露和反对,力量十分分散,难以与大型平台相抗衡,最后大多被平息,也因此让平台与作家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对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损害。正如阅文集团高层程武发布的长文所说,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网络文学作家与网络文学平台双方基于理解、尊重和共赢的伙伴精神共同推进。此次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的发声为二者提供了合作的新视角,力量失衡所造成的单方压迫必须用弱势力量的补强

来解决。为此,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健全行业协会与平台沟通机制,集聚行业发展共识,另一方面在合同谈判中引入行业协会力量,这主要是鉴于当下平台与作家之间协议的格式化,合同基本内容在不同作家之间并无差别,引入行业协会的参与将极大地提升网络文学作家的谈判力量,更有益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共赢。

(四)吸收竞争理论新成果,开拓网络文学平台反垄断规制思路

网络文学平台的反垄断规制不同于传统行业,其既具有数字经济平台的共性特征也具有网络文学平台本身的独有特征,为此,必须吸收竞争理论适应数字经济后的新成果,改变传统思路应对反垄断的机制与视角,善于运用针对平台经济的规制理论,弱化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和市场份额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上的重要性,更加关注平台的行为效果而非平台所采取的行为本身。此外,在市场势力的判定上引入新的权衡因素,重点关注平台竞争力主要根源的数据。在网络文学平台规制上,要着重注意著作权垄断带来的反竞争效应;在平台间竞争上,着重考察其他平台对大平台优秀作品的可获得性;在平台与作家关系方面,则主要注重网络文学作家与平台之间的著作权授权谈判可能性。综合反垄断执法手段,找到鼓励创新与规制垄断的最佳切入点,不断吸收竞争理论新成果,为网络文学平台反垄断规制提供新思路、新指引。

四、网络文学作家权益的多法保障

网络文学作家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对其权益保护仅靠反垄断法显得有些势单力薄。网络文学作家作为平台的合同相对方,平台强大的垄断力量需要反垄断法进行规制以限制其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中的一分子,其对社会保障也有相应的需求;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又需要著作权法的介入保护。

在社会保障方面,按照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理和实务操作规则,劳动关系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捆绑在一起,这种“全有或全无”的法律制度设计使得社会保障权益难以覆盖到网络文学作家这一群体上。面对这一状况,我国相继发布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发改高技[2017]1245号)、《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等文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维护平台从业人员权益。这就为社会保障覆盖网络文学作家这一群体提供了政策支持,为研究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关系的解绑提供了指引。继而有学者指出,法律如果希望为所有对

社会福利有需求的工作者提供合理的保障,就不应当将劳动关系作为社会保险关系的唯一“入口”,而应将经济从属性的强弱作为标准。对于大部分网络文学作家而言,网络文学平台的版权收入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导致网络文学作家对平台有着很强的经济从属性,从而为社会保险覆盖该群体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依据。而社会保险的覆盖无疑将为网络文学作家这一群体提供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有助于激发其创作力和保证其创作的连续性。

在著作权法方面,因为网络文学平台与网络文学作家之间的力量失衡,本来自由协商确立的合同,在事实上已经变成网络文学平台的单方格式合同,且要求独家授权,据阅文集团新合同内容所示,该授权期限直至作家死后五十年,基本覆盖了著作权法保护期限。而网络文学作家只能在签订与不签订合同之间选择,难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作家的著作权权益也就被平台所攫取,从而使得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家的著作权权益在事实上发生了错位,与著作权法鼓励文学创作的立法目的相背离。那么,在公私法融合日益凸显的今天,著作权法所赋予的权利让渡自由是否还适当就有了疑问,在平台与作家之间签订著作权权益让渡合同之时介入新的力量就有了必要,这体现在合同授权形式、授权时限、授权内容等方面。在授权形式上,独家授权是否可以施加一定的限制,为作家退出平台预留空间。在独家授权施加限制难以实行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授权时限上

施加一定限制,即为独家授权时限划定一次性授权最高时限,缩减网络文学作家因不平等合同所受到的权益损失。在授权内容上,则考虑内容让渡上限,以禁止完全转移的形式为作家对自己的经典 IP 继续创作提供条件。

多法共治将为网络文学作家权益提供更完善、更坚实的保障,如何充分发挥不同部门法的保障作用以及协调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冲突是今后网络文学作家权益保障的重要方向,这不仅有助于理论层面的学术探讨,也需要实践层面的经验总结。网络文学作家权益保障是激发网络文学创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方面,必须立足于时代,形成多法共治的合力,为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 [1] 邓国军. 网络文学的定义及意境生成[J]. 文艺争鸣, 2006(4):63-65.
- [2] 罗诗咏. 中国文学网二十年[J]. 网络文学评论, 2018(6):20-26.
- [3] 吴汉洪,王申. 数字经济的反垄断:近期美国反垄断领域争论的启示[J]. 教学与研究, 2020(2):40-54.
- [4] 陈兵. 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J]. 法学, 2020(2):103-128.
- [5] 谭钧豪. 文学网站用户服务协议中的僭越行为及其规范[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7):69-71, 8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Protection of Online Literature Writ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Platform Monopoly

YUAN Yanbo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new development vitality for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typical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which has also injected new possibilities into literary cre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network media, the network literature is quietly ris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network literature writers grow up with this new literary form.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literature writers and network literature platform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However, the injection of capital makes the power between platforms and writers increasingly unbalanced. With the help of its monopoly position, platforms are increasingly infring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riters, m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opposite and greatly dam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restrict the power of the platform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the writers of the network literatur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brings many differences from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gulatory methods of the anti-monopoly of the platform of the network literature. In view of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writers of the network literatu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and regulatory methods of other laws.

Key words: network literature; internet platform; writer's rights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新动向及预防对策

张胜英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随着网络信息全球化以及电商平台的迅猛发展,出现了方便而又快捷的网络信用卡支付方式。这种方式同时也给犯罪分子实施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以可乘之机。与传统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相比,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表现出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网上消费、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套现以及恶意透支等犯罪形式,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动向。对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犯罪类型以及新动向进行了分析梳理,旨在提出有效的预防对策,以降低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发生率。

关键词:网络信息全球化;信用卡诈骗;新动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0

中图分类号:D924.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52-05

近年来,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推动支付方式不断更新,无卡支付越来越普遍,成为当下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支付方式。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方便快捷之际也正在遭受着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实施信用卡诈骗带来的巨大风险。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与传统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相比具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与我国《刑法》第196条有关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的情形不完全相同,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且,犯罪分子进行网络信用卡诈骗的犯罪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和多样化。

一、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概述

(一)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概念

界定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概念,有赖于对“网络信用卡”的界定。从形式上看,传统信用卡是有形的、实体的卡片,一般用特殊的塑料制成,正面印有发卡行名称、持卡人姓名、账号并镶有芯片,背面有磁条、签名条信息。而网络信用卡实际上是无卡的,只有账号和使用密码,网络信用卡在实践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网络提交用户各种信息资料经发卡行审批后申领的无卡信用卡,只能网上使用;另一种网络信用卡通常是指依附在传统信用卡账户的一个子账户。和传统信用卡支付形式相比,网络

信用卡只需通过手机终端和信用卡绑定后,通过银行预先设置的计算机程序后台,用户登录系统正确输入卡号和密码,就能完成消费和交易,无需像传统信用卡持卡人持卡和签名即可完成所有的信用卡支付业务。与传统信用卡支付相比,网络信用卡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信息化。包括用户支付方式信息化、交易方式自动化以及使用的信用记录信息化。和传统的信用卡支付相比,网络信用卡不再持卡使用,只要输入账号和密码,就能完成交易支付,同时在网上可显示双方资金的增加或者减少等电子交易记录;在交易方式上完全脱离了人的干预,各种工作通过计算机系统和互联网实现。二是用密码代替了用户签名。网络信用卡是通过互联网和支付平台、信用卡公司共同完成的,传统的信用卡签名无法满足需要。因此,用密码代替签名成为网上支付信用卡业务的一种通行做法。比如,目前我们常用的微信和支付宝所进行的转账、手机银行等支付方式。可见,网络信用卡具有传统信用卡的所有功能,但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如方便快捷,用途广泛以及跨国交易等优势。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是伴随着网络信用卡的使用而出现的一种犯罪。具体而言,网络信用卡诈骗

收稿日期:2020-05-13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立项课题“网络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规制”(2019-ZDJH-009)

作者简介:张胜英(1974—)女,河南柘城人,法学博士,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副教授。

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利用网上支付信用卡的功能、特性,出于诈骗故意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取经济利益,故意实施诈骗活动而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随着网络无卡方式信用卡支付方式的普及和广泛使用,人们在享受网络信用卡业务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之时也给犯罪分子实施无卡方式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带来了可乘之机,严重威胁网络经济的正常发展,破坏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由于立法的缺陷以及防范措施不力,利用网络实施无卡支付信用卡犯罪的发案率逐年攀升,所涉及的财产犯罪金额也越来越大。网络无卡方式的信用卡诈骗不仅危害了国家信用卡管理制度,而且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给国家和个人的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要类型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和传统信用卡诈骗犯罪相比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也有其不同之处。根据近年来发生的案件,我们可以将网络信用卡诈骗比较典型的犯罪的类型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网上消费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指未经持卡人同意或者授权,非法持有信用卡并擅自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该信用卡,进行信用卡法定功能的支付、消费、提现等诈骗行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一般包括持卡冒用和无卡冒用,而且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网上消费的行为与传统冒用信用卡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法分子无需持卡消费,只需输入通过网络盗取的用户信用卡账号、密码即可完成网络消费。但网站、信用卡中心对于不法分子无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无法加以识别,原因在于其信用卡信息被盗窃,网站、信用卡中心基于认识错误而允许交易完成,通常持卡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并不知情。此类案件更为严重的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信用卡数据库,大量窃取信用卡资料并用于消费或予以公布的行为,持卡人不仅遭受重大利益损失,而且被入侵的信用卡中心也会损失惨重。

2. 伪造信用卡并使用

伪造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完全模仿真实信用卡进行非法制造、复制并使用;二是运用高科技手段利用盗窃的用户信息进行复制,或者在空白卡上输入虚假信息等方式进行伪造。这类行为主要指具有特定职业身份的犯罪人所进行的信用卡犯罪,犯罪主体主要有网络黑客或者银行内部人员,他们侵入到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内部从而获得信用卡持有人的信息。此外,在原有信用卡的

基础上进行涂改、变造也是伪造信用卡的一种方式。司法实践中,仅有伪造而没有利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消费、支付或者结算不构成信用卡诈骗,仅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3. 信用卡套现

信用卡套现是指持卡人不是通过正常合法手续(ATM或柜台)提取现金,而是通过其他手段将卡中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套取,同时又不支付银行提现费用的行为。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领域竞争激烈,信用卡套现案件频发。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看准信用卡套现的“商机”,通过注册空壳商户,向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申领POS机,采取虚构交易等方式,非法从事为他人转移资金、套取现金、养卡等犯罪活动,涉案金额巨大。2017年5月,海南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信用卡非法套现案,涉案金额1.2亿元。信用卡套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常规套现、翻倍套现、以卡养卡以及空卡套现等;套现模式多种多样,比如网络购物、微商套现、个人POS机等。从近年来发生的信用卡套现多起案件来看,利用信用卡非法获利手段日渐呈现多样性和隐蔽性,给国家和个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4. 使用信用卡后恶意拒付

使用信用卡后恶意拒付行为是随着网络信用卡的使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模式。在传统信用卡业务过程中,由于交易需要签名很难实施这种犯罪。但是在网络经济模式和特殊的信用卡法律体系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在网上消费后拒付的,则往往能完成犯罪。使用信用卡后恶意拒付的行为目前我国发生率还比较低,但在其他国家已经相当突出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这类行为也将会在我国大量发生。

二、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新动向

与传统的信用卡犯罪相比,对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其呈现出了新动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盗取信用卡信息是实施诈骗的重要环节

实施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前提是必须掌握用户的信用卡资料,因此,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渠道盗窃用户账号、密码和验证信息是实施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关键环节。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盗窃用户信用卡信息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新。一是通过研发病毒,将病毒植入用户电脑系统获得用户的账号、密码和验证信息。二是利用钓鱼网站实施盗窃,比如犯罪分子在钓鱼购物网站出售廉价商

品、放置精美的商品图片,同时在各种商品旁边设置各种金融机构的链接图标,一旦被用户点击,就会出现和金融机构相同的假冒网页,网银账号和密码就会被盗取。三是利用淘宝购物退款进行盗窃。犯罪分子通过网络软件窃取用户所在网站的购物信息,通过拨打电话冒充网站客服人员,谎称所购产品无货、卡单等问题,需要退款,套取用户卡号和密码,然后转走用户的存款。四是通过伪基站冒充“银行客服”或“代办公司客服”,或者向用户以官网为名发送短信以及虚假链接,按照其提示的步骤完成相关操作从而实现盗取。五是通过提额软件的 APP 实施盗窃信息^①,由于用户对这种软件的正确与否缺乏辨别能力,犯罪分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用户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时复制其信息,实现盗刷,从而造成财产的巨大损失。

(二) 犯罪手段科技化和智能化

伴随着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网络信用卡诈骗手段较传统的信用卡诈骗更加趋于科技化和智能化。犯罪分子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冒用和伪造信用卡的方法,而是利用高科技带来的便捷和灵活的犯罪方式盗窃用户的信用卡账号和密码,从而使犯罪方式显示出更加现代化、科技化和智能化的特点。比如,实施诈骗的核心犯罪分子负责通过互联网,远程为诈骗团伙安装、维护 VOIP(网络电话)和“透传软件”以及网络改号软件——来电任意显等网络软件,保证诈骗团伙的电话顺利接入内地的电话网络,从而能够顺利获取用户信息,实施网络信用卡诈骗。还有些犯罪分子利用虚假网络兼职进行诈骗。通过网站、QQ、微博、MSN 等方式散布虚假网络兼职信息,以高额佣金回报为诱饵,以业务销售为借口,骗取受害人钱款后失去联系。此外,利用黑客攻击盗窃网络银行账号、游戏装备也是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主要方式。不法分子通过不同的高科技网络手段只要窃取了用户的银行账号和密码,无需持卡和签字就可以刷走用户信用卡里的资金,从而造成巨大财产损失。上述网络诈骗方法充分显示了犯罪手段的科技化和智能化。

(三) 犯罪手段的隐蔽性

随着网络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手段较传统的信用卡犯罪手段更为隐蔽,犯罪分子不需要出头露面,只需通过现代高科技的网络平台就可以完成。常见的操作方式是通过代理服务器、伪基站、钓鱼网站、不同的 IP 地址、在电脑中植入病毒等进行网上操作,多次更换地址,使其诈骗行为更具隐蔽性。因此,比起传统的通过盗

码装置盗窃用户信息而言,利用网络窃取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则显得更加隐蔽。比如,在无卡支付成为大众普遍选择之当下,不法分子往往利用钓鱼 Wifi 盗取用户银行账号和密码等信息,从而导致用户的财产损失。还有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网购骗取受害人。^②随着网络信息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犯罪手段从传统的伪造、变造、复制信用卡等手段转为高智能网络窃取用户信用卡信息,从而使信用卡诈骗犯罪手段和方式更加隐蔽和灵活,增加了侦破工作的难度。

(四) 犯罪手段的多样性

之前的网络诈骗大多采用电话、微信、QQ,以帮助调额度、积分兑换等为由骗取客户的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以及验证码等信息,持续时间往往较短,最多不过持续一天。而 2019 年出现了以交友为目的的新型诈骗方式,即“社交网络杀猪盘骗局”。^③据统计,2019 年以来,多名女性陷入“杀猪盘”骗局,损失数额巨大,所跨区域范围较广。^[1]这类案件往往作案时间长,受害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后才知道自己被骗。“杀猪盘”案件发案隐蔽,难以有效预警,而其所造成的损失往往较大。此外,信用卡“钓鱼”诈骗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诈骗方法,不法分子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以信用卡逾期还款等理由要求持卡人提供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总之,近年来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方式层出不穷,不法分子无孔不入,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五) 犯罪方式的有组织性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往往需要很高的技术,单个人犯罪很难实现,因此需要很多人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犯罪,诈骗犯罪团伙开始实行公司化、集团化运作管理,分工明确,相互交叉。按照职能分工分为境外幕后组织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专门的转账人员、专职取款人员以及关联作案人员,根据不同的分工,各司其职,确保实施诈骗成功。为了规避风险,一方面对外包装为正式运营公司,另一方面也会高薪聘请律师作法律顾问。

(六) 犯罪行为的跨区域性和跨国性

随着网络信息化迅猛发展,网络信息全球普及,信用卡业务的开展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持卡消费。信用卡使用全球化自然给犯罪分子带来了犯罪机会,使得信用卡犯罪更具跨区域性和跨国性的特点。犯罪分子利用盗窃信用卡的资料信息,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在各国实施犯罪。比如,2019 年 9 月,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破获了一起横跨我国内蒙古、山东、重庆等地涉嫌跨区域信用卡诈骗犯罪团伙的重大案例,涉案金额 30 余万

元。^[2]近日,广西来宾警方打掉一个跨国贩卖银行对公账户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大约200万元。^[3]

三、网络信用卡犯罪的预防对策

当前,面对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不断变化,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以降低财产损失的风险。

(一)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规范操作流程

预防网络信用卡诈骗,首要的是自己在工作 and 生活中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避免陷入网上诈骗陷阱。一要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对于自己的信用卡密码设置避免用生日号、电话号码等简单记忆的密码,如此设置也容易被破解,加大了密码被泄露的风险。二是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陌生电话、短信链接以及网上红包。如果遇到电话号码显示的是官网号码,当工作人员索要身份信息、账号、密码时,切记不能提供,以防这些电话来自伪基站的来电任意显诈骗电话。如果对来电存在疑虑,建议挂断电话后自行拨通信用卡官网客服电话,而不要直接回拨过去。如果收到有关银行短信及链接,不要轻易点击进入,更不要输入个人及信用卡信息。如对收到的短信内容有疑虑,可拨打银行客服电话核实后再进行操作。尤其是目前流行的网上红包,不要轻易点开,防止钓鱼诈骗。三是不要轻信任何代办信用卡的个人及其中介,看似方便,暗藏杀机。建议选择银行或银行授权的第三方中介平台,如支付宝、微信等正规渠道。

(二)完善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立法,加大打击力度

一是我国《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是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列举虽然明确,但不能涵盖所有的犯罪行为,有限的立法对于近年来发生的网络诈骗犯罪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困难。比如使用信用卡后拒付行为,虽然我国这种情况的信用卡诈骗还比较少,但是从立法技术上来讲应该增加该类行为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一个客观表现。二是现行立法对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单位犯罪应对无力,无疑是一种放纵。因此,建议增加单位可以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三是《刑法》对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定罪量刑,笔者认为,盗窃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的应有之义,应该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量刑。四是调整信用卡诈骗罪的量刑标准。现行《刑法》对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仅以数额和情节确定不同的刑罚幅度存在一定的缺陷,量刑标准还应考虑犯罪形式、犯罪手段以及造成的后果。犯罪数额也应根据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异,不能一刀切。对于《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

特别巨大”有“唯数额论”之嫌,因此,在考虑犯罪数额的同时,还应考虑受害范围、影响的广度以及损失的严重程度,建议司法机关对此作出司法解释,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三)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提升防范能力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化技术已经得到普及和广泛使用。面对各种黑客、病毒的侵袭以及不法分子诈骗方式的不断升级,对银行系统的网络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势在必行。首先,网银系统应该不断升级,加大科技投入,构建现代化、智能化、安全化的高科技网银系统和网络监管系统,建立综合、系统的网络安全体系。其次,不断更新和升级信用卡终端服务技术,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信用卡诈骗的新手段、新方法。银行自身系统的适用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网络科技信息化日新月异的发展,银行终端必须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升级加密方法,严堵系统漏洞,切实提升防范能力。比如,在自动取款机上安装和检查银行卡设备。这些措施有利于有效防止信用卡消费的挪用,并且具有推广和应用的价值。

(四)完善信用卡管理制度,加强银行内部制度建设

随着银行之间竞争的加剧,为了拓宽信用卡业务,各大银行急于推广信用卡的办理和使用。发卡行对信用卡办理审核把关不严,流于形式,大多采用书信或者电话形式审核,从而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发卡行应高度重视信用调查环节,严格信用卡的审计和审核制度。一方面,要严格确定持卡人身份,确保持卡人就是消费者,严禁他人借用或冒用信用卡。可以借鉴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推广照片卡、激光签名、生物测定和个人识别码等高新技术手段,审核持卡人是否真正的发卡行注册用户。另一方面,加强银行系统内部制度建设。实行岗位定期轮换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同时加强内部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学习。近期频繁发生的储户存在银行的大笔现金被银行内部人员私自转走的案例,大多是银行内部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随意转移或者删除用户的银行记录,给用户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银行内部要提高全部工作人员的防范意识,积极做好预防工作。

(五)加强与公安机关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网络信用卡犯罪是一种比较复杂新型犯罪形式,由于其呈现出的智能型、隐蔽性等特点,所以仅仅靠银行系统的力量难以应对此类犯罪。因此,银行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对

发现的可疑网络账户要及时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加强监控,联合公安机关及时介入,立案侦查。此外,由于网络信用卡犯罪的全球化和跨区域性特点,不同的国家针对信用卡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给犯罪分子实施网络信用卡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可见,国际社会之间也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寻求积极合作,明确网络银行风险责任的国际条款,利用国际刑警部门,相互帮助共同完成追缴赃款、查找犯罪分子、遣返犯罪分子的活动。^[4]

(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用户信息泄露的渠道比较多,如网购、快递单、招聘网站、各种会员卡的办理等等,部分原因在于银行工作人员有意或无意泄露了客户个人信息资料,或者以营利为目的出售了个人信息。面对个人信息泄露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规范公民个人信息的储存、加工、流转、应用,明确公民个人信息分级,实施等级保护措施,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四、结语

网络信用卡犯罪是当前网络信息全球化发展下出现的一种常见多发的新型犯罪,与传统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在犯罪形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具有高度复杂性、智能性、隐蔽性和多样性以及跨区域性的特点。因此,网络信用卡犯罪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打击信用卡犯罪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既需要多部门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又需要有关部门不断完善信用卡立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大打击力度。当然,持卡人本人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也是预防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一个关键环节。总之,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减少该种犯罪的发生,以确保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安全。

注释:

- ①信用卡提额是银行根据持卡人的资信条件综合评分决定的,任何提额软件都属于欺骗手段,以此盗取用户信息,对其信用卡进行诈骗、盗刷。
- ②根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可信电子商务推进中心、中国可信网站应用推进联盟和北龙中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的《2012年中国网站可信验证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31.8%有网络购物经历的网民本人曾在网购过程中直接碰到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网购遇骗网民的规模保守估算为6169万。超过39.7%的网民损失额度超过500元。保守估算,每年因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给网民造成的损失不低于308亿。<http://www.100ec.cn/detail-6047227.html>
- ③所谓“杀猪盘”,是指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诱导受害人投资赌博的电信诈骗方式。诈骗分子准备好人设、交友套路等“猪饲料”,将社交平台称为“猪圈”,在其中寻找被他们称为“猪”的诈骗对象。通过建立恋爱关系,即“养猪”,最后骗取钱财,即“杀猪”。

参考文献:

- [1] 陕西网警巡查执法. 警惕杀猪盘骗局,一女子通过珍爱网交往,一周被骗636万[EB/OL]. [2010-06-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8622287445624922&wfr=spider&for=pc>.
- [2] 丁丁. 兴庆公安破获系列信用卡诈骗案,打掉一跨区域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团伙[EB/OL]. (2019-09-19) [2020-04-06]. https://www.sohu.com/a/341917838_785755.
- [3] 廖汨,刘畅. 警方破获跨国信用卡诈骗案,成功摧毁团伙作案[EB/OL]. (2020-04-29) [2020-05-06]. <http://tj.9ask.cn/news/detail/3469.html>.
- [4] 夏文婕. 浅谈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防范措施[J]. 法制博览,2016(14):201-20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New Trend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Internet Credit Card Fraud

ZHANG Shengying

(Henan Branch of National Prosecutors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online credit card payment is convenient and fast. It also gives criminals an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online credit card frau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redit card fraud, it also presents the forms of online consumption, forgery and use of credit cards, cash out of credit cards and malicious overdraf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esents some new trend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types and new trends of online credit card fraud crim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effective preventive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online credit card fraud crime.

Key words: Internet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credit card fraud; new trends

和谐有序:民间信仰及道德教化功能探析

——试以江西许真君信仰为例

黄德锋

(江西行政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8)

摘要:如何借助民间信仰的道德力量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国家治理智慧。许真君信仰作为古代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民间信仰,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古代许真君信仰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探讨其道德教化功能,可以进一步了解传统社会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古代国家治理模式,对我们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资鉴作用。

关键词:许真君信仰;神道设教;道德教化;国家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1

中图分类号:B9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57-05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随着时代向前推进,许多历史人物原有的作用可能被逐渐放大。江西古代社会对许逊的崇敬逐渐发展成为许真君信仰,这中间必然有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许逊由最开始的治理水患、倡导忠孝的英雄人物逐渐放大成为无所不能的神明,最后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祇。民间信仰一旦形成,其道德教化作用对维系百姓生活信心、社会的有序治理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就民间信仰之本质而言,它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为民众建构宇宙秩序和生存(或生命)的意义,同时为民众的现实生活提供强大的信念动力,并且要不断地维系甚至是重构民众的精神状态;二是建构一个具有道德标榜作用的神灵系统,以便规范或制约民众的行为,维系社会和谐与有序。”^{[1]83}古代社会建构民间信仰,发挥道德教化以凝聚人心、道德影响以稳定秩序的作用,从而达到对国家有序治理的目的,成为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

一、许真君信仰的形成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人物死后成为地方神明,必然有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民众认同的精神力量。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对国家的有效治理,积

极利用民间信仰,有意识、有目的地树立一些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神明,作为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民间信仰产生之初,其内容和功能大多是单一的,大体上都是为了满足某种具体需求而产生。其后,由于人类社会需求多样性的导向,致使这种单一性的民间信仰自然而然地向复合的多功能方向发展。……其发展路径大体是:最初只是为了满足某项具体需求,或是消除恐惧、建构自信;而后,是在娱神的同时娱人;继而增加凝聚社会的功能;再后来,又增加了道德教化机制,以及经济交易等方面的功能等。”^{[1]357}在古代江西,许真君信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我们考察许真君信仰的形成,遵守的也是这样的路径,即许逊历经艰辛为民治水的伟大功绩和忠孝立身的高尚道德为民众所敬仰,在民间社会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后来影响逐渐扩大,发展成为每年度举行的万寿宫庙会,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古代民间信仰,发挥了“陶冶百姓,凝聚人心,纯洁风俗,德定秩序,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2]。

据文献记载,许真君原名许逊,先祖是中原人,汉末因战乱迁入江西,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真君姓许氏,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玉,父肃,世为许昌

收稿日期:2020-06-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明互鉴下原始儒家与早期基督教生命伦理比较研究”(17BZX100)

作者简介:黄德锋(1976—),男,江西抚州人,历史学博士,江西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

人,高节不仕,颍阳由之后也父,汉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许逊在世时,南昌一带经历了几次大水灾,他不辞劳苦,奔走于江湖之间,往来于水患之乡,劝官府,动员群众,倡兴农田水利,经过数年的努力,水患暂息,人们生活得以安定。在当时艰苦的社会环境里,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神明,以安定民心和社会秩序。因治水之功深受豫章等地人们尊敬的许逊,“水旱疾苦,事无大小,必恭请乞灵,争前密祀,煦煦若嬰赤之恋慈,咸称江省福主,无不系心”^[3],许逊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被认为是神明的化身,自然成为民众信仰的重要对象。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利益的需要,许真君信仰由此而生,后来其信仰范围逐渐扩大,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民间信仰。

“许真君民间崇拜……深深地植根于民众生活中,反映出古代江南民众的心理信仰观念及乡间习俗,究其产生原因,主要归于许真君品德高尚,并给江南各地作出过重大贡献,民众故而把他当作神灵供奉,许真君民间崇拜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4]由此可见,人们信仰祭祀许真君主要是因为许真君治水的功德及其救民于危难之中的人生精神。古代民间信仰是民众在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他们将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变,神化为一种超自然的神明并加以崇拜,这些神明所具有的人生精神及价值观,对民众的行为取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人们对厥功至伟英雄人物的敬仰,把一个领导人们治水的人物许逊,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明,推上了神台,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信仰的对象和精神的重要象征,在民间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古代民间自发的一种造神运动。有学者这样评论中国古代的造神运动,认为“中国的民间自发性的造神有一大特点,那就是现实人格的神化,即把人提升为神,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历史与神话的融合。将历史人物转化为神话英雄,是文化认同的需要。一般来说,民间的自发性认同为造神提供社会基础”^[5]。可见,民间的造神运动的本身也许并不在于“神”,而在于民间对英雄人物的敬重与崇扬,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关注,这也是传统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

在灾难深重的古代社会,那些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民众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家国情怀的人生精神得到了社会传颂,为后人所崇敬,成为一方百姓信仰的神明。

许真君信仰的形成,还与许逊对传统“忠孝”思想的提倡有关。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忠孝”一直被封建国家奉为立国之本,这也是古代社会民

众的立身之本。据史料记载:“(真君)自少秀敏,及就学,淹贯经史,涉猎子集,象经律历,靡不习知,阴符道经,尤嗜参究,始从吴猛得授神方。”^{[3]841}这是许逊早期学道的记录。道教“净明派”并经过吸收传统符篆道派及儒释诸教的学说,而以宋元间在江西南昌西山形成了所谓的“净明道”或“净明忠孝道”。全力推崇忠孝伦理,逐渐成为比较典型的儒道结合、具有明显世俗化色彩的道派。由以上可知,以净明“忠孝”之道教化百姓,是许真君信仰得以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李奕园说:“实际上,民间所崇拜的神明,都是故去而有贡献的人。”^[6]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有功于国家和百姓,在社会上对主流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广泛渗透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影响力的神明。其实人们在民间信仰活动中对这些神明的崇拜,就是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的过程。我们也不可否认,传统民间信仰中也存在许多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但也必须要看到,“崇有德、敬有功”才真正是传统民间信仰最重要的人文精神。它通过民间信仰将这些英雄人物神化为神明并加以祭祀、崇拜,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人生精神,并跨越历史时空而变得永恒。这种神化的道德和精神蕴含着深厚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具有强烈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民间信仰在这方面的作用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实质是相吻合的。民间信仰对普通百姓进行的道德教化,通过国家的日常管理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传统文化在社会中找到落脚点,并不断扩大深化,为百姓所继承和弘扬,成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价值理想。

二、道德标榜

《周易·观·彖传》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巽上坤下,巽为风,坤为地,有风行地上之象。从此卦可以看出,古代先王观此卦象,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向人们积极推行道德教化,民众信服则达到天下大治。《观》卦中的“观”有“示范”和“观察”两方面的意思。“示范”就是先“正己”,然后通过“正己”去“正人”。“正己”是《观》卦的关键,即自身要通过“正己”树立榜样,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而“正己”的重要途径就是造神,提供一个可以让民众信仰的道德标榜。“观察”就是观察民间反映以检验自身的德行,故

《周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正己”在于自身的“德行”，有德行之人，才能使人“不言而信”，实现“正人”。“正人”之后，“观察”民间的风俗去判断“正人”的效果，这样才能做到“神道设教”，推行道德教化。

古代国家对许真君的赐封表达了封建王朝对许真君信仰的认同和肯定，树立起一个道德标榜，这是许真君信仰“神道设教”的决定因素，为国家开展道德教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宋真宗赐额万寿宫为“玉隆”，升观为宫，许真君“位于侯王之上”。宋徽宗尊许真君为“神功妙济真君”。清咸丰三年（1853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朝廷，请旨敕加许真君封号及赐御书匾额。在历代王朝的大力尊崇和推动下，许真君作为道德标榜的潜力被挖掘出来，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的象征，其“神道设教”的功能更加完备，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认识到根据“神道设教”树立道德标榜，在道德教化、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们还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制定出了各种祭祀的标准。《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7]秦汉以后，封建国家根据这样的标准，将众多符合国家道德标准的人物尊奉为神明，列入国家祭祀范围。许逊由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到无所不能的神明的漫长历史过程可知，许真君信仰之所以在民间社会得到持续的传承，是当时的统治者积极利用百姓对许逊的这种朴素感情，以设立“神道设教”的方式，认可或赐封、神化许真君的称号，扩大其影响范围，有意识地树立起一个道德标榜，以其作为道德教化的精神资源，以达到安定社会、巩固统治的目的。

“我们也应当看到，民间信仰虽然没有系统的宗教理论和严密的组织，但却有着融合儒道释三教的内容丰富的宗教道德，以儒家的忠孝为主，兼收并蓄佛教的因果轮回、道教的承负报应等等宗教伦理，加以渲染，在教化百姓与整合社会力量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8]纵观我国历史上的神明，其能够流传下来的一种重要因素就是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和推崇，如历史人物孔子、关羽等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大力提倡，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树立起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具有道德标榜作用的民间信仰系统，从而能够规范或制约社会民众的日常思想和行为。这些由于政府强力推动下所形成的道德标榜，久而久之为百姓广为接纳和习惯之后，也就逐渐成为国家有效治理和民间信仰的重要基础。

三、观民设教

《周易·观·象传》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从卦象来看，巽上坤下，“风行地上”。“风行地上”，吹遍万物，有“道德教化”之意。因此，统治者应该效法“风行地上”之“神道”，顺应民风民俗，观察社会，设立“神道”为下民所“观”，以道德礼义施行教化，发挥潜移默化的功效，此即“观民设教”之义。明清之际的学者张尔岐说：“卦名为观者，九五在上而四阴仰之，是以至大之仪表，首出乎上，则位足以为观矣。卦德内顺而外巽，是顺以宅心而和平积乎中，巽以制事而裁酌当乎理，德足以为观矣。德位兼隆，而九五一爻中而且正，是其所为，无一不合乎大中至正之道，可以观视乎天下而为之法也。”^[9]按照此种说法，“观民设教”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按照其现实需求，设立一个“神道”，以其“德”作为社会的楷模，以此教化社会，周及庶物，则民心得矣。

古代传统经典积极宣扬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建构社会表彰系统。从江西万寿宫庙会许真君信仰的发展及扩大来看，其原因是许真君作为道教中的“净明派”神明所体现出来的“忠孝”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的道德要求是相一致的。传统民间信仰的形成及其广泛影响并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一定会深刻烙上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记。在封建社会，这个意识形态就表现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同时融合了道家 and 佛教等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对古代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对百姓来说，“那些神灵原本来自生活的土壤，来自芸芸众生之间，他们体现了人们惩恶扬善的共同心理诉求，或者是人民优良伦理道德观念的化身，他们从民间的虔诚笃信中获得神能，他们是可以心心相印的、亲切的神灵”^[10]。统治者通过以信仰的方式纪念那些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英雄人物是非常有必要的，其目的就在通过信仰来宣传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民众的某些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最终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道德标准。

王弼注《周易·观·象传》曰：“统说观之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11]因此，按王弼所说，所谓“百姓自服”，并不是以各种手段威逼百姓服从，而是以传统“忠孝”思想教化人心，从而自觉服从国家统治。或许会有人认为，“神道设教”的“神”可能是指“鬼神”之类，是古代的封建迷信思想之一，封建统治者通过“神道设教”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和斗志，当然这

样的认识在事实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包括“神”的全部。针对于此,有学者指出:“这里的‘神道’并无迷信之义,也不是指凌驾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神秘主宰,而是指天地自然运作的天然法则。因此,‘神道设教’不是‘教人信神’,因为圣人法天因人所制作的‘教’并不是以神秘的人格神为主宰的宗教,而是儒家的‘礼教’。”^[12] 儒家的“礼教”应该包括万寿宫庙会许真君信仰中的“忠孝”之道,以进行人文教化,它是古代“百姓自服”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也是许真君信仰对“神道设教”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是“观民设教”所必不可少的内容,故古人对此发出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感叹。

四、德业并重

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还体现在信仰对象的德行与其历史功绩上。在万寿宫庙会中,人们将许真君的德行和功绩作为其信仰的象征。因而,“德”“业”并重 in 民间的道德教化就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这也是古代“神道设教”的重要功能。《周易·系辞上传》云:“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崇德”与“广业”是密切联系的,“崇德”是人内在的道德要求,“广业”是个人的外在理想,“崇德”与“广业”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同样重要。《周易》对德行的推崇,体现在对“德”“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德”对“业”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人们自身的行为实践当中,这与《周易·系辞下传》所说的“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的说法是一致的,表明了人们对那些具有高尚道德又具有伟大功绩的英雄人物的称颂。

《周易》高度重视“德”,具有丰富的重德思想。据统计,“德”在《易传》中出现了70余次之多。《周易·系辞上传》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之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崇德”和“广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一方面,‘崇德’是为了‘广业’,因为有才德的人品德高尚,通情达理,中正端庄,美德超逸,就会得道多助,利于建立丰功伟业。另一方面,‘广业’又是为了‘崇德’。”^[13]《周易》把“盛德”和“大业”作为人生崇高的价值理想,倡导人生的社会活动是为了建功立业。“德”“业”兼重,“功”“业”并进,是《周易》的主旨,也是中国人自古一以贯之的人生精神。

江西古代万寿宫庙会中对许真君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许真君历史功绩和忠孝立身的道德行为之上的。千多年来,人们信仰许真君、感恩许真君,不但

是为了感激许逊救民于危难、为民造福的功绩,还有对许逊道德的推崇和发扬。水患早已消失,唯有道德还流传民间。人们一年一度祭拜许真君,举行规模宏大的万寿宫庙会,除了弘扬许真君的崇高理想之外,还有就是人们对自身道德的反省和提升,通过对许真君的德行来激励自我的奋斗精神,从而创造人生之大业,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三不朽”理想中对“立功”和“立德”的追求。“民间信仰中的许多地方神,大都是由传说中那些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匡扶正义、助人为乐的楷模人物转化而来,对他们的崇拜及祭祀的过程,也是一种对崇信群体教化的过程,有利于培养人们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通过将现实生活中立德、立言、立功的文化英雄神化为超自然的神明加以崇拜,并使其代表的精神和人格超越时空界限而得以长期传承,这无疑会对普通信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教化作用。”^[14] 故民众受其鼓舞,拼搏进取,就可能实现《周易·坤·文言传》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的人生境界。因此,许真君得到民众的崇拜,始终是与其“德”与“业”分不开的。但许真君的“德”并不仅仅在于修身,主要在于事功,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百姓的幸福,他把个人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其“进德修业”“崇德广业”“盛德大业”的人生境界,成为人们敬拜的神明。

我国古代社会对“德之不修,业之不广”的忧虑,实际上是告诫和敦促人们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升道德水平,强调道德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依靠道德,人们才能不断克服人生之中艰难困苦,努力创造人生大业,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古代民众对待善恶的价值评判标准,民众的这种“善恶观”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决定于主体行为,即主体行为的或善或恶,并在此基础上的积累。人们在从事何种行为时,就应该明白此种行为的后果,这也是告诫人们,产生吉凶祸福的后果都是自我主观意念的产物,完全由自己的行为所决定。人们在从事任何社会活动时都要提醒自己要积德行善,及时立功,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有时作为,事业有所成就,才能赢得社会的信赖和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阐明了在新时代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对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许真君信仰中,我们可以知道许逊的高尚品德来自他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道德行为,来自于他在不同岗位上对社会的贡献。他为民除害、为国分忧、勤政爱民、清正廉洁、乐善好施、崇尚忠孝的历史功绩和道德品质始终受到人们的崇敬,他之所以千百年来能够成为江西传统民间信仰的神祇,就是其道德行为和功劳成就感天动地,是人们心目中的楷模。这种楷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人心平和、维护社会和谐有序,这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是与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一脉相承的,成为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我们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资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道超. 筑梦民生: 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83.
- [2] 郑万耕. “神道设教”说考释[J]. 周易研究, 2006(2): 47-48.
- [3] 金桂馨, 漆逢源. 逍遥山万寿宫通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19.
- [4] 李星. 论江南农村许真君的民间崇拜和影响[J]. 农业考古, 2010(3): 311.

- [5] 刘刚. 许真君与万寿宫[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9(2): 49.
- [6] 李奕园. 人类的视野[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281. 11.
- [7] 王夫之. 礼记章句[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1098.
- [8] 张振国. 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J]. 求索, 2010(11): 133.
- [9] 张尔岐, 撰. 周易说略[M]. 周立升, 点校.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100.
- [10] 刘华. 亲切的神灵[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187.
- [11] 王弼, 撰. 周易注校释[M].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76.
- [12] 杨阳. “圣人以神道设教”辨[J]. 孔子研究, 1990(1): 125.
- [13] 刘大钧, 林忠军. 周易传文白话解[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140.
- [14] 王存奎. 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 民俗学视角下的社会控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20.
- [1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Harmony and Order: Analysis of Folk Belief and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Taking the Belief of XYU Zhenjun in Jiangxi as an example

HUANG Defeng

(Jiangxi Administrative College, Nanchang, Jiangxi 330108, China)

Abstract: How to make effective social governance with the help of the moral power of folk belie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has carried out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forming a unique national governance wisdom.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folk belief in ancient Jiangxi, XYU Zhenjun's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XYU Zhenjun's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and discusses its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further understand people's living style and ancient state governance mod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also has a certain historical reference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Key words: XYU Zhenjun's belief; enlighten people to follow the lead of deity and priest; moral education; state governance

试论近代南浔铁路经营与发展困顿的原因

龚喜林

(九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摘要:为了杜绝日本帝国主义对江西境内铁路觊觎,1904年,江西官绅成立商办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开始筹建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1916年6月南浔铁路建成通车。然而,由于资本短绌、经营管理不善、日债逼迫以及动荡时局的影响,南浔铁路成为全国“唯一一条赔钱的铁路”。商办南浔铁路的历史命运表明在列强环伺、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因外有资本帝国主义的打压、内受动荡不安政局的扰乱而生存与发展困难重重。因此,主权独立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前提。

关键词:南浔铁路;日债;路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2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62-05

在全国收回利权运动浪潮中,为了维护江西路权,1904年9月,江西官李盛铎等呈请清政府商部成立“江西全省铁路总局”(1907年6月改为“商办南浔铁路有限公司”),筹办江西全省铁路,拟分别修建九江至广东、至浙江、至湖南、至福建等铁路。但因工巨款绌,江西省铁路总局决定先修建九江至南昌的铁路,是为“南浔铁路”。南浔铁路于1906年12月在九江龙开河开工建设,1916年6月全线通车。然而,南浔铁路线长仅128公里(70英里),“无一隧道开凿及浩繁之工程,用人工千人,八月应可告竣矣,而南浔铁路前后共费十年许”^[1]。在工程造价方面,南浔铁路最多不超过五百万元,但南浔铁路公司先后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本息竟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以每年营业收入,仅百万之数,而负债至千万元之巨。”^[2]南浔铁路严重资不抵债,几至破产,日本东亚兴业会社时有接管南浔铁路之举,南浔铁路因此而成为近代中国铁路史上“耗费最巨、工期最长、全国唯一亏折之路”^[3]。南浔铁路在其存续期间何以至濒临破产边缘?究竟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南浔铁路的发展?南浔铁路又折射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怎样的生存困境?为此,本文拟

在清末民初背景下,从资金的短绌、经营管理的混乱与腐败、动荡不安的时局等三方面来探讨南浔铁路所面临困境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窥探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艰难发展的历史命运。

一、资金的短绌与商办南浔铁路的困窘

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修建和经营铁路以攫取更多的资源与利权的同时,清政府官办铁路和商办铁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为了防止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染指江西铁路,江西官商绅联合起来兴建南浔铁路以维路权。按照最初构想,修建南浔铁路所需要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国人资本。南浔铁路公司最初也秉承国人自办铁路的宗旨,通过由招募而筹集的商股、以盐斤加价和抽收过境与交易税的货股和征收附加税的税股等方式来筹集资金。在商股方面,最初拟定集资五万股,由本省官绅先行购买,外省籍人士也可购买。或一人多股,或多人一股。该路商股自开办以来至1915年底止,由北平、湘、鄂、粤、南京及本省各县劝集以现金自由投资入股者,共银洋1197390元。此外,各股东应得息金有存未具领转作股本者,共银洋408800余元。^[4]在货股方面,南浔铁路公司先是呈请清政府

收稿日期:2020-05-29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8年)规划项目“社会变动中的南浔铁路研究”(18LS07)

作者简介:龚喜林(1967—),男,湖北监利人,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批准,每斤盐加价四文(1905年7月征收,1906年7月停止),继则在龙开河与湖口设立“路股局”,就过境的大米、木柴、纸张、夏布各商品抽收路股。截至1926年止,总计共收银洋420余万元。^[5]1916年1月,北洋政府财政部、交通部要求江西省政府每年筹集60万元保息专款,用来偿付所借日本债务之利息。于是,江西省政府负责征收地方五厘附税及契税附税专为担保债息之用。该款项由各县代征,由财政厅拨交南浔铁路局妥储备用。截至1926年底止,共计银洋219190余元。^[4]除上述三种集资方式外,南浔铁路公司还有派股、劝股之举措。

南浔铁路建筑资本曾计划全部向商民募集,不假外资,但由于盐斤加价和输运米捐,开办未久便先停收。而湖口货股,每年只十余万元,各处劝股也收效甚微,^[6]加以所用非人,乃至工程废弛,开支沉滥,弊窦百出。“商人所纳之湖公货,银四四九六八六五元四九,暨地方公股银二一九二三四元二五,浪费无度,几至停办。”^[7]辛亥改革后,南浔铁路公司不得不靠借日债度日。

为了应付危局,南浔铁路先后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四次借款,前后共计一千万元。因路款不继,工程陷入停顿,加之积欠日本大成工商会社借款银一百万元急需归还,1912年7月,南浔铁路公司彭程万、陈三立等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订立合同,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年利率六厘半,九五折扣,实收日金四百七十五万元,由该路财产及进款担保。该款自合同签订之日后第十一年起五年间摊还,至第十五年付清。每年六月与十二月付息,如遇利息迟滞至四期不付,或本息摊还迟滞之时,会社得实行抵押权;如聘外国工程师,应由会社推荐公司选择;铁路建设所需要的材料由会社代购。此为南浔铁路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的第一次借款。因借款用尽,工程仅推进到涂家埠,复受“二次革命”战事影响,工程无法推进。1914年5月,吴钫与陈三立等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续借款五十万元,该借款年利率六厘半,九五折扣,实收日金四十七万五千元。借款年限为十五年,自合同签订之日算至第十一年起五年间分十期匀还。此为南浔铁路向兴业会社的第二次借款。但五十万元借款无异于杯水车薪,工程剩三分之一尚未完工。于是,1914年6月,吴钫、陈三立等再次向兴业会社续借二百万元,南浔铁路因此得以完全竣工。该款年利率六厘半,九五折扣,实收总数日金一百九十万元,借款年限二十三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第十九年止五年间分十年平均摊还。^[8]此为南浔铁路向兴业会社的第三次借款。

“欧战以后,世界金融形势紧迫,一切债票无从发行。且国内水旱兵灾,连年迭出,维持运营,已属不易。益以每年应付外债本息较前倍增,而中央提用之款,地方协饷及军运记账等,有加无已。非唯外债本息难以应付,即日用材料借款,亦至无法筹措,至是遂有延欠各债本息情事。”^[9]为了迟缓积欠东亚兴业会社息金及其他短期借款,南浔铁路公司遂又于1922年5月,与兴业会社订立第三次续借款合同,再次借款为二百万元,借款九五折扣,年息七厘五,“以还夙欠及改良路事之用”。南浔铁路公司总计先后共向日本兴业会社借款四次,借款总额为日金一千万元。^[10]在一千万元日债中,“内有一百万元系由利息积累所生,正复利息三百二十五万二千数百余元。其借款契约中,曾载有如遇利息迟滞至四期不付,及本息摊还迟滞之时,即照约办理,暂行代管营业。至本息还满之日止”^[11]。

虽然,南浔铁路借日债本息约一千三百万元,但其运营并未有所起色。“迨至借款告罄,全路勉强通车,而每月营业所收入仍不足供全局人员薪工及开车养路之费,惟日日仰台湾银行鼻息,特藉借债以资生活。”^[12]而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不时有接管南浔铁路之举。南浔铁路直到1929年1月国民政府铁道部收归国有之前一直挣扎在债务之中。

二、经营管理的混乱与腐败使南浔铁路的经营捉襟见肘

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的制度与经验,清末民初的商办铁路所共存的缺点是,“在公司管理方面,企业精神不足而官场习气太重,因此,经营腐败,所筹的有限款项,常为经理人员轻易浪费,甚或据为私有,贪污中饱”^[13]。虽然,《江西全省铁路简明章程》曾规定,“本公司一切事宜遵照商部奏定有限公司章程及商业通行条规办理,以不杂官场习气为第一主义,力求撙节期于有成”^[14],但从商办南浔铁路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官僚气息浓厚、管理混乱、舞弊丛生、交通事故层出不穷。

“浔路腐败,书不胜数。”“盗卖钢轨也,重卖路票也,私窃枕木也,妄报方数也,浮开工账也,伙运私货也,私制提单也,种种花头,不一而足。”^[15]在刘景熙任总协理期间,南浔铁路腐败情形甚多,如“同一迁葬司事,甲充之月薪四十元,乙充之则三十六元。同一招待司事,甲充之月薪四十元,乙充之则二十四元,是事无定值,以人情厚薄加减而已。”又如该公司向上海祥福洋行所购枕木,“多为他公司剔蔽不用之料。水门汀土由沪运浔,该公司每因起卸不及,任其久搁霉湿。其所购各料,已经起岸者,层累堆

积,每至一二月之久,始请工程师往验,以致所生损害,不能更换”。在包工方面,“包工办法,均以换票为准。中票者先交保证金,即与包工,此包工者谓之总包。其下复有小包、分包。包工人中票后,公司不明定办法,任其出外招摇。其小包、分包缴纳总包之保证金,恒数倍于总包工人缴纳公司之数。包工人一得巨款,任意挥霍。迨零星工人就道作工,油米之资,沿途借贷,包工者无资应付,竟至隐匿不出。于是,工人之弱者逃散,而强悍者流为抢掠。逃散则工程延缓,抢掠则地方受害”^[16]。

李盛铎任南浔铁路总理期间,由于其长期驻京,遥领指挥,南浔铁路管理也日形混乱。“养路费与京汉路比较,浔路二百四十华里,至多不过四十万”,“而年款百五十万之多尚不足用”。“洋松之费,近年价目每千尺约规元五十两”,“竟报价七八十两”。“铁篷客车二十辆,除旧有转盘每辆应除银六百两外,竟报价四千一百五十两。”“煤时价八元,高者十元,块煤十三元,高者十五元,浔路用煤,年约万吨有零,乃竟报价十七元三角。”^[17]另外,南浔铁路车票系由伍文华印刷店印刷,由南浔铁路公司营业科计核科管理,但该科科员项惠生伪造车票竟达八万张以上。^[18]1922年1月,南浔铁路局涂家埠车站站长黄中强为通济、隆泰两转运站伪造红色发单,交由两转运站转运货物,该站长私自收取转运车费,暗中与该两转运站员工约定给以七折回扣,后被该路总稽查发觉,被永修县知事扣押。^[19]1921年4月,营业科主任胡伯诚与九江站售票员张志齐、童瀛洲,南昌站售票员孙嘉禄、叶子扬等串通,每日售出重票号车票若干,且其行为行之已久,查票员也无察觉,共查出重票千余张。^[20]

南浔铁路管理混乱导致交通事故频发。1923年10月21日,南浔铁路客车行抵沙河站时,客车车头突然损坏,停至数十分钟之久才勉强开行,但不久列车仍因动力不足而再次停车。列车长下车巡视,“知系车炉铁条已断,致炉底穿洞,不能盛火。于是车长飭该机关手,迅速设法修理,复迟至一小时许开行,沿途火焰挥扬空中,遂至中外旅客因而惊恐者有之,讥笑者有之,怒属者有之”。“及抵浔站,天色已晚,暗不见人,或错乱行装,或妇孺失件,而一般叫苦连天之声,又不绝于耳。”“此虽不常有之举,然有一此,即呈办理腐败之现象。”^[21]南浔铁路桥梁最危险者为山下渡大桥,该大桥本身不甚坚固,加之年久失修,“车行其上,颠簸滋多,坐客恒为之头晕目眩”,“乘客咸有戒心”^[22]。1920年4月4日,该桥发生惨烈事故。当天由九江开往南昌列车车行经山

下渡桥大桥时,大桥突然坍塌,致使车头和两节旅客列车箱掉入水中,死者约百余人。^[23]

三、动荡不安的时局影响了南浔铁路的发展

“中国铁路之不能良好发展,及其工程缺乏系统的保养,政治不安定实为其最大之根本原因。盖历年内乱及战争,足使铁路停止营业。”^[24]“据该路十六年统计年报,其累积亏折已达七百四十七万三千七百六十元有零,因此不特股息分文无着,即对外借款,也不能还本付息了。”^[25]动荡不安的时局影响了南浔铁路的发展。

军事对铁路的影响起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时期,南浔铁路虽然尚未全线贯通,但已经通车的路段却成为军运的主要通道。“军人占据车辆滥觞于辛亥革命。其时京汉铁路之广水以南为南军占据,对于所有车辆,有事借以行兵,无事视为传舍,几至于全供军用。而沪宁、株萍、南浔、广三、广九亦大率皆然。”“运兵转饷,迄无宁日,而扣车之后久假不归,致使各路大伤元气。”^[26]南浔铁路“时款尽工停,无法再进”^[27]。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江西为主战场,九江至南昌铁路沿线均沦为战场,工程被迫停止,桥梁被毁,车辆被征调军用,“至车辆则已经购置者颇多,惜为乱军毁坏者有之,损坏而不能修理者有之,及乱军败走后北军借用该车亦不能加以爱惜。”因此之故,“南浔铁路因战事损失四十余万,要求政府赔偿”^[28]。在1918年的“护法战争”中,段祺瑞政府对西南用兵,湖南和四川成为重点进攻区域,而江西则成为进攻湖南的前进基地。北洋军一部驻江西铜鼓等处为攻湘之援助,“又调鲁省新编戴旅长所部之混成旅,暨安武军六营来浔协助,张作霖亦有开拔来赣消息。南浔铁路之执事者不堪其苦,以行车规则军人无不干涉,不论有无危险,则强制开驶”^[29]。“自鲁军抵浔以来,强制其装运军队,该路执事若稍加理论,即遭殴辱。”“客军由浔运省争车互相争斗,机车车辆多被打坏,兼之煤炭缺乏,坐办张毅无力维持。”^[30]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孙传芳驻军南浔铁路沿线,“日夜扣车运兵,停止客货,已无营业可言”^[26]。而国民革命军“利用该路为军事运输,不但不给运费,且派管理员、委员、局长等收管该路,铁路公司之董事会也被解散,不能行使其职权。路股保息之法及所云保息自民国十五年后遂亦完全停顿。唯路股内米之输出则反发给护照,增收护照费,免除其厘金附加税,并令铁路运米减半收运费。省政府只图财政上之便利,遂使路政紊乱”^[30]。

“本路总协理初为奏派,嗣改公推,继则民选。

我军充赣,仅逾年,总管之员为温、为虞、为陆、为魏、为共产党之熊好生、周子南、詹文忠、欲求其发展,已属于万难。”^[30]从1907年开始修筑南浔铁路至1929年1月该路收归国有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因受政治局势影响,南浔铁路管理机构屡经变更,这严重影响到南浔铁路的经营。就管理结构的变更来说,从1907年8月至1915年12月为南浔铁路建筑与初步营业时期,该时期的管理机构为驻九江的南浔铁路总局。该局先以李有菜为总办,后因李在鄱阳湖遇难而由刘景熙为总理,但因经营困难,刘辞职而由吴钊继任总理。1916年1月至1926年10月为南浔铁路商办时期,其管理机构为南浔铁路管理局。1916年6月,由李盛铎继任总理,但李驻京遥领,路事概由坐办张毅主持。因南浔铁路弊端丛生。1921年改选蔡儒楷为总理,不久,蔡病故,其后有张肇达、胡思义、傅国俊、邹日焯、纽传善等或代或兼任总理。1926年11月,北伐军进驻九江,国民党派军队接管南浔铁路,南浔铁路商办结束,至1927年4月为军政管理时期,其管理机构为军事管理局,主其事者为温建刚、虞愚等。1927年5月至1927年10月为南浔铁路管理委员会管理时期。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政府鉴于南浔铁路向为商办,但亏损严重而有整理之必要,特组织南浔铁路整理委员会,由詹文忠、龚学遂、周子南等主持南浔铁路的整理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为交通部管理时期,此时期内,交通部改设南浔铁路管理局,委任陈隆恪为局长,张远东为副局长,“形成省监部管之势”^[26]。1928年7月至1929年1月为江西省政府管理时期,派林祖渠为监理;1929年1月,南浔铁路收归国有,归属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管辖,从此,南浔铁路才有稳定的管理机关。管理机关的异动严重制约南浔铁路发展。

国内外动荡时局影响九江进出口货物总量,进而影响南浔铁路运输业务。自1861年开埠通商以来,九江已成为江西进出口货物的中心。赣北与赣南的大米、武宁与修水的茶叶、产于江西各地的夏布等都辗转运输九江出口各地;而来自国外或国内各通商口岸的五金、尼绒、百货、煤油等国外商品也通过南浔铁路运销江西省内各地。动荡不安的时局使江西百业凋零,进出口货物大受影响,并间接影响到南浔铁路的营业。1913年“二次革命”,“本年进出口货物估值之总数为三千二百七十余万两,比上年约少二百三十三万两”^[31]。1925年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当年“南浔铁路公司收入总额七十五万元,较去年减少约十万元。此完全系受时局不靖之

影响,赣商不敢向上海汉口及其他商埠多进货物,铁路营业因而锐减”^[32]。1931年长江大水、上海“一二八”抗战、江西各县商业停滞,九江市场萧条,南浔铁路营业一落千丈。“该路局往年营业除早晚各车上下各两次外,尚开货车三五次不等。近来每次快慢各车售票总额,南浔两方面,每日不足一千元。”^[33]

四、结语

作为近代科技发展最新成果的铁路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过程中输入中国的。虽然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因昧于世界大势而对铁路盲目排拒,但是,在1895—1903年清政府大举外债筑路的浪潮中,西方列强通过贷款给清政府筑路而借此拓展其势力范围,清末民初的铁路从一开始就与国家主权相联系。于是,在1904年至1911年间,各省绅商则又筹款自办铁路以挽回利权,南浔铁路正是在此商办铁路大潮中动工兴建的。“唯绅商倡议自办之路,虽各自设立公司,推举总理,凑集股本,究以人民财力有限,只有一时之热心,却无实力与经验。不特进行迟缓,除粤汉外成效甚少,而且渐生弊病。”^[34]南浔铁路由于路线本身太短、经营难以取得预期效益,鄱阳湖水运的竞争削减了南浔铁路的运输业务;而更主要的是南浔路沉重日债的剥削与压迫、公司内部的腐败与管理的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影响,南浔铁路发展步履维艰,经营困难重重,南浔铁路也成为“我国唯一之赔钱路也”^[35]。南浔铁路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缩影,它的历史表明,在列强环伺、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因外有资本帝国主义的打压,内受动荡不安政局的扰乱,加之普遍缺乏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南浔铁路开办者们所秉承的“自保利权”“维护主权”“实业救国”的宗旨难以实现。南浔铁路最终其营业收入,“非但不能支起债息,并不能供给该路一切费用。吾赣人民,徒增巨债之负担,并无丝毫之利益,所谓发达国民经济,适得其反”^[36]。因此,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只有在民族独立、社会安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主权独立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第一前提。

参考文献:

- [1] 赣人自述南浔铁路之危机[N]. 实业丛报,1921(5):77-78.
- [2] 南浔日债进行整理[J]. 京沪杭甬铁路周刊,1929(9):2.
- [3] 颜小忠. 日本帝国主义与南浔铁路[J]. 九江文史资料选

- 辑:九江近现代经济史料(上集),1988(4):127.
- [4]周贯虹.整理南浔铁路建议书[N].江西省政府公报,1928(45):113-115.
- [5]南浔路大脏案近情之赣讯[N].盖世报,1921-04-19.
- [6]章勃.日本对华之交通侵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6.
- [7]南浔铁路[J].中华杂志,1(5).出版年份和页码不详.
- [8]张竞立.铁路借款提要[M].出版信息不详,1916:3.
- [9]孙科.二十五年来之铁道[M].南京:铁道部,1930:8-9.
- [10]张兢利.国有铁路债务节略[M].出版社不详,1936:409.
- [1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J].江西党史资料: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专辑,1989(9):186.
- [12]张瑞德.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03.
- [13]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40)[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470.
- [14]南浔铁路人物之写真[N].四民报,1921-12-21.
- [15]马鸿谟.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222-223.
- [16]请看南浔铁路腐败之内容[N].京报,1921-04-01.
- [17]南浔铁路股东之大发现伪票八万余张[N].晨报,1920-11-29.
- [18]南浔铁路近闻纪要[N].新闻报,1922-01-09.
- [19]南浔路发现售票舞弊案[N].申报,1921-04-12.
- [20]南浔铁路之腐败火车每误时刻机件破烂不修[N].晨报,1923-11-06.
- [21]南浔铁路之危险状况[N].新闻报,1920-04-24.
- [22]南浔铁路肇祸记[N].民意日报,1920-04-13.
- [23]皮格耳.中国铁路路政腐败之一部原因及其整顿方法[J].南浔铁路月刊,1930(8-7):1.
- [24]章勃.日本对华之交通侵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8.
- [25]曾鲲化.中国铁路史[M].北京:燕京印书局,1924:399.
- [26]侯家源.浙赣铁路南浔段复路通车纪念册[M].南昌:江西大中华印刷厂,1947:3-6.
- [27]南浔铁路因战事损失[N].申报,1913-12-20.
- [28]南昌通信[N].申报,1918-03-19.
- [29]路局之棘手[N].申报,1918-03-25.
- [30]南浔铁路股权纠纷.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入藏登陆号:001121009A001.
- [31]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61[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653-654.
- [32]南浔铁路收入减省完全受时局影响[N].申报,1925-12-01.
- [33]九江各业凋敝[N].盖世报,1933-03-16.
- [34]凌鸿勋.中华铁路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11.
- [35]陈汝善.全国铁路概要[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会,1930:39.
- [36]救济南浔路之一法[N].申报,1919-08-2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the Cause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nyun Railway in Modern Times

GONG Xilin

(School of Marxism,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s' covets on the railway in Jiangxi province, Jiangxi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established the Nanyun railway company and began to construct the Nanyun railway from Jiujiang to Nanchang in 1904. The Nanyun railway was opened to traffic in June 1916. However, due to capital shortage, poor management, Japanese debt pressure and the impact of turbulent times, Nanyun railway became "the only one losing money" in the country. The historical fate of Nanyun railway showed that in modern China, a poor and weak country surrounded by foreign powers, Chinese national capital enterprises had great difficulties i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due to the oppression of foreign capital imperialism and the disturbance of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refore, sovereign independence is the first premis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capital enterprises.

Key words: Nanyun Railway; deb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ight of Nanyun railway

1918年青年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述论

申海涛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就所谓“共同防敌”问题,展开秘密谈判,并最终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交涉内容被披露后,全国各界纷纷反对。留日学生组织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在日留学生罢学归国,参加救亡运动。国内学界也立刻掀起了抗议风潮。1918年反日学生运动虽仅持续数月,且未能阻止中日签约,但学界通过此次斗争实践得到了极大锻炼,为五四运动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青年学生;反日运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3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67-06

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许德珩曾经说过,“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备受压迫,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1]44}。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觉悟的群体,学界1918年掀起了以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目的的相当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通过此次斗争实践,广大青年学生得到了极大锻炼,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1918年中日关于共同防敌事宜的交涉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

1918年3月23日,北京政府代总统冯国璋以大总统名义,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令准王士珍辞国务总理职。^[2]辞职四月余的段祺瑞第三次组阁。组阁完毕之后,段祺瑞决定对川、湘、粤各省用兵,第二次南北战争开始。

为达到“武力统一”的目的,段祺瑞政府在外交上奉行亲日政策。1918年北京政府的大量借款中,多数来自日本。1916年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提出以“日中经济提携”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企图以经济方式对华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资本过剩,亟欲于海外求出路,通过大量对

华投资,日本既可获得利权,兼可转移华人对日之恶感,其实质是“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地化”^{[3]108-109}。

进入1918年,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后,沙俄势力崩溃,日俄同盟瓦解,远东政治格局剧变。取代原沙皇俄国在中国北满的地位,并乘机谋取西伯利亚,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12月,日本向英、法、美等国建议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以保障西方列强在该方面的利益,同时要求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与现存条约,以及日本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渔矿森林等权益。^{[4]124}英法两国于1918年1月表示同意,但美国反对。为消除美国反对借口、达到出兵西伯利亚、称霸东亚的目的,日本积极“邀请”中国共同出兵。2月5日,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访问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共同防止德国势力东渐,称“德俘在西伯利亚一带不下十余万人,一旦解放,即成劲敌。此时维持东亚和平,其责全在中日两国。……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因此,请“速密达军事当局,熟筹见复”,并声明“事关军事……务祈万密不宣”^{[5]13}。同时,日驻华使馆也多次向北京政府探询中国对此事态度,中国

收稿日期:2020-06-23

作者简介:申海涛(1978—),男,河北高碑店人,博士,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史。

政府给其答复为“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3]242}

1918年2月23日，章宗祥以非正式声明形式告知日本外相本野一郎中国的立场。本野声称：“中日提携，对待俄德，实系为东方大局起见，出于至诚”，“既有共同防敌目的，即不当先分畛域”，深望“中国当局放开胸襟，勿以从前之日本相视，切实共同提携，不胜切盼。”^{[6]929-930}26日，田中又一向章宗祥提出关于军事协定的两项办法：“一、先由两国外交当局结共同行动之协约，其余军事布置由两国军事当局再商；二、先由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外交当局但予认可，俟时机再订”。田中同时还表示“此两种办法，惟中国自择。但此时情势，其意以第二办法为敏速，并可免第三国之猜疑”^{[6]930}。北京政府在经过详细研究后于3月2日致电章宗祥，称“拟即采取第二种办法”^{[3]245}。

3月8日，日本外相本野一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称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应“迅速决定实行”，主张先定外交手续，草拟换文大纲，然后再由两国相关人员协定详细内容。外交手续上，本野称“用书信式，或用条约式，均可”，如用书信式，由中国先致日本，或由日本先致中国，“均听中国政府意见决定”；“若用条约式，渠意此种条约与从前日俄协约等相同，可不必经批准手续。至发表与否，亦听中政府意见”。本野同时还将换文草稿交予章，促北京政府照此草稿拟定换文，其内容为：“一、中国政府及日政府，因德国势力浸润极东地域内，全局和平及安宁被侵迫时，为适应其情势起见，协同考量应行之处置；二、依前项所述，经两国政府合意后，因实行应行决定之事项，凡两国陆海军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该当局官宪对于相互厉害问题，应互相详慎诚实随时协议。”^{[5]30-31}当日，章宗祥即将本野所拟的共同防敌条款转呈北京政府外交部，此后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换文，即以此为蓝本。

经过双方多次磋商后，3月25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就“共同防敌”问题在日本外务省互换照会。以3月25日换文为根据，北京政府与日本就所谓“共同防敌”问题，各派委员在北京组织委员会，展开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经双方议定后通过国务会议交参战督办处于5月16日正式签字。^[7]19日，《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在北京签字。协定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

同派遣之。”在协同作战期间，中国军事当局应提供运输、原料、通讯、情报、地图等便利，等等。^{[3]253-256}可见，《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根据该协定，日本于8月2日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后，即令其驻扎满洲铁路沿线的第七师团向满洲里推进。^{[8]3273}在未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擅自派兵入驻中东路，并宣布进入中日共同防敌态势。此后，日本源源不断派兵进入东北地区，至10月间，仅驻北满的日本军已达7万之多。但是，在武装干涉苏俄失败后，日本又拒绝按协定规定撤军。这就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埋下了祸根。

日本为掩人耳目，避免暴露其侵略本质，一直主张中日之间的交涉应秘密进行，但还是逐渐被外界所知。1918年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披露中日共同防敌换文内容，说“若中国签署这一协定”，“是自己实现”“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条。^{[9]135}从4月开始，国内各报纸又不断刊出关于中日军事协定的零星消息。4月17日，北京《晨钟报》以《中日交涉问题》为题，揭露有关中日军事协定的消息；24日，上海《时报》又以《中日密约》为题披露密约内容二十条。^{[9]136}其后，在5月19日《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的当天，北京《大中华日报》则将中日军事协定的全文一举刊出。次日，北京各报纷纷转载。其“刊出之协定条文，除文字稍加改动外，与协定文本基本一样”^{[9]139}。

自中日交涉内容被披露以后，一时间“中外喧腾，举国惊骇，奔走呼号，一致反对”。商界不断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公开中日交涉内容，并请拒绝签字。4月23日，上海三十七个商民团体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谈判军事密约。^{[9]137}5月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对于中日新约，请“严词拒绝，以救危亡”^{[5]120}。9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再电北京政府，坚决拒绝承认中日协定，称：“倘不先行公布，秘密签字，全国商民誓不承认。”^{[5]127}在得知《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字后，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又一次致电北京政府，称“报载中日新约，业已签字，群情惶惧万分。如果属实，全国商人誓不承认。”^{[5]146}教育界对中日交涉问题也密切关注。5月1日，江苏省教育会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外交部、教育部，请宣布中日协约内容，“并请审慎交涉，以固主权”^[10]。随着中日交涉问题而引发的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的日益高涨，16日，江苏教育会再次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外交部、教育部，请“速宣布取消以平众怒，并使爱国青年不至以忧愤废学，全国幸

甚,学界幸甚。”^[11]总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救亡运动。不过,总的来看,在此次反日运动中,虽然各界都参与其中,但走在最前列的是广大青年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

二、“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的成立与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

从4月中下旬开始,留日学生对于中日军事协定,“渐有所闻,遂群情激愤”。4月28日,留日学生召开大会讨论中日交涉问题,认为此次交涉“较民国四年(1915年)的二十一条尤甚,国家存亡之秋,必须有所行动。乃决议全体归国,唤起国内舆论,一致反对”。^{[6]983}日本东京各官立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于5月3日议决罢课,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随后各私立学校及在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9]183}罢课学生先后分别集会,散发传单、檄文,呼吁留日学生界采取一致行动,以救国家危亡。在其发布的《警告大中华国留日学生全文》中,开头即以“倭奴之野心!!! 亡国之惨祸!!! 诸君,其速归祖国!!! 速救祖国!!!”等醒目语句,激励同学奋起斗争,制止签订亡国密约。^{[12]177}

除罢课外,留日学生还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留日学生罢学归国。1918年5月5日晚,留日学生各省同乡会会长与各校学生会会长及代表在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大高俱乐部召开联合大会,正式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并议决大纲。救国团设“干事、副干事各一人”,之下分设5部,分别为文书部、庶务部、会计部、招待部、纠察部。会议议定该团“由各省同乡会会长或者其代表及各校同窗会会长、或其代表组织之”,“团员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6]984}。为便于展开活动,救国团还派出“先发队”前往上海、北京,并设本部于上海,同时在东京、天津、北京以及各省分别设立支部,以便展开活动。^{[6]984}会后,日本留学生归国分为三起,一为由总干事王兆荣、副干事张有相为首的向上海之先发队,一为副干事阮湘、王希天为首的向北京之先发队,一为直接回本省者。^[13]

5月12日,留日学生在上海法租界设立救国团本部。同时,救国团还颁布自治规约以约束团员行为,要求:一致对外绝不干涉内政;束身自爱保全高尚人格,不得有嫖赌及其他不正行为;本团团员务以勤俭质朴,极力摒除浮华恶习;对于本团有维持拥护之责任,不得败坏全体名誉及滥用本团名义;对于本团服务之外,有暇时,仍需勉学如常,不得荒弃学业。^[14]28日,在沪留日学生代表会议决,积极联络各校一致行动。^{[6]992}

5月13日,留日学生一支先发队阮湘等设立救国团天津支部,与上海的总部南北呼应;14日,与天津《益世报》接洽两次,与天津各学校接洽,均表欢迎。^[15]15日,部分留日学生抵达北京,随即到访各报馆,如《中华新报》《晨钟报》《北京日报》《益世报》《群强报》等,各报均同意为其后援。^[15]

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发展,救国团东京支部于5月17日发出檄文,劝告全体留日学生尽速回国,参加救亡运动。留日学生归国之议既倡,潮流澎湃,势不可遏。发起留日学生归国之议的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生议决一律归国,其余各同乡会、各学校同窗会等亦均议决一致归国,其将毕业者(6月)亦愤慨于此次之交涉,不愿再留决意相率归国”。^[16]其中,一学生于同乡会开会时,“当场撕去文凭,以表示决心,其他痛哭流涕、慷慨淋漓者,更不乏人”^[16]。除帝国大学外,其他各校留日学生也纷纷响应,陆续归国。5月9日,有中国留学生60名乘由神户解缆之熊野丸回国。^[17]16日,乘船回国留日学生达390余人。^[13]18日,山城丸共载归国学生90余人;19日,归国学生75人乘筑前丸抵沪。^[18]24日,由神户乘淡路丸向天津出发者30余人,同日乘立神丸、筑后丸两船由神户向上海出发者共200余人;27日,乘鹿岛丸由横滨出发赴上海者百余人。^[19]据中国方面统计,其时“留日之3548名学生中,归国者2506人”。^{[8]3222-3223}据日方统计,“截至6月12日,已有1207人回国,至8月回国者达2000人,约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三分之二”^{[9]138}。留日学生归国后即分赴各地,据《申报》记载,“计由陆路乘火车归东三省者四百余人,由海道航归广东、云南者共八百余人,此外未停沪上直归各省者约九百余人,而在沪之千余人,多系籍隶四川、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之人”^[19]。

在反对中日密约的过程中,留日学生成为首当其冲的主力。在得知中日协约签订后,留日学生救国团先后致电各界,望联合起来,一致行动。5月17日,救国团致电天津商界联合会,称:“密约闻已签字,国民誓死不认,诸公迹近都门,请速设法挽救,本团‘联络沪上各团体’代表不日来京,共筹取消方法,以救危亡”;同时,救国团还致电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教育会、商会,望能“飞电政府,为民请命,支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扶危定难,郅治保邦”。^[20]同时,罢学归国之后的留日学生还在国内各地学生中进行串联,组织领导并参与了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

三、学界反日爱国运动的兴起与沉寂

1918年4月,中日交涉内容被零星披露,学界

立刻掀起了抗议风潮。5月20日,北京各报纷纷刊出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后,留日回国学生李达、龚德柏、王希天、阮湘与北大学生中之爱国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联系,商量决定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

5月20日晚,北京大学在校内开救亡会,全体学生两千余人均到会,留日学生代表亦与会。开会后,“发诚挚沉痛之演说者颇多,并有在场痛哭泣下者,当即决定与留日学生取一致行动”,其具体办法为,第一,全体学生于21日上午9时齐集总统府,“由代表数人晋谒总统,恳求勿为盖印,并将条件全文速为公布”;第二,与全国商会联合会接洽,“筹商提携进行”^[21]。北京大学在其时俨然已成为“中国最高之学府”,学生向不干预政治,此次“因外交问题激动如此,诚教育界之极大事件”^[21]。

5月21日晨7时,北京大学学生会集一处,“呈全体请假单请求准假一日”。校长蔡元培拟设法劝阻,“惟众意谓校长自有苦心但终不能不依据旧进行”,于是,“校长去而全体学生整队出发”^[21]。上午9时,北京高等师范一队约二百余人最先到达总统府前;10时,北京大学全体一千六百余人抵达,随后工业专门学校一队也如期抵达。此时“共聚集二千余人,俱静肃待命,不闻笑语之声,此一种严肃之光景,盖北京空前所未有也”^[21]。三校到齐后,即举定代表北大段锡朋、雷国能、许德珩、王政、易克蕤、方豪;高等师范学校刘裕房、刘昂、熊梦飞;高等工业学校朱发祥、鲁士毅、邓翔海、夏秀峰等13人晋见大总统。^[22]冯国璋最终于12时在怀仁堂接见各代表,其对学生代表“最初略加训责,谓学生不宜干预外事,继询秩序好否,又问近日来此各校长等是否同意”,谓“此次中日共同出兵条件乃两国军事委员为军事便利起见,双方所定之契约经国家许可有与两国政府条约不同,故无须元首盖印即完全发生效力,勿盖印一层不成问题也。但诸生尽可放心,条件并非如外间所传之甚,绝无丧失主权之处”;随后“由衣袋中取出协议原文四纸”,“逐条朗读”,“唯附则数条未经宣布”;最后,冯令学生“速行退校,照常上课”^[21]。诸学生鉴于冯出言“至诚”,于是谢罪而退。法政专门学校全体于12点赶到,故其代表未能参加。当各代表未出之前,“二千余学生轰立烈日中,毫无惰容”,在各代表归来之后,四校学生“乃俱整队归去,时一点半”^[21]。但是,四校学生对得到结果并不满意,归校后随即开会商议之后应取之态度,议决“其一,不以国事废学业,决议自二十二日起,四校一律照常上课;其二,不以求学忘国事,决议课

余研究时事,以保守团结之精神,四校互通声气”^[23]。

北京学生的请愿事件虽收效不大,但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推动了各地学生运动走向高潮。5月22日,南开中学、新学书院、成美学校、德华学校四校学生千余人齐集直隶省长公署,要求见省长曹锐,并求转达政府不承认中日军事协定。四校学生公推新学书院汪旭东、南开中学马骏等3人、德华中学张长治、成美中学沙主培等共6人为代表。^[24]在省长曹锐会见6名代表说明该协约实无关系中国主权后,请愿队伍始渐渐解散。^[25]6月4日,济南农工商法四专校及武术传习各学员各派代表举行集会,议决以全省学生名义致电大总统冯国璋,望其“持以决心,拒绝盖印,借民气之激昂,为撤废之后盾”^[26]。10日,安徽留日学生电恳安徽督军倪嗣冲及省议会等转北京政府,请废除中日密约,以延国命。^[27]⁷²⁶15日,留日学生救国团致电江苏督军李纯并转各省督军、省长,“密约成立,大错已铸,泣恳我公再电政府,坚求废约,外戢强邻之野心,内促当道之觉悟”。^[20]同日,救国团还致电江苏省议会转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称“密约签字,凡我国民,誓死勿认,谨再电请力争”^[20]。17日,广东各校学生在广东教育会召集大会,是日归国的广东留日学生行装甫卸,即全体赴会,留日学生领袖何春帆发表演说,“声泪俱下”地将密约内容详细宣布。会后致电大总统并分电北京、天津、上海各省学生联络一致,并发出通告召集省城全体学生协同向国会请愿。^[28]23日,留学生救国团与上海绅、商、学、报各界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29]⁵⁵⁶此外,福州、湖南、浙江、广西等处学生,亦各联合谒见当地长官,请求代向政府力争废约。

对于学界的反日运动,北京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一再打压。在5月21日北京学生请愿当日,教育部就向直辖各校和私立学校发出训令,同时密电各省行政长官,要求严加取缔所有学生集会和请愿活动。^[30]³⁰⁵22日,教育部长傅增湘又向各校颁布训令两道,措辞极为严厉,“第一,训令系严飭各校校长务令出校各生赶回本校照常上课,不得在外滋事;第二,训令系历述学生求学时期不能干预政治,并谓各校长有管理学生之责,万不可听凭学生再有此种举动”^[22]。同时,教育部还发长文布告训诫留日学生及监督,称“改造个人乃建设国家之根本,而修养学行即诸生唯一报国之道也”,令其“克日东渡,镇静求学,其未经回国者亦互相境策,幡然就校,勿以宝贵之时日供无聊之牺牲”^[31]。28日,教育部勒令

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归国的留日学生，“限于6月10日以前各回原校，违者开除学籍”^{[9]140}。

在重重压力之下，6月17日，留日归国入京学生因活动甚难，议决离京，移支部于天津。^{[6]991}28日，王希天、阮湘等学生代表最后离京赴津，临行时以留日学生救国团驻京支部同人名义发表通函，“吾侪自5月15日抵京，迄今已逾月，心虽谅乎都人，言不用于当局，救国目的，茫如捕风，内疚良心，外惭多士。……至吾侪宗旨，一致对外，不预内争，区区此心，始终不渝，谗人之言，不足恤焉”^{[6]991}。留日归国学生离京后，以北京为中心的拒约运动已基本结束，各地的学生运动开始转入低潮，至1918年10月，学界的拒约运动在坚持约有半年之久后，也基本结束。

四、结语

段祺瑞政府为达到“武力统一”的目的，在外交上奉行亲日政策。1918年中日关于共同防敌问题的交涉及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引起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其中，学界大规模的反日运动尤为引人瞩目。而在学界反对中日密约运动的过程中，留日学生是首当其冲的主力，充当了发起者、领导者、有力参与者等多种角色。留日学生归国运动推动了国内学界反日运动的兴起。各地学生发起了相当规模的集会、请愿等运动，坚求废约。但由于北京政府的层层施压，以及学生自身斗争经验、群众基础的缺乏等方面原因，反日学生运动在持续数月之后，最终沉寂。不过，1918年的大规模反日学生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且未能阻止中日签约，但却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学界也通过此次斗争实践得到了极大锻炼。

通过此次反日运动，学界强化了组织观念，各地学生团体纷纷成立。1918年5月21日北京学生“破天荒”的游行请愿运动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32]211}。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1]44}。“几个被推去见冯国璋的代表被冯国璋一场圆滑而兼恐吓的话骗了出来，所有同去的学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着代表回到学校里去了。于是那些热烈的学生，因此觉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33]304}因此，为扩大影响，达到思想、行动上的一致，各种学生组织纷纷成立。6月15日，邓中夏、许德珩等联络北京各高校部分学生骨干分子，发起筹备“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会”。学生救国会成

立后，又分别联络上海、天津、南京、济南等地学生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互通声气，各地学生也都纷纷加入救国会，使学生组织全国化。6月30日，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发起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旨的少年中国学会。其团体之大，一时无两。各种思想的碰撞，学术的交流，使得“五四运动”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深受启蒙。另外，《国民》杂志社也是。10月20日，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之一——《国民》杂志社成立，其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34]49}11月，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集合同好，成立新潮社。总之，在短短几个月内，“各校学生独立自由组织和联合组织的小团体，相继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33]304}。

在成立社团，加强组织的同时，学界还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对统治，另一方面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7月5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由曾琦、张梦九主笔，设“广告”“论说”“公电”“国内要闻”“时评”“日本情势”“欧洲情势”“揭奸录”“专件”等专栏。^{[35]1615}邵力子在当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时评《祝〈救国日报〉》，称：“异日扑灭武人官僚之毒焰者，仍必以舆论为源泉，此今日救国之士所当亟为觉悟者也。……今《救国日报》亦于艰苦困乏中挺身而出，锲而不舍。所能扑灭其毒焰者，又岂仅武人官僚而已。”^{[36]41}此外，少年中国学会先后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两种刊物。1919年1月1日，学生救国会机关刊物《国民》月刊创刊，由许德珩、邓中夏等主持，主要宣传爱国反帝思想。

总之，1918年的反日学生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波及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在运动中，学界涌现出了大批学生领袖，培养了一批革命者；同时，强化了组织观念，且逐渐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认知。至五四运动时期，学界的力量之所以能够震撼全国，并非偶然，此次反日学生运动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 [1]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2]命令[N].政府公报,1918-03-24.
- [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 [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
- [6]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三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 [7]中国大事记[J].东方杂志,1918(6).
- [8]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四册)[M].台北:正中书局,1988.
- [9]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六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 [10]省教育会电请宣布中日协商条件[N].申报,1918-05-03(11).
- [11]公电[N].申报,1918-05-18(2).
- [12]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
- [13]留日学生归国后消息[N].申报,1918-05-20(6).
- [14]回国留日学生在江苏省教育会之谈话:附留日学生救国团自治规约[N].申报,1918-05-26(10).
- [15]留日学生抵京后之报告[N].申报,1918-05-23(11).
- [16]东京通信[N].申报,1918-05-13(3).
- [17]外电[N].申报,1918-05-11(2).
- [18]归国学生新到之人数[N].申报,1918-05-20(10).
- [19]留学界风潮未已[N].申报,1918-06-05(3).
- [20]留日学生救国团之电稿[N].申报,1918-05-20(10).
- [21]北京各学校之风潮[N].申报,1918-05-24(3).
- [22]北京各学校之风潮续闻[N].申报,1918-05-25(3).
- [23]北京大学生请愿后之各面观[N].申报,1918-05-26(3).
- [24]天津学生请愿详记[N].申报,1918-05-26(3).
- [25]外电[N].申报,1918-05-25(2).
- [26]鲁省学界亦反对新约[N].申报,1918-06-05(6).
- [2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1月—6月)[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
- [28]学生团之大会议[N].申报,1918-06-18(6).
- [29]李新.“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一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 [30]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 [31]教育部训令留学生东归之布告[N].申报,1918-05-26(3).
- [32]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33]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34]李景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21—201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 [35]张宪文,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36]傅学文.邵力子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Commentary on the Young Students Anti – Japanese Patriotic Movement in 1918

SHEN Haita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Japan launched secret negotiations on the so – called “common defense against the enemy”, and finally signed the “Sino – Japanese Joint Anti – Enemy Military Agreement”. All sectors of the country objected after the contents of the Sino – Japanese negotiations were disclosed.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set up “Greater Republic of China Salvation Group”, calling on students in Japan to leave school and return to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Besides,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set off a protest wave immediately. Although the anti – Japanese student movement in 1918 lasted only a few months and failed to prevent the signing of the Sino – Japanese con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gained great exercise through this struggle practice,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ey words: Sino – Japanese Joint Anti – Enemy Military Agreement; young students; anti – Japanese movement

层次化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三重内容逻辑

——根本理念、行动体系、优化路径

刘文博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命脉,应当时刻以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底色,致力于筑牢“四个自信”的理论根基。层次化视角明晰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三维着力点:制度、实践、延伸。从这三个主要方向进行逐步摸索,结合具体层面上的“根本理念”“行动体系”和“优化路径”,回答“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有哪些”“如何系统性理解与掌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内容”“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怎样广泛开展”等关键问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层次化;内容逻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4

中图分类号:D64;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73-05

一、问题的提出

(一)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有着历史性的含义。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1]意识形态安全历来被我国视为安全工作的立身之本,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中称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讲究“中庸和谐”的话语体系和共产党人“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工作信条中,出现“极端重要”的形容词汇,足以说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冷战思维”固化,一些敌对势力不惜余力地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活动;在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多样性日益展现的国内,多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垃圾文化”现象突出。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必须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支持。

(二)层次化视角:分析方法和分析对象的耦合

层次化视角,原本是一种旨在提高分析对象效能而进行整体评估、合理分类、归纳总结、演绎推理等步骤的研究思路。其精髓在于“各得其所、稳定有序”地模拟出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损益,在企业文化分析领域中颇为常用。在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许多学者也秉持着或多或少的“层次化”逻辑。有学者就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2]这种观点是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充分解构,明确提及了意识形态安全与制度、实践、规律的关系,倡导用较为细致的观察剖析意识形态安全。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层次。^[3]这样“左右协调、上下相依”的层次观,在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用层次的思想、分类的手段来看待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有着现实基础的。

收稿日期:2020-05-18

作者简介:刘文博(1997—),男,北京密云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公共外交。

(三)旧作与新解: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尚有争鸣空间。一些学者以高校为工作主阵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4]。也有学者指出“网络已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和最前沿”^[5],需要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攻坚战。另有学者语焉不详,没能辨别“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分野,对二者的范围大小、边界有无相对不敏感,以至于最后将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混为一谈。根据这些前人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应该是个立体丰满的多元结合体,而不能只从单一角度去理解分析。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确要以高校为主要阵地,但是否还有其他平台依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近年已成迅猛发展之势,但是否还有其他热点议题?至于将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鱼目混珠的说法,则要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出发,作出厘清和划定。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内容亟须从宏观架构方面给出条理分明的理论主干。制度层面,核定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相关概念;实践层面,建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行动指南;延伸层面,列举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困境出路。

二、制度层面:以根本理念为引领内容

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宗教信仰的安全。^[6]以此观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要以道德、政治和宗教为制度出发点,起到引领作用。

(一)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观

社会主义道德的实质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一切“以人为本”。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认为,真正的人身解放并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应该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解放”^[7]。某种意义上讲,只有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下,个人才能真正回归“原本道德”,抛却抽象的个体物质概念,体现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指引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才能最大限度上保持“不走样、行正道”。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道德观的重要基础在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存在价值在于“平等、自由、权利”的有机统一。以社会主义道德为纲要,可以凝聚人心“最大公约数”、培养无产阶级感情、施惠共产主义事业实践,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打下牢固之基。

(二)坚持党为核心的政治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披肝沥胆、与时俱进,在各个领域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胜利,取得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飞跃。无数不容置疑的事实和深刻隽永的思想铁一般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比优越性。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党为核心的政治观必不可少、至关重要。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斗争复杂、形势严峻,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切实统筹好国内外两个大局、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平稳落实,党的领导是有效法宝,必将带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走向更高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8],它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宗教的形成与消亡,主张宗教发挥其精神层面上的文化活力。存在即为一定的合理,宗教也是人类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的文明成果之一,如果仅从“大众鸦片”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误读,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宗教问题是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难点,不仅因其特殊敏感性质,更因其难以精准把握、一劳永逸。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主要是它认识到了宗教的“二重性”,提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我国宗教政策贯彻中起到了维护中华民族团结、构筑和谐社会的核心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迎难而上的攻坚思维,有助于啃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的“硬骨头”。

三、实践层面:以行动体系为主体内容

(一)以宣传为先导,做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讲述者

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尝试讲好意识形态安全故事。意识形态安全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真正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如影随形。以往,全社会对意识形态安全一如既往地讳莫如深、三缄其口。这样尴尬境地的造成,固然有民众对意识形态安全了解不多等原因,但最大症结还是在于官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宣传力度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9]其中涉及的“话语权”恰恰是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薄弱之处。走出颇有些谈“意”色变意味的

误区,必须把意识形态安全宣传提上日程。

首先,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工作责任。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向党看、跟党走”,把党中央明确过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重心当成个人工作中的“磨柴刀”,提高意识形态安全宣传比重,配合宣传部门整合舆论资源。其次,凝练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工作主题。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决不能止步于泛泛可谈而不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规定设立的“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就是很好的范例和机会,2020年的教育日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宣传丰富多彩,且线上线下相结合、多媒体矩阵协同发声,赢得较高评价。第三,关注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工作效果。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工作,是人民事业,造福千秋万代。任谁都不可以忽略宣传反馈,故步自封当起“甩手掌柜”来。将系列宣传工作走进千家万户,也要收集百家之言,作为日后衡量工作好坏的准绳,作为完善工作的根据和动力。

(二)以感化为手段,做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点金者

精神文明建设,贵在实现心灵融通、感同身受。意识形态安全与个人的精神信仰、行为模式息息相关,折射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历史维度看,东西方势力以思想领域为主阵地,反复交锋,其中尤以国外敌对分子的意识形态渗透最为常见。他们惯于过度美化自身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肤浅地展示出其略有优势的一面,对根本问题和矛盾避而不谈,妄图达到混淆视听、迷惑人心的目标。庞大苏联一夜化为乌有的殷鉴不远,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深入人心正是明智之选。从现实维度看,各种社会思潮奔涌而来,令人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自然热衷于关注博人眼球的价值观念并按此行事,意识形态安全定力仍要保持。如果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宣传还定位于物质层面,那么怎样做到心灵激荡、产生共鸣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则是需要格外关注的成事之要。

第一,提高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软实力”。所谓“软实力”,由哈佛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首提,意指通过吸引和说服使对方受到影响,从而有所改变。展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政策的道义、把正当性和亲和性融入工作始终、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睦相处,可以一定程度上完成这个任务。第二,扩大意识形态安全舆论的影响力。一段时期以来,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合力尚未形成,名正则言顺,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地位迫在眉睫。在理论渊源

上,可以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寻找我国隐蔽战线的光辉事迹,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居安思危”为代表的忧患意识,都能够予人启迪。在传播技术上,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西方传媒集团素以舆论操控能力而著称,我们也应学会包装修饰,在真实无误的基础上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执舆论影响之牛耳。第三,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效用的感召力。“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美人之所美的同时,见贤思齐,不忘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效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呈现出来,才能促使广大民众对意识形态安全产生更为深刻的认知,自觉、自信、自制地抵御其他意识形态的冲击。

(三)以网络为平台,做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维护者

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成就需要借助平台来巩固,网络首当其冲。诚然,网络不是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唯一落脚点,但由于网络平台的独特性质,必须引起足够警惕。一方面,互联网的飞速普及,赋予不可胜数的行为体发表言论、相互模仿的新机遇,成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火热前沿和重要阵地。另一方面,当下网络生态有待整治、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敌对势力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10]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者“新旧兼顾”,重视网络平台中的意识形态安全斗争,化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对期待和呼声给予及时回应,磨砺自身专业科学能力。与此同时,也要对网络言论的特点、倾向、本质了然于胸,坚定意识形态安全信念,毫不动摇地打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的“网络保卫战”。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合法性不容忽视。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加剧了意识形态安全论争的焦灼情景,大量反华反共书籍传单、影音片段横行无忌,将意识形态安全描述为可有可无的虚拟式存在,空心化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传播。此时应该致力于维护良好的官民互动,畅通上情下达的渠道,同心同德,反对动摇意识形态安全根基的无耻行径。另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权威性也恰如其时。近年来,不少网络舆论热衷于炒作他国意识形态的与众不同,逢中必反、巧言令色。试图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逐渐边缘化、话语权逐渐削弱化,曲解我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含义。如此做法值得严肃对待,要正本清源,从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成效出发、双管齐

下,扎扎实实地向沉默的大多数网民诠释出我国意识形态的不可替代。还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持续性必不可少。意识形态不仅是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也是新生事物的催化剂。网络平台中,“吃瓜群众”不在少数,他们可能时而义愤填膺、时而跟风热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也可“阶段性休息”,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无法完全放松,时刻将其作为当下网络交往中的应有之义、纯洁背景,方能临危不乱、处置得当。

四、延伸层面:以优化路径为导向内容

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中,如果说“根本理念”是工作基础,“行动体系”是工作关键,那么“优化路径”就是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升华。

(一)建立“大统战”工作思路,应对“空间”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之间不乏友谊交流的同时,也为冲突和争议埋下了伏笔。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带来便捷的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阶层撕裂。单边主义的抬头使得一些强权国家垄断意识形态话语权,动辄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国内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素养差距依然存在,意识形态隔阂尚未完全消除。因此,在空间角度上,需要统筹处理好“国际、国内”两个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战场、弥合自身存在的价值观分化。

所谓的“大统战”思路即是正确处理“国内”与“国际”的意识形态安全舆论场关系,正确对待国内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差异。以突发公共事件为例,国外敌对势力不惜一切手段来大肆抹黑我国意识形态,甚至有相互串联、共同施加压力的情况,国内难免受此波动影响。培育国内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提升传播技术专业度,在防止这种“言论倒灌”现象的同时,争取在国外展示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应该树立如泰山压顶一般的“高势位”姿态,再也不能过分容忍一些不负责任的个体散播不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荒谬言论,蛊惑人心。与此同时,也要推进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事业,凝聚广泛共识、自强不息,将意识形态安全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二)建设“长效度”工作机制,应对“时间”挑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一项“时间工程”,不允许中途而废、浅尝辄止。从改革开放初期起,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坚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直到现在仍未从根本上扭转意识形态淡化的局面。^[11]

事实是残酷的,但它反而使我们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不足和缺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总结历年来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得与失,看到时间因素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的主线作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仍大有可为。

要建设合理有序的工作机制,关键是要瞄准“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最大常量,坚持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活动力。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法律法规、文艺思潮等。以这些领域为抓手,多维覆盖、精准施策。除此之外,也要建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奖惩制度、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切实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不会因为人事变动等因素失去前进动力、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要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将党的领导和正面宣传与奖惩制度和应急制度相结合,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永葆青春、毫不变质。

(三)健全“人文关怀”工作理念,应对“人间”挑战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经提到过,“在保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归根到底,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一项捏合人心缝隙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意识形态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12]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概莫能外。

近年来,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跨文化传播事业蒸蒸日上,世界愈发成为一个“地球村”。渺小的个体价值观尚且不尽相同,作为民族集合体的国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各有侧重则更为正常不过。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与一些西方国家强调的“个人至上,绝对自由”根本不同的价值观新参照,展示了海纳百川、和合共生的包容性与自信心。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经成为重要国策,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建设布局的重要一维,这是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的强大支撑和重要契机。^[13]每种意识形态都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求同存异是必然趋势和规律。如此便需要我们保持厚重的“人文关怀”,创新意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推进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和大众化。坚持用耳熟能详的活动来吸引人、用可歌可泣的精神来培养人。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隐性引导出发,春风化雨般地完成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赢得

最为广泛的认可和肯定,从容不迫地获取大众支持,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掬得一捧清清水的根源之水。

五、结语

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不应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等量齐观,应该用层次化的视野来看待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可以抽象地看作是政治观念安全、道德文明安全和宗教信仰安全。而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则范围更广,不仅局限于主体的政治观念,也要确立客观的系统行动架构,在发觉问题之后,提出优化路径。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政治观和宗教观;把宣传讲述、细化深情作为工作行动的参考;及时认清以网络为首的新平台所带来的利弊;独占“天时地利与人和”,实现空间、时间和世俗的三重维度把控。如此才是一个完整的工作闭环,利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开展,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治久安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任凭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敌对势力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只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就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气概和魄力,就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念和定力。

参考文献:

- [1]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52.
[2]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

2007(1):126.

- [3]王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9(4):30.
[4]高世杰.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几点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6(5):43.
[5]王善英.推进“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3.
[6]田改伟.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政治学研究,2005(1):2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陈荣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含义的阐释[J].浙江社会科学,2007(3):3.
[9]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述评[EB/OL].(2018-08-20)[2020-05-10].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0/c_1123298689.htm.
[10]徐天亮.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N].人民日报,2008-11-10.
[11]罗嗣亮,郭文亮.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改革路径: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J].理论学刊,2012(4):92.
[12]陈全国.以敢于亮剑的精神确保西藏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求是,2013(21):20.
[13]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4):72.

(责任编辑 许峻)

Triple Content Logic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erarchy

——Basic Concept, Action System and Optimization Path

LIU Wenbo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lifeblood of political security and cultural security. We should always take ideological security as the background, and strive to buil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four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erarchy, the three-dimensional focus points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work are clarified: system, practice and extension. The paper explores gradually from these three main directions, combining the specific level of “basic concept”, “action system” and “optimization path”, answering the key questions of “what is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work”, “how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work”, “how to widely apply ideological security work” and so 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security; stratification; content logic

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特点、负面影响及管控

——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为例

刘 静,景庆虹*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危机已成为当今社会中的一种常态,危机传播管理是危机应对中的重要内容。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为切入点,通过对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四个特点进行研判,进而对自媒体背景下的民间舆论场在危机传播中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文章最后为政府如何更好地管控危机中的民间舆论场,提出了善待、治理、借用和引导等四项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危机传播;民间舆论场;新冠肺炎疫情;自媒体时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5

中图分类号:G206;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78-06

危机,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为流行的热词之一,至少基于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类遭遇到愈来愈多的危机袭扰。各种人为的非人为的、一般的重大的、内部的外部的事件、灾难,经常地、频繁地发生在我们身旁。二是在主观认知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危机日趋常态化、公共化的时代中,如何应对、处理、解决、战胜各种危机,业已成为人类如何生存、发展的重要议题。

当下,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一次世界性的、具有严重危害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截至2020年6月29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突破1000万例,死亡人数超50万例,平均病死率约为4.95%。面对肆虐的疫情,研究、探讨危机过程中的传播应对,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相关的概念的解析

危机到底是什么?至今在学界并没有权威的定论。危机作为一种能被人们感知、体验的现象,其存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正是在同各种各样危机的抗争与博弈中进化、发展的。危机现象是古老的,但对危机的探究则需放眼近代,无论是1982

年的美国强生公司“泰诺”事件,还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即便追溯到1947年美国政府成立的“危机小组”,也不过七八十年的时间。^[1]

危机的界定繁多,最早的如C. F. 赫尔曼所言,“危机是指一种情景状态”,^[2]巴顿认为危机是“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3]较为经典的如乌里尔·罗森塔尔的定义“危机是一段剧变和集体紧张的时期”,^[4]国内学者则将危机一般解读为某种“事件”“状态”“结构”“变动”等。

在研判诸多危机的解释后,我们更倾向将危机看作是一种状态。危机可以定义为:由于各种内部或外部原因,引发事物发生剧烈变化并造成结构破坏的一种状态。这也更接近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创造“危机”这个名词的本意,即危机是指“决定以求转机之状态”^[5]。

这个界定,可以延展出危机最为主要的三大特征:其一,突发、剧变性。其二,破坏、危害性。其三,关注、扩散性。因为危机本身突发性的剧变,造成对事物内外部的破坏、危害,必然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与扩散传播。因此,危机传播及其研究也就成为人们应对、解决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收稿日期:2020-07-20

作者简介:刘静(1996—),女,山东潍坊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信作者:景庆虹(1958—),男,北京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

于此,我们论及的传播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信息的传输,即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其二是指人的社会交往,即传播的本质。在此前提下,我们对危机传播界定如下:危机传播是指在危机状态下,相关组织、媒介与社会公众之间交流信息与协调关系的过程。这个界定旨在强调传播在危机状态中主、客体之间的信息传递与社会交往的双重功能,这对我们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危机传播的本质特性,进而更好地管控、战胜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危机传播作为传播中的一类,同样与谁传播(主体)、怎样传播(媒介)、传播给谁(客体)、传播什么(内容)、传播结果如何(效果及反馈)五大要素直接关联。所不同的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演进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手里都有“麦克风”、个个都能当“新闻发言人”的自媒体时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网民规模为9.04亿个,网络新闻用户达7.31亿个;手机网民8.97亿个,手机上网比例达99.3%。在这种背景下,信源、信宿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其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信道媒介也变得更为宽泛和多元,而以网络平台风头最甚。信息内容变得包罗万象、五味杂陈,真理与谎言同在。而就传播效果而言,也呈现出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情景和结果。

对比传统时代和自媒体时代,危机传播中与五大要素相关的内容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详见表1),尤其是危机传播中形成的民间舆论场,对危机期间的舆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会导致舆论暴力的出现,继而引发次生危机。

表1 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在传播要素中的区别

	传统媒体时代	互联网时代
传播主体	政府组织	每个人
传播媒介	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记者、新闻发言人等	移动互联、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网民等
传播内容	官方宣传,正面信息	评论、分析、吐槽、调侃、质疑、批判等各种信息
传播对象	传统媒体的受众	社会网络公众/群体
传播效果/影响	官方舆论场一家独大/正面效应	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博弈/正面、负面效应并存

舆论,是指公众对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6]。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对具

体事物的认识与解读、看法完全一致,而是必然持有不同的观点,这就使得社会舆论有了“官方”和“民间”之分。由于两种舆论的利益指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舆论主流价值观的官民认同。但由于理论认知的差异、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和信息掌握的不对称等因素,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两种舆论也会形成失衡、对峙与冲突。

从传播媒介角度而言,官方舆论主要通过党的报纸刊物、国家广播电视台、通讯社以及政务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民间舆论则主要通过民间人际交往、社交网络平台(如私人微博和微信、QQ、抖音等)进行传播。这就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二者共存同在并且相互博弈兼容。在危机发生情景下,公众的知情、参与、平等互动意识瞬间膨胀,民间舆论流量陡然增加,张力持续放大,导致极端舆论行为发生,可能部分甚至全部冲破原有的社会舆论框架,引发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矛盾的对抗。因此,对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研究、分析及应对,理应成为当务之急。

二、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引发了社会公众极为广泛的关注,不论何种动机与目的,草根阶层的出现、带来海量言论信息,形成了空前的危机传播民间舆论场。黑格尔指出:“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7]民间舆论场正是黑格尔所说的“真理”与“错误”并存的公共舆论平台。现将其鲜明的表象特点解析如下。

其一,自发性与主观性:自主发布;个人所为。

民间舆论传播的主体是社会上的庞杂群体,从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社会公知,到意见领袖、网红主播、草根民众各类人等,应有尽有。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上述人说不说、什么时间说、说些什么、说多少、对谁说,完全是个人行为,无须旁人过问。这种自发的传播,带有极强的主观臆断色彩。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公众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各种敏感信息都会被受众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迅速扩散、发酵,引发连锁反应。从李文亮事件看,无论李文亮等8人在微信群中讨论什么,无论当时提到的“SARS冠状病毒”日后是否真实存在,也无论他们在群中传播的动机与目的如何,其造成的结果则是敏感内容通过网络进入公众视域,瞬间会成为舆论热搜,无意中的个人行为便演化成现实中的大众传播,成为舆论场中的热点。

李文亮“吹哨”,众多网民转发,其本意都是提醒亲朋好友引起注意和警觉,自发参与、主观判断色

彩不言而喻。

其二,趋同性与随意性:主流正向;随感而发。

就理论而言,民间舆论场汇集的主流声音应为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因为公共危机事件牵扯到多数群体的切身利益,利益的一致性,使得舆论会趋于一致。但在现实中,危机本身及政府在危机应对中所呈现出的种种错综复杂因素,加之公众对某个问题认知、理解、评判的角度不同,又会使得不同群体的意见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

例如方方封城日记引发的“方方现象”,支持者、反对者、声援者、讨伐者,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网民“社会撕裂”。一个作家,对于危机及应对有自己发声的权利,而众多网民也有自己对发声人“点赞”或“声讨”的权利。无论是认为她有知识分子良知的“责任心”和“真诚善良”的社会情怀,还是批评她置抗“疫”大局不顾、抒发阴暗悲伤情绪,有“汉奸”之嫌,都使得传播者在网络中形成是非难断、好恶为先的舆论对立。

就整体而言,在新冠疫情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内大量信息是关注、预测疫情发展及趋势,介绍防控、治疗新冠病毒知识,赞扬抗“疫”阻击战中的英雄人物和业绩,安抚、疏导大众的恐惧、焦虑心理。其传播主题是趋同正向的,即支持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带领人民万众一心、战胜疫情。

但由于民间传播的随意性,此次疫情中也有大量臆断疫情、调侃抗“疫”专家、妄议政府、制造恐慌与混乱的不实虚假信息,充斥于民间舆论场中,此类传播虽然不占主流,但其负面影响力不可低估。

其三,及时性与碎片性:弹指挥间;信息零乱。

网络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自媒体性,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自主地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的个人、群体或者不确定的大众传递信息,每个人都能够在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时空里,成为某条信息的发布者或者转发者。移动互联平台的普及和5G技术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遗风古训;改革开放以来公众对各类信息,尤其是负面消息的敏感度、关注度的迅速增强,这些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自媒体在各类热点事件,特别是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传播中,越来越多地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无论是网络大V还是普通民众,往往在“第一时间”就成为相关信息的发言人,短时间内,依靠亿万网民的发帖、灌水、转发、置顶、评论、热议,网络舆论迅速发酵,上演传播的“生死时速”,形成强势的危机时期民间舆论场。

民间传播的这种及时性,使得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取到的不是官方信息,而是网民的各类言论,首因效应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们陷入这样一种危机传播现状:四小时,敏感言论极速扩散;六小时,男女老少路人皆知;八小时,传播主题指向明确;十二小时,民间舆论道德审判;二十四小时,事件人物已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在民间传播中,由于传播主体的信息来源、认知程度、表达能力、沟通水平等诸多因素受限,使得其传播的信息内容往往是不连贯、不统一、不完整、不系统、不全面的,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带有极大的模糊性。这种支离破碎、断章取义、各取所好、盲人说象的传播,其结果往往是让受众无法了解危机事件及应对的真实情况,从而极易误导公众进入舆论盲区。

民间传播的及时性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在第一时间知情的心理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危机预警与及时防范的作用。但是大量零乱散碎的信息,又会造成传播内容的残缺、片面和混乱,继而导致许多信息严重失实和极不确定。全时全域,群体互动,即时反馈的网络“快递”,辅之“眼球效应”的非理性盲从,更使得“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实效性的大量不实误导信息的急速扩散性共生并存。

其四,民粹性与失真性:全民传播;真伪难辨。

美国学者欧文·戈夫曼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表演,“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是演员”,其中有“误导的表演”,也有“神秘的表演”^[8]。民间舆论场就像一个舞台,网民则是不同角色的表演者,在同一个场域中上演一出悲喜剧。

首先,转型时期,各阶层、群体之间的现实利益很难统筹兼顾。政府与公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和理解不同,会直接导致人们对政府及社会的不满,这种情绪的宣泄方式之一就是网络吐槽。其次,公众民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为维护个人权益发声,积极为社会治理建言,希望与政府平等对话,这一切诉求,在网络世界里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和满足。最后,由于我们许多具体制度和实施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官方与民间沟通渠道的单一且不流畅,人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等理念很难实际落地。因此,公众选择门槛低、速度快、影响大、范围广泛的网络平台进行言语表达,通过所谓“信息支付”与“政府权威”对话已成必然。^[9]

作为与官方舆论场相对独立且带有对立、冲突倾向的传播场域,民间舆论场中“充满片面、怪诞、

过激、虚妄的社会意见盛行,歪曲客观事实真相”,全凭主观好恶质疑,批判,攻击的民粹意味,“如果发展到极端,很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10]。

三、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负面影响

从历史上看,“两个舆论场”作为中国社会舆论传播的场域空间,是一种客观存在。传统媒体时代,官方舆论场一方独大,民间舆论场势小力弱。伴随着改革开放政治生态的形成,加之网络媒体的快速崛起与发展,两个舆论场的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汤普森所言,现代媒体的发展带来象征形式生产、流通及其意义的变化,既是一种结构上的颠覆,也是社会价值的重构。^[11]自媒体时代,民间舆论场从隐性状态进入到显性状态,尤其在网络媒体上,其能量不断增强,影响力急剧扩张,在话语权竞争、舆论形成与传播、社会价值观导向等诸多方面,对官方舆论场形成了空前的挑战与冲击,同时也对整个中国舆论场产生了巨大的正、负面的双重影响。我们重点就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负面影响,分析解读如下。

其一,对消极情绪和负面舆论的叠加与放大。

如果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民间舆论场未得到有效的引导,社会负面舆论将会被无限制地放大,偏离官方舆论场的主流方向,造成人们思想领域的极度混乱,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12]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威胁每一个人生命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谈新冠病毒色变的语境,生死攸关的严酷现实,使民间舆论场中的非理性情绪占比明显居多,凭借自媒体的叠加与放大效应,这种情绪的膨胀会造成公众舆论的极端负面化,成为疫情危机事件中引发公众恐慌心理的“助燃剂”。

例如,方方的封城日记中写道:“一个女儿跟在殡葬车后号啕大哭。妈妈死了,被车拖走,她无法为其送葬,将来或许也不知道骨灰在哪。”再如,“更让人心碎的,是我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让这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仪馆扔得满地的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已化为灰烬”。诸如此类的悲情陈述,被网民出于同情、怜悯、悲愤或其他心理,迅速传播到各大社交网络平台,以致大量没有接触方方日记的网民,也竞相转载、评论,使得民间舆论场中的消极情绪持续急剧扩散,负面信息的影响力被增强,“在裂变式循环传播过程中形成‘蒲公英效应’”^[13]。

其二,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组织的不信任感。

自媒体时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不再依靠单一的

传统传播载体,一部手机就可形成“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民间舆论场。在很多危机情况下,官方媒体还未得到第一手资料,普通百姓便已经发布新闻实况,开始引导社会舆论。例如,新冠疫情初期,就是因为有医生发现并传递医院病人所携带的可能是高传染性病毒的信息,民间先有了“发哨人”和“吹哨人”,进而才引起官方的关注。

从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信息,到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被公安机关警示和训诫,再到感染新冠病毒住院,表示康复后尽快回到一线不当逃兵,直到因新冠肺炎不治去世,大量有关他的文章、议论、跟帖、视频在民间舆论场中炒得沸沸扬扬,大多都是对政府的猜疑、不满和指责。反观官方舆论场,由于各种原因对这样一个危机传播中的焦点人物少有评论,直到3月19号,新华社公布对李文亮事件的调查结果,这时距离2月7号李文亮不幸病逝已经40天有余。

官方正面信息传播的严重滞后,其“不能说,不敢说,不好说”与民间传播中的“抢先说,随意说,反复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明真相,捕风捉影,主观臆断下的负面情绪,极易造成公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感,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鱼龙混杂的信息传输成为谣言传播的推手。

随着“有图有真相”原则的盛行,民间舆论场逐步进入以“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为主要特征的后真相时代。^[14]网络技术为公众提供信息的无限传输和迅速传播的“准入”机会,自媒体主体自身私人化、平民化的特点,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引导、把关力度不足,使得各类海量的不实信息混迹于公众舆论当中,其最为典型、影响最恶劣的莫过于谣言信息的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民间舆论场中出现了许多不理性、不真实的声音。例如,借钟南山、李兰娟等知名专家、学者之名编造各种离奇段子,谎言惑众;以李文亮医生不幸殉职之事,歪曲事实,向政府发难;利用公众对疫情的恐惧心理,散布极端负面的谣言;为博公众眼球不问客观真实,刻意炒作不实信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则盲目信谣传谣,甘当“手指党,”在“病毒式渲染气氛”中“娱乐”狂欢。这种极端“去权威化”的失真传播,使危机中的民间舆论场增添了更多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四、对政府管控民间舆论场的政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规定:公民“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

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2020年3月1日，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标志着网络安全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2016年2月19日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5]。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曾八次提到“互联网”，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实现新时代下的“网络强国”^[16]。2020年2月3日，习近平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17]。

可见，党和国家对互联网的建设与管理十分重视，已经提升到了能否“长期执政”的政治高度。尤其是在危机事件中，政府对舆论传播的治理和管控，直接影响到危机应对的成效，亟须我们认真对待。基于此，我们针对危机中政府对民间舆论场的管控，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积极善待民间舆论场。

政府要树立正确的传播理念，积极支持、善待民间舆论场这一新生事物，真正把民间传播当成中国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提倡广大网民以多元主体角色，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保障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鼓励大家愿意说话，敢于说话，积极说话，实现民情民意的充分表达。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一充分发扬人民言论自由的原则，在当今网络时代依旧是政府正确对待多种舆论、不同声音的行动指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更好地服务群众，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作风。努力倾听民间舆论场发出的各种声音，了解掌握草根阶层真实的信息，并给予及时的反馈，从而更好地实现官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关系协调。

第二，科学治理民间舆论场。

民间舆论场作为相对独立的传播场域，其传播主体、渠道、内容、对象、效果等都与官方舆论场存在明显差异。由于民间舆论场在传播过程中带有明显的自发、随意和失真等特点，大众的激情被转化为愤怒和宣泄，精神被冠之以“恶搞”和“戏谑”^[18]。因此，政府必须要对其加强依法管理并做到科学治理。一方面，利用好法律的强制性。国家要制定出一系列针对性强、约束力高的法律法规，依法治网，使广

大社会公众知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另一方面，运用好道德的约束力。政府要积极倡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理念，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提升民间舆论场中网民的整体素质，使社会公众实现从自发随意传播向自觉正向传播的转变，还民间舆论场一片净土。此外，政府还要根据民间舆论场的发展趋势，因时、因地的出台各项科学合理、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危机传播中，当好民间舆论场的“守望者”和“把关人”。

第三，充分借用民间舆论场。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2年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虽然不能简单套用于中国的民间舆论场，但民间舆论场提供了私人聚集的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的言论，真实的带有自由辩论、充分交流和理性批判的成分；继而形成的公共舆论也会对政府组织及公共权力产生有效监督。^[19]就以上三点而论，民间舆论场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的基本要素，完全可以成为与官方舆论场同频共振的民间发声重要公共平台。危机发生后，政府可以利用如意见领袖、舆论达人、两微大V等信源可信度高的群体和个人，发布正确导向的信息，引导民间舆论场中大部分具有不稳定倾向的网民步入舆论正轨；还可以充分发挥明星网络明星粉丝数量多，受众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影响大、效果好的优势，实现传播过程中的趋利避害。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借用民间舆论场的力量，挖掘其中的有效信息，发挥其正能量的最大价值，使其成为官方舆论场的有益补充。

第四，有效引导民间舆论场。

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提出的“三级模式”理论认为，政府、媒体和公众构成的“三级”，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要想构建理性的“公共领域”，抵抗负面的、消极的舆论侵袭，就要平衡好政府、网络媒体和公众这三个不同的话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这“三级”中的特殊地位，即主导和引领作用。各级政府组织必须要对民间舆论场中“人的思想与意识进行正确引导，真正为公众营造一个和谐、多元、民主且充满活力的舆论空间”^[20]。具体到危机传播管理中，政府要做到第一时间公开信息，让民众听到并且相信真实的声音，尽可能避免谣言先于真实信息散布传播。要不间断地把危机事件最新进展公布于众，彰显官方的权威声音。同时还要针对民间舆论场中的不实、错误信息，及时予以纠正，引导、影响民间舆论趋同主流舆论的基调，使得官民两个舆论场尽可能相互融合。以体制内传播

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主导性吸收、化解和改变来自体制外传播的挑战性因素,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引领过程中,让中国舆论场整体更加客观、真实、透明与健康。

五、结语

民间舆论场的发展于我国整体的舆论环境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以新冠疫情为例,在此危机事件爆发后,表现出及时性与自发性,即事物本身具有的矛盾性。由此,政府要清晰地认识到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特点与影响,不仅要民间舆论场中的各类信息进行研判和监控,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加强对不实信息的管控与治理;也应借助这一民意表达平台积极地与社会公众进行线上互动,合理、有效、正确地引导和挖掘民间舆论场中的有效信息,实现治理管控与良性互动的有机结合。在此过程中推动我国政府治理模式革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最终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来向武,王朋进.缘起、概念、对象:危机传播几个基本问题的辨析[J].国际新闻界,2013,35(3):66-73.
- [2] HERMANN C F. International Crise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M]. Free Press, 1972.
- [3]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18-19.
- [4] URIEL R. Crisis Decision Making in The Netherlands [J]. Netherlands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 Vol. 22.
- [5] 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 [6]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1.

- [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3.
- [8] 杨礼雕.社会热点事件舆论场的博弈与融合[J].甘肃社会科学,2015(4):189-192.
- [9] 韩志明.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理解“闹决”现象的二维框架[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42-54,155.
- [10] 涂光晋,吴惠凡.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台”:“人民网”意见表达与整合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1):23-29.
- [11] 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铨,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 [12] 王海霞.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场的主动权[N].吉林日报,2017-04-07(008).
- [13] KUANG W. Social Media in China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142-145.
- [14] 李良荣,袁鸣徽.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新业态[J].新闻大学,2017(3):1-7,146.
- [15] 习近平.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1).
- [16] 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八次提到互联网[EB/OL].人民网,2017-10-18.
- [17]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4-12.
- [18] 胡百精.新媒体语境、危机话语与社会性格[C]//彭兰.中国新媒体传播学研究前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9] 李阳.新媒体视域下多元舆论场的博弈与融合[J].江汉论坛,2016(8):134-139.
- [20] 彭鹏.网络舆论调控的政府作为[J].青年记者,2014(26):83-84.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Characteristics, Negative Influence and Control of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CP

LIU Jing, JING Qingho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risis has become a normal state in today's society,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risis response. Taking the NCP crisis as the entry point, we studied and judged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the crisis propagation,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the crisis propag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media”. On this basis, four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government to better manage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the crisis, including being kind, governing, borrowing and guiding.

Key words: crisis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field; the NCP; we-media era

传承与变迁:关于“京味文学”图书出版的若干思考

刘燕萍

(中信出版集团 编审室,北京 朝阳 100029)

摘要:近年来,关于“京味文学”方面的图书出版几成热潮。这里的“京味”主要指的是体现在作家作品中围绕北京具体展开的一系列地域文化特色。而作为文学风格的“京味”,其独特意义在于能够超越地域文学的局限,获得更深远的意涵。然而今天,随着“京味”所赖以承载的生活方式的消失,传统美学意义上的“京味”已然消亡,它正在变成供人凭吊和缅怀的对象。因此就文学图书出版而言,培育与发现“京味文学”新的传人势在必行。

关键词:“京味文学”;地域文学;图书出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6

中图分类号:I206;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84-04

作为图书出版行业的风向标,在近些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京味文学”与文化方面的图书一直是人文社科类的重要项目。这里包括各类与北京有关的古籍、志书,以及文学、艺术、民俗和地方风物方面的图书。究其原因,就像我们在崔岱远的《京味儿》一书中所看到的,那些唯有北京才有的地道的北京滋味,正在消逝的京城字号,以及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一直都是人们热切怀念的对象。这种地域喜好与怀旧的热忱,造就了关于“京味”想象的诸多偏好,以及由此而来的图书市场的繁荣。在此方面,京味文学类图书的发展脉络值得人们特别注意,而对其历史与现状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展开对其未来发展之路的思考。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学和文学现象,都应该生长在一定的时空之内,贵为首都的北京之文学,其发展轨迹当然也不会例外。那么,我们在看待作为地域风情与文化特色之载体的北京文学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与蔚为大观的津味文学、苏州小巷的“苏味”小说、荷花淀派,或是楚文学,以及崛起于三湘四水的“湘军”放在一起考察。如此一来,北京人

引以为豪的“京味文学”便成为需要认真讨论的重要议题。

简而言之,人们热烈讨论的“京味文学”之“京味”,其实主要指的是体现在作家作品中围绕北京具体展开的一系列地域文化特色。甘海岚在其主编的《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研究》一书中,将这种地域特色概括为“北京作家、作品所反映的北京地域自然环境、风俗民情、价值取向、思维特点、行为方式、心理特点、生活习惯、语言风格等方面”^[1]。论其历史渊源,当然与五方杂处之北京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有着莫大的关联。据研究者考察,正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后人造就了现代称之为“京味”的北京文明,其中包括民俗与风情、性格与气质、心理与语言方式,以及认知态度与内心规范等一整套文化模式。作为一种文学风格,“京味”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曹雪芹的《红楼梦》,而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无疑是作为旗人后裔的老舍。作为文学传统的“京味”,被后世更多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所继承。概括来看,这种被称为“京味”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故都景象与市井风光。譬如自老舍以来,北京文学中最常出现的小胡同和大杂院,无疑构成

收稿日期:2020-06-25

作者简介:刘燕萍(1981—),女,湖北咸宁人,教育学硕士,中信出版集团编审室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图书编辑与出版。

了这座文明古都百年来最为经典的城市景观,这也是古都北京最为显眼的外部标志之一。据统计,北京在20世纪80年代时仍有四千多条胡同,而四合院则是自12世纪以来北京最主要的建筑样式,它们各自有着诉说不尽的故事。就拿北京标志性的胡同来说,相信许多读者对《四世同堂》里的“小羊圈”胡同记忆犹新。这个颇似葫芦形的小胡同,有着一个极为隐蔽的葫芦嘴入口,而进去之后才豁然开朗,主人公祁瑞宣家的房子“便是在葫芦胸里”。在老舍的小说里,正是围绕这些标志性的地点,人物和故事才有了特有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有了这个色彩,故事才有骨有肉。”因此,在老舍的作品中,写到北京的地方名称数以百计,一会儿西四牌楼,一会儿护国寺,每个地方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因此显得如此亲切自然,令人心驰神往。自老舍以来,北京的故都景象与市井风光不断成为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心武,以及更年轻的叶广岑等作家笔下的重要内容,这几乎形成了一种写作传统。

其二,民风民俗及乡土人情。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北京本地的民风民俗及乡土人情,往往成为“京味”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主要包括一些岁时节令,以及地方风俗等等。邓友梅笔下的市井生活,就被称为“民俗文学”,这也被人视作北京文明古都最深厚、最耀眼的文化底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部经典小说凝聚了作者多年的思乡情感,她通过儿时的记忆,在一种温情和忧伤中完成了对旧时北平南城的时空重建,而民俗风情和人文景观也尽收其中。对此,吴贻弓改编的同名电影体现得更加明显:蜿蜒的长城,威严的故宫,以及行走在黄土路上的骆驼,成为观众对于老北平挥之不去的记忆。影片带领观众寻觅北平独有的味道:穿过悠长的胡同,耳畔回响的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街角的剃头挑子嗡嗡作响,捏面人的手艺人专心致志,卖糖葫芦的高声吆喝,胡同口有人在汲水喂骆驼……如此旧年风物,才是最令人心动的景象。

其三,各式各样的“京味”人物。这些深深浸泡在“北京文明”中的各色人物,永远是“京味”的核心。他们广泛存在于北京作家们的笔下。比如陈建功《找乐》里“和一帮子‘戏迷’‘票友’们一块儿混”的李忠祥,他迷恋北京味十足的戏曲演唱,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爱好,而是凝聚过往生活方式的独特纪念,以及一代人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汪曾祺的《云致秋行状》同样写的是一个京剧演员的生活,他活得虽不轰轰烈烈,却在死后“还会有人想起他”。在这些人物当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邓友梅笔下的

那五。那五属于“八旗子弟”,往昔的贵族家庭,是货真价实的名门后裔;然而,自从祖上留下的产业挥霍一空后,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落户。小说通过讲述那五十多年坎坷生涯中那些荒唐、可笑又可悲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谛。

其四,京腔京调与京韵京声等语言元素。方言土语永远居于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最显要的层面,也是地域文化最直接的呈现方式,这便突显出北京方言的重要意义。从老舍到刘心武,从邓友梅到汪曾祺,小说语言的亲切中总会带有一丝幽默与温情。而在离经叛道的王朔那里,所谓的“京片子”,依然是小说里极有魅力的元素。这一点甚至在更年轻的石一枫这里依然有所体现。无论如何,方言永远是北京作家笔下值得重视的文学元素,正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所说:“北京方言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2]

二

作为一种文学风格的“京味”,之所以有着独特的意义,显然能够超越地域文学特色的局限,而获得更加深远的意涵。这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的风韵、特定的人文景观的展示,以及在其中注入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趣味。刘颖南、许自强主编的《京味小说八家》一书,收录了老舍、汪曾祺、刘绍棠、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浩然和苏叔阳等八位具有代表性的“京味小说”家。事实上,在当时,这八位作家基本涵盖了“京味小说”的重要人物。

正如有关研究者所指出的,围绕北京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故,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和北京情的所谓“京味”,其实是个相对模糊又带有“不确定性、变异性和灵活性”的概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在历史中发生变迁。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前文所论及的“京味”更多还是属于老北京的市井文化,就像《南城旧事》里的旧北平。这种旧有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市镇文化的表征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它最后的辉煌。这也是“京味小说”引起热烈讨论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后,在新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传统“京味”所赖以承载的社会生活已渐趋消失,而现代北京人身上的所谓“京味”正逐渐融合于时代的潮流中,而愈显淡漠了。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所谓的“京味”不应该局限在狭隘的“旧城圈”之内,而应该把它作为进化的或发展的历时性范畴来理解,将其理解为显示出鲜明北京城市风格的共识性系统。也就是说,任何现代“城市人”都不应该由单纯的土著居民

构成,对于日渐庞大的北京城来说更是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成分更加复杂的北京,其“旧城圈”的天地无疑会随着城市的演进而变得越来越小。北京人的内心情感和价值观将面临极为深刻的调整,如此一来,“京味文学”的变化也将不可避免。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味小说”的热潮期时,这种兴盛中的危机以及变化的迹象就已经开始显现。当时的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等人的创作,已然显出后继乏人的窘境。对他们来说,向前追溯,老舍当然是“京味”难以逾越的高峰,如人所说:“老舍之后,不会再有第二个老舍。”向后看去,一批更加具有现代城市意识的作家开始对“旧城圈”形成巨大冲击,这里面就包括此后被称为新潮小说家的刘索拉和徐星。现在看来,《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完全具有重新定义北京文学的潜质。这里最具有冲击力的无疑要属王朔。

现在看来,正是从军区大院走出来的王朔,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新京味”。说其是“京味”,那是因为王朔笔下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小说人物都出生成长在北京,说的是地道的京腔京调,接触的也都是关于北京的一切。然而,纵观《顽主》《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等作品,“新京味”之“新”终究体现在大城市中青年人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并摆脱了以往“京味小说”的结构程式和审美规范。这也难怪,“大院”风格的年轻主人公,毕竟不同于温和典雅、讲究礼数的老北京人,他们身上更多体现出一种时代的焦躁与冲动,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新一代北京人。有研究者认为,王朔小说的“新京味”是北京大院文化和胡同文化沟通融合之后的产物,体现出城市文化的某种兼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既是“京味”文学的延续,更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发展。

王朔的小说,以及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给北京乃至全国观众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渴望》被称为“‘京味’文化的第一个浪头”,而《编辑部的故事》则是为“这种京味文化真正定性定名”。在王朔这里,传统意义上的“京味小说”在经历了它自身的灿烂辉煌之后,终于出现了面貌不同的“新京味”,它因与刻意追求醇正优美的传统“京味”背道而驰而显得意义非凡。这种突如其来又有其必然性的巨大变化,给京味文学研究者带来新的课题。尽管这里的“京味”并不等于“痞味”、调侃语,以及脏话、黑话等时髦浪潮的消解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学意义上的“京味”已然消亡。如此来看,“京味”似乎终将变成供人凭吊和緬

怀的对象。对于文学而言,培育“京味文学”新的传人势在必行。

三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京味文学”新的传人,肯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京味”作者。因为正是“忽视新北京人的心理特征及个性和新北京城的景观,缺乏对新文化形态的感性把握而把视点移到易于把握的角落”,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京味小说陷入窘境,以至于有学者不断呼吁,“京味”不应该停留在大杂院和胡同里,它同时应该思考着如何走出来。

也正是在这样的呼吁声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京味”作家群已经趋于解体。另外一些并不追求地域特色的北京作家开始走上前台,比如徐坤、邱华栋等新一代北京作家,更加关注的是作为都市文化的北京,观察并描述处于迅速都市化中的北京人。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引起重视,也越来越受到欢迎,这也意味着“京味文学”事实上的转型正在显著发生。这其实从侧面说明,一个都市化的北京,正在消解它自身独特的地域标记。所以对于创作来说,一方面固然要考虑有意识地突破“老舍模式”,对北京的地域特色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在北京新的都市景观面前,如何表现北京人的文化心态与文化选择,以此为京味风格与叙述方式找到新的支点。

21世纪以来,更多的外来作家正在不断丰富北京文学的形式与韵味,“京味”也在其历史的流转中不断塑造自身。格非、徐则臣等人也在尝试以北京作为写作对象并各有侧重,但他们的小说并不会太在意作为一个北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也对描写北京市民社会的世相心态,以及有关北京人俗世人格的刻画并没有太大兴趣。在今天依然活跃的北京作家里,更接近于传统“京味小说”的,无疑当属叶广苓了。尽管从年龄上看,她早已不再年轻,但依然葆有着那份热忱与感念。这位生长于胡同、皇祖父家与草根母族的记忆均与胡同文化紧密相连的女作家,似乎成了传统“京味文学”遥远的绝响。纵观其作品,《状元媒》中南营房胡同里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从《全家福》到《采桑子》,让我们看尽了世纪风云里的宅门聚散与平民沧桑。就这样,叶广苓一面回瞥旗人的生存境遇,一面体味京味文化的流行,让这遥远的绝响得以时常令人反顾。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在年轻一代的北京作家中,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不多见,这便使得培育“京味文学”新的传人的任务陡然变得棘手起来。环顾今天的北京文学圈,更多的作者属于新一代移民,因此,流连传统的“京味”无疑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在为数不多的本土作者中,青年作家侯磊的创作虽多涉北京史地民俗,甚至他也自诩精神世界是“穿着长衫用毛笔写文言”,但在他那里,“老北京”终究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而出身大院的石一枫,虽颇能体现出王朔的某种神韵,但也仅止于语言的模仿。他的经典作品《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借命而生》等,更像是新的都市传奇,而具有强烈的“去地方性”。

今时今日,倘若非要给“京味文学”找到一个新的传人,那么他必须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他的

笔下,唯有让胡同、四合院与国家大剧院、鸟巢等北京新地标并立并存、交相辉映,才能体现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双重魅力。换言之,既要接续传统,也有面向未来,守正创新方可重新焕发活力,这或许才是新的“京味文学”图书发展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 [1]甘海岚.前言[C]//甘海岚.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 [2]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Inheritance and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shing of “Beijing Flavor Literature” Books

LIU Yanping

(Editorial Office, Citic Publishing Group,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eat upsurge in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on “Beijing flavor literature”. It mainly refers to a series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writers’ works centering in Beijing. As a literary style,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Beijing flavor” lies in that it can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obtain more profound meaning. However, today,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way of life that “Beijing flavor” carries, the “Beijing flavor” in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sense has already died out, and it is becoming an object for people to mourn. Therefore, in terms of literature publishing, it i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and discover new successors of “Beijing flavor”.

Key words: “Beijing flavor of literature”; regional literature; publication of books

时代主题·民族精神·文化认同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传播策略探析

高杰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从平凡日常中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变迁和时代进程,使得作品以纪实内容表现出的深度超越了个体故事,它传递出的精神面貌与文化内涵投射到所有中国人,引发观众普遍共情,激发强烈文化认同感,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传播有正面效果。文章从题材选取、价值呈现、叙事风格、视听语言、审美情趣多个角度,探析《人生第一次》的传播策略。

关键词:人文纪录片;时代主题;民族精神;文化认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7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88-04

出生、上学、当兵、结婚、买房……每个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节点。由央视网和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的系列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一次》,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记录12个真实而动人的“第一次”,勾勒出当下中国人完整的人生图鉴,展示中国人对于生命、生活的理解和态度,书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人生哲学。该片于2020年1月开播后,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收获优良口碑的同时,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一、选题紧扣时代主题

(一)反映民生热点

《人生第一次》总导演秦博曾介绍这部纪录片是“记录每个平凡中国人的高光时刻”^[1],所呈现的故事与社会现实相互映照,契合每位观众的生活。从分集标题来看,影片采用的是线性结构,用12个篇章把人的一生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这些篇章与统领全篇的“人生第一次”主题紧密衔接,并兼顾各自的使命,用镜头窥探个体在时代大潮影响下的命运轨迹,又以个体命运折射出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兼具真实性、艺术性、隐喻性。

每个篇章的选题都立足时代背景,着眼于当下热门的社会话题,涵盖国计民生方方面面,故事内容

丰富,蕴含深刻的现实意义。《出生》与国家二胎政策相呼应,《上学》反映中国式家庭教育,《长大》关注留守儿童教育状况,《当兵》响应参军入伍号召,《上班》围绕残疾人就业保障,《结婚》记录年轻人婚恋观,《进城》与脱贫攻坚相融合,《买房》讲述中国人的房子情结,《相守》照应的是医保政策,《退休》注目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养老》聚焦独居老人养老问题,《告别》见证遗嘱观念变革。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时代主题的艺术化表达,使《人生第一次》成为展现中国社会时代风貌的重要载体。

(二)体现时代价值

“长大”是生命的一个漫长过程,很难用短时间的纪实影像表达清楚。《人生第一次》选取独特视角,用偏远山区留守儿童学习写诗的故事把“长大”转化为真实可感的具体形象。这个题材呈现出多重内涵,立意相当高远。诗歌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对这群孤独安静的孩子们来说,写诗也许不能改变命运,但可以照亮内心,释放内心的呐喊。孩子朴素而稚嫩的诗句中蕴含着他们的快乐、忧愁、期盼。长期以来,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被建构为“孤僻、叛逆、缺少关爱、沉迷游戏、受教育水平低”之类的弱势群体,存在“污名化”“边缘化”倾向。^[2]《长大》引发观

收稿日期:2020-04-17

作者简介:高杰(1996—),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学。

众对山区留守儿童成长和教育的关注,打破刻板印象,摘去留守儿童身上被固化的“负面标签”,突出他们的闪光点,以及他们在复杂境遇中敏感丰富的内心。同时诗歌文化在中国绵延数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但在“分数即王道”的现代社会,很少有人会重视、学习诗歌,中国人的诗意与浪漫被慢慢消解。影片启发观众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同时,还启示社会的教育意义。

而《进城》这集更像是《长大》的呼应,进一步丰富纪录片时代价值内涵。《长大》讲述留守儿童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独自成长,《进城》则转换视角把镜头照向他们的家长,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不得不放弃对孩子的陪伴,走出大山,进城务工。个体故事印刻着时代足迹,他们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命运,还承载着脱贫攻坚所赋予的时代意义。

每个城市都有从乡村涌入的务工人员,他们被称为“农民工”,由于城乡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认知偏差,以及不良媒体的“妖魔化”报道,这个群体一直遭受多方偏见,伴随着负面印象,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群。《进城》从全新角度引领观众了解、感受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状态和真实情感,呼唤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理解、尊重。选取的拍摄对象是位女性,她离开家庭进城独闯需要更大的勇气,但农村女性同样享有眺望远方的权利,也能够凭借努力与坚强为下一代争取更好的未来。

正是由于《人生第一次》对留守儿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平等关注,才使得它传达出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价值。若只谈论儿童成长的天真烂漫、亲子关系的温暖和谐,而回避特殊群体现实存在的困境,那必定无法留下真实的生活样本。为了表达美好而牺牲真相,不是纪录片的职责,也无法真正发挥纪录片的传播价值。

二、故事化叙事彰显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不是高深莫测的哲理,而是以现实生活为载体,深深地渗透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人们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践行着民族精神。纪录片的镜头需要融入普通人民群众生活中,深入观察记录,引导观众从生活百态中感受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以及在新时代下的重要意义。^[3]

(一) 聚焦普通中国人

人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价值需要得到展现。对人文纪录片来说,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其使命是通过个体的解读,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培养观众文化品位,引领正确价值导向,建构与时代相符的道德伦理体系,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人生第一次》聚焦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个性、价值,以平民视角、平视之姿去客观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呈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懈追求。影片采取蹲守拍摄的方式,从旁观者的角度长时间跟踪记录个体人物的生活故事,深入观察他们眼中的世界。整部纪录片拍摄对象涵盖新生儿、残障人士、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幼儿园小朋友、小学新生、新婚夫妇、北漂年轻人、部队新兵、癌症病人和家属、退休老人、空巢老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理想,但每一个人物及其生活都有独特价值。他们是鲜活的个体,也是庞大社会群体的写照,共同折射出时代缩影。此外,观察视角能再现生活原生态,给予拍摄对象充分的话语空间,为观众保留自由的解读空间。这些人物在镜头下的言语行为非常自然,生活气息浓烈,形象客观而立体,真实而动人,极大地拉近观众与影像的距离,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尊重。

人们只有面对与个体命运相关的真实内容,才能产生情感共鸣,才能去思考、去感悟。《人生第一次》投向普通大众的“温暖目光”使影片充满人间烟火气,传递出浓郁的人文关怀气息。它对平凡人物的生活境遇和情感世界的表现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价值观念对现代生活的重要影响。

(二) 讲中国故事

在很多观众印象中,系列纪录片的叙事节奏缓慢,没有戏剧般引人入胜的跌宕情节,显得平淡乏味。而《人生第一次》在情节的设计和故事的展开上有所突破,结构较为紧凑,叙事风格化强烈,以温情细腻的表现手法将故事娓娓道来,传递出希望和正能量,影片文化价值内涵也随之提升。如第一集《出生》30多分钟的时长讲述了二胎生产、高龄产子、心脏病手术后诞下双胞胎这三个故事,叙事结构清晰,三条线索的对比给故事内容营造张力,观众跟随人物共同经历焦虑、紧张、喜悦,表达生命之始的艰难,触及人性中最为柔软的部分,饱含对生命的至高敬意。

个体故事不仅传达真挚情感,还能体现民族共性。《进城》这集中,农村女性王银花来到上海一家养老院做护理工作,初来乍到,她听不懂上海话,记不住老人的姓名年龄,体力也跟不上,在新环境中慌张而又无所适从,不过她始终在埋头苦干,尽力克服

种种陌生与不习惯。王银花就是众多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影,她身上有中国劳动人民传统的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的美好品质。《上班》篇讲述了一批残疾人在就业培训基地接受培训后上岗成为阿里客服的故事,入职考核标准是1分钟打42个字,“你有几根手指,或者没有手指,都要做到”。他们没有屈服于个体命运的不幸,经历过绝望却仍对幸福生活充满向往,在这份特殊工作中重拾自信与力量,收获爱情、友谊,实现自我价值,传递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相守》篇以癌症患者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人的婚姻观,患者和家属面对病魔虽然无奈,却还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继续生活,相互扶持着走下去。医院旁一条被称为“抗癌厨房”的小巷,蕴含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每一顿精心制作的饭菜都是家属们对亲人的爱意,当初的结婚誓言变成不离不弃的陪伴,真正诠释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生活信念通过一个个平凡而真实的人物故事自然地呈现出来:拼搏进取,勤奋务实的生活观;温馨和睦,稳定幸福的家庭观;相知相守,同甘共苦的婚姻观;以和为贵,以德待人的处世观,这些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诸多方面,来源于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人生第一次》从温情故事中挖掘延伸意义,用生动的影像叙事彰显深刻的民族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弘扬民族精神,对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塑造民族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三、视听艺术建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4]也就是个体对所属群体共同文化的确认,并因此产生群体归属感。此外,文化认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对个人身份的认定、民族文化的传承有重大影响。在纪录片的符号体系中,视听语言对于建构文化认同尤为重要,视觉和听觉紧密结合,才能使观众对影片文化内涵直观地感知、接受、认同,而艺术与审美表达也为建构文化认同助力。

(一) 诗意镜头

纪录片的内涵意义需要有直观的影像画面来展现,画面美不美,有没有意境,能不能表现情感,将直接影响观众的观看意愿。《人生第一次》的审美情趣在于对人文诗意的表达,现代的诗意往往蕴藏在人身上,有些人的生活就是诗意本身,值得用镜头去挖掘。

《长大》这集,云南潞水中学学生跟随老师去野外采风写诗。为了寻找灵感,学生们把树叶卷成小孔,透过它去看蓝天、云层、山间、旷野,带着好奇与

探索的欲望观察周围万物;躺在草坪上晒太阳,在声声蝉叫中放飞思想;闭上眼睛捂住耳朵,静静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孩子们用不同方式在感受自然、感受生命,他们三三两两席地而坐、埋头写诗的画面已经充满诗意韵味,唤起观众对本真和美的共情。

而喧闹纷杂的街头巷尾也能拍出诗意,虽然没有美景,也不恬静,但同样令人动容。《退休》这集,老人童华荣患有眼疾,无法视物,老伴常尚慧负责照顾她生活起居,片刻也不离身。夫妻俩每天背着书包、手牵手一块去上老年大学,一个学诗,一个学书法。一路上常尚慧就是童华荣的眼,给她描述看到的一切,带她穿过大街小巷。他们手拉手蹒跚过马路的背影传达出生活的诗意,仿佛看见了两位老人细水长流的相守,相濡以沫的一生,激起一种情感与心灵的互动。这样的镜头语言是永恒的,在平淡中体现着不同层面的文化认同。

(二) 细节呈现

平凡生活中点滴意义的累积可以汇聚为震撼人心的力量,一部能让观众产生文化认同的纪录片不仅要有艺术审美,还得有真实可感的细节。细节是创作者凭借敏锐性捕捉而来,虽然稍纵即逝,却是表现人物情感的情绪点、深化作品主题的趣味点,甚至是故事之“眼”。^[5]

《人生第一次》的细节呈现极为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新兵张书豪穿着军装与从两千公里外赶来探望的母亲一起合影,这时画面定格在张书豪抿着笑偷瞄母亲的那一刻,母亲脸上洋溢着开心骄傲的笑容,儿子偷瞄的眼神中充满依恋,微妙的小细节将这对母子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留守儿童穆庆云通过视频电话把自己写的第一首诗念给在广州打工的妈妈听,含蓄地诉说对妈妈的想念,妈妈听完在手机那端沉默了好几秒,开口第一句话带着哭腔说“女儿,对不起”,观众立刻就能体会到这位妈妈的无奈与愧疚,触动人心。云南曲靖的务工人员在劳务工作站站长刘增雄的带领下搭上去往上海的火车,发车之际,刘增雄拿着喇叭事无巨细地交代注意事项,包括火车上卫生间的门怎么开关、到上海过马路要看红绿灯、要学会垃圾分类……生活化的细节让观众感受到纪实气息,产生共情与代入感,更加理解这些第一次进城的人们内心的忐忑。

此类情感自然流露的细节画面,给观众的想象是很丰富的,能深入观众心灵,引导观众去联想、深思,是深挖作品主题的切入口。同时影片以拍摄对象对理想的追求和不懈拼搏精神,感召观众对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行反思。

(三) 生动解说

解说词可以说是纪录片影像的注脚,尤其对人文纪录片来说,解说词能够传达出创作者的情感、态度,点明内涵和主题。它不是简单描述画面内容,而是对画面进行解释、补充、强调、渲染,提高纪录片的故事性与可看性,要求兼具文学性和口语化。《人生第一次》就有较多精彩解说词引发网络热议,如“人类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核武器,而是豁出一切的勇气”,“生活就像一条溪流,身在其中时,你总是很难去察觉其中变化的力量”,不仅加深观众对主旨的理解与把握,还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文化认同建构。

声音也是传播情感的独特渠道,因此解说员关于语气、语调、重音、节奏的运用都需要精心处理,声画合一的解说能极大增强纪录片表现力。^[6]《人生第一次》每集分别邀请一位知名演员担任解说员,他们的声音、形象整体上与每集的故事基调相符,丰富的表演经验也能使解说增色不少。例如高亚麟在《家有儿女》中的父亲角色深入人心,由他来配《上学》这期很容易唤醒一代人的童年回忆;老戏骨寇振海荧幕形象严肃,嗓音浑厚,解说《相守》更能传达出癌症患者与家属相守的不易,声音中的情感浓度就足以打动观众。选择明星做解说员,一方面可以借助他们的名人效应提高纪录片影响力以带动收视,另一方面当观众熟悉的明星与纪录片中普通人的故事碰撞出火花,可以轻松打破荧幕内外两个世界的区隔,增强观众代入感。

四、结语

《人生第一次》完成了一部人文纪录片的使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以平民视角关照微观人物命运,彰显时代背景与个体人物的融合;以真实、理性、细腻的镜头表达人文关怀,展现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平凡而温暖的力量;以生动的叙述解读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寻觅生活的诗意。

一个个原汁原味的朴实故事,传递出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乐观。影片透过生活表象挖掘精神文化内涵,用影像方式塑造新时代民族精神,触发集体情感共鸣,有效地实现了文化认同建构,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表现出较高的文化品格。

参考文献:

- [1] 袁欢.《人生第一次》:致敬每个坚韧又乐观的中国人[N]. 文学报,2020-04-02.
- [2] 刘潇.符号学视域下“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9.
- [3] 苗元华.纪录片彰显民族文化精神的途径[J]. 电视研究,2019(1):63-65.
- [4] 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
- [5] 戴蔚,殷素洁.纪录片《极地》:民族文化的价值表达与认同建构[J]. 东南传播,2019(3):59-61.
- [6] 李菁.浅谈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的创作与配音[J]. 记者摇篮,2019(4):88-89.

(责任编辑 许峻)

Time Theme, National Spirit, Cultur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Documentary *The Firsts in Life*

GAO Jie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Anhui,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ities documentary *The Firsts in Life* has captured th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times from the ordinary daily life, which makes the depth of the documentary content of the work surpass the individual story. The spiritual outlook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t conveyed are projected to all Chinese people, arousing the audience's general empathy and inspiring a strong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 spirit and n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Firsts in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me selection, value presentation, narrative style, audio-visual language and aesthetic taste.

Key words: humanities documentary; time theme; national spirit; cultural identity

关于高校教学现代化趋势的思考

陈志强¹, 朱 涛²

(1. 郑州西亚斯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9; 2.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高校教学现代化是高校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推进高校教学现代化的进程要从高校课堂教学过程做起。首先要进行高校课堂建设,要在熟悉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建好能够从事现代化教学的新型教室,并缩短课时时间,提升课时效率;其次是要运用现代工具和技术做好教学的各项准备,包括:“透视”学生、“玩转”教材和“精化”教案;最后是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等工具和技术支持课前预习、改进课中教学、检测课后效果。

关键词:高校;教学;现代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8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92-05

一、引言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中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标志性、纲领性文件。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指导思想办好各级各类高校,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迎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到来,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还要熟知支撑教育现代化的工具及其相应的技术应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是支撑教育现代化的硬核工具,将“三+”工具应用到教育领域,无疑能够强有力地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高校教学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高校将“三+”工具应用到教学过程之中,也必将强有力地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研究、启动并推进高校逐步实现教学现代化,是我国3005所各级各类高校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也是高校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哪所

高校走在了时代的前边,哪所高校就具有领先优势,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国务院2015年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核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一流为目标,将我国一批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从而有效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1]

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我国高校都具备了向教学现代化进军的思想基础和一定的技术条件。时代赋予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担当;党中央发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响应。

本文着重讨论课堂教学过程的现代化问题。

二、高校课堂建设现代化

(一)熟悉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就是人造智能。只有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才具有智能。近期,人工智能研究的是如何使现有的计算机更“聪明”,使它能够在某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人类的智能,如进行推理、决策、规划、学习等或针对具体领域,为人们提供辅助性的智能工具,帮助人们解决一些问题,尽量减少人们脑力劳动的强度;远期人工智能要揭示人类智能的根本机理,在此基础上用智能机器去模拟、延伸和扩展人

收稿日期:2020-06-25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河南省高校高质量教学模式研究”(20B880049);2019年度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改项目“基于‘三+’视角改革河南省教学模式研究:以产业经济学为例”(JJXY002)

作者简介:陈志强(1957—),男,山西灵丘人,郑州西亚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类教学。

类智能,实现脑力劳动的自动化。

学习是机器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是否具备学习能力是机器是否有智能的标志。机器学习,是使计算机通过学习自动获取知识与技能,实现自我完善。自然语言处理,是让计算机理解和生成人类自然语言。专家系统,是模拟人类专家求解问题的思维过程,其水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人类专家的水平。模式识别,是研究视觉模式和听觉模式。计算机视觉,是在计算机上实现或模拟人类视觉功能。人工神经网络,用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人工网络。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用于从数据库中提炼和抽取知识,实现知识的自动获取。自动程序设计,用户只需告诉计算机做什么无须说明怎么做,计算机自动实现程序的设计。智能控制,无须人的干预或者基本无须人的干预,能独立地驱动机器实现其目标的自动控制技术等。

实践是机器功能的最终目标,是否感知并与之交换信息是机器是否智能的标志。机器感知,是计算机直接“感觉”周围世界,像人一样通过“感觉器官”直接从外界获取信息。如通过视觉获取图形、图像信息;通过听觉获取声音信息。机器感知包括计算机视觉、听觉等各种感觉能力。机器的联想就是有关数据、信息或知识之间的联系。机器联想利用人类按内容记忆原理,采用“联想存储”的技术实现联想功能。

(二) 建好新型教室

具有现代化设施的新型教室应该是师生心目中的科幻教室,应该具有情景感知和环境管理功能。建立新型教室,是要“利用传感技术、网络技术、无线通信以及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高科技技术,优化教学内容呈现、便利学习资源获取、促进课堂交互开展,实现全面感知学习情境、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同时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测评学习结果,有效地支撑多元化的教学设计实施。”^[2]因此,新型教室要区别于传统的教室:一是要配备足够的现代化设备。一般的新型教室要配备足够的电脑(包括师生同时使用的电脑),便于师生同时使用。配置教师控制台,便于教师控制教学过程。配置学生学习台(“学习台”的设置可以是四人桌、六人桌),便于学生形成学习小组。配置智能音箱(教师控制台、学生学习台),便于师生随时询问相关教学信息。配置耳机,便于师生在无干扰情况下融入教学情境。教师和学生的位置最好是围绕教师控制台的270°的大半圆结构,便于师生互动;二是要建好

教师客户端。教师通过客户端实现互动教学功能,还可以直接调用其他资源平台、互联网上的教学资源。其技术支持是“独有的智能教学网关”内置流媒体模块。通过智能教学网关内置的流媒体模块,将教师屏幕数据流分发给学生终端,所有数据流在教室内部传输,不经过服务器,并具有延时小,清晰度高、稳定性强等优势;三是要建好学生客户端。学生通过客户端了解每次课的教学安排、课程内容结构、课时重要知识点、辅助参考资料、作业等,实现与教师、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即时互动交流,分享教学过程的相关信息、资料,甚或与智能音箱进行互动,不断强化对重要知识点的理解。学生可用自己的电脑,也可使用学校配置的电脑、耳机等必需的学习工具。开课前“扫码”进入学习小组(学生每次课可以进入不同的小组)。便于学生在“无干扰”情况下融入学习情境;四是为师生设置足够用的个人云盘。教师可随时调用云盘中的文件进行教学。包括课件、试题等。可直接分享给上课班级的学生,直接从云盘播放课件、下发研讨话题、出题测试等。

(三) 缩短课时时间

一般高校的课时时间是45分钟。然而一般高校在规定时间内教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教学内容不精而显得冗长,教学节奏比较慢等使多数师生都有疲惫感)。“学生数量激增,师资和教学设施配套不足,教学质量下滑的情形普遍存在。”^[3]这是客观存在(少数高水平大学除外)的情形。但也有一种情况给我们很大启示:那就是“阅读微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次性“阅读微信”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重复性之多都不能让他(她)停下来。这就是“阅读微信”的内容所产生的不断开始,不断结束的“短、平、快”效应。“鉴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高校应及时巩固发展主体和提升办学水平,处理好内涵式和外延之间的要素关系,不断扩张自己的教育事业。”^[4]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目前大学生的课堂注意力一般维持在30分钟左右,超过这个时间,教学效果会显著下降。因此,本研究为了适应当前(00后学生)一般高校学生的新特点,将每次课的课时时间设计为30分钟。比如:上午第一节课8:00—8:30分,第二节课8:40—9:10分,第三节课9:20—9:50分,第四节课10:10—10:40分,第五节课10:50—11:20分,第六节课11:30—12:00分。传统课间休息时间是三次40分钟,这样的课时设计课间休息是五次共60分钟,而总课时时间不变。这种课时时间的缩短,对教师的教学准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质量高”“内容精”“逻辑

强”“节奏快”将是对教师进行教学准备的必然要求。同时,30分钟的课时一方面会提醒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另一方面缘于教师教学准备的精炼,也会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种即完成了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要求,又使得师生双方都比较轻松愉快的课时安排,将会使得师生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同时还适应了现代化的节奏感,减少了疲惫感。

三、高校教学准备现代化

(一)“透视”学生

陶行知说过:“人不同,则教的东西、教的方法、教的分量、教的次序都跟着不同了。”^[5]“透视”学生就是为了要因材施教。一是要按照机器联想原理建立有关数据、信息或知识之间的联系,并采用“联想存储”技术实现联想功能。具体就是建立学生综合信息库—智能音箱问答系统。高校可以将学校的(不涉密)的综合信息纳入智能音箱系统,如学校的历史沿革、建校以来的办学成就、学校的整体结构、未来的战略远景、目前所处的状态、各项规章制度、典型案例剖析、教师的综合信息、各类学术团体(社团)等输入智能音箱问答系统。同时还要以班为单位,将涉及学生的综合信息,如:学习背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习成绩、思想状态、知识基础等都纳入其中,教师可以随时通过智能音箱了解学生的相关信息;二是建立根据个人浏览习惯推送信息效应—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推送系统。该系统进行相对“封闭”设计来推送高校内部的教学动态信息。要有专门的教学统计(大数据)安排,对每天出现的反映教学(可举一反三地应用到其他部门)方面的信息及时收集并输入到“推送系统”,教师通过“专门的渠道”浏览学生动态信息,“推送系统”就会不断推出这些学生的动态。这样教师即可对学生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三是要建立“因材施教”整合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模式。可通过配置服务器、存储设备建设校级“云中心”,将全国各地涉及不同类型学生的信息和相应的“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手段等大数据纳入“云中心”,由教师选择针对性教学模式(诸多高校倡导“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学生第一”已经成为诸多高校办学的首要因素。之前,这种情况停留在口头上的多,落实的少。现代化教学能够使“学生第一”成为真实)。

(二)“玩转”教材

从近期看,“‘玩’教材于股掌之中”,即可游刃有余地进入教学过程。这其中把握教材的框架结构

和重要知识点及其逻辑关系是关键。一是对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通过组织国内(或国际)一流专家针对教师进行远程培训,强化教材框架结构和重要知识点及其逻辑关系,设计互动环节,验证教师对培训内容的掌控程度。要通过“云中心”建立教师客户端,教师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随时访问教学视频,直播回放等;二是制作涉及重要知识点的微视频。教师要在把握重要知识点的基础上写出“教学剧本”,由学校支持制作微视频。教师当“导演”,学生当“演员”。微视频要有仿真场景;三是为重要知识点配图、题字。通过互联网选取吻合重要知识点的精美图片,同时配以精炼的文字,将配图和题字放在教学课件相应的位置上。教师在上述三方面过程中能够不断强化对教材的理解,从而达到“玩转”教材的目标。

从远期看,人们大脑容纳多少知识点就不太重要了。因为机器智能、计算机储存的知识能让人随时调出来使用,能通过智能推送系统随时让人们看到所需要的知识点。因此,未来对人们最重要的是融会贯通能力,是把相关知识点融合应用的问题。所以,未来“玩转”教材,一是通过专门制作的微视频演绎教材涉及学科知识的起源、发展、假设、成果、问题、前景等,并将本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知识融合介绍,教师即可通过对此教材的综合理解“玩转”教材;二是通过将教材有限延伸、扩展并融入实践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要为实践服务。任何教材都不是脱离实践而孤立存在的理论体系。因此,教师对教材的把握,还要延伸、扩展到实践中去,用实践的规律、逻辑关系等解释书面语言,能使教学过程的表达更生动,也能使学生更加地融会贯通。

(三)“精化”教案

在“透视”学生并“玩转”教材的基础上,“精化”教案最终决定高校教学过程质量。一是梳理教学内容框架。包括学期教学内容框架和课堂教学内容框架(后者称为“子框架”)。“子框架”的梳理更为重要,它使教师的教学过程更加胸有成竹。可通过高等教育权威部门组织智能设计,将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框架“推送”出来,以便高校教师在“精化”教案过程中参考;二是强调教学内容的重要知识点。一般内容由学生自学完成,重要知识点由教师反复强化完成。围绕着重要知识点的教学,教师要设计微视频、图片加文字,以及深入浅出地表述(甚至是现场模拟),使教案更加通俗易懂;三是理顺课程内容的逻辑关系。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教学过程的逻辑进度“彰显”教学质量。教师的教案要反

映教学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使在学生掌握所学内容的过程中训练他们的逻辑思维。

扬弃传统教案,梳理教学内容框架,凸显重要知识点,理顺教学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就能“精化”教学过程,实现高质量教学。

四、高校教学实施现代化

以现代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学习空间、大数据等,能够及时将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收集起来“采用云计算和学习分析技术可以对学生进行精准的学习分析与定位,这不仅能在课前为教师提供深度全面的学生学习情况,还能在课中帮助教师对学生提供适时适当学习支持和服务,在课后教师也能及时对学生学习作品、学习过程和学习成绩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 with 评价反馈”^[6]。

(一) 强调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现代化教学为学生更好地进行课前预习提供了便捷的技术支持。一是通过“微信”、学习通等即可在“班群”里发布课程教案、学习课件、辅助材料等,使学生在开课前通过研读课程教学内容熟知重点、难点及不够理解的问题,并在预习过程中在学习平台留下痕迹,既让教师了解了学生预习的情况,也为学生在课中带着问题学做好准备;二是在发布的教学内容里提出关键性问题,这些问题要做成微视频,形象、生动地展示在学生面前,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为学生课中理性地理解所学内容奠定基础。还可以将关键性问题输入智能音箱问答系统、“推送系统”,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询问智能音箱、浏览关键问题等获得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三是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辅助参考资料,并提供查阅这些参看资料的哪些内容(甚至在第几页),也可提示学生在“推送系统”输入那些字来获得这些参考资料的核心内容。总之,通过预习,每个学生都能够清楚课中要学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方法才能够把课中内容学好等;

(二) 改进课中教学

课中教学是学生掌握学习内容的硬核过程。“互联网+”“大数据+”“智能+”都是现代化的课中教学工具。一是把制作好的课程框架的微视频播放给学生。课程框架要完整反映本次课程涉及的结构及其重要知识点,以及本次课程的细节安排等。播放完成后马上发送准备好的框架、重要知识点的问题,学生点击回答问题,教师获知每个学生理解本次课所讲内容的情况。每次课程内容的量要设计恰当,既要有重要知识点,也要有重要知识点的延伸内

容;二是按照课程框架内容组织授课。涉及重要知识点的内容要播放准备好的微视频,以启示、强化授课内容。这之后的讲授过程中还要通过精心选取的图片、深入浅出的文字进行“精讲”。要按照精心设计的教案,控制重点,突出难点,联系实际,精简不必要的教学环节,用较少的时间、精练的语言,揭示知识的规律,把知识讲深、讲透、讲准,使学生弄懂不懂的东西;三是检测学生学习情况。可从三方面进行:第一,合作回答问题。“课堂中的‘教’与‘学’应该围绕学生学习活动展开,使用以‘学习为中心’这一提法,比‘以学生为中心’更适合。”^[7]合作回答问题有利于展示学生的学习能力。具体做法是:合作搭档(两个学生)或学习小组之间交流(对讲+复述)重要知识点的内容,然后合作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第二,通过移动终端在线答题。针对重要知识点的内容出题,让所有学生答题,实现均等的互动机会。为了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还可将回答问题的情况记录下来作为学生学分的组成部分;第三,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教师下发重要知识点讨论话题,每个小组可以有不同的讨论话题,也可以是相同的讨论话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电脑打字输入讨论内容。上述三种强化重要知识点的做法可根据课堂情况随机选用。

(三) 检测课后效果

课后效果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并为下次课的改进提供数据支持的基本标志。一是准备好相关试题。每次课程都要针对重要知识点准备一定量的试题。试题既可以是客观题,也可以是主观题(包括计算题)。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把题做完,客观题由学生点击按钮完成。主观题由“推送系统”协助完成(学生通过点击相关内容,选取推送出来的若干答案)。教师在借用“推动系统”设计主观题时,要设计“干扰”内容,以使学生做完题后能真正理解所学内容;二是控制好答题过程。每次课的时间有限,检测课堂学习效果的时间也有限。这就需要学生养成在规定时间内答完题的技能。题量、题型以能反映检测的重要知识点为准。答题的方式,可以是统一答题,也可以是抢答等;三是布置好课后作业。检测结果能够在教师管理平台同步生成,说明学生掌握重要知识点的程度。对于掌握比较好的重要知识点,就不布置此类作业。对于掌握不太好的重要知识点,可通过作业的形式让学生进一步强化相关内容。

五、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教学现代化是高校与时俱进的

必然趋势。实现高校教学现代化离不开现代工具和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等的支持,这是推进高校教学现代化的“利器”。从课堂教学过程来看,现代化的教学首先要求教师要熟悉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运用,要拥有包括传感技术、网络技术、无线通信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设施的新型教室,要通过缩短课时时间、把握教学节奏等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教学准备过程中,要通过智能音箱问答系统、根据个人浏览习惯推送信息效应一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推送系统,等等。“透视”教学对象的综合情况,要通过培训、制作微视频、联系实践等形象生动地把握教材的内容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把教案做得精准。教学过程中,要在指导学生做好预习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工具制作的微视频、精美的图片,提炼出的精炼的文字来展示教学的重要知识点,随时和学生进行教学过程的沟通交流,并通过准备好的比较恰当的试题进行课后效果检测,即时反馈测试结果。相信通过上述作

法,高校一定能够逐渐融入现代化教学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 [1]贺腾飞.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与问题[J]. 教育学·心理学学报, 2018(6).
- [2]智慧教室[EB/OL]. [2019-09-11] <http://www.cnedustar.com/news/info.aspx?id=1123>.
- [3]计国君, 邹大光, 薛成龙. 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J]. 教育学·心理学学报, 2018(4).
- [4]石磊. 高等教育内生需求视角下的协同创新实现路径研究[J]. 教育学·心理学学报, 2015(1).
- [5]刘福泉. 我国合作学习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 天津市科教研学报, 2007(6).
- [6]胡小勇, 刘怡. “互联网+”时代的智慧教学前沿: 趋势和案例[J]. 教育信息技术, 2018(4).
- [7]周芬芬. 课堂教学改革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教育学·心理学学报, 2018(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oughts on the Modernization Trend of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Zhiqiang¹, ZHU Tao²

(1. Zhengzhou Sias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19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universitie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art from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rst of all, we must carry out classroom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must build a new type of classroom that can engage in modern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familiarity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horten class time and improve class efficiency; second, we must use moder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to prepare for teaching. Including: “perspective” students, “fun” textbooks and “refined” teaching plans; finally, we must use tools and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 “big data +”, “smart +” to support pre-class preview and improve class Teaching and testing the effect after clas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of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be achieved.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modernization

新媒体时代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发展路径探究

张永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新媒体时代,对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分析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构建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精英培养模式,丰富专业课程设置,增设新媒体课程以及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等发展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发展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19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097-05

随着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和4G、5G、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推进,新媒体成为区别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的媒体形态,如微信、微博、QQ、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已经成为承载和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1]。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担负着为电视台、影视制作、影视广告、文化传播以及门户网站等单位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任务,新媒体为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课程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目前,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课程体系与职业要求的对接性不强,对未来工作岗位和生产模式变革的探索相对滞后,毕业生的行业知识技能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因此,把新媒体融合到传统的策划、拍摄、后期制作等专业课程体系中,加大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学的改革力度成了学科建设的重点。

一、新媒体对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一)增强新媒体时代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

新媒体时代导致传媒环境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传媒产业思维的转变,传媒业思维模式的革新也直接影响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培养目标的重新建构^[3]。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广播影视制作专业教育办学中的关键环节,培养方案的设定直接指导院校广播影视制作专业的办学方

向,是广播影视制作专业办学具体化的表现。尤其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和网络服务快速提升的碎片化时代以及微博、微信、QQ空间以及APP等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需要更科学、直观和全面地获得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在这样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员不能简单地做好本职工作,要不断地随着变化的行业环境学习,充实专业知识,掌握最前沿的理论与实践动向,应对一切新的挑战。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教育距离缩短。新媒体技术对影视节目制作人才的吸引力强,新媒体就像一本丰富的百科全书,涵盖着丰富多彩的信息和展现方式,无论什么类型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新媒体搜索到。同时,新媒体也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未知领域,从而吸引着广播影视节目专业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去开采、挖掘,获得更多认识,成了新时期广播电视人才应该掌握的技能。

(二)创新能力成为广电行业竞争制胜的法宝

新媒体具有的新特征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教育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新媒体由于其参与性,新媒体信息呈现出循环叠加的闭环;新媒体使用方式的便捷,使人们的信息来源多样;新媒体的内容可以双向传递,可以形成比较强烈的互动关系;在新媒体平台上,容易形成

收稿日期:2020-06-27

作者简介:张永强(1978—),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响视艺术创作与教学。

网络社群,呈现出圈层化、群体性特点;新媒体因其自身互联网属性,通过链接,不同的新媒体和内容可以融合到一起。目前,我国高校培养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员只具备了基本能力,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广电行业市场竞争。在新媒体时代,除了单一的传播媒介的转变,节目内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多种数字化信息形态”衍生出来,再与“文字、图片、视频和可视化的动态数据等内容”相融合,真正做到了视听和感官的调动。另外,单一的议题设置主体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受众的要求,要了解行业内的动态,要了解受众关心的话题,要符合影视专题栏目的传播方式等等。要想尽快适应新媒体发展的步伐,只有考虑这些问题,才能制作出更好的广播影视专题节目。当新媒体迅猛发展威胁到传统媒体的地位时,为了赢得广电行业的竞争优势,挽留受众流向其他媒体,广电制作人员的创新能力成了赢得竞争优势的制胜法宝^[4]。

(三)在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精通单门技术

国内广播影视行业蓬勃发展,对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需求量的剧增促使了地方院校或相关专业的大规模新建,导致大量招生和不对口培养,以至于大多数毕业生无法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时间的有限性已经让位于空间的无限性,尤其是在内容上,新媒体不仅通过购买和自制聚集了大量版权,而且通过技术赋能,创造了短视频等原生内容,特别是微信、微博以及手机 APP 客户端的应用,导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记者,广电行业的人才需求来源宽泛,专业院校的毕业生不一定是该行业的唯一需求。学生在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和未来工作中最主要,也是最欠缺的能力是自我更新的能力^[5]。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工作需要兼具应用型、复合型的适用型制作人才,其自我更新的应变能力是适应剧组工作多变性质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比如儒意影业大名鼎鼎,出品了受众追捧的《芈月传》《琅琊榜》,而公司在招聘人才的要求是能够玩转微博、微信的新媒体编辑,以及懂网络的影视剧宣传,以加强公司品牌的营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广电节目制作的质量、舞台的呈现以及现场的效果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无论是策划编辑、拍摄过程以及后期编辑制作,要想给观众呈现最完美的效果,都需要对单门技术十分精通的人员来完成。因此,广电专业人才不但要综合能力强,发掘某一项专业技能的深度

也非常重要。

二、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培养体系不完善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从创立到今天也只有很短的十多年时间,作为一个新兴的专业,和高校其他专业相比较,该学科的发展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教学经验,仍处于相对摸索阶段。当下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学仍然是按照广播、影视两个传播渠道来培养人才,忽视按传播介质模式更新所带来的革新要求,导致学生只能适应单一脉络的工作模式,无法适应新媒体不同业务流程的实践工作,也难以满足新媒体背景下对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综合实践能力较强的复合型要求。而从工作性质角度出发,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毕业生并不一定于媒体环境就业,从事文化宣传系统、政府企事业单位宣传工作环境以及网络影视等方向性的工作也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另外,我国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设置比较混乱,各个高校对于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课程体系不统一,并且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各有千秋,在教育方案、教学目标等方面随意性比较大;同时,多个高校设置了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存在着一定的泛化现象,并且对于这个专业的招生人数也没有很好的控制,使其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水平跟不上新媒体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课程内容单一

首先,课程教学内容陈旧、单一,与行业发展脱节。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基本是高等院校自行设计和决定,用人单位和行业人士等的参与度并不高。而地方院校教师在展开教学时仍使用“填鸭式”教学手段,教材容过于陈旧落后,教师经验也已落后于广播影视行业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没有充分的结合“产、学、研、用”,所培养的制作人才实践能力不强,导致毕业以后无法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对学生职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其次,课程内容不能适应专业多样化的需要。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对于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人才而言,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未来发展趋势必然是多元化、跨学科的培养,单一的教学内容无法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再次,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开设课程涉及面十分宽泛,但是在相关小方面的课程设置量又很少,一些课程设置量只能让学生停留在最浅层次的接触。

最后,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和其他学科设置一样都局限在政治、英语以及体育,内容单一形式僵化,无法达到拓宽学生视野和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目标。比如,一些高校教学实践中都在更多的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摄像机、非线性编软件,至于对于提高思想层面意识的策划、传媒传播类等课程很少,这种教育模式无法适应新媒体传播的发展,培养的人才到成为了节目制作的专门技术人员。

(三) 新媒体课程开设不足

以单向、大规模为特性的大众传播,通过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近似于面对面、点对点、个人对个人的人际性的信息交流方式。互联网技术发展之下,互联网媒体将人们族群化的过程中,关系传播将逐步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形式^[6]。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与时俱进,应用和掌握新媒体的状况令人担忧。在新媒体平台,用户选择一档节目,就意味着加入一个由五湖四海的观看者结合而成的兴趣社群,通过新媒体技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实现虚拟的共同在场。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分析,某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新媒体课程设置了两门课程,即数字媒体作品赏析、数字音频应用基础,同时开设了一门网络艺术选修课程。某高校只设置了新媒体节目制作以及新媒体概念一门课程,而有些高校甚至有关新媒体课程的设置为零。虽然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不断增加新媒体课程的开设,但是总体来讲,新媒体课程开发的数量仍然相对较少。虽然我国高校对于向媒体课程开设各不相同,要想比较详细了解新媒体,一两种新媒体课程的开设数量完全不能满足学生对于新媒体应用的需求,如果学校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企业要想得到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愿望就会落空。

(四) 教学水平参差不齐跟不上人才培养的要求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需要社会、行业与院校共同培养^[7]。有效整合校内外有效教学资源,在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推进“协同育人”教育政策,实施影视院校、影视基地、影视产业三方协同的良好机制,是改革和创新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模式。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合作,主要以社会的实际需求与影视节目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趋势为导向,院校与企业双方共同参与到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的

培养全过程。注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专业素养以及核心竞争力等进行培养,通过校企两类不一样的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把学生的实践与在校学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然而,现行地方院校对于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课程的教学,“闭门造车”现象严重,造成实际教学与社会、行业脱离,严重缺乏深入到广播影视行业进行锻炼的实践能力。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开设的时间短、教学体系不成熟,加之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了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传媒专业人才需求量猛增,导致各个高校纷纷开设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但是高校的扩招也导致了学校教师队伍资源匮乏,虽然补充了一些教学能力相对较好的教师,但教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培养的学生水平也高低不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区别的重要特征体现在媒体的“新”上,新媒体载体的形式新、新媒体更新发展变换快、技术要求高、硬软件更新换代快等,造成有些教师难以掌握新媒体技术,不能充分利用新技术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因此,高校教师要主动学习和运用新媒体技术,提高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三、新媒体时代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 构建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精英培养模式

高校教育的大方向是扩招与大众化,这种大众化培养模式不是适应所有学科教育,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要根据本专业特点来选择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进行创新^[8]。近年来,我国广电行业创新的作品、艺术感和文化底蕴强的作品极少,荧屏一开都是模仿复制,节目雷同。当硬件设施越来越好的同时,影视作品、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却越来越低,缺乏了艺术创造的能力。精英培养模式就是少量招生本专业学生,让有限的教师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教育教学,并且采取不同特点的学生来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因而,构建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精英培养模式非常重要。从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特点来看,决定了该专业适应精英教育模式。从社会需求来分析,当前我国广电行业的对人才需求已经呈饱和状态,如果还不改变培养模式,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和对行业的冲击。当然,也不是一味地培养“小众”,但要求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从原来的扩招逐步回归到精英培养模式。

(二) 丰富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课程设置

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并不是单一的

技能型教育,在自媒体时代的培养目标更应该从理论研究方面、制作方面以及策划等方面,会动脑子、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综合素质高且跨界合作能力强的人才,融合创新,推动行业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界对复合型人才的质量要求和需求量都在不断提高。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工作包罗万象,是标准的复合型工作,人才需求自然也不能完全局限于专业本身。除专业知识和技能外,需拓宽其他知识领域。首先,丰富策划、运营类等课程的设置。虽然制作过程对技术要求较高,但是制作的节目有创意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受众必须爱看、想看是考验制作人员的试金石,也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其次,要增加媒体传播一类的课程。现在的电视节目传播的信息无外乎于两类,一是信息服务,二就是为受众提供娱乐。因此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教育教学不能局限于一个小框架,而且要融合传媒和娱乐,只有将二者充分融为一体才能从根本上满足观众对于内容的需求。因此,课程设置除了要懂得新媒体技术,更应该懂得如何运营管理、宣传营销,通过新媒体的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的平台来吸引观众。

(三) 增设新媒体课程

当前的新媒体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主导,依托高新技术,以手机平台、电脑平台、数字电视等为主要渠道向受众传播信息,提供具有数字性、交互性、快捷性、多元化特点的连线游戏、远程教育、即时信息互动等相关服务的传播手段或传播方式的总和^[9]。新媒体具有覆盖受众广,信息传递快等优势,其中网络电视、网络平台、网络直播、手机 APP 等都是典型代表。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传媒业的逐渐兴盛,开设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的相关院校数量也持续走高,在专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教学资源短缺、教学设备供应不足等现象也随之出现。新媒体时代的专业从业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采编、制作、多流程发布等相关专业技术,这也正是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在教育教学中比较缺失的一部分。缺失采编、制作等诸多教学环节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媒体一线的实际工作,更是在与竞争者相比之下没有优势体现,必然会出现淘汰等现象。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在教授基本的专业知识时应该跟随外部的环境改变而不断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增添和更新。除了各种新媒体技术,如今,无论电视节目还是电影,其宣传和与观众互动都离不开微

信、微博等的营销,所以说当今时代的影视人士必须掌握新媒体制作、宣传能力。外界传媒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今天的新媒体也会成为未来的“旧媒体”,更加全新的媒介形式又会一一出现,但无论怎样发展,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都应该紧跟传媒发展趋势,培养学生学习新的理念和技术。

(四) 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新媒体背景下的新闻资源传播平台,已经从传统传媒产业的“封闭式”转变为自媒体用户主动参与的“全民式”,传播渠道的拓宽、传播理念的转变、传播模式的革新都对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整合理论教学、丰富实践教学环节”是当前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所应该坚持的重点。丰富实践教学环节,不仅是要加重课程设置中实践教学类课程的比重,更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模式来丰富教学。调整实践教学类课程的比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主体任务,这是由于学科专业定位所决定的,无论是传统媒体背景下还是新媒体对于人才的综合实践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

丰富实践教学模式。在采用传统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课程“大课讲授 + 小课实践”的基础上,采取学期专业汇报、作品展览、节目制作艺术集中展示等灵活方式,加大学生对专业实践的兴趣;同时加强与专业教育相关的摄影、摄像、非线性编辑、后期制作、节目策划等方面的综合实践,拓宽专业技术层面;可以构建跨专业平台的综合实践模式,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学生,设置节目制作各流程岗位、共同完成节目制作流水作业要素演习;定期组织学生参加相关主持比赛,以赛代练,短期内提升强化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

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新媒体技术素质能力,掌握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技术特点和要点,提高信息加工的能力,高校更应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潮流,必须积极开发新媒体平台和软件^[11]。比如,在教学视频的实际拍摄过程中,受制于拍摄场地和拍摄对象,MOOC 视频的脚本也不像电影情节那样富有变化,其内容相对平直,讲究知识结构的严谨,因此很难有艺术性的发挥空间,所以使得拍摄出来的镜头显得平淡无味、单调呆板。所以,我们需要在拍摄过程中应严格使用“三镜头法”去拍摄,适度增加一些运动镜头,或者在后期时通过画面特效和镜头切换效果增加画面的亮点,最常用的是通过捕捉教师授课中

的关键性动作,或者学生的表情等画面特写来增强视频的表现力,避免学生观看教学视频过程中视觉疲劳,导致厌倦情绪产生的产生。

四、结束语

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出现,广播、电视、纸媒、移动媒体、新媒体等产业融合所衍生出来的融合性媒体迅猛发展也给传媒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广播影视节目类型不断丰富、全民记者等相关要素的影响,要求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不断调整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培养方案等,避免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教育与媒体综合实践出现脱节现象^[12]。我国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在面对不同时期的媒介改革时都应该以较好的教育革新来面对一线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从业者的实践需求,在传统媒体改革创新和新媒体影响下,高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教育要紧跟媒介生态发展要求,培养更多的符合社会、企业所需要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从业者。

参考文献:

- [1]任政. 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研究[J]. 传媒论坛,2020(1):35-36.
- [2]王亚美. 高职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现存问题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10):118-119.
- [3]单红琳. 高职影视专业产教融合的策略:以横店为例

- [J]. 西部素质教育,2020(4):215-216.
- [4]李月珍. 融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探析[J]. 西部广播电视,2019(4):48-50.
- [5]唐乘花. 媒介边界消融时代高职传媒专业教育的思维创新初探[J]. 创新与创业教育,2020(2):56-61.
- [6]李华君,涂文佳. 5G时代全媒体传播的价值嬗变、关系解构与路径探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1-5.
- [7]周党华,陈文耀. 依据职业标准构建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J]. 传播与版权,2018(11):102-103.
- [8]张继明.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及其优化[J]. 现代教育管理,2020(6):7-13.
- [9]郭艳琳,高龔,孙辰宇.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信息传播的转向及革新策略初探[J]. 北京教育(高教),2020(6):45-47.
- [10]王圆方. 高校广播电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以《广播节目制作》为例[J]. 西部广播电视,2018(10):54-55.
- [11]范凯. “四位一体”的影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与论证[J]. 教育传媒研究,2020(1):62-64.
- [12]李成林. 基于翻转课堂和全过程考核的教学考核模式改革研究: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影视制作实验系列课程为例[J]. 内蒙古教育,2020(1):30-32.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 Production Major in the New Media Era

ZHANG Yongqiang

(College of Media,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new media era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 production special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 production majo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path, such as building elite training mode, enrich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adding new media courses,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vel, and so on.

Key words: new media;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 production major, development path

基于云班课的亲验式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以《运输管理》课程为例

张媛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亲验式教学是指导学生通过亲身操作或体验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一种教学模式。云班课APP可以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即时互动、资源推送和作业任务。以《运输管理》课程为例,从课前准备、课堂互动、课后总结三个环节详细阐述了基于云班课实现亲验式教学的模式设计思路 and 措施。

关键词:亲验式教学;云班课;运输管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20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102-04

亲验式教学是指导学生通过亲身操作或体验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一种教学模式,能够促使学生变被动听课为积极思维、主动实践,在强调实践应用和创造力培养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当中具有重要地位。

对于经管类专业而言,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亲验式教学方法主要有案例分析、情境模拟(如情境性讨论、管理游戏)等,这些具体方法的实施以恰当的素材资源为依据。一些教师根据多年的授课经验,搜集或编写了众多案例,以及富有趣味的小故事、小游戏等并在课堂上使用,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亲验机会。但是,经过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并且主要还是线下开展,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当前的技术和经济大环境下,教师更应该基于移动互联网开展亲验式教学,而如何有效运用移动交互平台进行亲验式教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学改革趋势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可见,教学信息化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活动必将实现融合。积极应用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使课堂教学由单向式转向交互式、教学评价由单一化转向过程全面化。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通过亲验式教学,提高课堂参与度,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专业能力是学生把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如《运输管理》课程要求学生为完成“把一批钢材从北京运到上海”这一任务,而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设计运输作业活动及确定合理运输路线。方法能力包括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计划决策能力和评价能力。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让学生在课下自主自动的完成学习,储备知识。在完成专业任务时,要会做计划、做决策。任务实施后要会评价总结。学生最终是要面向企业、走向社会的。我们还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主要包括与成员一起完成任务的团队协作、沟通交流的能力,诚实守信、自信心、开拓创新、爱岗敬业等。

二、传统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运输管理》是物流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

收稿日期:2020-01-21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跨境电商背景下国际贸易专业的转型”(2018GGJS176)

作者简介:张媛媛(1981—),女,宁夏银川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物流管理。

在整个物流管理课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课程主要介绍公路运输、水路运输、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等几大运输方式的基本原理和运作实务,课程在内容上的特点是比较细致、严谨、缺乏趣味性。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下会存在如下问题。

1. 授课效果完全依赖于教师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整个授课过程教师不仅是编剧和导演,更是主演。事实上教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开展科学研究,并把科研反哺教学。所以,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语言能力强的教师,还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语言能力不是很强的教师,即使科研成果丰富,学生也很容易产生意识疲劳,更有甚者还会产生厌恶感,课堂教学中就会频频出现学生睡觉、玩手机、思想不集中等现象。

2. 不利于课堂互动

在传统课堂模式下,往往是教师先传授知识给学生,也就是告诉学生“这是什么”,学生被动地接受“这是什么”的知识,之后教师可能会在课堂上留有时间来解决个别积极学生的“疑问”。这种教学难以调动绝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学

生没有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甚至没有理解知识点,没有思考“为什么”,这样被动接收到的知识没有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3.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传统教学以知识传递为主,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方法、价值观的形成等关注不够。学生除了汲取知识营养,还要能够有条件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主动寻找或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传统的教学模式显然是无法充分保障的。

三、“云班课”支持下的亲验式教学模式

云班课是一款基于移动互联网环境的课堂互动教学 App,它能够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即时互动、资源推送和作业任务。云班课的评价体系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参与,学生可以在云班课上通过完成教学任务获取相应的经验值。

将云班课应用于《运输管理》课程,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参与度低,学习积极性差的问题。在课前、课中、课后都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且提高了师生互动频率与效率,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基于云班课的《运输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设计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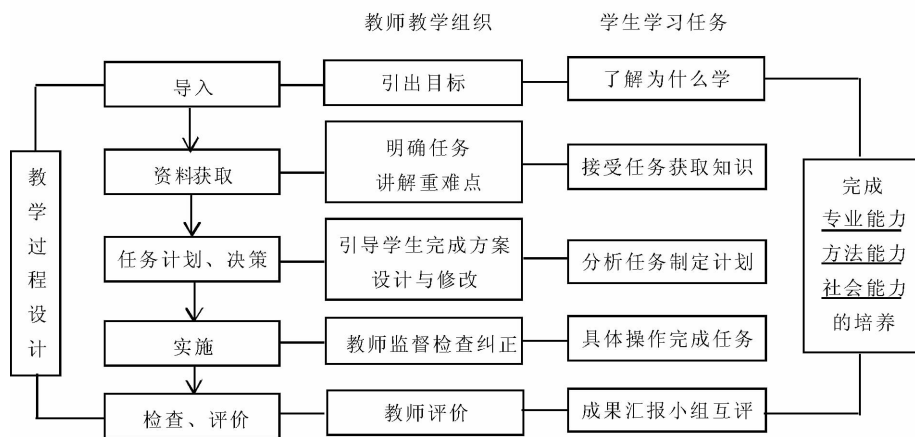


图 1 教学过程设计图

1. 导入

教学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导入阶段。导入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明确学习的目的,这一环节可分为两个部分进行,一是课前准备,二是课堂导入。

(1) 课前准备

课堂教学时间是有限的,要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课前准备是关键。教师在精心备课的基础上,在课前通过蓝墨云班课的手机端或者电脑端向学生发布能够引起学生注意、兴趣的学习资源和课前任务。在云班课中上传的资源类型比较丰富,包括 Word、PPT、Excel 在内

的各种文档,或者网页链接资源、视频资源等。

教师对这些上传的资源可以设置学习目标。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和想法,可以发布在云班课的“答疑/讨论区”。教师也可以在“答疑/讨论区”提出问题以鼓励学生思考,为每一位提出疑问的学生加相应的经验值。收集了课前学生的疑问后,教师的备课更加具有针对性。

同时,教师还可根据学习资料的难度来设定每个上传资料的经验值。如果学生查看并学习了该资源,学生的经验值就会增加。云班课会对每个学生的资源学习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

教师可以在课前通过云班课的“头脑风暴”“投票”“测试”或“小组作业/任务”等活动布置几个课前作业,如提问本视频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这样确保学生能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学习。

(2) 课堂导入

在课堂导入阶段,教师收集学生对课前发布资源学习后的疑问与想法,以此作为切入点引出学习的目的。带着疑问,学生会很快进入学习情境,了解为什么学习以及学什么。这样的课堂导入更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资料获取

教学过程的第二阶段是资料学习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环节。

(1) 任务

教师首先明确这一过程的学习任务。一般情况下,学习的任务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可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沟通交流等能力。例如在公路零担运输这个单元模块,可以在云班课上发布“小组作业/任务”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情景模拟整个公路零担运输业务流程。学生接受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学生接下来要获取相关的知识。

(2) 知识

教师讲解与任务相关的重要知识点。知识的获取一部分来源于课堂上教师的传授,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课下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可利用智能手机做载体,使用云班课进行多元化的课堂教学,从而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

云班课的“课堂表现”有四大活动:举手、抢答、选人(随机选人和手动选人)、小组评价。

举手:教师端发起“举手”活动,学生端可以点击参与举手。举手学生的头像和姓名就会显示出来,教师选取一位或多位学生来发言。

抢答:教师端发起“抢答”活动,学生端点击进行抢答,抢到回答权的学生就像中奖一般,非常兴奋。

选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随机选人,就是教师拿起手机“摇一摇”,可以将回答问题的学生概率随机化,带着一种趣味中奖的形式,课堂学习气氛更加活跃;另一种是手动选人,教师可根据名单选取学生,这种方法可以为一些总是“抢答抢不到、摇也摇不到、积极性又很高的”学生提供更多机会。

小组评价:通过云班课 APP 进行学习分组,引入团队合作,以集体荣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基于云班课的“课堂表现”活动,教师可在课堂

上根据不同的教学情境设计,选用合适的活动,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中。学生发言后,教师根据发言情况进行相应的点赞、加经验值。学生获得经验值后有即时的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使学生能更加认真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云班课 app 根据经验值的多少进行学习排名,学生在 app 上随时可以看到自己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经验值,对自己和他人的平时表现有相应的了解。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经验值排名,会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师发起的各种活动,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学习主动性。

以公路运输优缺点这一知识点的学习为例。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难以达到让书本上的知识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而基于云班课的亲验式教学模式可以这样做:随机选取两位学生,或者,如果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还可以进行举手或抢答来确定两位学生,然后由一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或所见所想来描述一个场景或举个例子,另一个学生来猜这位同学想要表达的是公路运输的哪个特点。这种由教师引导、学生互动学习的方式能够让学生主动去思考、总结,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主动获得的知识才会被加工与记忆,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储备。

再有,同样是一个启发性的问题,在传统教学中,学生不愿意互动,碍于面子不参与。但在云班课的亲验式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针对某个问题发起“头脑风暴”活动,随时和学生互动,如提问“你认为什么样的运输是质量好的运输”,经过两到三分钟的头脑风暴,让每一个学生在云班课 APP 上进行发言,多样的思维、自由的发言,学生参与的热情增加了。教师还可将这一活动投屏到大屏幕上,把大家的发言进行分享。教师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点评,加深同学们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尤其当学生的观点与老师的一致时,会让学生很有获得感和成就感。通过这样的过程有助于帮助“内敛”的同学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方便了教师了解所有学生的水平和想法。

3. 任务计划、决策

教学过程的第三阶段是任务计划、决策阶段。针对上一阶段的任务——情景模拟整个公路零担运输业务流程,教师引导学生完成方案的设计与修改,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析任务、明确分工并制定计划方案,并把制定好的方案上传到相应云班课活动中。

4. 实施

教学过程的第四阶段是实施阶段。学生依据制定好的方案进行具体操作,来完成任务。教师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检查及纠正。

5. 检查评价

教学过程的第五阶段是检查评价阶段。学生对任务完成的情况做成果汇报。针对上一阶段的任务——情景模拟整个公路零担运输业务流程,汇报的成果有两个,一是业务流程图,二是小组成员分角色扮演整个流程。通过此项任务的完成,学生亲身参与到公路零担运输业务流程中,对流程中各个环节、业务中各个细节都能亲身感受到,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汇报结束后由教师和学生共同评价此次任务的完成情况。在云班课相应“小组作业/任务”中进行评价。让学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一是可以让学生有参与感,不再是教师“说了算”,二是锻炼了学生客观、公正的评价能力。

四、云班课亲验式教学课程反馈体系设计

1. 课后总结

教师授课后的反思与总结有助于教学经验的积累。同时,总结不应只是教师来进行,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表明了学习与思考之间的辩证关系。思考对学生来说意义很重要,有助于学习加强对所学的内容理解,因此在教学中要给学生自我总结的空间。在云班课上,每节课或者每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后,教师发布一个课堂总结的活动,由学生来总结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学习的感受、自己的理解与反思、接下来的打算。在这个活动中,学生通过回忆可以理清知识的脉络,通过描述自己的学习感受来强化学习兴趣,通过表达对所学知识的观点学会了独立思考,通过决定接下来要干什么强化了对学习的热情与兴趣。

2. 测试

发布测试活动时,教师端可以设置答题的时间和答题的次数。在《运输管理》课堂的测试中,通常不限答题次数,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测试。

每个学生都有好胜心,都想在测试中获得满分。如果学生做完一遍提交后没有获得满分,他会及时自我检查、再做一遍,争取拿到满分,直到时间截止为止,学生都在尝试获得满分,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积极性。测试活动结束后,学生能够查看自己答题的情况,哪个题目没有回答正确一目了然。教师可以看到此次测试的具体数据分析,针对正确率低的题目进行讲解,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记忆。

3. 学情分析

学生每参与完成一个云班课的活动,都会获取相应的经验值。云班课 APP 会对每个学生的经验值做详细记录并形成学习报告。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教师可以轻松掌握班级、学生个体的学习情况,从而总结相应的教学经验,做到以教促教,以学促教。

五、结束语

亲验式教学模式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来获取知识。而云班课 APP 的使用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云班课在《运输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教学效果显著提高,对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在高校其他课程的教学中进行进一步推广与应用。但《运输管理》的课程教学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云班课 APP,结合慕课、翻转课堂等丰富的教学手段,才能全方位实现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 [1]张媛媛. 市场营销专业亲验式教学资源库建设与系统实现[J]. 大众科技,2011(9): 197-211.
- [2]谭春兰.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践[J]. 物流工程与管理,2016,38(6): 219-220.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ential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loud Class

——Taking the Cours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s the Study Case

ZHANG Yuan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Experiential teaching refers to a teaching mode in which students acquir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rough their own operation or experience. Cloud class app can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real-time interaction, resource push and homework task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essay takes the course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s the study case, to elaborate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s to implement experiential teaching based on cloud class from three aspects: pre-class preparation, class interaction, and post-summary, which can be further extended and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other subjects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experiential teaching; cloud class;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疫情下高校在线教学中 学习空间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分析

胡 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线教学正在我国高校全面铺开,在线教学的发展迅速改变了既有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短期内给学生带来了新的体验。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学习情绪、学习空间和环境噪音”等都会影响学习效果,因此尝试构建“多元学习空间”,改善学生情绪,构建学习空间,降低环境噪音,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关键词:学习空间;在线教学;高校;智慧教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21

中图分类号:G43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106-04

一、学习空间

(一)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 Diana Oblinger(2006)在《学习空间》提出“Learning Space”的概念,在她的努力下《Journal of Learning Space》于2011年创刊^[1],在此之后“学习空间”概念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目前对于学习空间的界定、理念的阐述不尽相同,国内学者杨俊锋^[2](2013)等人对学习空间的界定为“学习空间通常指整个学校的学习环境”,指出学习空间包括正式、非正式和虚拟三种;许亚锋^[3](2015)等在综述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将“学习空间”看作一个整体,界定为“用于学习的场所”,且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胡永斌^[4](2016)在《网络学习空间的分类:框架与启示》一文中指出“需要加强对网络学习空间的科学分类,减少争议和分歧,更好的建设和利用网络学习空间,并且提出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是信息时代下,智慧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余继、闵维方^[5](2018)指出“学习空间通过学习中的情绪行为,包括愉快、安全感、归属感等积极情绪或焦虑、害怕失败、不安全等负面情绪,影响学习的认知活动;学习空间的物理环境要素,包括光线质量(强度和来

源)、桌椅布局、噪音水平、空气质量、电源插座配置、Wi-Fi、私密度、人员密度、弹性化程度、视觉激励效果,以及空间氛围等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王致远、江丰光^[6](2020)指出“学习空间物理因素如环境噪音、光线、桌椅布局等都会影响学习者对学习空间的满意度和学习绩效,尤其是环境噪音对学习绩效影响最大”;邬大光、李文(2020)通过对全国高校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调研表明“学生的学习空间及终端设备支持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非常重要占比34.89%,重要占比40.48%)”^[7]。

(二)学习空间的界定

综上所述,学习空间不仅仅指学校课堂,学习能够在任何场所进行,因此把学习空间的概念界定为“用于学习的场所”,既包括物理学习空间,又包括虚拟学习空间;既涵盖正式的学习空间,也涵盖非正式的学习空间。

二、疫情下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现状

(一)在线教学的课程类型

在线教学课程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理论讲解类课程,授课形式为“讲授语音/视频+PPT”,其中的语音/视频既可以是实时直播,也可以

收稿日期:2020-05-13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基于智慧教室开展《市场营销》课程情景教学的实践研究——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186120017);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级重点项目“市场营销专业‘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045111)

作者简介:胡钰(1977—),女,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和教学管理与创新。

是线下录制,比如管理学基础等;二是软件演示类课程,通过“屏幕分享”能够让学生看到操作过程,比如 Photoshop 等课程;三是硬件操作类课程,这类课程需要教师课前录制好手工操作展示过程,教学中教师边播放边讲解,比如化学实验或者艺术设计类课程;四是学生反馈类课程,需要教师在与学生的反馈互动中进行实时指导,体育课就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二) 在线教学形式

目前实施的在线教学形式大致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网络实时直播授课,类似面对面授课,教师主导教学活动,对设备和技术要求较高;二是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其形式类似课堂自习,学生可以利用笔记、网盘、社交媒体等工具完成学业,学生主导整个学习过程,这种形式需要有课程资源作保障;三是“课程直播+自主学习”,其形式是前两种形式的“混合”,教师和学生互为主导和主体,教学活动按照课堂需求在两种教学环境中进行切换。

(三) 在线教学平台

在线教学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在线教学资源与教学平台,如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学堂在线等,这类平台适合学生自学和教师在线教学;二是在家自助直播平台,如腾讯会议、钉钉、企业微信等,这类平台适合于当下的疫情防控形势,学生在家操作简单易行;三是既能满足网络课堂教学要求,也能进行线上预习、作业布置与批改的平台,比如雨课堂;四是在线教学管理答疑交流平台,可利用企业微信、微信和 QQ 进行线上布置、答疑、督促和评估班级学生自主学习情况。

(四) 在线教学满意度与学习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在线教学的满意度与学习效果并没有原来预计的满意度高,选择三个类型的高校进行了数据分析,情况如表 1。

表 1 在线教学的满意度

高校类型/名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河南大学(综合性)	约 61.8%		约 38.2%	
河南师范大学(专业型)	9%	40%	45%	6%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应用型)	25.24%	48.32%	24%	2.45%

综合性大学以河南大学为例,该校的学生认为具有最佳学习效果的教学方式为传统的课堂教学,占调研人数的 49%,其次是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比例为 33%,效果最不好的反而是教师网络直播教学,比例为 8%;专业类大学以河南师范大学为例,该校统计数据表明,学生对在线教学的总体满意度

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但是总体情况不容乐观,非常满意占 6%,满意 48%,一般占 40%,非常不满意也是 6%;网络学习效果也呈现同样的分布状态,满意和非常满意加起来是 49%;一般占了 45%,不满意占了 6%;应用型学校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该校的同学认为在线教学中,学习效果“好”的最多,占 41.05%,非常好的占 21.48%,效果好的比例合计为 62.53%。

三、高校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 平台选择多,学生负担重

据梁剑^[8]的调查显示,每位教师使用的平台数平均为 2.16 个,每位学生平均为 2.99 个。其中,使用 1 个教学平台的教师占 17.65%,使用 2 个的教师占 54.06%,使用 3 个的教师占 24.31%,使用 4 个的教师占 3.09%,使用 5 个及以上的教师占 0.89%。使用 1 个教学平台的学生占 9.24%,使用 2 个的学生占 33.71%,使用 3 个的学生占 30.70%,使用 4 个的学生占 13.31%,使用 5 个及以上的学生占 13.04%。据不完全统计,在疫情初期,学生学习终端安装的在线教学平台一般是 4—6 个,多的达到 9 个,线上教学平台多而且分散,增加了教师学生使用和选择的焦虑。

(二) 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在学习效果满意度调研中,河南大学统计数据是“一般和不满意占 38.2%”,河南师范大学的数据是“一般和不满意占 51%”,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一般和不满意占 26.45%”。在线教学的总体满意度不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四、影响学习效果的原因分析

学生在校学习时,会遵从学校的作息时间和教学秩序,疫情期间在家,虽然在线教学时间安排还是一样,但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改变了,即“学习空间”发生了变化,学习效果受到了影响,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在校与居家“学习空间”变化之比较

类型	疫情期间居家			在校		
	学习情绪	学习空间	环境噪音	学习情绪	学习空间	环境噪音
强弱程度比较	高		√	√	√	
	低	√	√			√

(一) 学习情绪方面:社交和生活环境封闭化,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热情和态度受到影响

疫情期间封闭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会导致心情的压抑与焦虑,同时也会导致社交圈子缩小,信息渠道和信息量的减少,反映到学习状态上就是学习动力

不足,学习热情不够,学习态度不够积极,反应在课堂上就是不能积极跟随教师上课的节奏,互动讨论时不能及时发言,反应迟缓。

(二)学习空间方面:学习和居家休息环境交叉,学习、休息界限感模糊甚至缺失

大学生正常的生活状态是在教室或者图书馆学习,休息是在宿舍,锻炼身体去操场或者体育馆,娱乐和休闲去城市综合体。但是疫情期间,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在家里进行,学习、锻炼、休息各种活动之间界限模糊甚至缺失。学生在线学习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开始缩短,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三)环境噪音方面:受学习设备和网络的影响比较大

从河南大学的统计数据来看,81.5%的学生手头均配备了电脑,100%的学生均配备智能手机;45.5%的学生使用电脑进行网络学习,48.5%的学生使用手机进行网络学习,6%的学生使用平板电脑等工具进行网络学习;81.3%的学生家中有WIFI或者可以蹭到WIFI,18.7%的学生需要使用手机流量进行网络学习。学习终端的移动化直接导致了环境噪音的变化,在环境噪音比较小的地方,学习效果会好;环境噪音比较大的地方,学习效果就会降低;其次网络情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网络信号的强弱程度也直接影响课堂效果。

五、构建“多元学习空间”,共同提升学习效果

多元学习空间(iSpace)^[8]的概念是2011年由台湾朝阳科技大学提出,因为时代、科技与社会的快速变迁,学校有意将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生活作更密切的结合,将波锭纪念图书馆地下室自修区的部分空间改建成一个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空间。这个空间被命名为“iSpace”(多元学习空间),即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空间(我的空间)。2014年,美国亚利桑大学图书馆将信息共享空间改造为创客空间,并命名为iSpace。在iSpace里,给予学生最大使用权限、提供创业指导和构建联合办公(co-working)场所。多元学习空间是创设“以学生为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鼓励自主学习”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让学生身在其中,心也在其中。

(一)按照时空分离原则,构建“多元学习空间”,做好功能模块分区,让学习空间有界限,降低环境噪音干扰

人的生物学专一性决定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只做一件事情,效率才能实现最大化,尤其是学习这样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根据这个原则,指导学生居家构建“学习——休息——锻炼——社交”功能分区模块,让学习和其他模块在物理空间和时间内与其他模块分离开来,让各个功能模块保持“距离

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只做一件事情,清空大脑,放松身心。比如“学习空间模块”,上课、做作业、答疑都在个空间里进行,出了这个区域,就不再处理学习方面的事情,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不能在“学习空间”里处理,需要到相应的空间里去做。



图1 “多元学习空间”构建图

疫情期间,学生使用移动终端上课的比例非常高,上文中河南大学的统计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超过一半的学生使用移动终端进行在线上课,随时移动的在线课堂就会随时受到环境噪音的干扰,直接影响学习效果。

指导学生在功能模块分区的同时,也要剔除环境中可能会产生的噪音干扰,把学习空间尽可能设置在偏僻和远离“社交”和“娱乐”空间模块处,尽可能地降低环境噪音。

(二)搭建“网上学习资源库”,建设线上“学习空间”

教师可针对教学内容,搜集大量的教学资源,并进行合理的设计和运用,扩增教材的知识容量,构建更丰富立体的学习资源空间。原来的教学是以传统教学为主,网上资源库为辅,这次疫情的爆发,大规模在线教学的实施,也暴露了在线学习资源库建设的短板,因此,借由这次机会,教师可以把大量高质量的开放性课程资源如慕课、微课、在线课程等等都可以做成辅助教学资料,这些资源可以是图片、视频、各种文件资源和网页链接的形式,做到课前预习有内容,课堂讨论有难度,课后复习有深度,和在线教学互相配合,构建立体化的学习空间,共同助力于学习效果的提升。

(三)搭建“分享”空间,鼓励同学们参加分享,激发学习兴趣

在调研中,学生反映还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效果最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分享”。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教室里,师生交流互动及时,学生之间

相互陪伴,分享思维火花,教室不仅是一个学习空间,其实也是一个分享空间。在线教学平台虽然也搭建了一个学习空间,但满足的是课堂教学需要,分享功能弱化。因此,我们可以搭建线上“分享空间”,提升学习兴趣和改善学习态度。

(四)搭建“支持空间”,为提升学习效果提供支持

1. 优化教学平台,构建灵活教学模块,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满意度

据邬大光课题组对 97 所高校线上教学质量报告文本分析,97 所高校一共使用了 66 种在线教学平台,其中高校/政府平台共 11 种,占比 17%,市场化平台共 55 种,占比 83%。从教师和学生的使用评价来看,各类教学平台基本上满足了线上教学的最基本需要,但是距离满足教师“平稳流畅地把教学内容传送给学生”和学生“互动是否能够及时有效的反馈”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优化教学平台,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问题导向的学习需求。

在线教学不是传统课堂教学内容的搬迁,教师可以根据自己课程的特色,在满足人才培养方案的前提下,采用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网络课堂教学。中山大学中文系,遵循人文学科的特点,基于平时长期实行的“全程导师制”,和平时的阅读设计相衔接,搭建了“大一普通作文、大二图书评论、大三学年论文、大四毕业论文”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写作学习计划,在疫情期间,让学生静下心来自我阅读和思考,鼓励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家阅读与写作,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开设心理调适课程,缓解学习焦虑

针对疫情期间学生的学习情绪问题,我校专门开设了心理调适课,由专业的心理学老师通过实操课程来进行讲解,学生在线收看同时可以在家进行模仿和操作,缓解学习压力和焦虑。

参考文献:

- [1] DIANA O. Learning Space [EB/OL]. <http://www.educationcause.edu/research-and-publications/books/learning-spaces>, 2020-07-20.
- [2] 杨俊锋,黄荣怀,刘斌. 国外学习空间研究述评[J]. 中国电化教育, 2013(10): 15-20.
- [3] 许亚锋,尹晗,张际平. 学习空间:概念内涵、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3): 82-94.
- [4] 胡永斌,黄如民,刘东英. 网络学习空间的分类:框架与启示[J]. 中国电化教育, 2016(4): 37-42.
- [5] 余继,闵维方. 学习空间对大学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8(6): 79-88.
- [6] 王致远,江丰光. 学习空间对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影响的调查研究:基于环境心理学视野[J]. 教学研究, 2020(5): 10-21.
- [7] 邬大光. 教育技术演进的回顾与思考: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高校在线教学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4).
- [8] 梁剑. 疫情背景下高校“云课堂”在线教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J]. 中国多媒体与在线教学学报, 2020(5).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f Learning Space on Learning Effect in Online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U 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Online teaching is spread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teaching has changed the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styles. It has brought new experience to students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the survey result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how that students'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 are not satisfactory. Through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found that “learning emotion, learning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noise” will affect the learning effect. Therefore, the author tries to construct “diversified learning space” to improve students' emotion, construct learning space, reduce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strive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Key words: learning space; online teaching; university; smart classroom

动载荷对塔式起重机的危害及防止对策

王继东, 杨海鹏, 孙海玲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从塔机的结构特点、作业特点和环境特点出发,结合作者数十年的工程应用经验,分析了各种动载荷对塔机结构的危害,提出了动载荷是造成塔机结构损伤和倾覆事故的主要因素,并从载荷计算、操作使用、自动控制三方面给出了降低动载荷对塔机危害的综合性策略。

关键词:塔式起重机;动载荷;危害;措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22

中图分类号:TU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110-05

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是一种工程建设必备的重要设备,广泛应用于水利、电力、冶金、化工、民用建筑以及一带一路等工程建设中。由于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塔机保有量稳居全球第一。与此同时,每年塔机的事故数量也属全球最高,虽然国家把塔机列为特种设备,对其制造、加工和使用环节严加管控,塔机的安全事故依然居高不下。塔机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塔机结构的严重损坏,影响工程建设的进度,还严重威胁着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如何避免塔机安全事故,保证塔机的使用安全,始终都是国家安全管理部门和塔机技术人员一直关注的重要课题^[1]。本文从塔机的结构特点出发,分析了塔机构件损伤和整机倾覆事故的原因,认为动载荷的作用是引起塔机构件损坏,导致倾覆事故的主要因素,并给出减少动载荷危害,防止倾覆事故发生的相应对策。

1 塔机的结构特点及倾覆事故的原因分析

塔机按变幅方式分为小车变幅式和动臂变幅式;按塔机能否行走,分为行走式和固定式。图1和图2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固定式塔机,也是工程建设中最为常见的塔机机型。塔机主要由固定基础、塔身、回转机构、升降机构、平衡臂(或机台)、起重

臂、起重小车(或动臂变幅机构)、塔顶、司机室、顶升机构、引进小车和电气控制系统等部件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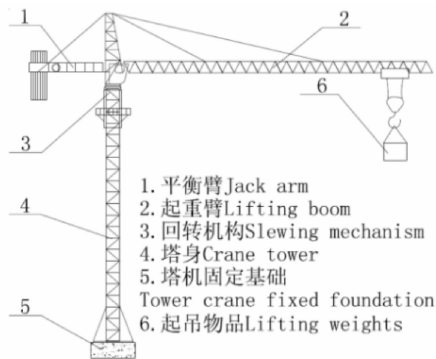


图1 小车变幅式塔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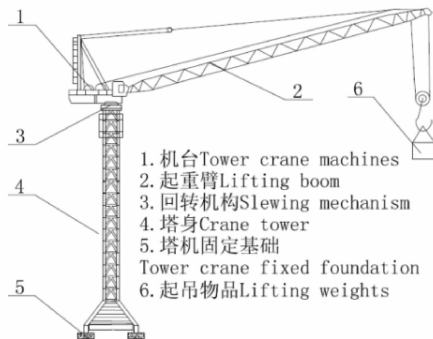


图2 动臂变幅式塔机示意图

收稿日期:2020-05-20

基金项目:2018年河南省高新技术领域科技攻关项目(182102210598);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创新团队项目(CXTD2017K4)和可持续发展建筑研究项目(CXTD2018K2)

作者简介:王继东(1965—),男,河南太康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建筑施工机械自动化技术。

从塔机的结构组成可以看出,塔机构成的主要特点是:①由较多的钢结构部件组成;②钢结构部件主要通过焊接加工而成;③结构部件之间主要通过销轴或高强螺栓连接;④塔身的高度较高;⑤起重臂的长度较长。另外,塔机还具有重复、间歇、循环、起(制)动频繁的作业特点,以及长期工作于户外、作业环境恶劣的环境特点^[2]。

通过对多年的塔机事故案例分析发现,塔机最常见的事故是塔机倾覆、起重臂折断、塔身折断、机构损坏等等^[3]。其中,塔机倾覆危害非常大,不仅影响工程建设的工程进度,还常常伴有机毁人亡。引起塔机事故的因素很多,塔机结构较为复杂、连接点较多,操作人员的违规超载、超行程、超级别、超风速及超低温使用,以及安装、拆卸不规范、作业环境恶劣等等。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但其实质就是这两类因素引起了塔机承受载荷的较大变化,造成塔机零部件上的一些应力较大或存在缺陷的区域损伤和撕裂或导致塔机结构疲劳破坏。有关研究表明塔机的动载荷在塔机的一个工作循环中均可能存在。统计表明,约90%的结构损坏是因疲劳引起^[4]。由于塔机结构特点、工作特点和环境特点的特殊性,在塔机工作时,作用在塔机上的载荷除常规的静载荷之外,还存在着许许多多动载荷的作用,因此要避免倾覆事故的发生,降低塔机动载荷的影响至关重要。

2 塔机动载荷种类及其危害

动载荷,就是随时间急剧改变的载荷。对塔机而言,动载荷主要有惯性载荷、振动载荷和冲击载荷三种形式^[5]。动载荷的剧烈变化,会引起塔身结构的动态响应,较大的动态响应会造成塔机构件的损坏。

2.1 塔机的惯性载荷

惯性载荷是在加速度作用下产生的与结构质量相关的一种载荷。塔机的惯性载荷,包括各机构的起(制)动过程中的惯性载荷、塔机各旋转部件及起吊物品在旋转时产生的惯性载荷。因塔机操作人员错误操作或违规操作,引起的起(制)动过猛,越级换挡或者机构调速失效都会产生较大的惯性载荷。尤其是起重臂较长的塔机,转动惯量较大,在其旋转时,快速打反车或突然刹车时,将会产生风险很大的惯性载荷,引起钢结构焊缝开裂,导致起重臂或回转机构的损坏,严重时,会导致倾覆事故。塔机升降机构工作时,快速打反挡、快速换挡或紧急停车也会造成惯性载荷过大,反复作用的惯性载荷会引起钢丝绳脱槽或断裂,引起塔机失稳发生倾覆事故。

2.2 振动载荷

振动载荷是在短时间内以很大的速度作用于构件上的载荷。对塔机而言,塔机整体结构可以看成是一个弹性系统,当升降机构骤然加(减)载时,会引起塔机的弹性振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振动应力,相应于该应力的载荷属于振动载荷。振动载荷对塔机的疲劳强度有较大影响,振动载荷具有反复性和峰值较大的特点,常常会引起塔机脆弱的节点疲劳损坏。^[6]笔者曾参加过数十次塔机安装调试工作,对此深有体会。在满载吊起或放下重物的瞬间,整个塔身会出现振幅巨大的反复颠簸震荡,机台上的工作人员几乎无法站立和行走。这种周期性强、振幅很大的震动载荷对塔身结构危害巨大,长时间出现会导致塔身焊缝或有缺陷的杆件断裂,引起塔机失稳,导致倾覆事故。在研究塔机倾覆事故案例时发现,有不少事故案例是由于塔机起吊物品捆扎不牢,在起吊过程中物品突然滑脱,也就是骤然减载所引起的。还有一些案例是由于塔机起升卷扬机构过卷或冒顶,导致塔机突然加载引起的。

2.3 冲击载荷

在很短时间内以很大的速度作用于构件上的载荷称为冲击载荷。冲击过程实质上就是冲击动能转变为塔机弹性体的变形位能,并使塔机产生反复振动的过程,反复的振动会使塔机产生巨大的应力尖峰。比如,在塔机进行提升物品操作时,如果起升钢丝绳处于松弛状态,突然把物品以较高的速度提升离地,就会引起很大的冲击载荷。过大的冲击载荷,会使塔身反复振动,垂直度超差过大,致使塔身重心产生巨大偏移,造成塔机失稳,引发塔机的倾翻。另外对于轨道移动式塔机而言,当塔机大车行走通过轨道接头时,如果接头处缝隙过大,轨面高差超限,也会产生很大冲击载荷,严重时,会导致塔机行走台车脱轨,引起倾覆事故的发生。

3 减小动载荷对塔机危害的措施

综上所述,塔机动载荷过大,会导致塔机构件的疲劳破坏,造成塔机倾覆。动载荷是引发塔机倾覆事故的重要因素。由于塔机的结构、作业及环境特点比较复杂,动载荷的产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在塔机设计时,采取措施提高塔机抗疲劳、抗屈曲和抗倾覆的能力,在塔机使用时,采取先进的控制手段减小塔机动载荷的影响,对避免塔机疲劳破坏和塔机倾覆事故是非常有必要的。多年实践表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3.1 充分考虑动载荷的影响以提高塔机抗疲劳、抗倾覆的能力

在塔机设计过程中,尤其是进行承载能力验算、

防屈服、防疲劳,防弹性失稳抗及倾覆稳定性验算时,应充分考虑在塔机作业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动载荷的影响,一般是通过乘以一个动载系数的方式加以考虑。依据塔机的结构特点,在设计验算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种动载荷的影响。

3.1.1 与塔机的升降过程相关的动载荷

该类动载荷主要考虑以下三种:自重振动载荷、起升动载荷和卸载动载荷。

(1) 自重振动载荷

在起吊载荷突然离开地面时,或者突然部分或全部卸除载荷时,以及在下降过程中突然制动停车时,塔身自重将因出现震动而产生脉冲式增大或减小的动力响应,称之为自重振动载荷。在进行载荷计算时应加以考虑,该振动载荷的大小用塔机自重 F_G (其中钢丝绳的质量按起升高度的50%计算)乘以起升动载系数 φ_1 来取得。为反映该振动载荷的上下限, φ_1 一般在0.9~1.1之间选取^[7]。

(2) 起升动载荷

在塔机起升载荷突然离开地面传动机构加速时,将会引起塔机结构的动力效应。在计算这种工况的载荷时,可用起升动载系数 φ_2 乘以额定起升载荷 F_Q (包括起吊物品的质量、吊具质量及钢丝绳的质量,其中钢丝绳的质量按起升高度的50%计算)。

φ_2 的大小与起升速度有关,可通过公式(1)进行计算^[8],一般在1~1.25之间。

$$\varphi_2 = 1 + 0.35V \quad (1)$$

式中: V ——载荷的起升速度(m/s);

(3) 卸载动载荷

在塔机正常作业时,如果在空中突然卸除全部载荷或部分载荷,或者起吊物品因固定不牢而滑脱,由于载荷的突然变化,会对塔机的结构产生减载振动作用,这种作用对塔机的结构和抗倾覆稳定性具有严重影响,因此应加以考虑。减载后的起升载荷的大小用塔机的额定起升载荷 F_Q 乘以卸载动载系数 φ_3 来计算^[9],卸载动载系数 φ_3 可按公式(2)计算选取。

$$\varphi_3 = 1 - 1.5 \Delta m/m \quad (2)$$

式中: m ——总起升质量(kg); Δm ——卸除部分的质量(kg);

3.1.2 运行动载荷的计算

因行走机构和回转机构的起(制)动或运行中碰到障碍物引起的动力效应,称为运行冲击载荷。它包括行走惯性载荷和回转离心力载荷。

(1) 行走惯性载荷

塔机或起重小车在轨道上行驶时,由于轨道的

接头间隙和轨面的不平整而产生的垂直方向的冲击效应,称为行走惯性载荷。其大小可按公式(3)计算。

$$F_H = 1.5(F_G + F_Q) \times \varphi_4 \quad (3)$$

式中: φ_4 ——运行冲击系数(当运行速度 $\leq 1\text{m/s}$, φ_4 取1.1;当运行速度 $> 1\text{m/s}$, φ_4 取1.2);

(2) 塔机回转时的离心力^[10]

塔机在做回转运动时,各旋转部件和起吊物品会产生离心力,离心力的大小,可用这些部件的质量、回转速度及部件质心的回转半径来计算,悬挂的总起吊载荷可看成与起重臂端部的刚性连接,总起升载荷和部件的离心力均按最不利的位置进行计算。在计算离心力时 φ_5 取为1。一般情况下,离心力对结构起减载作用。

(3) 加(减)速度载荷^[11]

当传动机构加(减)速、意外停机或机构突然失效时,承载结构或机构所受到的载荷,可通过刚体动力学方法进行计算。计算时,假定总的起吊载荷固定于起重臂架的端部或直接悬置在于变幅小车的下方。为了反映塔机在加(减)速过程中,弹性振动使载荷增大的影响,可用按公式(4)来计算加(减)速度载荷 F 。

$$F = F_\omega + \varphi_5 \times \Delta F \quad (4)$$

式中: φ_5 ——动载系数, F_ω ——加(减)速前的载荷, ΔF ——驱动力(或制动力)引起的载荷变化值。

φ_5 的值与传动机构的驱动力(或制动力)的变化、系统的刚度、质量的分布及钢丝绳悬挂位置有关,其范围是: $1 \leq \varphi_5 \leq 2$ 。

当驱动力(或制动力)的变化比较平稳时, φ_5 取较小的值;当驱动力(或制动力)的变化比较剧烈时, φ_5 取较大的值,具体取值可参考起重机设计手册。

3.2 编制严格的操作规程

从上述对塔机的结构特点及倾覆事故的原因可知,大部分塔机安全事故是由于操作者不规范或违规操作造成的。有关研究报道,在塔机安全事故中,因操作人员违章操作引起的事故占比80%^[12]。因此,要避免塔机因过大的动载荷、周期动力效应引起的疲劳破坏和塔机倾覆,必须规范操作人员的操作行为。除塔机使用单位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技术培训外,塔机设计单位必须在塔机使用说明书中编制严格安全操作规程、操作程序、安装流程和注意事项,禁止操作人员的超载、超幅度、超风速和超低温等违章作业,禁止快速换挡、突然打反档、频繁

急停车等违章操作。另外,力矩限制器故障或损坏、起吊吨位和工作幅度不能明确显示时,也应禁止操作。安装调试、拆卸、储存及运输时都应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

3.3 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控制和调速手段减小动载荷的大小

由于操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技术能力各有不同,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要完全靠操作人员的规范操作来避免动载荷的危害有一定的难度。因而,提高塔机的自动化控制水平是提高塔机安全可靠性的必然要求。随着 PLC 技术和变频调速技术在塔机制造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合理地利用 PLC 的控制功能和变频器的调速功能,可以减少或避免因人工操作而出现的失误,从而更好地降低动载荷对塔机的危害。在塔机电气控制系统设计中,建议增加以下自动控制环节。

(1)为杜绝在塔机作业时,人为解除力矩限制器和大风报警器的违章行为,在电气控制系统中,增加力矩限制器和大风报警器的状态检测环节,一旦发现力矩限制器和大风报警器被关掉或旁路,应能自动切除具有安全风险的操作电路。

(2)在塔机的工作半径或运行距离控制电路中,增设冗余控制环节。即一个开关失效后,另一个开关自动投入,自动避免塔机超行程或超范围作业。

(3)合理采用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控制功能,实现传动机构的自动加(减)速,使塔机各机构能够软启动、软制动和平滑切换档位,有效降低因驱动速度的突变引起的动载荷。

(4)采用变频器的力矩校验功能来控制制动器的打开与关闭,确保机构启动时首先消除传动构件之间的间隙,然后再打开制动器。在机构制动状态,减速到设定的力矩值时再关闭制动器,以解决传动系统的软起(制)动功能和准确停车之间的矛盾,既能实现软起(制)动功能,降低塔机起(制)动动载荷的大小,又能保证塔机的准确停车。

(5)增加延时控制环节和正常停车与紧急停车的互锁环节,以消除快速打反档产生的危害。即使操作人员因操作失误打错了速度挡位,塔机也必须经过正向降速—停车—反向加速的过程,从而消除了快速打反档产生的速度突变。

(6)采用变频器力矩校验功能,减小升降机构在起吊地面重物时因钢丝绳过于松弛引起的起升动载荷危害。通过检测电动机输出力矩的大小,使钢丝绳逐渐拉紧,起吊物品逐渐受力而提起,从而有效减小或消除起升过程中的动载荷。

(7)增加风速控制、温度控制及操作频度与电气控制系统的连锁控制功能。当风速超过设计风速、温度超过允许温度,或操作频度超过塔机工作级别时,停止具有安全风险的机构操作,从而消除大风、低温或超工作级别造成的塔机损坏。

(8)在容易产生应力集中或者有缺陷的结构节点,预置传感器或后期贴片实时监测应力的变化,并通过置于操作室内的计算机安全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当应力超过设定值时,发出声光报警,警示操作人员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保证塔机的安全运行。

4 应用实例

笔者从 2003 年开始先后参与研发设计了不同型号的塔机近百台,其中超大型塔机有三种型号,FZQ2000 型塔机 20 台、FZQ2400 型塔机 20 台、MQ300t 型塔机 1 台,在塔机设计中均采用了上述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经过 17 年的应用表明,41 台塔机均实现了无振动、无冲击平稳的可靠运行,故障率比传统塔机大幅度降低,无一台塔机发生大的构件损毁,无一台塔机发生倾覆事故。目前这些塔机分布在全国各地,仍然在不同的水利、电力、冶金和港口等国家重点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种型号的塔机深受工程建设单位的青睐。这三种重型塔机的研发,均获得了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种重型塔机使用情况汇总表

规格 specifications 项目 project	FZQ2000	FZQ2400	MQ300t
额定起重量(吨)	80	100	300
首台设备投用时间(年)	2003	2005	2009
生产台数(台)	20	20	1
升降机构变频调速方式	无 PG 矢量控制	有 PG 矢量控制	磁场定向控制
平移机构变频调速方式	V/F 控制	V/F 控制	V/F 控制
PLC 型号	三菱 FX2N	三菱 FX2N	罗克韦尔
变频器型号	安川 G5	安川 G7	罗克韦尔 PowerFlex 700S
使用效果	运行平稳、无冲击、故障率低	运行平稳、无冲击、故障率低	运行平稳、无冲击、故障率低
发生倾覆事故次数	0	0	0

5 结语

本文基于作者数十年塔机设计、安装、调试及事故分析经验,提出动载荷是塔机发生倾覆事故的主要因素,分析了各种动载荷对塔机的危害,并从载荷计算、操作使用、自动控制三方面给出了降低动载荷对塔机的危害和防止倾覆事故发生的综合应对策略。多年的应用实践表明,这些措施都是行之有效的。同时应当指出,由于塔机结构复杂、工作环境恶劣、操作者素质参差不齐,分析和解决塔机安全问题时,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应把塔机的机械、结构、电气控制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地解决塔机的损伤和倾覆事故。尤其是应用先进的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来辅助解决塔机的结构疲劳和倾覆事故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1]王继东,闫玉萍,李晶.建筑塔机溜钩故障的分析及对策[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7,34(11):42-45.
- [2]喻乐康,孙在鲁,黄时伟.塔式起重机安全技术[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4:1-8.
- [3]姚新胜,黄洪,钟伟.塔式起重机安全性研究[J].工业安全与防尘,2000(4):35-9.

- [4]王大会.基于变频工况的起重机工作机构动力学分析与研究[D].太原:太原科技大学,2016:21-23.
- [5]项载毓,肖正明,伍星,等.冲击载荷下铸造起重机主梁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研究[J].机械强度,2015,37(4):718-724.
- [6]王嘉顺,朱国征.塔式起重机倾覆稳定性研究[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2,22(6):27-28.
- [7]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重机设计规范:GB/T3811—2008[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14-15.
- [8]宋传增.塔式起重机的载荷优化计算[J].山东机械,2001(2):24-26.
- [9]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塔式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13752—2017[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7:15-20.
- [10]文豪,秦义校,钱勇.起重机械[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65-80.
- [11]陈熙祖.简易起重机设计手册[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7-10.
- [12]娄凯明.起重机抗倾覆稳定性分析[J].中国设备工程,2019(2)(上):102-10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Damage of Dynamic Loads to Tower Cran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ANG Jidong, YANG Haipeng, SUN Hailing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oper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ower crane, and decade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amages of various dynamic loads to the tower crane structur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dynamic load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tower crane structure damage and overturn accidents.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reduce the damage of dynamic load to tower crane is given from three aspects of load calculation, operation and automatic control.

Key words: tower crane; dynamic load; hazard; measures

碳纤维布部分包裹 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试验研究

黄春晓^{1,2}, 王伟³, 王颖^{1,2}, 潘福婷^{1,2}

(1. 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合肥 230088; 2. 安徽新华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9; 3. 安徽给排水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合肥 230011)

摘要:为了研究碳纤维增强聚合物(CFRP)部分包裹的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和破坏机理,本文进行了8根组合短柱的轴压试验,探讨了钢管强度、CFRP布包裹层数、CFRP布包裹间距等参数对试件轴压性能的影响。通过对破坏模式、轴压荷载(N)-轴向变形(δ)曲线、钢管和CFRP应变响应等试验结果的分析,揭示了CFRP部分包裹圆钢管混凝土轴压短柱的受力机理,提出了组合短柱的轴压承载力计算公式,研究结果将为CFRP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碳纤维增强聚合物(CFRP);部分包裹;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试验;承载力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23

中图分类号:TU398.9;TU35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115-05

1 引言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polymer, CFRP)由于其重量轻、抗拉强度高、施工方便等优点,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构件的极限强度和延性,在加固工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1-2]。钢管混凝土柱在高层和高耸建筑中应用较多,但是由于外钢管的局部屈曲和腐蚀问题,会导致构件的承载力下降,进而降低结构的耐久性^[3-4]。在钢管混凝土柱外层包裹CFRP材料,使核心混凝土处于外钢管和CFRP材料的双重约束之下,可以提高钢管混凝土柱的受压承载力和耐久性^[5-6]。

目前,已有学者对CFRP包裹钢管混凝土构件开展了研究工作。Park等^[7]通过试验研究了轴压荷载作用下CFRP约束钢管混凝土的受力性能。Yu等^[8]研究了CFRP全包裹钢管混凝土柱在循环轴压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性能。陶忠等^[9]对CFRP全包裹的耐火钢管混凝土柱和梁的轴压性能及弯曲性能进

行了试验研究。试验结果均表明,CFRP材料的包裹作用对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承载力有显著的提高。

以上研究主要针对CFRP全包裹的钢管混凝土构件,对于CFRP部分包裹的钢管混凝土柱的轴压性能研究较少。本文对CFRP部分包裹的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进行轴压试验,分析钢管强度、CFRP包裹层数和CFRP包裹间距等参数对试件轴压性能的影响。并在试验的基础上,提出CFRP部分包裹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承载力的计算公式。

2 试验概况

2.1 试件设计

本文设计了8根CFRP部分包裹的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试验参数分别为钢管强度、CFRP包裹层数和CFRP包裹间距,如表1所示。钢管外径均为140mm,厚度为6mm,高度为450mm。试验中采用的CFRP材料为单向承载力抗拉纤维布,宽度均为50mm。试件示意图见图1。

收稿日期:2020-06-01

基金项目:安徽新华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2018zr002);安徽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KJ2019A0885);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812216041)

作者简介:黄春晓(1989—),女,安徽六安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钢结构和组合结构。

表 1 试件设计参数

参数	试件 编号	D (mm)	L (mm)	t (mm)	n (层)	a (mm)	f_{cu} (N/mm ²)	f_{ck} (N/mm ²)	f_y (N/mm ²)	CFRP 包裹 情况
钢管强度	AS11	140	450	6	3	50	31.2	20.9	240.8	部分包裹
	AS12	140	450	6	3	5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CFRP 包裹层数	AS21	140	450	6	0	0	31.2	20.9	348.6	无
	AS22	140	450	6	1	5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AS12	140	450	6	3	5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AS23	140	450	6	5	5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CFRP 包裹间距	AS31	140	450	6	3	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AS32	140	450	6	3	3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AS12	140	450	6	3	5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AS33	140	450	6	3	150	31.2	20.9	348.6	部分包裹

注:表中 D 、 L 和 t 分别表示外钢管的外径、长度和厚度; n 和 a 分别表示 FRP 材料的包裹层数和包裹间距; f_{cu} 和 f_{ck} 分别表示核心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和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_y 表示外钢管的试验屈服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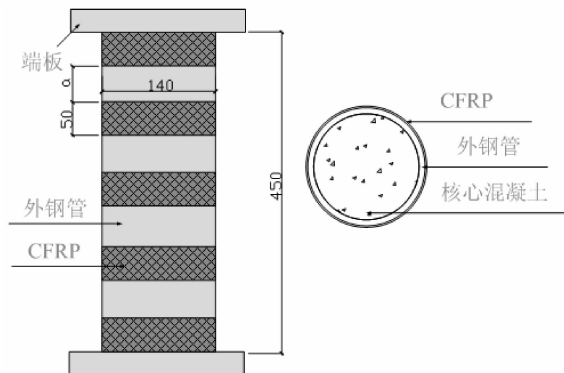


图 1 试件示意图

2.2 材料特性

外钢管选用名义屈服强度为 235MPa 和 345MPa 的无缝圆钢管,其力学性能见表 2。CFRP 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见表 3。核心混凝土选用高性能和高自密实性的商品混凝土(SCC),其标准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值为 31.2N/mm^2 ,弹性模量为 30521.3N/mm^2 ,根据 ACI 规范将其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定为 $0.67f_{cu}$ 。

表 2 钢材特性

钢管	钢管厚度 t (mm)	屈服强度 f_y (N/mm ²)	极限抗拉强度 f_u (N/mm ²)	弹性模量 E (N/mm ²)	断裂伸长率 δ (%)
Q345	6	348.6	487.3	2.02×10^5	13.8
Q235	6	240.8	379.2	1.98×10^5	15.3

表 3 CFRP 材料特性

材料	单位面积 质量 (g/m ²)	抗拉强度 标准值 f_{FRP} (MPa)	伸长率 ϵ_{FRP} (%)	受拉弹性 模量 E_{FRP} (GPa)	抗拉强度 P_f (%)
CFRP	296.0	3510	1.44	243.0	3.3

2.3 试验装置和加载制度

试验均在合肥工业大学结构工程实验室进行。先将一块 50mm 厚的钢板焊接到圆钢管的底部,再将自密实混凝土浇注到钢管中并在实验室中进行养护。一个星期养护期结束后,将另一个 50mm 厚钢

板焊接到圆钢管混凝土柱的另一端,以确保施加均匀的轴向荷载。试验现场装置如图 2 所示,使用 500t 液压万能试验机向柱端施加竖向荷载。

在柱顶、柱底和跨中布置三个线性位移传感器,如图 3 所示。在钢管壁和 FRP 纤维布上应力较大和变形较大的部位布置环向应变片,记录应变值,得出应力分布,如图 4 所示。

正式加载前进行预加载,向柱端施加预计极限荷载的 10%,保持 2 分钟后将荷载增加到 60%,保证试件和底座紧密接触,仪器与装置正常工作。正式加载为分级加载,每级荷载为预计极限荷载的 5%,持载 4 分钟测量数据,直到试件破坏,继续加载至施加轴力下降至极限荷载的 80%,试验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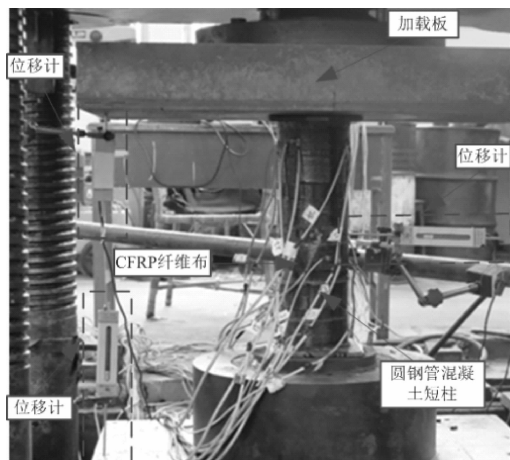


图 2 试验加载示意图

3 试验结果

3.1 试验现象

试验表明,由于核心混凝土的填充作用,阻止了外钢管向内屈曲,组合短柱的主要破坏模式为向外屈曲。然而,钢管向外屈曲的部位主要发生在未包裹 CFRP 纤维布的部位,此外,在包裹区域出现了胶体剥落和 CFRP 纤维布严重断裂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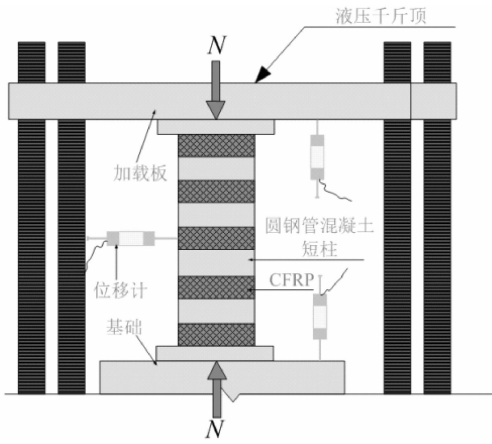


图3 位移计布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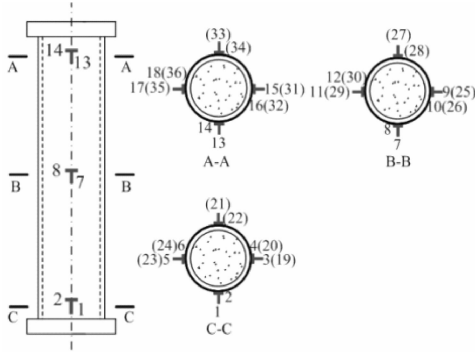


图4 应变片布置图

这些现象表明,CFRP 纤维的拉伸性能在组合短柱的轴压试验中得到了充分利用。试验结束后,剥除外层 CFRP 纤维,剖开外钢管后发现,核心混凝土表面发生褶皱鼓曲,并伴有部分压溃的现象,破坏模式和外钢管保持一致,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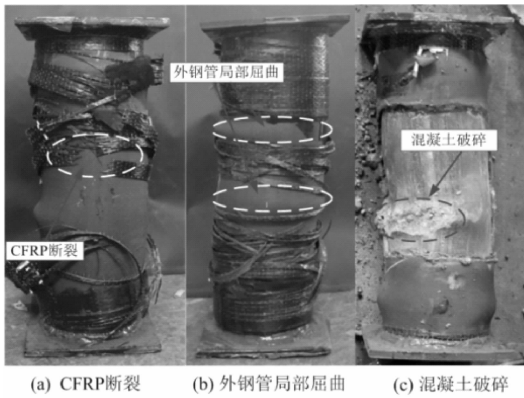


图5 CFRP 约束钢管混凝土短柱的失效模式

3.2 试验结果分析

图 6 所示为 CFRP 部分包裹的钢管混凝土短柱的轴压荷载 - 轴向变形 ($N - \delta$) 曲线。在加载初期,试件处于弹性阶段,当荷载达到极限强度时,由于外钢管的局部屈曲和 CFRP 纤维布的断裂,曲线突然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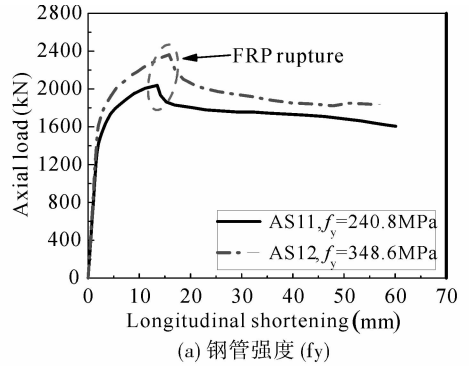
3.2.1 钢材屈服强度

图 6(a) 所示为钢材屈服强度对组合短柱的轴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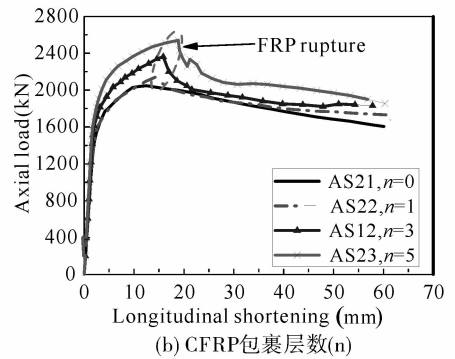
性能的影响。试件 AS11 的极限承载力比 AS12 低 15.6%,而对初始刚度的影响不大。试验结果表明,钢材屈服强度越大,组合短柱的极限承载力越大。

3.2.2 CFRP 包裹层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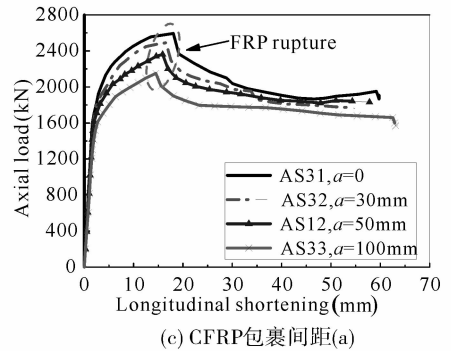
图 7(b) 所示为 CFRP 包裹层数对组合短柱的轴压性能的影响。相比于未包裹 CFRP 纤维布的试件 AS21,包裹层数分别为 1、3 和 5 层的试件 AS22、AS12 和 AS23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高 6.3%、13.4% 和 20.6%。试验结果表明,随着 CFRP 纤维布包裹层数的增加,组合短柱的极限承载力逐渐增大,对初始刚度的影响不大。



(a) 钢管强度 (f_y)



(b) CFRP 包裹层数 (n)



(c) CFRP 包裹间距 (α)

图6 短柱的轴压荷载 - 纵向应变 ($N - \delta$) 曲线

3.2.3 CFRP 包裹间距

图 6(c) 所示为 CFRP 包裹间距对组合短柱的轴压性能的影响。相比于未包裹 CFRP 纤维布的试件 AS21,包裹间距分别为 0、30、50 和 100mm 的试件 AS31、AS32、AS12 和 AS33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提高了 26.1%、18.7%、13.4% 和 5.1%。试验结果表

明,随着包裹间距的增大,组合短柱的极限承载力逐

渐减小,对初始刚度的影响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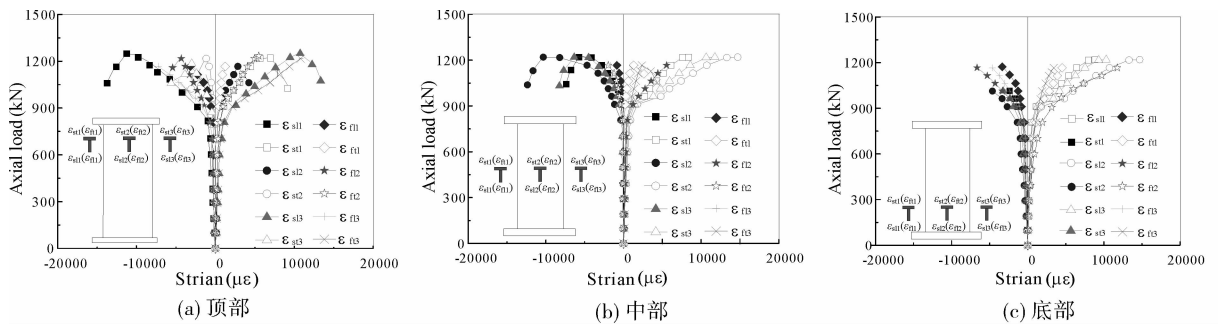


图7 短柱不同截面高度处钢管的 N - δ 曲线

从试验结果可以得出,CFRP 的约束作用明显提高了钢管混凝土短柱的极限承载力,而对初始刚度的影响不大。此外,当 CFRP 碳纤维布突然断裂的时候,所有试件的 N - δ 曲线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轴压荷载作用下,CFRP 约束圆钢管混凝土短柱的延性比没有 CFRP 约束的组合短柱低。

3.3 钢管荷载 - 应力曲线

采用文献 11 给出的钢管应力 - 应变分析方法,得出短柱的轴向荷载和钢管应力的关系曲线。图 7 所示为轴心荷载作用下部分约束钢管混凝土短柱不同截面高度处钢管的 N - δ 曲线,中部 CFRP 碳纤维布率先断裂,而两端基本未发生断裂,靠近短柱中部非包裹区钢管先屈曲,包裹间距越大,钢管越易屈曲。结果表明,钢管底部和顶部的纵向应变基本对称,随着荷载的增大,CFRP 碳纤维布出现破裂现象,拉伸应变可以达到极限应变,说明 CFRP 纤维布在组合短柱中充分增强了抗拉性能。

4 组合短柱的极限强度

目前,由于对 CFRP 部分包裹的钢管混凝土组合柱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统一理论的方法,提出轴压荷载作用下 CFRP 部分包裹的圆钢管混凝土组合短柱的简化计算公式。

4.1 统一理论方法

不同于 EC4^[10] 给出的简单的叠加方法,Han 推荐的统一理论方法将钢管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管和核心混凝土作为一种复合材料。利用钢管混凝土柱的整体几何特性和复合力学参数来计算轴向抗压性能。对于轴压荷载作用下的圆钢管混凝土短柱,简化的设计方法如下:

$$N = A_{sc} f_{scy} \quad (1)$$

$$f_{scy} = (1.14 + 1.02\xi) f_{ck} \quad (2)$$

其中, N 为轴压荷载作用下钢管混凝土短柱的轴向抗压, f_{scy} 指试件的统一强度, A_{sc} 指钢管混凝土短柱的截面面积。

4.2 CFRP 部分包裹钢管混凝土短柱简化经验公式

基于轴压荷载作用下普通的钢管混凝土短柱的统一理论计算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轴压荷载作用下 CFRP 约束的钢管混凝土短柱的简化设计方法。该方法是一种考虑了混凝土强度、钢材强度、CFRP 极限强度和 CFRP 包裹层数的简化模型。

当轴压荷载施加在这种组合短柱的横截面上时,核心混凝土和外钢管会向外扩展。与此同时,CFRP 材料在横向受到的张力提供的约束效应开始抵抗横向扩展。因此,在包裹区域,CFRP 材料可以防止钢管的外扩。在 CFRP 带到达极限强度后,会发生突然的断裂。根据 CFRP 约束钢管混凝土短柱的试验结果,简化计算方法如下:

$$N_{u,scf} = A_{sc} f_{scf} \quad (3)$$

$$f_{scf} = (1.14 + 1.02\xi + 0.265\alpha_f - 0.046\xi_f - 0.902\alpha_f^2 - 0.024\xi_f^2 + 0.732\alpha_f\xi_f) f_{ck} \quad (4)$$

$$\xi_f = A_{fcp} P_f / (A_{sc} f_{ck}) \quad (5)$$

$$\alpha_f = b / (a + b) \quad (6)$$

其中, f_{scf} 指 CFRP 约束钢管混凝土短柱的标准强度; P_f 指 CFRP 布的标准强度; A_{sc} 和 A_{fcp} 分别指组合柱和 CFRP 布的截面面积; ξ_f 指 CFRP 布给钢管混凝土柱的约束系数; α_f 指沿着组合柱高度方向的包裹比; b 是纤维条的宽度, a 是 CFRP 的包裹间距。

将计算承载力和试验结果进行比较,见表 4。结果表明,计算所得结果 ($N_{u,c}$) 和试验结果 ($N_{u,t}$) 吻合良好。

表 4 试验和计算结果对比表

试件编号	$N_{u,t}/\text{kN}$	$N_{u,c}/\text{kN}$	$N_{FE}/N_{u,t}$	$N_{u,c}/N_{u,t}$
AS11	2010.5	2018.4	0.98	1.01
AS12	2324.6	2281.4	1.00	0.97
AS21	2049.1	2048.4	0.99	1.00
AS22	2177.4	2055.0	0.95	0.96
AS12	2324.6	2281.4	1.00	0.97
AS23	2470.3	2354.7	1.00	0.95
AS31	2582.9	2542.1	0.97	0.98
AS32	2432.8	2344.0	0.97	0.96
AS12	2324.6	2281.4	1.00	0.97
AS33	2153.1	2021.8	0.96	0.94

5 结论

5.1 CFRP 约束圆钢管混凝土短柱的失效模式主要包括:钢管壁局部屈曲,CFRP 纤维布的断裂和核心混凝土压碎。组合短柱的外凸曲主要位于未包裹区,表明 CFRP 纤维布的约束可以显著的防止组合短柱的薄壁钢管向外凸出。

5.2 随着钢材强度和 CFRP 包裹层数的增加,CFRP 部分包裹圆钢管混凝土短柱的轴压承载能力逐渐增大,而当 CFRP 包裹间距增大时,其轴压承载降低。CFRP 参数的变化对组合短柱轴向刚度的影响不大。试验结果表明,轴压荷载作用下与 CFRP 全包裹的圆钢管混凝土短柱相比,采用合理的部分包裹办法也可以得到明显的增强承载力的效果。CFRP 部分包裹的钢管混凝土短柱的轴压荷载(N) - 纵向压缩应变(δ)曲线从峰值突然下降是由于 CFRP 碳纤维布的破裂和整体屈曲。随着 CFRP 的断裂,试件 N - δ 曲线出现突然下降。研究表明,其下降幅度与 CFRP 体积约束率有关。

5.3 在统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轴压荷载作用下 CFRP 约束圆钢管混凝土短柱的简化计算经验公式,并通过试验结果进行了验证。简化计算公式可以为 CFRP 应用于钢管混凝土结构提供一种有效的设计方法。

参考文献:

[1]梁炯丰,郭立湘. FRP 钢管再生混凝土柱的性能与分析[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103.

[2]钮鹏,李旭,王晓初. FRP 增强加固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研究进展[J]. 混凝土,2018,5:152 - 156.
[3]张国伟,詹远. 圆截面钢管混凝土柱的局部屈曲性能研究[J]. 世界地震工程,2016,32(2):259 - 263.
[4]彭炜. 钢管混凝土柱构件稳定性研究[D]. 南昌: 南昌航空大学,2017.
[5]朱春阳. 装配式 FRP 增强钢管混凝土柱: 中国, CN107060216A[P]. 2017 - 08 - 18.
[6]LEE D H, HAN S J, KANG S K, LAFAVE J M, Shear strength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s strengthened in shear using externally - bonded FRP composites [J]. Composite Structures,2017,173:177 - 187.
[7]PARK J W, CHOI S M. Structural behavior of CFRP strengthened concrete - filled steel tubes columns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loads, Steel and Composite Structures,2013, 14(5):453 - 472.
[8]YU T, HU Y M, TENG J G. FRP - confined circular concrete - filled steel tubular columns under cyclic axial compression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2014,94(94):33 - 48.
[9]TAO Z, HAN L H, WANG L L. Compressive and flexural behaviour of CFRP - repaired concrete - filled steel tubes after exposure to fire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2007,63(8):1116 - 1126.
[10]Eurocode4(EC4).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S]. Part 1. 8: Design of Joints. Russels. CEN,201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perimental Study on Axial Compressive Performance of Concrete - Filled Circular Steel Tube Stub Columns Partially - wrapped by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HUANG Chunxiao^{1,2}, WANG Wei³, WANG Ying^{1,2}, PAN Futing^{1,2}

(1. Key Laboratory of Building Structure of Anhui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3. Anhui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Hefei, Anhui 23001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axial compressive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concrete - filled circular steel tube stub columns partially - wrapped by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FRP),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xial compression tests on 8 combined stub columns, and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steel strength, number of CFRP layer and spacing of CFRP strip on the axial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f the specime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mode, axial load (N) - axial deformation (δ) curve, steel tube and CFRP strain response, SEI, DI and other test results, the force mechanism of the CFRP partially - wrapped concrete - filled circular steel tube stub column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is revealed,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the axial compression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combined stub column is propo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FRP in actual engineering.

Key words: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FRP); partially - wrap; concrete - filled circular steel tube stub column; axial compression test; bearing capacity

鲜切山药保鲜剂开发及应用效果研究

郑丽萍, 王 皓, 李玉玲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结合鲜切山药保鲜的研究背景,探究天然保鲜剂茶多酚在鲜切山药保鲜中的作用功效,以及使用茶多酚、壳聚糖、柠檬酸组成的复合保鲜剂对鲜切山药的保鲜效果。实验结果表明,茶多酚对鲜切山药起到一定的保鲜作用,能有效抑制内部褐变,延缓鲜切山药氧化速度,其中由0.1%茶多酚、1.0%壳聚糖和1.8%柠檬酸组成的复合保鲜剂对鲜切山药保鲜效果最为显著。

关键词:鲜切山药;茶多酚;复合保鲜剂;应用效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24

中图分类号:TS25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120-05

山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虽不及红薯等作物的普及性,但因其独特的食用药用双重价值而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流传至今。山药中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过氧化氢酶、尿囊素、植酸、山药碱等成分因子^[1-3],还含有多种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必要的无机元素、金属元素和微量元素,可以提高机体免疫能力。除此之外,山药还具备显著降低血糖浓度及血脂浓度的功效,可以调理肠胃功能,增强营养的摄入吸收,起到保健作用^[4]。鲜切山药既保留了山药的营养成分,同时又具备鲜切果蔬方便快捷、可完全食用的特点,因而成为目前山药最合适的加工方式之一。如何增强鲜切山药的抗氧化性能,保证品质质量,延长其商品的货架期,是鲜切山药加工存放与交易流通的关键,这也使得鲜切山药的保鲜问题成为我国山药行业的重点研究方向^[5-7]。

目前,国内鲜切山药等果蔬的保鲜方式主要有化学剂保鲜^[8]、可食性涂抹处理^[9-10]以及天然植物提取液保鲜^[11-13]。其中化学保鲜剂用量少,效果显著,但对人体可能存在副作用;可食性涂抹处理主要可以在山药表面镀膜,形成密闭气调环境来防止山药氧化,并且对人体无毒无危害;天然保鲜剂因效果显著,并对人体有益,近年来成为学者主要研究应用的

方向。

近年来,天然保鲜剂被普遍应用于各种果蔬加工保鲜当中,茶多酚便是其中之一,因其是茶中的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菌抑菌效果,且不会对人体造成毒副作用,广泛应用于草莓、桑葚、鲜切天麻等果蔬植物的保鲜研究中^[14-15]。选用天然保鲜剂茶多酚,与不同浓度的柠檬酸和壳聚糖组成复合保鲜剂,通过单因素实验验证3种溶液的保鲜效果,进一步设计正交实验选出最优复合保鲜剂比例,验证最优比例复合保鲜剂在鲜切山药中的应用效果,考察其对鲜切山药生理特性和品质变化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铁棍山药:市售;壳聚糖(脱乙酰度>95%)、柠檬酸、茶多酚、邻苯二酚、福林酚、没食子酸标准品:均为分析纯。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BROOKFIELD CT3 质构仪:美国 BROOKFIELD 公司;AE124 分析天平: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UV-1800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TG16 台式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SLDS-1 电导率仪:南京桑力电子设备厂。

收稿日期:2020-07-13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911068024)

作者简介:郑丽萍(1986—),女,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型材料的开发及其性能研究。

1.3 实验方法

单因素实验:称取不同质量的茶多酚、壳聚糖和柠檬酸,分别配置浓度为0.1‰,0.2‰,0.3‰,0.4‰,0.5‰的茶多酚溶液;0.5%,1.0%,1.5%,2.0%,2.5%的壳聚糖溶液以及0.6%,1.2%,1.8%,2.4%,3.0%的柠檬酸溶液。每组溶液中放置4块大小一致的山药块,浸泡15 min后取出自然沥干,于保鲜柜中贮藏5天。测定贮藏后失重率、感官评分、质构等数值,分析其对鲜切山药的保鲜效果。

正交实验:在单因素实验结果基础上设计正交实验,分析、筛选出最优比例的复合保鲜剂。

验证实验:采用最优复合保鲜剂处理鲜切山药,监测贮藏不同时间山药的失重率、感官评分、质构、多酚氧化酶活性(PPO)、总酚含量、相对电导率等性能或品质的变化,验证最优复合保鲜剂在鲜切山药中的应用效果。采用万分之一分析天平测定贮藏前后鲜重,得出失重率;设置感官评分表并由5名感官评价员进行感官评分;采用质构仪测定山药的表面硬度和表面弹力;采用邻苯二酚法测定多酚氧化酶(PPO)活性^[16];使用福林酚比色法测定总酚含量^[17];采用电导率仪测定相对电导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鲜切山药保鲜剂的配方设计

2.1.1 壳聚糖溶液对鲜切山药失重率、感官评分及质构的影响

壳聚糖形成的膜层具有阻水性,可以抑制山药内部的呼吸作用和水分散失,减少因自身生理活性而造成的消耗。图1a为使用壳聚糖溶液处理后贮藏4天鲜切山药的失重率随壳聚糖浓度的变化曲线(同一条件下测试4个样品,取平均值)。由图1a可知,随着壳聚糖溶液浓度的逐渐增加,鲜切山药的失重率逐渐降低,且降低效果与对照组相比较显著(对照组鲜切山药失重率为1.38%);由图1b可知,各浓度的壳聚糖溶液均能对鲜切山药起到不同程度的保鲜护色功能,保持较高的感官评分(对照组为81.2分)。图1c为不同浓度壳聚糖溶液保鲜的山药硬度数值,对比可知,经各浓度壳聚糖溶液处理过的鲜切山药贮藏后,其表面硬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604.3 g)。

2.1.2 柠檬酸溶液对鲜切山药失重率、感官评分及质构的影响

由图2a可知,柠檬酸处理过的鲜切山药在低温保藏4天后的失重率明显低于清水对照组(1.38%)。整体来说,鲜切山药的失重率数值与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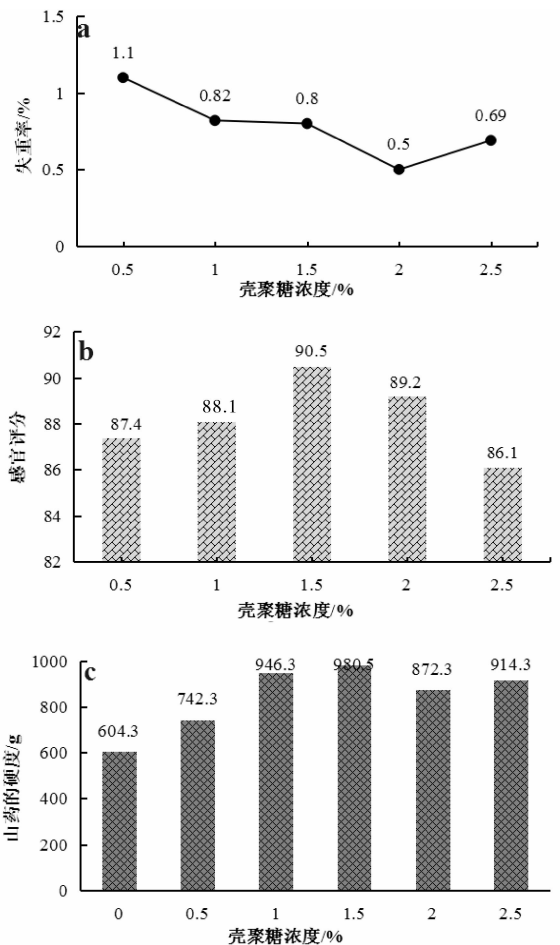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浓度壳聚糖对山药失重率(a)、感官评分(b)和硬度(c)的影响

檬酸浓度的增长成反比,并且在柠檬酸浓度为1.8%时其失重率最低。图2b展示了柠檬酸溶液处理的鲜切山药低温保藏后感官评分的变化情况,表明柠檬酸溶液处理后山药感官评分均高于清水对照组(81.2分)。当柠檬酸浓度在0.6%~1.8%时,感官评分随着柠檬酸浓度的升高而变高,浓度为1.8%时得分最高。图2c为柠檬酸处理后,鲜切山药经贮藏其硬度变化情况,表明各浓度下山药的表面硬度数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2.1.3 茶多酚溶液对鲜切山药保鲜效果的影响

茶多酚为茶叶中主要的提取物质,表现出优秀的抗氧化能力和抑菌作用,常常作为食品及果蔬中的天然保鲜剂^[13]。茶多酚作为草莓、桑葚、天麻等果蔬的主要保鲜剂,浓度为0.2%~2.0%时可取得良好的保鲜效果^[18],本实验的前期单因素实验中,发现采用0.5%~1.5%浓度的茶多酚溶液浸泡鲜切山药,沥干后被茶多酚溶液染色较为严重。根据国标中关于茶多酚在添加剂中含量的规定,重新设置浓度区间为0.1~0.8 g/kg。实验结果表明,0.1‰,0.2‰和0.3‰浓度的茶多酚溶液不仅对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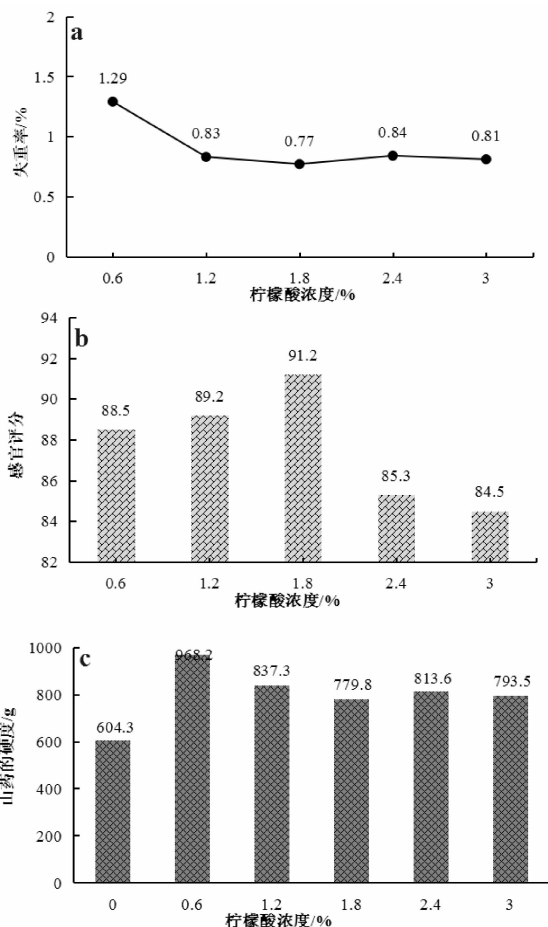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浓度柠檬酸对失重率(a)、感官评分(b)和山药硬度(c)的影响

切山药起到一定程度的保鲜作用,同时也不会使乳白色的鲜切山药被浸染发黄。表1为不同浓度茶多酚溶液对鲜切山药失重、感官评分、硬度的影响情况。由表1可知,茶多酚虽对鲜切山药起到保鲜作用,但效果不显著,主要原因是由于茶多酚浓度偏低,其次是因为茶多酚对于果蔬的保鲜,更多的是作为抑菌剂,防止细菌微生物侵染细胞,不同于壳聚糖、柠檬酸防止自身成分消耗的作用机理。

表1 贮藏后鲜切山药保鲜效果情况与茶多酚溶液浓度关系表

	0.1%茶多酚	0.2%茶多酚	0.3%茶多酚	清水组
失重率/%	1.07	1.01	1.09	1.38
感官评分/分	86.3	84.5	83.9	81.2
硬度/g	610.5	620.5	626	604

2.1.4 正交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单因素实验,选取3种因素保鲜效果最好的3个浓度区间设计正交实验(L_9)。选取的茶多酚溶液、柠檬酸溶液、壳聚糖溶液浓度见表2。

表2 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A 茶多酚/%	B 柠檬酸/%	C 壳聚糖/%
1	0.1	0.6	1.0
2	0.2	1.2	1.5
3	0.3	1.8	2.0

将不同样本浸泡后沥干,放入食品专用保鲜柜低温贮藏,以贮藏3天后山药感官评分和失重率为指标依据,进行数据计算,正交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以感官评分为主要指标,失重率为验证保鲜效果指标。

表3 鲜切山药保鲜效果正交实验结果

实验号	A	B	C	D(空)	感官评分
1	1	1	1	1	91.2
2	1	2	2	2	90.4
3	1	3	3	3	88.7
4	2	1	2	3	86.5
5	2	2	3	1	85.7
6	2	3	1	2	92.2
7	3	1	3	2	82.2
8	3	2	1	3	91.6
9	3	3	2	1	90.2
k_1	90.1	86.6	91.7	89.0	
k_2	88.1	89.2	89.0	88.3	
k_3	88.0	90.4	85.5	88.9	
R	2.1	3.8	6.2	0.7	
优化水平			$A_1B_3C_1$		

对正交实验中鲜切山药保鲜情况的感官评分数据分析可知,最优方案为 $A_1B_3C_1$,即0.1%茶多酚溶液/1.8%柠檬酸溶液/1.0%壳聚糖溶液。3种因素对鲜切山药保鲜效果影响的显著程度为:壳聚糖溶液>柠檬酸溶液>茶多酚溶液。

2.2 鲜切山药保鲜剂的应用效果研究

2.2.1 保鲜剂对鲜切山药失重率和感官评分的影响

山药切块后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或在切割过程中山药组织受到不可逆转的机械性损伤,均能加快营养物质的流失速率和水分的蒸发速率,使鲜切山药失重率增加。由图3a可知,在前4天内由 $A_1B_3C_1$ 比例复合保鲜剂处理过的鲜切山药贮藏后,其失重率均低于清水处理的山药,且随着天数增长,清水组失重率高于复合保鲜剂处理组的比例逐渐升高,证明该比例复合保鲜剂能明显阻止鲜切山药中水分的逸出和营养物质的消耗,达到保鲜并延长贮藏时间的作用。

感官评分是最直观判定鲜切山药保鲜情况与品质变化程度的指标。当鲜切山药发生氧化褐变或霉变时,表面颜色变深,感官评分降低,丧失可食用性并无法再保藏。经 $A_1B_3C_1$ 复合保鲜剂处理过的鲜切山药感官评分情况如图3b所示。由图3b可知,复合保鲜剂处理的鲜切山药保鲜情况(感官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且随着贮藏天数增加感官评分下降趋势较缓。相比之下,对照组在第3天时感官评分就下降至90分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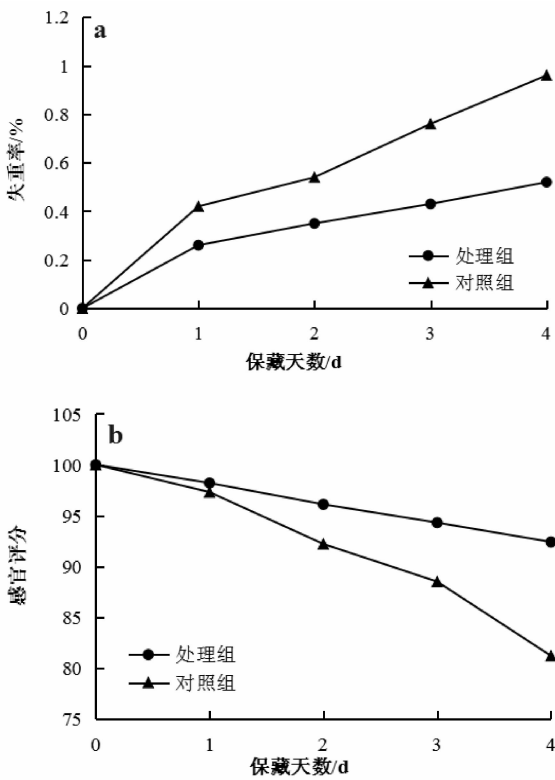


图3 复合保鲜剂处理后山药失重率(a)和感官评分(b)的变化情况

2.2.2 保鲜剂对鲜切山药质构的影响

使用质构仪测定鲜切山药的硬度与弹力系数。由于山药块略小且厚度相对较薄(1 cm左右),使用TA39探头对山药进行表面刺穿1 mm,测试所得硬度和弹力随贮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由图4a可知,清水对照组的表面硬度随着贮藏时间增加而减少,这可能是由于表面水分散失严重,细胞组织结构逐渐松散进而导致硬度降低;处理组第1天硬度测定结果偏低,主要原因是经保鲜剂处理的山药表面水分被膜物质锁住,表面水分仍然充足,从而导致硬度系数偏低。由图4b可知,使用复合保鲜剂处理后山药的弹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变化缓慢,这是由于处理后的鲜切山药内部水分及营养成分保存良好,弹力较高,而对照组鲜切山药在自身呼吸作用与外部氧化褐变的影响下水分散失,营养物质流失,使内部质构逐渐失去弹性。

2.2.3 保鲜剂对鲜切山药中多酚氧化酶(PPO)活性的影响

用邻苯二酚消光值法测定山药中多酚氧化酶(PPO)活性。使用分光光度计在 $\lambda = 410$ nm处,以蒸馏水为对照组测定样本在该波长下吸光度变化值。测得其在第3天时PPO活性为 $34.2 \text{ U} \cdot \text{min}^{-1} \cdot \text{g}^{-1}$,而对照组为 $41.2 \text{ U} \cdot \text{min}^{-1} \cdot \text{g}^{-1}$,明显低于对照组,证明该复合保鲜剂可以抑制山药内部多酚氧化酶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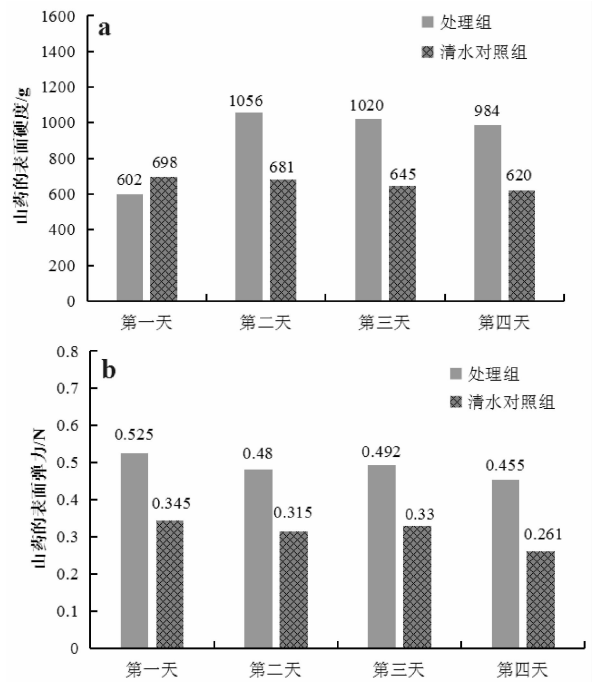


图4 鲜切山药的表面硬度(a)和表面弹力(b)随贮藏天数增加的变化
2.2.4 保鲜剂对鲜切山药中酚类物质含量以及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2.2.4 保鲜剂对鲜切山药中酚类物质含量以及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处理组鲜切山药在第3天测得的酚类物质总含量为 $24.2 \times 10^{-2} \text{ mg} \cdot \text{g}^{-1}$,对照组总含量为 $19.1 \text{ mg} \cdot \text{g}^{-1}$;测得保鲜处理过的鲜切山药样本相对电导率为19.8%,清水对照组为26.3%。证明该复合保鲜剂能抑制山药内部褐变反应,保持抗氧化总酚含量,并保持山药细胞膜的透性和完整性。

3 结论

通过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探究不同浓度壳聚糖、柠檬酸、茶多酚溶液对鲜切山药的保鲜效果,筛选出最优比例的复配保鲜剂,主要结论如下:

(1)壳聚糖、柠檬酸、茶多酚3种单一保鲜剂均能有效抑制鲜切山药品质降低,复配保鲜剂的最优比例为0.1%茶多酚/1.0%壳聚糖/1.8%柠檬酸。影响鲜切山药保鲜效果显著程度依次为:壳聚糖溶液 > 柠檬酸溶液 > 茶多酚溶液。

(2)含有茶多酚的复配保鲜剂处理过的鲜切山药,其质构、感官评分、失重率等参数均优于对照组以及单因素实验组;该复配保鲜剂处理过的鲜切山药贮藏至第3天时,内部总酚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内部多酚氧化酶(PPO)活性与相对电导率数值均低于对照组。

(3)含有茶多酚的复配保鲜剂处理鲜切山药能明显延缓山药内部酶促褐变反应,减少营养物质及水分的流失,保护了鲜切山药组织细胞膜的透性和完整性,减缓鲜切山药品质的变化。

参考文献:

- [1] 龚凌霄, 池静雯, 王静, 等. 山药中主要功能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食品工业科技, 2019, 40 (16): 312-319.
- [2] 陈梦雨, 刘伟, 俞桂新, 等. 山药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J]. 中医药学报, 2020, 48 (2): 62-66.
- [3] 廖朝晖, 朱必凤, 刘安玲. 山药主要生化成分含量的测定[J]. 韶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 24 (3): 67-69.
- [4] 孙晓生, 谢波. 山药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J].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011, 22 (3): 353-355.
- [5] 王梅, 徐俐, 王美芬, 等. 复合保鲜剂对鲜切山药保鲜效果的影响[J]. 食品与机械, 2017, 33 (5): 134-140.
- [6] 屠琼芳. 不同贮藏方式下山药生理特性和品质变化及鲜切山药保鲜效果的研究[D]. 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 2009.
- [7] 樊林娟. 鲜切山药酶促褐变及其抑制方法研究[J]. 轻工标准与质量, 2018 (2): 68-69.
- [8] 唐金蕾, 陈媛媛, 程代, 等. 复合保鲜液对鲜切山药的护色保鲜作用[J]. 食品与发酵工业, 2020, 46 (3): 212-220.
- [9] 马利华, 秦卫东, 陈学红, 等. 可食性膜特性与鲜切山药涂膜保鲜效果的研究[J]. 食品工业科技, 2013, 34 (17): 326-329, 333.
- [10] 王兰菊, 屠琼芳, 刘颖, 等. 壳聚糖涂膜对鲜切山药品质的影响[J]. 食品工业科技, 2009, 30 (4): 309-311.
- [11] 李元政, 胡文忠, 薛仁高娃, 等. 天然植物提取物的抑菌机理及其在果蔬保鲜中的应用[J]. 食品与发酵工业, 2019, 45 (14): 239-244.
- [12] CHEN C, LIU C H, CAI J, et al. Broad-spectrum antimicrobial activit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garlic (*Allium sativum*) extracts [J]. Food Control, 2018, 86: 117-125.
- [13] YONG A L, OOH K F, Ong Hean-Chooi,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ntibacterial mechanism and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l protein targets mediated by antibacterial medicinal plant extracts [J]. Food Chemistry, 2015, 186: 32-36.
- [14] 张宇航, 王荣荣, 邢淑婕. 茶多酚在果蔬贮藏保鲜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16, 37 (11): 210-214.
- [15] 冯文婕, 刘雅慧. 茶多酚/壳聚糖复合涂膜保鲜剂的开发[J]. 农业科技与装备, 2019 (1): 47-49.
- [16] 李全宏, 赵雅松, 蔡同一, 等. 鲜切马铃薯褐变抑制效果研究[J]. 食品科学, 2005, 26 (9): 74-77.
- [17] 杨选平, 曹继武, 黄雪芳, 等. 福林酚比色法测定棕榈花中多酚含量的研究[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7 (11): 128-128.
- [18] 曹森, 赵成飞, 崔世江, 等. 复合保鲜剂对鲜切天麻贮藏品质的影响[J]. 包装工程, 2020, 41 (1): 31-36.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of Fresh - Cut Yam Preservatives

ZHENG Liping, WANG Hao, LI Yuli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resh-keeping technology of fresh-cut yam was introduced briefly, and the effect of natural preservative tea polyphenol on fresh cut yam was explored,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compound preservative composed of tea polyphenol, chitosan and citric acid on fresh cut y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 polyphenol has a certain fresh-keeping effect on fresh cut yam, which can inhibit the internal browning and delay the oxidation speed of fresh cut yam. Among nine compound preservatives, the compound preservative composed of 0.1% tea polyphenol, 1.0% chitosan and 1.8% citric acid show the most significant fresh-keeping effect on fresh-cut yam.

Key words: fresh-cut yam; tea polyphenol; complex preservative; application effects

不同品种山药的质构相关性研究

赵国欣, 赵永岗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分析测试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山药是一种传统的药食同源植物,其营养价值丰富。传统的山药口感评价仅仅依赖于人体的感官评价,评价易受身体、心理和外界因素的影响。利用质构仪对不同品种山药的硬度、弹性、黏附力、内聚性、咀嚼性及胶着性等感官特征进行相关性研究,可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从而建立科学量化的评价山药质构特性的方法。对7种山药进行压缩测试和全质构分析(TPA)测试,TPA测试结果表明:金秤砣山药和铁棍山药中淀粉和蛋白质含量较高,其内部分子结构较为紧密,表现出较大的硬度、弹性、黏度、内聚性、咀嚼性和胶着性等TPA指标;菜山药水分含量较高,其分子结构较为稀疏,TPA指标相对较小。

关键词:山药,感官评价,智能感官技术,质构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25

中图分类号:TS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125-04

山药是一种传统的药食同源植物,《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其具有“主治伤中,补虚羸、除寒热邪气、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聪目明,经身不饥延年”的功效^[1]。据统计,世界上现存600余种山药,其中93种产自中国^[2]。在中国,山药多产于河北、河南、山东和云南等地。因品种、产地、气候等影响因素不同,各品种山药的营养成分差异较大^[3],口感差异也较大。

智能感官技术具有识别度高、稳定性好、客观性强、方便快捷等特点,能有效协助人类对食品进行区分^[4]。质构分析作为智能感官分析的代表,近年来在食品分析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5-7]。质构分析主要是对产品与人们感觉相关的机械特性进行测量评估,用来分析食品的脆性、硬度、嫩度、黏性、咀嚼性、内聚性、弹力、拉伸强度、穿透度、抗压强度等各项物理指标。

本实验通过对生山药的表皮与果肉进行穿透实验来测定生山药的硬度,并以此判断其可运输性(即在运输过程中是否易受外力损伤)。对熟山药

则进行对口感影响比较大的硬度、弹性、黏附力、内聚性、咀嚼性及胶着性的全质构分析(Texture profile analysis TPA),从而对比不同品种山药口感的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BROOKFIELD CT3 质构仪:美国 BROOKFIELD 公司,TA-39、TA-41 探头,TA-BT-KIT 夹具基台。

1.2 材料

本实验所用山药来自不同产地,其名称、产地及外形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品种山药产地及外形

山药品名	产地	直径/cm	长度/cm
牛腿山药	山东泰安	4-5	70-80
水山药	山东菏泽	4-5	50-60
细毛山药	山东新城	3-5	80-100
菜山药	河北蠡县	4-5	60-70
铁棍山药	河南焦作	2-3	60-80
小白嘴山药	河北保定	2.5-3.5	40-50
金秤砣山药	云南昆明	6-8	18-24

收稿日期:2020-07-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高校重点研究项目(20B550009)

作者简介:赵国欣(1980—),女,河南沁阳人,理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分析测试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仪器分析研究工作。

1.3 实验方法

1.3.1 样品处理

分别取7种山药中形态较为标准者,清洗干净。果肉硬度实验取山药中段制成长度2 cm的圆柱体,探头插入方向为山药生长方向。

表皮硬度实验取山药中段,切成2 cm的圆段,并从中间切开,测试时切面朝下,表皮朝向探针。

熟山药取山药果肉中心位置,制成2 cm直径的圆柱体,分别在水沸腾后以1000 w功率煮10 min,然后取出放至室温(10 min)进行测试,测试时探头插入方向为横截面方向。

1.3.2 实验条件

不同测试项目对应的仪器操作条件见表2。其他参数保持一致:目标(探头插入深度):5.0 mm;测试速度:1.00 mm/s;返回速度:1 mm/s。

表2 不同测试项目对应的质构参数

测试项目	测试类型	探头类型	负载单元/g	触发点负载/g
果肉硬度	压缩	TA-39	1000	2
表皮硬度	压缩	TA-39	10000	10
熟山药质构	TPA	TA-41	10000	10

2 结果与讨论

本文分别从硬度、弹性、黏附力、内聚性、咀嚼性及胶着性等方面对比7类山药的TPA特征。图1~图7为不同品种熟山药的TPA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几种山药质构特性略有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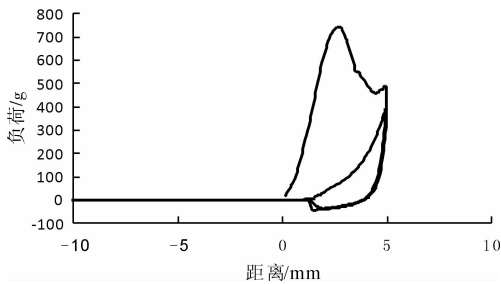


图1 菜山药的TPA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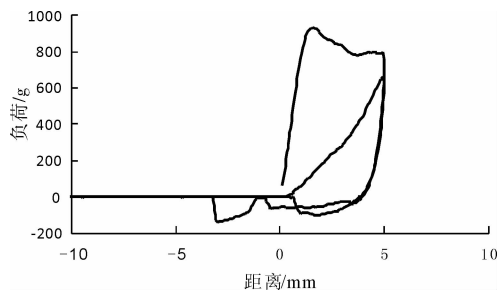


图2 金秤砣山药的TPA图

2.1 硬度

硬度感官定义为牙齿间用来压迫山药所需的最大力,即压缩实验或TPA实验中所需的最大力值。硬度的大小体现了山药保持形状的内部结合力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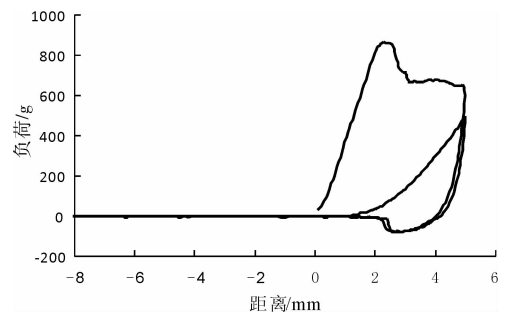


图3 牛腿山药的TPA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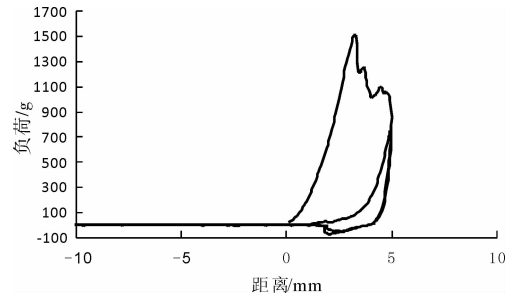


图4 水山药的TPA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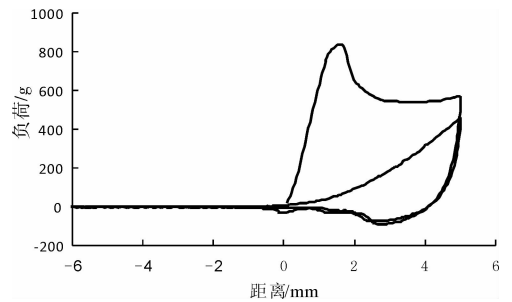


图5 铁棍山药的TPA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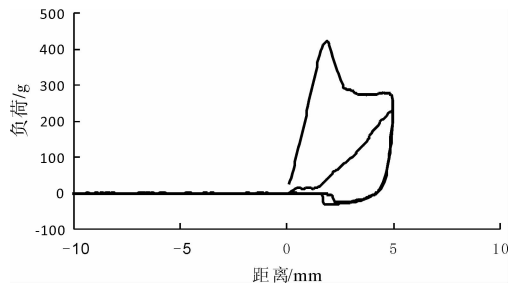


图6 细毛山药的TPA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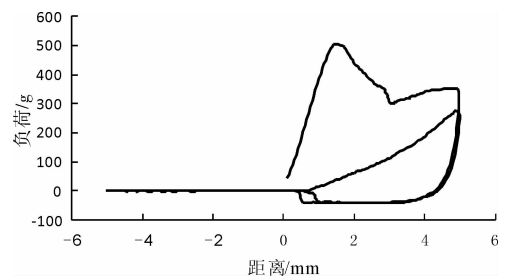


图7 小白嘴山药的TPA图

小。实验分别测定了不同品种生山药的果肉和表皮硬度,测定结果见图8。从图8可以直观地看出表皮硬度从高到低依次是金秤砣山药、铁棍山药、小白

嘴山药、细毛山药、牛腿山药、菜山药以及水山药；而果肉硬度从高到低依次是铁棍山药、细毛山药、金秤砣山药、小白嘴山药、菜山药、牛腿山药以及水山药。因此,结合表皮硬度、果肉硬度以及山药外形来看,金秤砣山药的可运输性最佳,铁棍山药、小白嘴以及牛腿山药次之,以上4种山药在运输过程中受到外力不易损伤折断。细毛山药、菜山药的可运输性比较一般,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一定的保护。由于水山药的表皮硬度与果肉硬度均大幅低于其他山药,因此在运输过程中需要比较严格的保护措施。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铁棍山药的表皮与果肉硬度都很高,但是由于其体型细长,直径仅为2.5 cm左右,是本次实验所有山药中最细的,因此在运输过程中要在包装的抗弯折性上做足够的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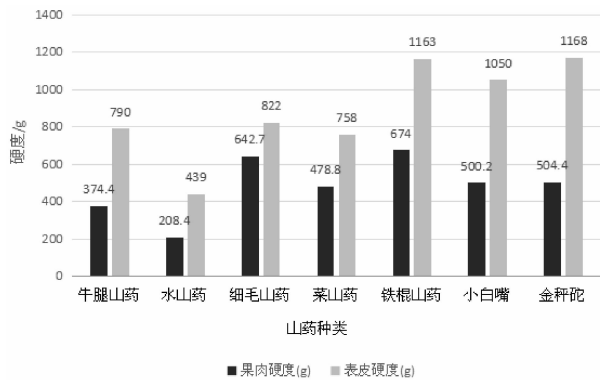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品种山药果肉与表皮硬度对照图

同种山药煮熟后,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即温度渐渐趋于室温时,其硬度值也有变化。实验发现:放置时间越长,即温度值越低,其硬度值越高。原因可能为温度降低的过程水分随之挥发,山药体积缩小,分子间距变小,因此山药分子间内部结构变得更加紧密。放置10 min后其硬度值趋于稳定,故本实验TPA测试均为山药煮熟后放置10 min再进行。表3列出了不同品种山药煮熟后的硬度、弹性、黏附力、内聚性、咀嚼性及胶着性等质构参数。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水山药的水分含量较多,淀粉含量相对较少,因此在煮的过程中内部组织结构变化相对不大。所以水山药煮熟后仍然保留了高的硬度值。而细毛山药和小白嘴山药淀粉含量较高,煮熟后淀粉糊化,使内部结构变得较为疏松,所以表现出了较低的第一循环硬度^[8]。而金秤砣山药和铁棍山药则在淀粉含量较高的同时内部组织结构也较为紧密,所以第一循环硬度依然较高。

2.2 弹性

弹性感官定义为连续2次咬样品间样品恢复的高度。同样条件下,样品恢复越高,弹性越好。弹性

表3 不同品种熟山药质构特性

样品名	硬度/g	弹性/mm	黏附力/g	咀嚼性/mJ	胶着性/g	内聚性
牛腿山药	866.0	3.46	75.0	7.30	214.00	0.25
水山药	1511.0	3.58	53.0	8.60	244.00	0.16
细毛山药	421.0	4.57	31.0	6.20	139.00	0.33
菜山药	743.0	3.39	37.0	5.40	161.00	0.22
铁棍山药	838.0	6.94	90.7	18.13	266.40	0.32
小白嘴山药	505.0	4.06	42.0	5.80	147.00	0.29
金秤砣山药	931.0	4.53	138.0	14.30	323.00	0.35

受蛋白质含量等因素影响,蛋白质含量越高,弹性越强。表3数据表明:铁棍山药,细毛山药和金秤砣山药蛋白质含量高,弹性好;而水山药和菜山药蛋白质含量低,弹性则较差。

2.3 黏附力

黏附力感官定义为牙齿克服与山药接触的吸引力所需的力,是指压缩实验过程中最大的负值力。它能反应山药分子间结合力的大小,结合力越大,黏附力越大。从表3可以看出:金秤砣山药和铁棍山药由于组织结构较为紧密且淀粉和蛋白质含量较高表现出了较高的黏附力。感官上表现为口感较为紧实,比较粘牙。水山药、细毛山药、菜山药和小白嘴山药的黏附力均不高,表现在口感上就是口感较为滑嫩。

2.4 内聚性

内聚性表征组成样品结构的内部键力。它的数学定义为TPA实验第二循环压缩功/第一循环硬度功。研究表明,内聚性与样品分子内部的蛋白质结构或交联有关^[9]。内聚性是山药抵抗外界因素的损伤并紧密连接,使自身保持完整的性质,比值在0到1之间,内聚性越大,口感越细腻。由表3可知,几种山药内聚性大小顺序为:水山药 < 菜山药 < 牛腿山药 < 小白嘴山药 < 铁棍山药 < 细毛山药 < 金秤砣山药。金秤砣山药、细毛山药和铁棍山药内部键力更大,内聚性更高,口感更细腻。

2.5 咀嚼性

咀嚼性即所说的咬劲,表示咀嚼吞咽一个具有弹性的样品所需的能量。它的数学定义为硬度、内聚性、弹性三者的乘积。由于金秤砣山药和铁棍山药内部结构紧密,硬度较高,弹性较大,因此其咀嚼性较高,其他类型山药咀嚼性则较低。

2.6 胶着性

胶着性是山药被咀嚼时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结合力,反映了山药细胞间的结合力大小。它的数学定义为硬度和内聚性的乘积。金秤砣山药,细毛山药和铁棍山药内部组织结构较为紧密,表现出较大的胶着性。

3 结论

结合表皮硬度值、果肉硬度值以及山药外形来看,金秤砣山药的可运输性最佳;铁棍山药、小白嘴山药以及牛腿山药次之;细毛山药、菜山药的可运输性一般,在运输过程中需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熟山药 TPA 测试结果表明:金秤砣山药和铁棍山药淀粉和蛋白质含量较高,内部分子结构较为紧密,因此表现出了较大的硬度、弹性、黏度、内聚性、咀嚼性和胶着性等 TPA 指标,口感上更加黏滑细腻。菜山药水分含量较高,且分子结构较为稀疏,因此 TPA 指标都相对较小,口感上更加脆嫩。

智能感官技术的选择可以更加科学客观、稳定地指导人类对食品品质进行区分,帮助人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食品。

参考文献:

- [1] 尧俊英,刘苏萌,冯昕,等. 山药组织培养研究进展[J]. 河北农业科学,2009, 13(9):51-53.
- [2] FU Y, CHEN S, PAUYAU H A, et al. Application of Bubble Separation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oline in Dioscorea

(Yam) Tubers[J]. J Agric Food Chem,2005, 53(7):2392-2398.

- [3] 舒锐,李晓龙,聂玉杰,等. 不同品种山药主要营养成分的比较分析[J]. 种子科技, 2019(13):33-34.
- [4] 彭毅泰,黄益前,朱宇轩,等. 基于智能感官评价区分杂粮在馒头加工中的应用初探[J]. 粮食与油脂,2020,33(6):54-58.
- [5] 李红艳,刘天红,姜晓东,等.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珍珠龙胆石斑鱼营养成分、食用安全性和质构特性分析[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20,11(12):4083-4090.
- [6] 江连洲,冉安琪,贾子璇,等. 不同贮藏期大豆蛋白对千页豆腐品质的影响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2019,35(20):311-318.
- [7] 庄洋,陈露,田成,等. 腐乳营养成分与质构特征及其偏相关分析[J]. 食品科学,2020, 41(3):80-85.
- [8] 师俊玲. 蛋白质和淀粉对挂面及方便面品质影响机理研究[D]. 陕西杨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1.
- [9] 郝红涛,赵改名,柳艳霞,等. 肉类制品的质构特性及其研究进展[J]. 食品与机械,2009,25(3):125-128.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hinese Yams

ZHAO Guoxin, ZHAO Yonggang

(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yam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medicinal and edible homologous plant, which has rich nutritional value. The traditional sensory evaluation of Chinese yam only relies on human feelings, which is subject to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evalu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ardness, springiness, adhesion, cohesiveness, mastication and gumminess by using intelligent sensory technique - texture analyzer, so a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ally quantified method for the evaluation of yams.

Key words: yams, sensory evaluation, intelligent sensory technology, texture profile analysis